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上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总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祆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镯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的“白衣秀士”祆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序

程兆奇

这本“文革”社会生活史是大陆长年研究“文革”的第一部专著，值此出版之际，对老友谨致由衷祝贺。

我和大陆相识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打乱秩序的“革命”喧嚣已经过去，社会重新回到了比十七年更甚的压抑和沉闷的轨道，前程茫茫，任何向往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由于我们生长的时代自始就是一个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封闭环境（就“隔绝”而言“竹幕世界”并非诬词），其实对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一片茫然。但渴望自由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当时大陆写了不少小说、诗歌，具体内容和词句今天已不复记忆，对未来憧憬的印象则至今犹存在我的脑际。那个时代极度贫乏，唯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光阴”可以恣意挥霍，我们在一起不知聊过多少个日夜。回想起来，大陆立志把身经的时代写下来的想法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以后大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这些年大陆每当发现稀见的新材料，或采访重要的当事人，都会及时让我分享，不过我从未听大陆谈过为什么他要持久坚持研究“文革”。我想大陆的原动力应该和大陆在“文革”中的特殊遭遇和感受有关。这

一点有必要稍作说明。

“文革”在它结束后的不久即被定性为“灾难”，这是 1949 年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不留尾巴彻底否定的唯一例外。今天对“文革”的多样看法固然是因为“伤痛”的淡忘，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可以较容易从广阔的视野中看到“文革”的不同面相。即使从灾难着眼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也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文革”和十七年，是意外的歧出还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说十七年是不是“理想国”，今天的认识都远较当年丰富。但无论如何，“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确实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在这个巨大灾难中每个个体的情况当然会有不同，大陆的手足之亲直至“文革”后期仍遭飞来横祸，可以说他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民族是真正称得上患难与共的。所以，大陆致力于“文革”研究不同于对待一般的“学术”课题，当然更不是闲情逸致式的兴趣。

我在这里特别交代大陆的“家国之痛”，是想说明为什么大陆本来完全有资格和理由像时下海内外大多数有关著述一样对“文革”作批判性的反省，而呈献给读者的却是一部“学术”型的专书。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历史总还是要以真实的人事为对象，总还是以求解真相为目的。即使认为史料不能摆脱记述者的主观因此真实本不可知的极端主张，也不可能放弃求真的努力，否则便与史学无关。大陆近年主要是通过广征史料来梳理史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大陆选择这一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有感于相关著述对史实的轻忽。

“文革”是我们及身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亲切的体会，这点对我们认识“文革”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说，“亲历”既不能保证记忆不误，也不能保证观察无偏；有时因情所系反而会遮蔽理

性的眼光。大陆所举“文革”时期上海是否使用过“肉票”的讹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所以主有者形诸笔墨时便毫无犹豫，理所当然。其实“文革”未用肉票记载明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中就有现成答案。这一点最可说明：一、束书不观但凭印象的不可靠；二、误记已成常识；三、因此，传达正确的知识就有了格外的必要。说到志书，本书“人口史”、“经济生活史”等章节的有些结论多有迳援志书之处。我想大陆在这点上所取的宁失于“浅”勿失于疑的态度，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写史者的当取态度。我说的“浅”不是指“义理”上未作深论，作为社会生活史的一种，大陆此卷和全书一样，主要是叙述各个时期和各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做理论上的总结，或借“社会生活”之酒浇自己的块垒；我说的是大陆对上海“文革”史料的掌握不在任何人之下，所叙相当部分内容的第一手材料都曾经眼，但在援引根据时大陆尽可能以新修志书为据，未作繁复征引。我想除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之意，大陆的考虑主要是志书取材多为官方文献（官私记录的信疑不可一概而论），修订也有较严格的程序，在知识的准确性上相对较高。这在“炫博”成为时尚的今天，大陆这样的朴实作风比他无征不信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

除了上述“有案可稽”的章节，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海红卫兵大串联”、“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野营拉练”等都由大陆从广泛史料的耙梳中第一次概括。这些部分最见搜寻之功，相当不易。也许在“过来人”看来，小报、毛像、拉练……即使不说耳熟能详，至少并不陌生，但就认识“全面”而言，通过信实证据建立起来的史实毕竟不是一己体验或道听途说所能及。这里所说的“全面”既是指来龙去脉的全貌，也是指反映实情的深入。

在此不妨举书中一例以为证明。“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文革”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我们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实是实情的写照。大陆通过当时市革会政宣组的《政宣简报》等“内部文件”却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贬斥的时期，居然仍有人以盈利为目的贩卖宣传革命的小报。如果不是深掘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以“非常与正常”作为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主题的用心。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止时期，所谓“死水一潭”、“天翻地覆”，不过是形容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大小而已。所以，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文革”虽是“非常”，也只是“常”中之变的较激烈时期，而非完全逸出常道的“反”“常”。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其实不仅是社会生活，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鸟瞰整个共和国史，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毋宁说改革开放才是相当程度上的“非常”，而“文革”则是其来有自，变中有常。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不是“非常”，和沉闷的十七年比，“文革”的大起伏当然是“非常”，我只是说“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所以大陆以“非常与正常”命题确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概括。

本书是大陆研究“文革”的第一本专书，对大陆涉猎的上海“文革”的广泛方面而言只是一个局部。大陆正在着手和已列入计划的工作，最让人期待的是他和上海研究“文革”的两金中的另一金、复旦大学的金光耀先生合编的上海“文革”史料汇编。这个史料汇编以专题结集，对利用者相当方便，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最大特

点是凡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有价值的材料都在收编之列，没有“画地为牢”，预先设定规模。这样开放的结果，将来究竟会编成怎么样的第一部大书，实难预料，从已分门别类的专题看，编出数十卷应该不在话下。史料汇编之外，同样十分有价值的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张、姚、徐（景贤）的年谱长编。“长编”与一般年谱的不同在于征引原材料；而大陆所编的不同，在于大量引用的公私文献不仅是“第一手”，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尚未出版甚至尚未印刷，从从未为人援用的角度说，称得上是“珍本秘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金”的工作尤其是大陆的工作对上海“文革”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命我作序时希望我能就自己对“文革”的心得作一篇“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觉得谈不出既有价值又符合主旋律的看法，而且借题发挥也未免不敬，所以就以预告也是预祝大陆的新成就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句。

题记

金大陆

“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前者附着于“非常”，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故会产生“正常中的扭曲”；后者拉扯着“非常”，是“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故会产生“正常中的妄为”。所以，不管是“非常中的正常（顺应与应对）；还是正常中的非常（扭曲和妄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交汇和兼容，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相和精彩题旨，以至它既说明了时代的错乱，又在本质上证实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以非常与正常的交错关系，将“文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不仅可构建一个有血肉、有灵魂的研究文本，更能从中看到血肉躯体之伸缩；读到灵魂归附之挣扎。

目 录

总序	熊月之	1
序	程兆奇	9
题记	金大陆	15
第一章 上海(市区)1966—1976 年的人口状况 1		
一、总人口与总户数		1
二、各区人口分布情况		4
三、人口自然变动		7
四、若干区的人口自然变动		9
五、人口机械变动		11
六、人口性别构成		15
七、人口年龄构成		17
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他		20
第二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婚姻管理 25		
一、结婚登记情况分析		25
二、离婚登记情况分析		30
第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38		
一、“文革”前的工作基础		38

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和状况	39
三、成效分析	44
第四章 1966—1976 年上海的职业人口	51
一、职工人数的增长及其特点	51
二、职工的来源	54
三、职工的分布	56
四、职工分类和性别构成	59
第五章 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	64
一、初始期与上升期	64
二、突破期、高潮期与回落期	70
三、组织与活动	75
四、管理与服务	80
五、角色与态度	84
六、一个关键问题	87
附一：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一览表 (1969. 8. 15—12. 12)	91
附二：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直属接待 单位一览表	96
附三：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	97
第六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一	102
一、正式的外出途径	102
二、诉求和企盼	109
三、抵御与挑战	111

四、非正式的外出途径	114
附一：寻找“蒋如毛”——我的大串联之一.....	123
附二：三进山城——我的大串联之二.....	125
第七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二	134
一、徒步串联	134
二、曹锦清教授的故事	141
三、后期串联	143
四、钱粮往来与清理	149
附：从上海走到上饶——步行串联纪实.....	160
第八章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销	171
一、流产的“串联联络站”.....	171
二、10月以后的“顺产”	173
三、一项发现	179
四、短促的尾声	185
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在上海工总司文献中出现情况一览表(1966.12.3—1967.3.10).....	190
第九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服饰演变	196
一、标树崇“武”的审美	196
二、悄悄启动的消解和蜕变	200
三、“一身军装”的变形	202
四、化解“千人一面”	204
五、“江青服”在上海	207
六、所谓“奇装异服”	209

附一：上海确实变啦！	218
附二：领与袖的红色风情(文摘)	220
附三：1969—1976年上海报刊关于批判“奇装异服”专题 文章目录	225

附录一 始信人间有鬼狐

——从苏步青教授的《夜读〈聊斋〉偶成》谈起	228
-----------------------------	-----

附录二 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

——曹宠、秦邦廉访谈记	239
-------------------	-----

附录三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251

**附录四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和包含“文革”内容的
 情况简介** 269

附录五 从巧合到圆满

——陈国康先生(陈老头子)的“文革”资料收藏史	309
----------------------------------	-----

附录六 “文革”时期上海毕业生上山下乡及分配情况

统计	320
----------	-----

第一章

上海(市区)1966—1976 年的 人口状况

一、总人口与总户数

选取上海 1966—1976 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为了对这一专题有所梳理和了解,也是为了替所承担的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性研究,搭建一个既可以瞭望,以求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又可以开掘,以求深入地把握许多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的平台。首先,请看表一:

表一

1966—1976 年上海市总人口及总户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户

年份	总人口	市 区	郊 县	粮食定量人口	总户数	平均户数(人)
1966	1 095.83	636.21	459.62	715.73	242.42	4.52
1967	1 105.72	638.76	466.96	712.69	244.46	4.52
1968	1 108.97	633.71	475.26	715.89	248.03	4.47
1969	1 093.99	608.64	485.35	677.40	251.94	4.34

(续表)

年份	总人口	市 区	郊 县	粮食定量人口	总户数	平均户数(人)
1970	1 072.55	580.23	492.32	653.49	253.40	4.23
1971	1 066.82	570.74	496.08	643.95	255.85	4.17
1972	1 064.11	564.73	499.38	638.35	261.32	4.07
1973	1 070.01	562.49	507.52	636.78	265.90	4.02
1974	1 073.78	561.96	511.82	633.48	269.42	3.99
1975	1 076.72	557.05	519.67	630.94	271.85	3.96
1976	1 081.30	551.91	529.39	630.89	278.75	3.88

资料来源：《上海公安志》、《上海计划志》、《上海粮食志》。[1]

由表一可见：

第一，1966—1968 年的两年间，上海的总人口分别增长 9.89 万和 3.25 万人，属正常的自然增长。1968—1972 年间，上海的总人口则呈现显著下降的状态，尤其 1968—1970 年，人口数下降了 36.42 万人，这主要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所致。上海粮食定量人口（指享受城市供应的市区和郊县城镇的非农户）的统计可提供佐证。那就是从 1968 年起，粮食定量人口一直在减少，1968—1970 年甚至达到 62.4 万人。[2] 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受供者骤然从计划之列消失——正是由于城市学校的大批毕业生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完成了“非农户”向“农户”的身份转化，即通过务农解决自身的口粮问题才实现的。从 1973 年开始，上海的总人口恢复增长，直到 1978 年才恢复到 1966 年“文革”运动发动那年的水平。

第二，自 1967 年起，上海市区的总人口数就一路呈现下降的态势，十年间共减少 86.85 万人。其间 1968—1969 年、1969—1970 年最为明显，分别达到 25.07 万人和 28.41 万人，显示出集体性迁徙的

特征。与此同时,上海郊县的总人口数则是一路增长的,十年间共增长 69.77 万人。最高年份是 1968—1969 年,为 10.09 万人;最低年份是 1971—1972 年,为 3.30 万人,基本属于均匀性的增长。这说明“文革”十年间,上海市区的人口是向外疏散的;上海郊县的人口是向内接纳的(包括市区人口向郊县迁移)。互为比照,更凸显出市区人口向外疏散的规模是巨大的。

第三,尽管上海的总人口数在“文革”十年间有起有伏,但关于上海总户数的统计却呈现平稳上升的走势,即十年共增多 36.33 万户(1976—1986 年上海的总户数则增多 86.17 万户),其中最高的年份是 1975—1976 年,为增多 6.90 万户;最低的年份是 1969—1970 年,为增多 1.46 万户,年均增多 3.63 万户。这说明“文革”动荡中,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迁移分户、结婚立户)总是在进行着的,群众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也总是不懈的。与此同时,平均每户人口的统计数却平缓地下落,1966 年、1967 年为 4.52 人,1976 年为 3.83 人。其实,引人关注的应是发生在这期间的变化,突破了一条很重要的界限,那就是按照“票证时代”日用品和副食品的供应规则,4 人户与 5 人户的差别,即为小户与大户的分界。由此,1966 年、1967 年的平均每户人口 4.52(人),恰巧踩在了大户的边界内。这也证实了社会总户数的规模是以大户为主的。1968 年以后(该年平均每户人口 4.47,显然已属小户),因情况发生了反置性变化,社会总户数的规模也就是以小户为主了。综上所述,一方面社会的总户数在增多,另一方面平均每户的人口数在减少。这种家庭人口构成的趋势——例如 1980 年、1985 年、1990 年上海的总户数分别为 303.9 万户、352.7 万户、415.3 万户,而平均每户人口数则分别为 3.77 人、3.45 人、3.09 人——正勾勒出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正常曲线。

另外,在总人口数方面需补充两点。

其一,根据上海履行户口登记的暂(寄)住人口统计(指市区暂住

4 非常与正常

3日以上)：1966—1970年因“文革”动乱，无统计数。1971年恢复统计后显示为21.08万人；1972年为25.37万人；1973年为27.76万人；1974年为22.47万人；1975年为19.01万人；1976年为21.79万人。^[3]这说明“文革”后期，上海流动人口的基数为20多万，加上3日以内离沪的或不登记者，这个数字应更大。

其二，已知1966—1976年上海总人口数基本保持在1000万～1100万之间，以此推算(以1970年和1975年为例)，上海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为1734和1741。如果说这项单纯的统计会给人带来迷惑和宽慰的话，那么将市区和郊县的统计分开，即可见市区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为41180和39535；郊县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为821和866。^[4]两者呈现如此悬殊的差距，基本反映了上海城区热闹、拥挤和繁杂的情状。

其实，这也是本课题“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得以展开的地理环境。

二、各区人口分布情况

再看“文革”十年间上海各区的人口状况(以1966年、1970年、1976年为例)。

表二

1966年、1970年、1976年上海各区总人口数、总户数统计表^[5]

单位：人/户

区名	总人口数			总户数		
	1966年	1970年	1976年	1966年	1970年	1976年
长宁区	387 246	357 448	341 933	81 825	85 039	90 757
虹口区	807 373	734 122	692 251	180 755	181 968	188 538
黄浦区	668 743	613 230	593 480	150 245	152 127	158 325

(续表)

区名	总人口数			总户数		
	1966年	1970年	1976年	1966年	1970年	1976年
静安区	543 572	495 904	476 945	125 710	127 656	133 907
卢湾区	530 297	486 923	461 544	124 041	126 035	131 136
南市区	774 554	700 943	649 261	179 599	178 345	182 503
普陀区	549 412	496 791	471 232	无统计	无统计	无统计
徐汇区	450 632	421 006	420 126	95 678	100 400	110 946
杨浦区	828 509	753 023	709 361	无统计	无统计	无统计
闸北区	659 310	593 023	551 170	145 209	144 134	148 594

资料来源：《长宁区志》、《虹口区志》、《黄浦区志》、《静安区志》、《卢湾区志》、《南市区志》、《普陀区志》、《徐汇区志》、《杨浦区志》、《闸北区志》。

由表二可见：

第一，“文革”十年间，上海各行政区域的总人口数为杨浦区最高，长宁区最低。具体排序应为：杨浦区→虹口区→南市区→黄浦区→闸北区→普陀区→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其中，属中心城区的南市区、黄浦区因历史悠久、商业繁荣而人口高度集中，排序在第三、四位外，其他排位靠前的杨浦区、虹口区、闸北区等均位于偏东及东北方向，且因区境开阔，工业发展而集合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反之，位于偏西及西南方向的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和长宁区，则多因“环境幽雅”，历史上或“充当休闲区的角色”^[6]，或属“文化中心区域”^[7]，而人口数量排列于最后。所以，如果以南北向贯穿市区的西藏路为纵轴；以东西向流经市区的苏州河为横轴，便可明显地在上海的人口分布地图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和“南多北少”的状况。这是1966—1976年上海人口分布的基本定位，也是这一时期上海不同区域的市民社会生活，在人口环境方面的基本定位。这

种定位一直延续到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因上海的改革开放获得重大进展,人口迁移才十分频繁,上海人口分布地图才出现崭新的格局。

第二,考察“文革”十年间上海各行政区域人口数的变化,发现 10 个区集体性地发生了人口下降的情况。这种共同的社会人口波动,必然缘于共同的社会运动。那主要就是席卷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导致市区各区必须进行人口“输出”(属人口机械变动)。据统计,各区人口下降数由多到少的排序是:南市区→杨浦区→虹口区→闸北区→普陀区→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其中最多的南市区是 125 293 人;最少的徐汇区是 30 506 人。在此,区境之间本原的地理范围和人口密度,固然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该排序也就与各区总人口的排序基本吻合。有趣的是同为人口高密度区的南市区和黄浦区(该区人口下降数为 75 263 人),却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这或许与两区人口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构成差异相关。



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上海人口“输出”

第三,同时,各区的总户数情况(缺杨浦区和普陀区的统计)与全市的总户数统计高度契合,即不同人口环境的 10 个区均出现平稳的

增长,这再次证实包括迁移分户、结婚立户的群众日常生活,不仅是日日趋新的,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原动力。

三、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变动的原因有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自然变动关联人口出生、人口死亡和人口自然增长。下面请看表三:

表三

1966—1976年上海市人口自然变动统计表

单位:‰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人数(万人)	出生率	人数(万人)	死亡率	人数(万人)	自然增长率
1966	15.95	14.6	5.82	5.3	10.13	9.3
1967	13.77	12.5	5.60	5.1	8.17	7.4
1968	16.47	14.9	5.87	5.3	10.60	9.6
1969	16.30	14.8	5.19	4.7	11.11	10.1
1970	15.10	13.9	5.41	5.0	9.69	8.9
1971	13.03	12.2	5.60	5.2	7.43	7.0
1972	11.54	10.8	5.93	5.6	5.61	5.2
1973	10.94	10.2	5.84	5.5	5.10	4.7
1974	9.85	9.2	6.25	5.8	3.60	3.4
1975	10.14	9.4	6.47	6.0	3.67	3.4
1976	11.04	10.2	6.63	6.1	4.41	4.1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志》、《上海计划志》、《杨浦区志》。

由表三可见:

第一,比照上海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例如 1951—

1958 年平均出生率达到 40% 以上,1959 年则稍有下降),以及 60 年代初,因“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人口出生率出现补偿性回升”的实际情况(例如 1963 年上海的人口出生率为 30.3‰,自然增长率为 23.3‰)。^[8]应该承认,1966—1976 年的“文革”十年间,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处于一个“低谷区”。其中最高年份是 1968 年,达 16.47 万人,出生率为 14.9‰;最低年份是 1974 年,达 9.85 万人,出生率为 9.2‰。十年的平均出生率为 12.1‰。进一步观察,可见十年间以 1972 年为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的平均出生率为 13.8‰;后阶段的平均出生率为 10.0‰。这主要是 70 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良好开展的缘故。例如 1964 年上海南市区产妇第一胎为 22%,第二胎为 23.6%,第三胎为 54.4%。1973 年上海市区产妇第一胎为 57.9%,第二胎为 35.7%,第三胎仅为 6.4%。^[9]80 年代时,因 50 年代出生的人口集体性地进入生育期(属“蛇吞象”现象),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结构性回升(平均出生率为 14.4‰)。1993 年,上海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第二,1966—1976 年上海人口死亡率始终处于平稳的状态中,其中最高年份是 1975 年,死亡人数为 6.47 万人,死亡率为 6.0‰;最低年份是 1969 年,死亡人数为 5.19 万人,死亡率为 4.7‰,十年平均死亡率为 5.4‰。但这种平稳状态从 1974 年开始,便稍稍地有所抬升,且这种抬升一直延续到整个八九十年代。例如全市 1980 年的死亡率为 6.5‰,1985 年的死亡率为 6.69‰,1990 年的死亡率为 6.74‰。这倒是值得医疗和公共卫生界关注的。

第三,根据统计,1966—1976 年上海总出生人口为 144.13 万,总死亡人口为 64.61 万,故自然增长人口为 79.52 万。已知十年间以 1972 年为界,可分辨出两个不同特征的人口增长期,且因十年间的人口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检索自然增长人口,便得知上海

1966—1971年自然增长 57.13 万人,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8.72‰; 1972—1976 年自然增长 22.39 万人,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4.16‰。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分明的,而且是显著的。它再次证实了 70 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和实绩(容后讨论)。由此可以确认,在上海“文革”十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方面,应以 1972 年为分水岭。

四、若干区的人口自然变动

再看上海若干区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表四)。

表四
上海若干区 1966—1976 年人口自然变动统计表

区名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单位: ‰
	总人数	平均出生率	总人数	平均死亡率	总人数	平均自然增长率	
长宁区	30 497	7.56	19 555	4.90	10 942	2.66	
黄浦区	51 626	7.42	40 307	5.84	11 319	1.58	
静安区	45 018	8.03	35 367	6.35	9 651	1.68	
卢湾区	42 396	7.74	33 509	6.18	8 887	1.56	
南市区	59 889	7.59	45 131	5.80	14 758	1.79	
杨浦区	71 186	7.55	38 250	4.13	32 936	3.42	

资料来源:《长宁区志》、《黄浦区志》、《静安区志》、《卢湾区志》、《南市区志》、《杨浦区志》。
说明:“总人数”指该区十年出生人数的总和。

通过以上 6 个区的统计材料,可见上海(市区)各区因地域和人口总数的关系,人口出生数存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人口总数最多的杨浦区,十年总出生人口达 71 186 人;而人口总数最少的长宁区,十年总出生人口为 30 497 人,两区相差 1 倍多。但两区的平均出生率却高度一致(7.55‰与 7.56‰),与其他各区的该项统计也相当吻合。

即便两区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较明显地高于其他各区，那也是因为两区的平均死亡率较低的缘故。这说明当时各区之间关于生育的社会宣传和政策，以及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并不存在地域之差。

在此，存在的疑问是：为什么前述中上海十年的平均出生率为12.1‰，十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为6.7‰（十年平均死亡率5.4‰倒无多大变化），而若干区的统计数据却如此低落呢？这是因为前述中的统计属上海全市，它包含了郊县的因素。此处的统计是上海市区的。因本课题的主旨（城市社会生活史）不干涉郊县，也就将市区的统计数据单独列出。然而，它恰恰反证了1966—1976年的十年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变动——主要表现在人口出生方面，是较大程度地低于郊县水平的。

下面将通过六个区的统计材料，特别显示并证实前述中已提及的——1972年应为上海“文革”十年间人口自然变动方面的一条界线。

表五

上海若干区1966—1971年与1972—1976年人口自然变动比较统计表

单位：万人、‰

区名	1966—1971年 人口出生		1972—1976年 人口出生		1966—1971年 人口自然增长		1972—1976年 人口自然增长	
	总人数	平均 出生率	总人数	平均 出生率	总人数	平均自然 增长率	总人数	平均自然 增长率
长宁区	19 763	8.68	10 734	6.22	9 306	4.06	1 636	0.97
黄浦区	31 854	8.11	19 772	6.59	10 261	2.59	1 058	0.35
静安区	27 485	8.69	17 533	7.24	8 332	2.62	1 319	0.54
卢湾区	26 343	8.52	16 053	6.81	8 430	2.67	547	0.23
南市区	37 007	8.22	22 882	6.84	13 127	2.88	1 631	0.48
杨浦区	46 334	8.67	24 852	6.21	27 082	5.06	5 854	1.45

资料来源：《长宁区志》、《黄浦区志》、《静安区志》、《卢湾区志》、《南市区志》、《杨浦区志》。

很明显,表五的各项数据均显示,从1966—1971年到1972—1976年的人口自然变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落(有的甚至相差数倍)。且这种降落不仅在各区间表现为同频的特征,即为全局性的状态,更在向度上表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态势。所以,标举1972年为界牌,就不是随意度量的结果,完全是由统计事实垒筑起基础的。

那么,为什么“文革”十年间的人口自然变动会在1972年发生如此幅度的降落呢?其实,“文革”开始前的196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就遵照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全市开展了“控制多胎生育”的工作。“文革”动乱冲击了计划生育,许多药具供应处于停顿的状态。直至1969年3月周总理提出“文化大革命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要计划生育,要节育”^[10],计划生育工作才得以恢复。1970年,国家决定对常用避孕药实行免费供应;市革委会教卫组委托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成立计划生育组,开展技术和培训工作。据1971年统计,上海市育龄夫妇节育率已达72.3%。^[11]众所周知,计划生育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它需要经历周期轮转的检验。正是1970年重新实施了各项计划生育的举措,其成效终于在1972年的人口统计上获得了显现和确证。

五、人口机械变动

已知上海1966—1976年的总人口数是下降的,且人口自然变动处于“稳定低增长阶段”,^[12]所以导致总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地在于人口的机械变动。这固然是推论的结果,现通过统计数据予以证明。请看下表:

表六

1966—1976 年上海市人口机械变动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迁入人数	迁出人数	机 械 增 长	
			人 数	增 长 率
1966	10.10	17.87	-7.77	-7.1
1967	9.00	7.34	1.66	1.5
1968	9.43	17.24	-7.81	-7.1
1969	7.75	35.25	-27.50	-25.0
1970	5.85	37.09	-31.24	-28.8
1971	12.64	25.38	-12.74	-11.9
1972	12.87	18.85	-5.98	-5.6
1973	17.13	15.89	1.24	1.2
1974	16.65	16.17	0.48	0.4
1975	21.21	21.72	-0.51	-0.5
1976	20.02	20.21	-0.19	-0.2

资料来源：《上海计划志》、《上海公安志》。

由表六可见：在整个“文革”十年中，除 1967 年、1973 年和 1974 年外，所有年份的人口机械变动，均处于负增长的状态。其中最高年份是 1970 年，迁出人数 37.09 万人，迁入人数 5.85 万人，人口机械增长 -31.24 万人，机械增长率为 -28.8‰。最集中的时段是 1969—1971 年，三年共迁出 97.72 万人，迁入 26.24 万人，三年人口机械增长 -71.48 万人，占“文革”期间人口机械变动总数的 79.1%；三年人口机械增长率为 -65.7‰，占“文革”期间人口总机械增长率的 79.1%。

上海市区的人口机械变动亦可提供佐证。见表七：

表七

上海若干区 1969—1971 年人口迁移增减统计表

区名	迁入总人数	迁出总人数	迁移增减总人数	总比例(%)
长宁区	3 832	49 232	-45 400	70.6
虹口区	10 661	99 733	-89 072	64.7
黄浦区	10 750	74 658	-63 908	78.6
静安区	7 406	65 591	-58 185	67.8
杨浦区	无统计	无统计	-89 934	73.2

资料来源：《长宁区志》、《虹口区志》、《黄浦区志》、《静安区志》、《杨浦区志》。

说明：“总比例”指 1969—1971 年迁移增减总人数，在整个“文革”十年间的人口增减中所占的比例。

上海若干区 1969—1971 年的人口迁移增减如此悬殊，其在“文革”十年间人口增减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不禁使人感到惊骇和异常，更使人产生追问的必要。那就是为什么“文革”十年间的人口净迁出会在这三年间发生如此规模的攀升？其实，上山下乡运动在 1968 年夏秋就已经开展了，但当时 1966 届、1967 届分配时，却有相当部分进了上海的工矿企业。抑或上海工业基地紧缺人手；抑或为了体现某种政策需要（当时称“四个面向”），总之，这在全国是十分独特的情况。这也是 1968 年上海开始出现集体性人口迁移（迁出 17.24 万，人口机械增长 -7.81 万），却没有达到高潮的缘故。该年冬，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达后，上山下乡便成为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必由之路。所以，接着进入分配程序的 1968 届、1969 届便被宣布“一片红”，即所有的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再加上当时动员城市闲散居民落户安徽，一批工厂内迁等，终于使这种非自然状态的人口流动，不仅成为现实，成为人们的遭际，更构成了大规模、大跨度的人口迁徙。

检索当代上海的人口流动情况，1955 年、1958 年曾有两次外迁

高峰,那主要是根据中央“上海城市改造”的方针,遣散流落的难民和疏散闲杂的劳力。1961—1962年又出现一次外迁高峰,那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为缓解城市压力,精减职工回乡。如果说这些“文革”前发生的人口外迁,多是出于经济运行的缘由,多是由城市老弱病残闲等组合的人群;那么,发生在“文革”中的人口外迁,则多是出于政治运作的需要,多是由城市知识青年等构成的队伍。两者相比,前者为了合理的城市定位,后者为了非常的革命号召;前者强调顾全大局的行动,后者强调脱胎换骨的改造;前者以退为进,求得矛盾的化解,后者积重难返,造成困难的拖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属于良性的人口调节,后者属于恶性的人口变动。确实,在城市发展史上,这种大规模地将有文化的年青一代迁往农村、迁往边疆的例证是很少见的。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抵御着城市文明,更在本质上具有泯灭城市文明的企图。所以,它只可能是趁势而起的呼啸和折腾,只可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而不可能有持久的结果。



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上海人口“输出”

总之,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机械变动,在上海的人口史上留下了一段畸变的印记。

六、人口性别构成

在“人口构成”的章节中,先看性别构成。见表八:

表八

1966—1976年上海市人口性别构成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男	女	性别比(女=100)
1966	544.40	551.43	98.73
1967	550.83	554.89	99.27
1968	552.60	556.37	99.32
1969	542.65	551.34	98.42
1970	531.92	540.63	98.39
1971	528.08	538.74	98.02
1972	525.94	538.17	97.73
1973	529.76	540.25	98.06
1974	531.74	542.04	98.10
1975	533.10	543.62	98.06
1976	535.33	545.97	98.05

资料来源:《上海计划志》、《上海公安志》。

从表八中可见,1966—1976年上海人口的性别构成,处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构中——不仅每年的性别比,连十年间性别比的变动均一直保持在97.73~99.32之间,这说明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十分接近,完全属于自然态的分布(女性人口略高一点)。相比50年代

(1949—1959年,平均性别比为113.0)男性人口明显高于女性人口,多是缘于男性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社会仍然存在少许残害女婴的事实。由此可反证“文革”十年间是不存在类似的情况的:一则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严酷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劳动力留驻上海的;二则解放以后十多年的新的生活和城市文明,也是不会允许残害女婴之类的愚昧继续存在的。

现进一步了解全市各区的人口性别比。见表九:

表九
上海各区若干年份人口性别比统计表

区名	1966年性别比	1970年性别比	1976年性别比
长宁区	101.16	100.46	100.85
虹口区	100.63	101.51	101.83
黄浦区	105.42	106.55	110.50
静安区	96.27	96.39	96.73
卢湾区	97.24	97.42	97.56
南市区	100.18	100.78	100.58
普陀区	无统计	无统计	无统计
徐汇区	无统计	无统计	无统计
杨浦区	104.43	103.81	104.10
闸北区	104.44	104.76	104.79

资料来源:《长宁区志》、《虹口区志》、《黄浦区志》、《静安区志》、《卢湾区志》、《南市区志》、《杨浦区志》、《闸北区志》。

从表九中可知,1966—1976年间,上海各区之间的性别比是基本平衡的,其中南市区、虹口区、长宁区的男女人数最为接近。黄浦区的性别比最高,这与该区历史形成的金融商业地位有关(男性从业者多),也符合“商业区性别比较高,而农业区、近郊区的性别比较低”

的人口学常识。^[13]相比而言,工业大区的杨浦区和闸北区(俗称“下只角”)显示性别比略高一些;地处优雅闲适区段的静安区和卢湾区(俗称“上只角”)则显示性别比略低一些。这种由男女两性比例关系构成的区域特征,大致可象征性地证明在生活风格和文化个性方面,上海的“下只角”更粗实一些,更阳刚一些;上海的“上只角”更精致一些,更阴柔一些。

七、人口年龄构成

再看上海人口的年龄构成。见表十:

表十

若干年份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统计表

年 份	单位: %		
	少年儿童(0—14岁)	成年人(15—59岁)	老年人(60岁及其以上)
1964	42.31	51.61	6.08
1973	26.27	64.47	9.26
1982	18.15	70.09	11.76

资料来源:《上海计划志》。

在此,选择1964年、1982年作为参照的坐标,不仅是因为这两个年份距离“文革”的开始和结束较近,容易说明问题;更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年份进行了人口普查,数据公开且具有权威性。由表十可见:1964年上海少年儿童(0—1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2.31%,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一则说明整个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上海的出生率居高不下。二则说明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类型偏向为“年轻型”。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1972年取得显著绩效,该项人口比例到1973年时,下降为26.27%;到“文革”结束以后的1982年,更下降为

18.15%。很明显,此中不仅有出生率下降的缘由,更有大批的少年儿童因年岁增长进入了成年人(15—59岁)的行列(1973年时,该项比例为64.47%)。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年龄结构类型划归为“成年型”。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口(60岁及其以上)的变化。由于解放以来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从1953年时的3.67%,到1964年的6.08%,到1973年的9.26%,再到1982年的11.76%。1992年时,该项人口的比例已达15.97%)。根据国内通用的计算标准,60岁及其以上人口大于10%,即表示该区域属老龄化社会(按65岁及其以上人口计算,其通用标准为大于7%)。现已知1973年全市的该项比例为9.26%,说明当时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已渐渐地逼近老龄化。另据《静安区志》记载,1973年时静安区60岁及其以上人口有61131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2.58%,故认为该区“已进入老年型市区行列”。^[14]再据《虹口区志》记载,1975年时该区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1.03%,故断定“区境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其形成时间在1975—1979年间”。^[15]在《闸北区志》、《普陀区志》公布的相关材料中,均显示1979年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分别达到11.65%和10.70%,故也宣布该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已属“老年型”。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现摘编若干区的统计资料。见表十一:

表十一

上海若干区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情况表

单位: %

区 名		虹 口	普 陀	闸 北
少儿比(0—14岁)	1964	43.39	46.84	44.92
	1973	22.14	23.52	26.99
	1982	13.77	13.83	13.72

(续表)

区 名		虹 口	普 陀	闸 北
成年比(15—59岁)	1964	51.24	48.13	49.98
	1973	68.06	68.02	64.19
	1982	72.40	74.72	73.89
老年比(60岁及其以上)	1964	5.37	5.03	5.10
	1973	9.80	8.46	8.82
	1982	13.83	11.45	12.39
年龄中位数(岁)	1964	21	17.33	18.37
	1973	33	26.69	26.95
	1982	34	29.89	30.19
年龄结构类型	1964	年轻型	年轻型	年轻型
	1973	成年型	成年型	成年型
	1982	老年型	老年型	老年型

资料来源:《虹口区志》、《普陀区志》、《闸北区志》。

说明:1. 该表中1964年的数据为1964年7月1日的统计;1973年的数据为1973年12月31日的统计;1982年的数据为1982年6月30日的统计。2. 闸北区采用的是1972年的统计数据。

除了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标准外,根据年龄结构形态的其他标准,例如“年轻型”类型的少儿比应为40%以上,年龄中位数(岁)应为20以下;“老年型”类型的少儿比应为30%以下,年龄中位数应为30以上等。表中虹口等区的年龄结构类型,分别在1964年、1973年、1982年列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应是比较清晰的。有意味的是,动态地看这三种年龄结构类型的时间分布,便可知上海的人口变动正是经历了“文革”十年,或者说正是“文革”十年间的上海人口变动,完成了从“年轻型”→“成年型”;再从“成年型”→“老年型”的两次转型。其间,1973年的定位是承前启后的,它不仅再次标示了

因计划生育等工作引发的人口变动的趋向,更因其“成年型”的居中地位而凸显出了它的动力构架。固然,这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动态分布,不能与“文革”运动有牵强的关系,但终究是“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人口环境。

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他

平均预期寿命是指 0 岁年龄组人口的平均生存年数,国际上用来评价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1951 年,上海市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 42.0 岁,女性为 45.6 岁,显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后因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便迅速提高,例如 1957 年时,该项指标男性为 65.2 岁,女性为 68.2 岁,竟然比 1951 年增加了 20 多岁。进入 60 年代,上海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减缓,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幅也就随之减缓。

表十二

上海若干年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统计表

单位: 岁

年份	市 区		郊 县		全 市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65	69.6	73.2				
1970	70.2	73.9				
1973	71.5	75.1	69.1	74.9	70.3	74.9
1975	70.6	73.9	68.2	73.9	69.4	73.8
1978	72.2	75.2	69.2	74.7	70.7	74.8

资料来源:《上海卫生志》、《上海统计志》。

由表十二可知:“文革”发动前一年的 1965 年,上海市区人口预

期寿命男性为 69.6 岁,正逼近 70 岁大关;女性则已突破该大关达到 73.2 岁。1967 年,“市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16]70 年代以后,尽管上海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仍在增长,但这种增长已十分缓慢,间或还会出现稍微的回落,例如 1975 年的该项统计数据就小于 1973 年。据《上海计划志》记载,“1970—1980 年,男、女分别增 1.1 岁和 1.5 岁”,^[17]因此,“文革”十年间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中。同时,从表中可知:上海市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要略高于郊县,这大致可证明当时城乡之间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

已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死亡率相关,接着就应梳理死亡率以及死因顺位等情况。据《上海卫生志》报告:1951 年,全市居民死亡率高达 14.1‰。60 年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全市为 4.7‰~7.7‰。70 年代,全市死亡率为 5.0‰~6.5‰。与此同时,1951 年上海市区的婴儿死亡率竟高达 79.9‰,1965 年时已降至 13.0‰。进入“文革”以后的 1966—1972 年,市区婴儿死亡率为 8.3‰~12.0‰。从 1973 年起,郊县的婴儿死亡率纳入统计系列,所以 1973—1979 年全市的婴儿死亡率为 11.5‰~15.5‰,其中市区为 10.3‰~12.0‰;郊县为 11.7‰~18.2‰。^[18]上海人口死亡率的曲线走向,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是吻合的,即从 50 年代的高位迅速下滑,至六七十年代时,基本保持了平缓滑动的态势。这反映了即使在“文革”时期,解放以来健全起来的社会保健体系和医疗卫生机构,还是处于正常有效的运作状态的。

有关死因顺位的统计,根据《上海卫生志》的报告:1951 年,上海市区居民的首位死因是传染病(含寄生虫病),死亡比为 50.4%。从 1960 年起,循环系统病列首位,传染病次之,肿瘤病上升为第三位。以后几年,肿瘤病排列第二,传染病的序列则下降。在此,值得注意

的是“文革”中的 1968 年,损伤及中毒(称意外死亡,包括交通事故、自杀等)占据了死因的第三位,这大概与“文革”运动正处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阶段有关(1965 年时,该项统计数据为 26.5/10 万。1968 年上升到 78.4/10 万,死亡比为 15.6%,高于通常年份 6% 左右的 2 倍多。其中 64% 集中在 20—49 岁年龄段,男性高于女性。1973 年时,该项统计数据下降为 47.1/10 万)。下面以 1970 年为例,看当时的死因顺位。见表十三:

表十三

1970 年上海市区居民死因顺位统计表

顺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死因	循环系统疾病	肿瘤病	呼吸系统疾病	损伤及中毒	传染病	消化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精神病	内营代免
死亡率	160.4	125.3	46.5	40.9	38.5	30.0	8.0	7.6	3.4	2.4
死亡比	29.8	23.3	8.6	7.6	7.2	5.6	1.5	1.4	0.6	0.5

资料来源:《上海卫生志》。

说明: 表中死亡率单位为 1/10 万。死亡比单位为 %。

由表十三可知: 循环系统疾病、肿瘤病不仅列第一、二位序,更占据死亡比的 53.1%(死亡率为 285.7/10 万),可谓第一梯层。列第三至第六位序的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及中毒、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共占据死亡比的 29.0%(死亡率为 155.9/10 万),可谓第二梯层。其余如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只占据死亡比的 4%(死亡率为 21.4/10 万),可谓第三梯层。很明显,三个梯层的跨越是大幅度的,即疾病本身的凶险及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在流行病学的图谱上是权重不一的。然而,有关的统计提示此中的关键在于: 正是从 1970 年起直到 1985 年,上海市区居民的前五位死因顺位没有发生变化。^[19]1986 年时,处于第五位的传染病与第六位的消化系统疾病互

换了位置,并延续到1990年时,仍保持原有的位序。这就是说,以传染病的位序不断下跌(1950年第一,1960年第二,1970年第五,1980年第六),以肿瘤病的位序直线上升(1950年第七,1960年第三,1962年以后持续第二)为主要特征的当代上海市区居民死因顺位,基本是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定型的。

尽管上述内容,似乎多属医务工作者的话题,但从人口学和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去解读,即以这一系列枯燥的数字为坐标,为导向,回归并行进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大致可感悟到当时人们生存境况的变化。

注 释

- [1] 易庆瑶:《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应飞:《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 [2] 在此,粮食定量人口的统计数大于总人口的统计数,是因为从市区迁往郊县的毕业生,虽已不属粮食定量人口,但仍在上海总人口的统计之列。
- [3] 易庆瑶:《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 [4] 颜德纶:《上海统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 [5] 齐允海:《长宁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王明辉、姚宗强:《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周太彤、胡炜:《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史济良、瞿钧:《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胡瑞荣:《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孙卫国:《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张一雷:《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萧一华:《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施叔华:《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曹一丁:《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 [6] 熊月之:《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 [7] 同上书,第 135 页。
- [8] 张明岛、邵浩奇:《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5 页。
- [9] 同上书,第 468 页。
- [10]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4 页。
- [11] 张明岛、邵浩奇:《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5 页。
- [12] 同上书,第 465 页。
- [13] 金大陆:《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 页。
- [14] 史济良、瞿钧:《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 页。
- [15] 王明辉、姚宗强:《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8 页。
- [16] 张明岛、邵浩奇:《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0 页。
- [17]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1 页。
- [18] 张明岛、邵浩奇:《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9 页。
- [19] 同上书,第 473 页。

第二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婚姻管理

一、结婚登记情况分析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均由区政府民政科办理。1968年5月，结婚登记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1975—1976年间，各区革命委员会地区组开始接管此事。1977年婚姻登记正式复归民政部门。由此可见，尽管“文革”十年间的婚姻管理模式发生过数次的变动，但基本的管理是持续的和正常的。现根据已出版的上海十区区志的材料，编辑成表：

表一

1966—1976年上海各区结婚登记情况统计表

区名 年份\	长宁	虹口	黄浦	静安	卢湾	南市	普陀	徐汇	杨浦	闸北	总计
1966	1 324	2 987	2 960	2 271	4 446	2 622	1 667		3 154	2 340	23 771
1967	2 220	4 663	4 558	3 999	3 535	3 875	2 753		4 743	3 139	33 485
1968	2 015	4 475	4 471	3 942	3 305	3 734	2 523		2 916	2 797	30 178
1969	1 849	3 948	3 887	3 387	3 298	3 482	2 179		4 329	1 936	28 295

(续表)

年份\区名	长宁	虹口	黄浦	静安	卢湾	南市	普陀	徐汇	杨浦	闸北	总计
1970	1 444	3 451	3 140	2 927	2 739	2 988	839		3 921	1 936	23 385
1971	1 292	3 228	2 847	2 773	2 457	2 625	1 620		2 995	2 034	21 871
1972	1 501	3 764	3 203	3 031	2 751	3 118	1 890		3 459	2 083	24 800
1973	1 584	4 206	3 717	3 481	2 910	3 800	2 662		4 230	3 128	29 718
1974	1 632	4 012	3 694	3 102	3 042	3 538	2 391		4 066	2 685	28 162
1975	1 861	4 264	3 349	2 908	2 730	3 799	985		4 463	2 775	27 134
1976	1 907	4 471	5 337	3 448	3 209	3 929	2 627		4 487	2 922	32 337
总计	18 629	43 469	41 163	35 269	34 422	37 510	22 136	25 381	42 763	27 775	328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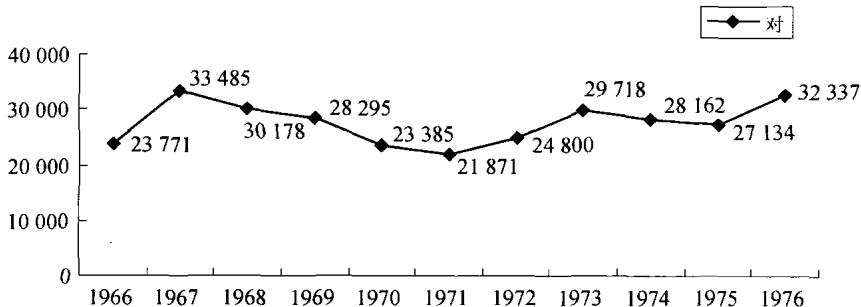
说明：总计 328 517 对中包括徐汇区的统计。各年份的总计中缺徐汇区的数据。

先从年份方面看。

很明显，1966—1976 年上海结婚登记数据的分布，呈现出了一个“盆地型”的样式，即前期高(1967—1969 年总计为 91 958 对)；中期低(1970—1972 年总计为 70 056 对)；后期高(1973—1976 年总计为 117 351 对)的走势。固然，这与人口年龄构成的情况相关。据现有的上海 1964 年(可上推三年估算)和 1973 年的统计资料，1964 年上海的总人口为 1 086.22 万；1973 年为 1 070.01 万。1964 年属适婚期的 20~24 岁年龄组的人数比为 5.15%，1973 年该年龄组的人数比为 8.06%；以此类推，1964 年 25~29 岁年龄组的人数比为 6.10%，1973 年为 7.21%；1964 年 30~34 岁年龄组的人数比为 7.38%，1973 年为 5.11%。显然，两个年度的总人口及适婚人口比没有很大的差距。^[1]所以本文也就着重于从社会运动和社会心态的角度进行分析。

为了说明问题作图如下：

1966—1976年上海市结婚登记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上海十区区志。

首先，为什么前期会高呢？

考察“文革”运动的演进过程，可知1967—1969年的时局正处于动荡之中（如造反派夺权、两派武斗、大批判当道等），但这种在形式上表现为“派性冲突”的动荡，毕竟不是战争、地震和瘟疫，会对整座城市的正常生活产生摧毁性的冲击；何况，发生在上海的武斗一直是小型的、局部的、非军械的（容后研究），并不真正对市民的生活构成胁迫。这就是说伴随着动荡的时局，市民的生活（包括谈情说爱和匹配良缘）仍在大街小巷生动而活跃地开展着（某种意义上，这成为对动荡时局的嘲讽和调侃）。与此同时，除了造反派的执迷和狂热外，不少群众或直接、或间接地游离于运动（与上海“文革”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的“派性冲突”有关，容后研究），以致整个社会流布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心理认同，当时的红卫兵报、造反报就曾批评青年人中存在不搞“路线斗争”，而忙于“线路斗争”（指男的装配无线电；女的结绒线等）；不搞大批判，而忙于谈婚论嫁的倾向。其实，正是这种动荡的时局，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氛围，很奇特地构创出了一个背离性的效应，那就是反倒为广大的青年人提供了适宜于“营造生活”、“构筑生活”的时空条件，这也就直接促使了那个时段的婚姻登记数走向高位。

其次，为什么中期会低呢？

1969年3月，周总理针对“文革”中出现“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的情况，重申“要计划生育，要节育”的方针。^[2]就此，上海的街道、企事业单位和郊区农村普遍开展了“反对早婚，提倡晚婚”的宣传教育活动。殊不知，这种宣传教育活动在“文革”运动的背景下，被打上了诸如“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两个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以及“早婚是腐朽人生观的表现”等政治印记，并针对当时青年中存在着的“恋爱、结婚、生孩子，人生三大事”，“早婚合法”等所谓“活”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当大喊‘早婚合法’之时，正是被阶级敌人的‘糖弹’击中之日”。^[3]同时，不少单位抓住青年人“上班像条虫，下班像条龙，开会打瞌睡，约会打冲锋”，“身在大工厂，心在小家庭，热衷于爱情，增添了私心，忘记了革命”的现实表现，^[4]组织未婚青年学习班和青年家长座谈会，既捕捉早婚的苗子，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又通过倾听老工人忆苦思甜、编写大批判专栏等，“提高革命警惕性，决不上阶级敌人的当”。^[5]据有关事迹介绍：上海柴油机厂年方



编辑同志：在上海柴油机厂冷轧车间，传诵着青年技术员蒋进尧同志为革命三次推迟婚期的事迹。

蒋进尧今年三十岁，女方在外地工作，也有二十八岁。去年国庆节，双方家长曾多次来信催他回家结婚。那时，「里正」开展精兵简政、干部下放劳动的群众运动，蒋进尧也离开了办公室，和工人一起参加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他想：现在正是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加紧改造自己的时候，决不能被个人私事拖住了后腿。于是，他就毅然决定推迟婚姻。

今年一月底，车间革委会决定要蒋进尧同志参加试制一项重要产品的战斗。这时，他的头脑中又展开了公与私的斗争。原来，他已决定在春节期间结婚，而回家结婚就要耽误这项任务的完成。

毛主席去“抓革命，促生产”，他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顿时增加了战胜私字的力量。他想：现在帝修反正在加紧策划战争阴谋，妄图侵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要去“抓革命，促生产”，保卫祖国，就不能要女人。

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打击帝修反的实际行动。于是，他就和工人师傅日夜奋斗在一起。

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他连十四六夜也不休息，结果把假期都忘了，直到女方来信，他才把自己的情况向她说明。由于蒋进尧同志一心一意，今年国庆前夕，有些热心的同志对他说：

「蒋呀，你年纪差不多，也有四年多没回家了，这次该回家料理料理自己的事啦！」蒋进尧回答说：「现在大家都沉浸在首钢学习，掀起革命

竞赛热潮，各方面工作都很多，形势要求我们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女方也表示再次延迟婚期。

蒋进尧同志为革命三次推迟婚期，受到了工人同志的的热情称赞。他们说：「毛泽东思想哺育新人，一心为公忘私，三延婚期干

三十的技术员“为革命三延婚期”^[6]；上海国棉一厂 834 名未婚青年，人人订出了晚婚计划。^[7]诚然，“提倡晚婚”属正常的社会举措，但“文革”时期的政治理念和群众运动的功能，必然要将其推演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中去，必然要摆出轰轰烈烈的阵势和场面。在此，与其说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形成了威迫和压力，不如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响应之，跟随之，默认之。这也就直接决定了那个时段的婚姻登记数走向低位。

最后,为什么后期会高呢?

一方面这属补偿性的反应，即一个迟早要发生的结果，在前一流程中搁置了，在后一流程中必定是要启动的。所以曾经的延宕，变为当下的通畅。当年的许多响应者、跟随者、默认者，终于集合性地排进了婚姻登记的行列。二方面因为 1968 年参与“四个面向”分配的老三届人——20 万左右留城的工矿者已工作了许多年；部分赴国营农场、市郊甚至外地的务农者，已通过各种路径办成了回城的手续。年龄和条件决定了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集体性地进入了婚姻期。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汇合了，也就直接导致了那个时段的婚姻登记数走向高位。

再从区域方面看。

从表一可知上海虹口区的“文革”十年婚姻登记数排列在第一位(43 469 对),接着是杨浦区(42 763 对)和黄浦区(41 163 对)。排列



《解放日报》1969年9月9日



上海 20 世纪 60 年代结婚证



上海 20 世纪 70 年代结婚证

在后三位的则是徐汇区(25 381 对)、普陀区(22 136 对)和长宁区(18 629 对)。确实,两个集团绝对数的差异是显著的,但相关人数比却并非呈现显著的差异,例如 1970 年列首位的虹口区婚姻登记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4.70%,1976 年为 6.46%;而婚姻登记数列于末位的长宁区的该两项比例分别为 4.04% 和 5.58%。很清楚,这缘于与各区的人口基数成正比分布,所以,将各区婚姻登记数与各区总人口数并列检索,可见它们之间的排序基本是吻合的。

二、离婚登记情况分析

现在讨论上海“文革”十年间婚姻状况中的离婚情况。

为了说明问题,需进一步追述“文革”前的离婚状态,以明了内里的差异和联系。其实,上海各区的离婚数在50年代时相对偏高,例如虹口区1953—1959年的离婚数为2568对,年均366.9对;同期总人口最少的长宁区也达到811对,年均115.9对,且“感情不和”、“性格不合”等均构成离婚理由。这一方面是因为1949年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以此解除了一些不合法、不人道的旧式婚姻。二方面是有部分的入城者,或因环境、地位发生了变化,而喜新厌旧;或因合乎情理而改换了婚姻。60年代上半期,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因政治形势的畸变,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紧张和僵硬。具体表现在婚姻方面,就是上海各区的离婚数开始大幅度下降,例如虹口区1960—1965年的离婚数为499对,年均83.2对;同期长宁区为223对,年均37.2对。由此可见,如果说50年代较高的离婚数据,是由多重社会因素支撑着的,那么,60年代上半期出现的离婚数下降的情况,则主要是由政治因素的逼迫造成的。且这种下降的幅度和趋势,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必然出现令人大为惊愕的结果。

下面请看表二和具体的分析:

表二

1966—1976年上海各区离婚登记情况统计表

单位:对

区名 年份\	长宁	虹口	黄浦	静安	卢湾	南市	普陀	徐汇	杨浦	闸北	总计
1966	10	103	50	25	111	40	88		61	27	515
1967	18	96	169	93	92	96	35		149	61	809
1968	23	106	121	85	112	109	55		153	92	856
1969	42	96	101	76	91	84	72		85	90	737
1970	36	102	88	65	116	60			54	52	573
1971	31	78	57	76	65	70			57	15	449

(续表)

区名 年份\	长宁	虹口	黄浦	静安	卢湾	南市	普陀	徐汇	杨浦	闸北	总计
1972	31	106	83	73	61	78			77	0	509
1973	8	75	89	59	71	78	46		98	69	593
1974	8	78	69	58	34	64	38		65	67	481
1975	19	59	60	33	25	54	35		39	38	362
1976				13	3					2	18
总计	226	899	887	656	781	733	369	587	838	513	6 489

说明：徐汇区离婚数为 1967—1976 年的统计。总计 6 489 对中包括徐汇区的统计。各年份的统计缺徐汇区和部分普陀区的数据。

仍然先从年份看。

考察上海 1966—1976 年的离婚登记数，首先应该承认十年间的总离婚数只有 6 489 对，尽管其中会有少量的统计散失，还是使人不可思议。这即是说，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两对。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

确实，进入“文革”运动后，尤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血统论”及后期的“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直接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剑悬临在市民生活的头顶上，随时随地可劈刺下来。由此，如果说青年人为追求婚恋幸福，还能嘀咕出几句“人生大事”等；那么既有阅历又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或因性格志趣，或因经济家务，或因习性情感（毋提“性和谐”之类）等出现了裂痕，则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当时的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更因为这一系列“非政

“治化”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

请看几节关于离婚问题的访谈（口述资料）：

A说：“自我记事起，就觉得爸妈性格不和。我爸是一般机关干部，我妈是小学老师。双方话不多，但都顶真，经常针尖对麦芒。‘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一个屋里，以后曾激烈地争吵过几次，都说要离婚。同楼的邻居也来劝过，我和姐姐很害怕。后来，爸爸和妈妈突然不吵了，但各睡各的床，爸爸则自己开伙，最无奈的是他俩从此形同路人，从不搭理一句话，有事都通过我们传达。有一次，爸爸将文件包落在家里，中途回家发现钥匙也在包里。妈妈的学校就在隔壁，爸爸非要骑车兜个圈子到中学找我。我曾听妈妈与同事说起离婚的事，她说要等我们长大。在这个家，我和姐姐很亲。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姐姐都考取了大学，爸爸妈妈也就离婚了。”

B说：“‘文革’时期，我家所住的小楼里，4家人家有问题，1家是‘文革’中调配房子搬进来的，是煤气厂的工人。这家男人在家打老婆，打得鸡飞狗跳，小孩子惊叫，起先几家还出去劝架，后来这家男人了解了我们的底牌，便自恃工人，屡屡惹出些事端刁难大家。结果，他们夫妻三天一大吵，五天一恶吵，就再也没人劝了。有次吵到砸坏家具，喊救命，单位里来人，最终也没有闹离婚。”

C说：“在大学家属院里，老一辈教授的夫人多为家庭妇女。秦妈妈家则是两个知识分子。他们家庭和睦，待人亲切，一对双胞胎子女成绩优秀，真正是令人称美的好家庭。谁知‘文革’中，秦伯伯揭发了秦妈妈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秦妈妈决绝地搬出了这个家，住在学校宿舍里，再也没有回过家。当时，一对子女插队去了，一家人天各一方。‘文革’后期，时常看见秦伯伯去找秦妈妈，但听说秦妈妈不回头。当然，他们与子女都是来往的。‘文革’结束以后，秦

妈妈直接去了国外，两个子女也随即去留学。前些年仍可见到秦伯伯孤单的身影，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但这对夫妇没有离婚。”

D说：“我说一段‘文革’时期中年人偷情的事。这个男的孤身在上海一家皮鞋店上班，工资蛮高，但很懒很脏。老婆老实勤快，每年两次带小孩从南通乡下来上海，总要帮丈夫洗几大盆堆积的碗筷和衣被。那家小孩跟父亲长得极像，父亲也很宝贝。记得是1970年夏天，那天我看夜场电影回家，突然半楼梯亭子间响起一片嘈杂声，有人猛烈拍门并厉声呵斥：开门！原来是楼下邻居伙同文攻武卫在捉奸。门开了，那店员床上的帐子里坐着个女人。我记得文攻武卫问那女人：自己男人呢？那女人回答：坏脱了。那女人蛮漂亮的。不久，店员的老婆赶到上海，不吵架，只是哭。楼下邻居都劝她，要多来上海。这对夫妇也没离婚。”

遗憾的是，访谈中没有找到父母辈的人来直接诉说事由和心绪。但几个事例终究可以证实，“文革”期间中年人的婚姻关系并非是风平浪静的。同时，从事例中可知，当事人之所以没有走向离婚，除了社会舆论视离婚为道德的悖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显现，当事人对子女的殷殷牵挂和期待，是使当事人从形式上维持家庭完整性的重要原因。然而，所有的婚姻裂痕，却并没有因为当事人的忍耐而抹平；恰恰是这种忍耐，使当事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了更深重的压抑——没有倾诉，没有发泄，更没有寻觅和依傍——当事人只得以放弃撞开离婚大门为代价，来认同、来维护以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伦理裁判所”的权威，只得通过扭曲自我、磨损自我、熄灭自我而慢慢地走向情感的枯萎和死寂。

上海“文革”十年共6 489对的离婚数，是一个冷漠而残酷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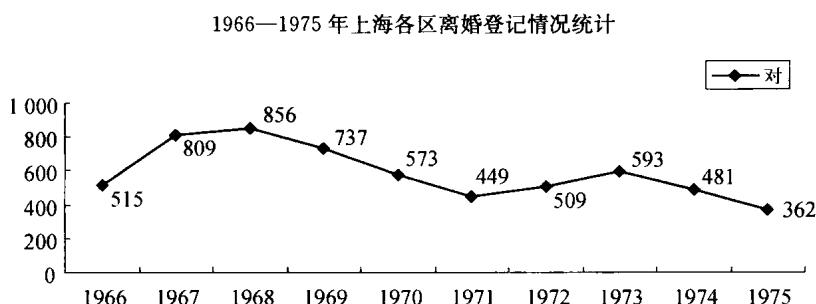
那么,这统计中稀少的离婚数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了说明问题,先听两段访谈。

E说:“我父母是在‘文革’时期办理离婚的。其实父亲在‘文革’前就因历史问题关押了,他是个有发明的工程师。母亲很重情,每年都去探视他。我们姐弟很争气,均以高分考取重点中学,没有受家庭的影响。‘文革’开始后,因血统论的关系,我们姐弟非但不能参加红卫兵,连外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资格都没有。有一次,弟弟不服,被班上红五类打得眼睛肿起来。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护士的母亲又气愤又痛心,前思后想决心同父亲办离婚。母亲是个很执着的人,她到处跑,到处问,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事情办成了,还给我们改了姓。不久,父亲死在关押处,母亲很伤心,经常背着我们祭奠父亲。”

F说:“我们有个邻居是在‘文革’中解除婚姻的。记得这家人的夫妻关系本来就不是太好,但没有走到离婚的地步。‘文革’爆发后,男主人被揪斗了,家也抄了。这家人的三个孩子不知是出于‘革命’,还是泄愤,对父亲很凶,还开家庭批斗会。父亲扛不住自杀了,父亲单位在里弄里贴了许多‘死有余辜’的标语。后来,这家人的母亲便领着三个孩子到丈夫单位申请离婚,据说三个孩子也写了什么信。‘文革’结束了,这家人的父亲平反时,母亲和三个孩子都哭了。但这家人的叔叔在一旁说,当年他们都有责任的。”

确实,在“文革”时期稀少的离婚数背后,并非多是“性格不合”、“婚外情”之类的常见理由,而是深深地埋伏着“社会政治”的归因。正如事例E中的母亲,坚持要与父亲办理离婚,不是为了自己划清界限,同样是出于“对子女的殷殷牵挂和期待”。当然,在

“文革”运动中也确有丈夫或妻子，因对方被冲击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而提出离婚的，其理由当划归于“社会政治”的范畴（如事例 F）。据《上海民政志》称：“文革”期间因冤假错案而离婚的现象增多，在申请离婚登记中，对因“政治原因”的离婚申请者，以调解和好为主的原则已无约束力。^[8]检查“文革”十年上海市离婚登记情况，可见 1967—1969 年的三年为离婚高峰期（分别为 809 对、856 对、737 对，高于日均 2 对），以后则平缓走低（低于日均 2 对），这恰可证实“文革”的动荡期与离婚的高峰期是一致的，其“社会政治”的归因也就显而易见了。如图：



资料来源：上海十区区志。

说明：因缺 1976 年上海各区的离婚统计数，故不作记录。

联系前述中关于“不离婚”现象的探究，可发现在根本上“离婚”与“不离婚”的缘由原来是归一的——不离婚是屈从于“社会政治”的需要；离婚则是服从于“社会政治”的需要。相比之下，屈从者选择了忍耐和承受，服从者选择了顺应和摆脱；屈从者被动了些，畏缩了些，服从者主动了些，放旷了些。总之，“文革”时期面对离婚的问题，既是以“社会政治”为主导的原因，产生了众多的屈从者和稀少的服从者；同时，又是这众多的屈从者和稀少的服从者，共同从两个方向搭建起了这座以“社会政治”为主旨的裁判所。^[9]

与此同时，上海各区 1976 年的离婚统计数，出现了非常蹊跷的

情况：除了静安区(13对)、卢湾区(3对)、闸北区(2对)以极其稀少的数据记录在册，其他七个区的统计数据竟然集体失踪了(见表二。且发生在“区志”这么厚重的出版物中)。是当年没有统计，还是统计后佚散了？是一个有待探查和求解的谜。

从区域方面看，上海各区十年离婚数的列序(虹口区列首位，为899对。长宁区列末位，为226对)，大致与各区总人口的列序吻合，这说明总人口的基数在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不作赘述了。

最后，各区有关婚姻的统计还显示，“文革”即将结束时的1975年上海出现了涉外婚姻，其中黄浦区9对，长宁区5对。1976年黄浦区4对，长宁区2对，南市区4对，虹口区9对。在此，与其说是这些当事人为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而委身于他人，不如说这些当事人是通过合法婚姻改换着身份和前程。它向社会传达了一种信息，人们的婚姻选择可以更开放，人们的婚姻生活应该更人性。

注 释

- [1]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469页。
- [2]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
- [3] 《解放日报》1969年9月9日。
- [4] 《解放日报》1969年9月9日。
- [5] 《文汇报》1970年12月28日。
- [6] 《解放日报》1969年12月13日。
- [7] 《解放日报》1971年9月13日。
- [8] 范静思：《上海民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 [9] 据上海婚姻登记中心调查，2004年度全市协议离婚登记数为2.7万多对，平均每天75对。见2005年9月7日《新民晚报》。2009年度，全市办理协议离婚数为38 772对，平均每天约106对夫妇离婚；2010年度，全市办理协议离婚数为37 334对，平均每天约103对夫妇离婚。见2011年1月26日《东方早报》。

第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一、“文革”前的工作基础

为了对本命题的展开有所铺垫，先梳理一下上海“文革”前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

解放以后，上海市的人口出生数出现了高增长，例如 1953 年达 25.61 万人，1954 年达 33.70 万人。^[1]就此，1955 年 8 月，上海市颁布了《关于节制生育的初步方案》，适当放宽了人流及绝育手术的管理尺度，并在第一医药商店设立避孕药品专柜。1957 年 12 月，上海市节育工作委员会成立。次年，又通过《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纲要(草案)》，规定一个家庭最好只有 2~3 个子女。应该承认，上海的经济文化基础，决定了在制定人口政策和宣传生育文明方面，具有较强的现代理念。遗憾的是，1958 年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计划生育工作因与“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的大跃进运动不相匹配而就此遭到冷落，上海医药商店库存的避孕药品竟积压变质，损失金额 58.8 万元。^[2]

1962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强调计划生育是关系建设社会主

义的大事。市教卫馆编印宣传资料 3 万份,挂图 3 700 套发往基层。该年上海市区 168 个药房和 121 家兼营商店经营避孕药品和避孕套,郊区十个县的 198 家中新药零售店也都经营 1~4 个品种的避孕用具。^[3]1963 年,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同类机构),并明确晚婚年龄为市区男性 30 岁左右,女性 25 岁左右;农村男性 25 岁左右,女性 23 岁左右。生育则提倡“少、稀、晚”,即生育子女数控制在 2~3 个以内,每胎间隔 4~5 年,初育妇在 26 岁以上。^[4]当年,上海集中开展了计划生育宣传指导活动,杨浦、卢湾等区均培训了 1 万多名宣传员参与工作。上海供应的避孕药具也大幅度增长,各种避孕药具的调拨分别较 1962 年增加 1~4.2 倍。^[5]1964 年,上海继续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并大力落实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一年,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共支出 214 万元,占整个市卫生事业费的 5.1%。^[6]1965 年,上海进一步采取奖励计划生育的政策,具体规定免费实行放节育环、人工流产、绝育等手术,手术假期工资照发,酌情给予工分和口粮补贴等。^[7]1965—1966 年,上海共施行节育手术 7 万多例。^[8]同时,上海根据商业部、卫生部的决定,降低避孕套的价格,并免费供应子宫帽。在宣传方面,上海共投资编印计划生育宣传资料 2.4 万册,宣传画 1.2 万套,画册 1.3 万册,展览图片 9 套,唱片 1 500 张。^[9]

应该承认,上海“文革”前(1962—1965)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政策、措施和宣传上不仅形成了立体型的运作构架,而且实施了强有力的推进工作。1965 年时,上海的人口出生率为 18‰,比前些年有所下降,效果是明显的。

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和状况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组织瘫痪,宣传

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

编者按：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决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习惯的大问题。它对革命、对生产、对家庭、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都起着直接的影响。今天上海皮鞋厂两位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来信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以来，有些单位对这项工作有所放松，特别是有的医疗部门竟不愿向群众宣传，不肯贯彻计划生育措施。这是对革命事业、对群众利益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引起卫生等部门的重视，加以改正。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剥削敌人会利用这个问题来挑拨，向革命群众散布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因此，我们不仅要同自己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作斗争，而且要提高警惕，把那些躲在背后捣鬼的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揪出来。

编辑同志：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抓与不抓，计划生育后果大不一样。拿我厂女工最多的缝纫车间来说，过去由于没有认真抓好这一工作，妇女中病假人员多，家务负担重，关心政治的人少，车间生产效率低，经常出现停工待料现象，严重影响其他兄弟车间的革命斗争，说生完，第二车间的抓革命，说生产。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工作，经常宣传，反复地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几年来取得了很好效果。由于

生育有了计划，孩子和家务的牵累少了，现在每个车间的女工都能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生产车间每月超额完成，并且保护了妇女的身体健康，减轻了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负担。

现在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重要时刻，抓紧革命，促进生产还忙不过来，哪有闲空来抓计划生育工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抓好了这项工作，就能保证女职工的身体健康，

使她们更好地把精力用到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皮鞋厂 两个革命造反队员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医务人员，最近在联系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单位对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比较重视，他们通过开办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与此相反，有些单位却对计划生育工作贯彻不力。有的医务人员不愿意宣传，不肯负责作技术指导。今年四月，宝山县顾村公社有六个产妇，产后到一个医院要求作绝育手术，这个医院竟以拒绝。陪同的生产队干部一再要求予以照顾，他们竟不肯答应。最后，他们向县领导部门反映，医院才勉强的替她们做手术。事后，个别医务人员还大为不满，骂生产队干部多管闲事，气得六个产妇都哭了。

计划生育工作，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和医疗部门能对此引起重视，切实把它抓起来。 陈群



《解放日报》1968年7月28日

停息，计划生育药具供应工作停顿，人口出生率在历年直线下降的情况下，一度出现了回升。例如，1967年上海的人口出生率为12.5‰，1968年和1969年的人口出生率则分别为14.9‰和14.8‰。1968年1月，市革委会发布文件，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在郊县做到指导措施落实。^[10]当年7月28日，《解放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了群众来信“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在此，值得记取的是编者按语指出计划生育“是关系到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习惯的大问题”，而且“计划生育也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把那些躲在背后捣鬼的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揪出来”。明明是群众中开明与愚拙的差异，偏偏拉扯到兴无灭资的对峙中；明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偏偏提升到阶级斗争的纲纪上。例如，静安区江宁街道发现有人对知识青年散布“早谈恋爱，早结婚，早享乐”的思想，便认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罪行”，并进行了揭

批。^[11]川沙县合庆公社(今属浦东新区)有一人大骂上门作节育动员的干部,便“抓住这个活靶子,挂上黑主子,开展革命大批判”。^[12]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调,确实为此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平添了几分威严和紧张,也属“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

1969年3月,周总理针对“文革”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的情况,作出“要计划生育,要节育”的指示。^[13]就此,“文革”期间停顿的计划生育工作正式开始恢复。具体表现为:

一、组织重建。1970年,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委托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成立了计划生育组,对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技术管理。^[14]各区、县等也相继恢复建立了相关机构,对所管辖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实施领导。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73年12月,上海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成立,并对“晚、稀、少”作出明确规定:晚婚男性为25周岁,女性为23周岁;二胎间隔4年,最多生2个孩子(“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8月,市革委会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给予奖励的政策。1981年8月,市政府修订了有关规定,正式提出“严格控制第二胎”)。与此同时,静安、南市、普陀、卢湾等区的领导机构均通过调查和预测,发动群众制定全区的人口控制规划,以及育龄妇女“一人一卡”、“一月一访”等工作考核制度,将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做到从“生了算”到“算了生”。杨浦区则根据区境工厂多、育龄妇女集中的特点,按照劳保挂钩医院的关系,将300多家大、中



上海郊县的“赤脚医生”
宣传计划生育(徐建刚提供)

型工厂划成 5 个片,28 个互助组;100 多家小型工厂挂靠街道医院成立互助组,在条块结合中充分发挥组织的协调作用。全市许多企事业单位基层单位和街道、生产队等也都设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保证在第一线有所开展和落实。例如,上棉一厂指定干部负责,厂部和车间二级管理,医务人员则分片包干。南市区小南门街道和卢湾区嵩山街道等将工作着眼点放在里委会下的几百个居民小组中,各培养了近千人的骨干队伍。^[15]

二、专业领先。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作为对全市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技术管理的单位,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了调研和培训。例如 1971—1973 年,该院派出医疗队对川沙县 12 万已婚妇女进行妇科和计划生育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为郊县医务人员举办了二十多期计划生育技术培训班。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还牵头组织市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防治协作组,制定了《上海市计划生育手术质量情况季报表》、《男女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断标准、防治措施》,并联合纺织局职工医院,不断探究和推广新型、安全的女性绝育法。闸北、黄浦区等也以区中心医院为首,成立计划生育技术协作组,既处理节育手术疑难杂症,又推广节育技术。杨浦区则联合著名的新华医院、长海医院等,在 8 所区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计划生育指导门诊,设置 75 张专用床位,并对全区负责节育手术的专业人员进行技术考核。为什么计划生育部门如此重视节育技术呢?请看表一:

表一

1975—1980 年上海市女性节育手术质量分析表

年份	手术总例数	感染率(10 万分之)	出血率(万分之)	内脏损伤率(万分之)
1975	189 665	6.6	30.4	6.0
1980	342 264	1.4	5.1	2.1

资料来源:《上海卫生志》。

原来,当时节育手术的整体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75年手术出血率甚至达到30.4/万,内脏损伤率也达到6.0/万。后通过种种努力,正是在“文革”结束前后的1975—1980年间,该手术的事故率大幅度下降,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自70年代起,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还开展并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例如有天花粉蛋白剂中期妊娠引产、利凡诺尔羊膜腔注射引产、抗早孕、宫内节育器临床研究等。^[16]

三、措施落实。有了组织保证和技术指导,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良性运作。避孕药品和节育用具的产量大幅上升,例如1969年一个月的避孕药品的产量,就相当于1968年全年产量的3倍,注射用长效女用避孕药等也研制投产;^[17]1969年沪产节育环的产量为103.8万只,1972年达270.2万只,1973年达544.7万只。^[18]1970—1974年,国家连续三次作出常用避孕药、口服避孕药直至全部避孕药具实行免费供应的决定,上海市387家药房迅速执行,1500余家烟糖百货商店也参与免费供应避孕套,以至在全市构建起了一个较完备的避孕药品发放网络。上海医药商业职工忠于职守,按地区分块包干,下里弄、下工厂,沿街挨户送药上门。例如地处南京路的第一医药商店,走访了区段内的21家单位,其中一大型商店无人领药,竟4次送药上门。据统计两年多来,市区的医药职工共向14.8万人次发放了225万片避孕药品。^[19]与此同时,市卫生宣传站为营造氛围,自1972年起编印了60万份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发往各区、县和基层。各区、县和基层在落实计划生育措施时,也不断有所探索和开创。例如普陀区为使“晚、稀、少”的方针家喻户晓,1972年在全区举办计划生育学习班2542期,学员达16万人;上钢五厂不仅经常运用专栏、画廊、交流会宣传计划生育,还开辟了“晚婚和计划生育展览室”;南市区小南门街道组织积极分子和

医务人员参加的宣传队，深入里弄开展宣讲，并做到“每周活动一次，每月研究一次”；川沙县严桥公社为推广口服避孕药，组织“赤脚医生”现身说法，被群众称为“麻球滚芝麻”。确实，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有男无女不双全”等思想，上海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另据统计，自1967年起，上海市财政拨发的计划生育事业费，每年达60万～70万元。^[20]



计划生育宣传画

三、成效分析

应该承认，1969年以后重新启动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富有成效的，这不仅表现在“组织重建”方面已比较完善和周全；“专业领先”方面已显示出权威和实效；“措施落实”方面已形成一整套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典范，更直接表现在由这些倾注着千万人心血和辛劳的运作所带来的育龄人口节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结果上。先以闸北区（表二）和普陀区（表三）的统计为例：

表二

1974—1976 年闸北区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

单位：%

年份	计划生育率	晚婚率	晚育率
1974	78.60		94.96
1975	81.60		94.21
1976	85.63	91.22	96.97

资料来源：《闸北区志》。

很显然，这一时段闸北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收获是全面的，不仅计划生育率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节节攀升，晚婚率和晚育率均达到极高的指标。缘此，作为最有力的证据，1974 年和 1975 年闸北区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21]

表三

1964 年、1976 年普陀区婴儿孩次数量对比统计表

单位：%

年份	出生 婴儿数	第一孩婴儿		第二孩婴儿		第三孩婴儿		第四孩及以上婴儿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964	7 984	1 584	20.07	1 899	24.06	1 546	19.58	2 865	36.29
1976	3 094	2 602	84.10	455	14.70	37	1.20	0	0

资料来源：《普陀区志》。

很显然，以“文革”开始前的 1964 年（那一年，市财政投入总卫生事业费的 5.1%，共 214 万元用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和“文革”结束时的 1976 年作比照，可见 1964 年时的第一孩婴儿数为 1 584 人，所占比例为 20.07%，第四孩及以上婴儿数竟多达 2 865 人，所占比例为 36.29%。1976 年时，第一孩婴儿数为 2 602 人，所占比例已达 84.10%，第二孩婴儿、第三孩婴儿人数分别为 14.70% 和 1.20%，均属显著下降，第四孩及以上婴儿数为 0。这说明十多年来普陀区的

生育模式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大规模地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

现在看全市的有关统计(表四):

表四

1971—1975 年上海市育龄人口节育率及节育措施构成统计表

单位: %

年份	节育率	节育措施构成				
		避孕药针	宫内节育器	女绝育	男绝育	外用器具及其他
1971	72.3	19.5	10.3	44.6	9.7	15.9
1975	85.7	24.9	13.7	40.4	7.3	13.7

资料来源:《上海卫生志》。

从表中可知:1971 年上海育龄人口的节育措施,以“绝育”(女性为主)为首选项目,所占比例竟然高达 54.3%,以至成为上海 70 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当时已多胎生育的夫妇人数比高,各种避孕药具的使用尚未收到理想的效果,也就多采用这种“绝断”的手段了。应该承认,“绝育”手术作为节育措施的构成之一,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损伤(尤其男性)是较大的,且有难以言说和补偿的困厄,维持如此高的比例,只能说明当时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的任务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组织动员和集体落实的情况,并非是高度人性化的选择。再检查 1975 年的统计,可见男女绝育数虽仍处在高位上(达 47.7%),但已开始动摇和下落了。其他如采用避孕药针、宫内节育器等节育措施的则开始爬升。这不仅是计划生育工作表现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也是社会集体心理认知的进步。“文革”结束后的十多年,男女绝育数直线下降(如 1980 年为 35.1%,1985 年为 18.3%)可谓证实。固然,这也与多胎率的下降存有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统计显示 1971 年时,上海育龄人

口的节育率为 72.3%，1975 年时达到 85.7%。应该承认正是社会整体节育率的不断提升，从而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才确保了上海市的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在整个 70 年代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态势。下面再以表五的数据事实为佐证：

表五
1966—1976 年上海市出生人口及出生率统计表

年 份	单位：万人、‰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出生人数	15.95	13.77	16.47	16.30	15.10	13.03	11.54	10.94	9.85	10.14	11.04
出生率	14.6	12.5	14.9	14.8	13.9	12.2	10.8	10.2	9.2	9.4	10.2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志》、《上海计划志》、《杨浦区志》。

作为“文革”十年间上海人口出生情况的整体展示，表五以 1969 年以后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数据事实，证明了自周总理在“文革”中发出“要计划生育，要节育”的指示，致使已停顿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恢复以来，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社会动员、全方位推进的基础上，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接着，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文革”动荡中，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获得如此成效？

首先，上海的历史文化环境，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上海人的家庭观、生育观，一般更贴近于现实而偏离于传统；更贴近于当下而偏离于未来；更贴近于自我而偏离于宗族。何况，上海人的“城市人”身份，以及上海人的价值理念中，先天的具有追慕现代文明的素养和品质。所以当号召计划生育时，与其说更多的上海人是留恋旧有的家庭模式，而被动地服从之；不如说更多的上海人是向往着新型家庭模式的诞生，而主动地响应之。

其次，“文革”运动前的 50 年代后期，上海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尽管其间遭遇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但 60 年代前期再度兴起的计划生育，仍然在政策制定、队伍组建、措施落实和宣传鼓动方面有所推进和建树。应该说，这一切构筑了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基础。所以当“文革”中被冲击、被阻断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恢复时，上海原有的“良好基础”不仅支撑起了一座起点较高的工作平台，更在各个方面发挥着它的功效和势能。

第三，“文革”动荡中，尽管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会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影响，特别是“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的方式，便构成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时代特点。但作为国家对社会事务的正常管理，仍然是存在着、进行着的——计划生育工作正纳入这一范畴。何况，计划生育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生活，关系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所以当它作为国家的政策被倡导、被推动的时候，其权威性是不可置疑的，其指导性也是被高度认同的。缘此，各级管理部门就能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

最后，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推进中，上海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表现出了强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导致该项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确实，任何富有成效的工作，不仅需要公众的认同，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认同产生思想的动力，参与产生行为的动力，而且越是落实在基层，这种动力就越是坚强和持久。在此，固然不能认为上海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所作所为，是对“文革”政治路线的服膺。而恰恰是对国家管理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恰恰是对自身生活的热爱和关注，才使他们如此热情参与和勤奋工作，才使整个计划生育工作成为成功的事业。

注 释

- [1]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6 页。
- [2]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4 页。
- [3] 同上书，第 414 页。
- [4]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2 页。
- [5]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4 页。
- [6] 王渭泉：《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6 页。
- [7]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2 页。
- [8] 张明岛、邵浩奇：《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5 页。
- [9] 同上书，第 260 页。
- [10] 1968 年 1 月 19 日，《支部生活》1968 年第 2 期刊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晚婚的通知》：根据市妇联革命造反兵团、市卫生局机关七一兵团以及卢湾、普陀、杨浦、黄浦、南市等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反映，最近以来，本市人口的出生率有显著上升，早婚的也多起来了。1967 年的出生率比 1966 年增长 50% 左右，结婚数增加一倍左右。
又据 1968 年 8 月 28 日《支部生活》第 56 期《进一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去冬以来，早婚现象增多。各区、县人口出生率均有较明显的上升。如出生率一贯较低的黄浦、静安两区，今年 3 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50%。全市城镇人口出生率 1968 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以上。
- [11] 《解放日报》1969 年 9 月 11 日。
- [12] 《解放日报》1969 年 9 月 9 日。
- [13]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4 页。又据《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5 页记：1969 年 3 月 14 日，周恩来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时说：前几年，我们搞计划生育，北京人口增长率接近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五以下。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年人互相串连，早结婚，生育率就增加了。所以，今年我们要把计划生育问题重新提出来。生产避孕药品倒容易，但要造成一个习惯不容易。
- [14] 杜淑贞：《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 页。
- [15] 《解放日报》1971 年 4 月 18 日；《文汇报》1975 年 11 月 25 日。
- [16] 杜淑贞：《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 页。
- [17] 《解放日报》1969 年 4 月 13 日。

- [18] 俞斯庆：《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6 页。
- [19] 《解放日报》1973 年 10 月 22 日。
- [20] 王渭泉：《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6 页。
- [21] 曹一丁：《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3 页。

第四章

1966—1976 年上海的职业人口

一、职工人数的增长及其特点

劳动年龄人口指男 16~59 岁、女 16~54 岁的社会劳动者人数，包括它的行业、职业构成等，基本反映了人们参加社会劳动和进入职业生活的状况，是重要的人口指标。为了说明问题，请看表一：

表一
若干年份上海市社会劳动者人数及职工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社会劳动者人数		职 工 人 数		
	合 计	占总人口	合 计	占总人口	占社会劳动者
1965	460.76	42.1	272.13	24.88	59.06
1970	540.87	50.4	307.50	28.67	56.85
1975	646.88	60.1	376.53	34.97	58.21
1976	669.56	61.92	399.27	36.92	59.63

资料来源：《上海工运志》、《上海统计志》。[1]

由表一可见：1966—1976 年的“文革”期间，上海的社会劳动者

人数是逐年增长的,前五年增长 80.11 万人,后五年增长 128.69 万人,总共达 208.8 万人。再看职工人数(因本课题的主旨为城市社会生活史,所以在社会劳动者人数的具体统计中,就省略了“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的数据,只展示在职职工的统计情况),前五年增长 35.37 万人,后五年增长 91.77 万人,总共达 127.14 万人。且从 1970 年始,社会劳动者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 50%,即总人口中有一半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行列(1976 年时,该比例达到 61.92%)。这主要是因为 50 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 20 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请看表二。

表二

1966—1976 年上海市职工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全民所有制单位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	指数(以 1962 年为 100)
1966	273.75	213.36	60.39	193.6
1967	280.15	219.13	61.02	198.2
1968	304.56	242.90	61.66	215.4
1969	309.42	247.11	62.31	218.9
1970	307.50	244.53	62.97	217.5
1971	321.31	252.80	68.51	227.3
1972	332.79	261.26	71.53	235.4
1973	340.53	266.86	73.67	240.9
1974	350.68	273.36	77.32	248.0
1975	376.53	293.84	82.69	266.3
1976	399.27	312.26	87.01	282.4

资料来源:《上海劳动志》。^[2]

表二显示:除了 1969—1970 年间,上海职工人数是下降的外,

其余均以不同的增幅上升着。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节点。

第一，在前五年非常平缓的增长节奏中，突兀性地出现了 1967—1968 年高达 24.41 万职工人数的增长，且 23.77 万人集中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只有 0.64 万人进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这是因为上海的“老三届”中，有相当部分的 1966 届和 1967 届人，在“文革”期间启动的第一轮分配中，依据“四个面向”的方案进入了工矿。现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这部分人应有 20 万左右。

第二，便是 1969—1970 年出现的在业人口数下降的情况（总人数为 -1.92 万人。全民单位为 -2.58 万人。集体单位属正常的少量增长），这对上海作为大型城市和重要工业基地的定位来说，是十分反常的现象。这就是说，当年全民单位职工调离、死亡、退休等总人数，竟然高于或因调动、或因退伍等而加入职工队伍的人数。如果说这只是常规层面的人员变动，那么根本的原因在于 1968 年底掀起的上山下乡高潮，制定了上海 1968 届、1969 届人全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所谓“一片红”方针。由此，劳动力资源的流向被政治需要篡改了，上海的工矿企业断绝了进人的渠道，职工队伍也就违反常规地收缩了一圈。

第三，从 1971 年起，上海的职工人数出现了补偿性反弹。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需要持续补充劳动力（据《上海计划志》资料：1967 年因造反夺权，上海的工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 9.7%，上海“文革”期间其余年份的经济指标均有所增长）；^[3]二方面是因为“一片红”的上山下乡方针已难以继续推行，而改换成了“农工平衡”、“一农一工”（即家中已有务农者，再有子女分配时则进入工矿）之类的政策。因之，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继续延伸着（多为长子、长女等），但终究每年有 10 万左右的毕业生，成为全民单位的在业人口。在本项统计中，1974—1975、1975—1976 年两个年度的

职工增长,分别高达 25.85 万人和 22.74 万人(其中全民单位分别增加 20.48 万人和 18.42 万人)。在此,除了不断有大批毕业生分配的缘由外,上山下乡运动已成强弩之末(或者说上山下乡的政策已变得宽松),致使一批知识青年通过招工、上学、参军、独退(指独生子女)、病退等改变了身份,回到了城市,自然也就扩充了职工队伍,增加了职业人口。

二、职工的来源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十年间的在业人口变化,既有突兀性的膨胀,又有突然性的收缩,确实走出了一条怪异的曲线。顺沿着这条曲线去寻找它的运行逻辑,毋宁说看不见市场的支配和影响,甚至连计划的调度和安排,连对人口事实的尊重和重视都过于牵强。这是因为它的内在驱动,完全源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需求而变得十分无序;且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革命属性而变得十分强制。这种无序的强制和强制的无序互为因果,终于导致了如此错杂的局面。

那么,上海“文革”十年间职业人口的变化与毕业生出路的关系果真如此紧密吗?请看表三。

表三

1966—1976 年上海市全民单位固定职工来源比例统计表

年份	城镇居民 待业人员	农村 劳动者	学生	复员退伍 转业军人	集体 转全民	临时工 转正	其他
1966—1976	1.07%	5.25%	72.28%	6.71%	0.62%	9.52%	4.55%

资料来源:《上海工运志》。

说明:“其他”栏类包括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外省调入等。

由表三可见,1966—1976 年间,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来源确实主要在于毕业生(高达 72.28%)。所以,毕业生的数量和去向,便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业人口的变化和状况。按理说，毕业生的数量要素是绝对性的，去向要素是随机性的。但“文革”运动掌控着毕业生的去向，自然也就消解了随机性的功能；反之，其数量的绝对性功能则随着毕业生去向或农村、或留城的不同定位而产生着不同的权重。与此同时，可发现表中其他各项“职工来源”的比例均很低（均不超过 10%），其中“集体转全民”只有 0.62%，“城镇居民待业人员”也只有 1.07%。这不是说该两项统计指标的总人数是低的，而是证明“文革”十年间，这两类人群因“身份羁绊”——政策和社会舆论均认定待业者的身份不仅是“游移”的，更是“脱离社会主流”的；而集体人员先天性地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也只能处于边缘——所以，这两类人群便完全缺少了进入全民单位的机缘。反之，复员退伍军人因政治身份的优势，不仅是优先的，更是堂而皇之的。这一群体属常年固定的职工来源，受到各全民单位的欢迎。

下面着重解答为什么表三中“临时工转正”一栏的比例竟高达 9.52%。

1965 年 11 月，上海市人委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发布了《上海市临时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凡属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需要，应“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当年上海全民单位中临时工为 11.34 万人，占全市职工的 5.4%。“文革”运动初期，上海的部分临时工、外包工成立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并冲击市劳动局，要求转为固定工。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强调临时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前，仍按原办法执行”。1968 年 1 月 18 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中，又重申了临时工等“一律不得转为固定工”的意见。至 1970 年底，上海全民单位中临时工已达 15.29 万人，占全市职工比例为 6.3%。^[4]

1971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规定已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可以改为固定工。就此,1971年12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临时工转正的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当年即有10.50万临时工转为全民单位的正式工。1972年又转正3.14万人,至1975年的三年间又转正了0.81万人。^[5]其实,临时工、外包工等也是存在“身份羁绊”的,但由于这一群体集体性地“在岗”,且有造反的背景,终于在“文革”中后期获得了身份转换,构成了重要的“职工来源”。表中“农村劳动者”一栏的比例为5.25%。据查,1969年以前上海的全民单位没有从农村招收过职工。此后则是原城市户籍的知青通过招工、农村户籍者通过企业征用土地等方式进入全民单位。在此,该两项发生在1970年后的统计恰好说明,为什么“文革”后五年的职工来源数会明显地高于前五年。

三、职工的分布

上海的职业人口具体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是如何分布的呢?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分类标准,列表四如下。

表四
若干年份上海市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人数及比例表

年份	合计	工业 (比例)	基本 建设 (比例)	农林 水气 (比例)	运输 邮电 (比例)	商饮 服供 (比例)	城市 公用 (比例)	科教 文卫 (比例)	金融 (比例)	机关 团体 (比例)	其他 (比例)	单位:万人、%	
1965	272.13	148.04 (54.4)	10.07 (3.7)	8.71 (3.2)	16.60 (6.1)	42.18 (15.5)	7.35 (2.7)	30.48 (11.2)	1.09 (0.4)	6.80 (2.5)	0.81 (0.3)		
1970	307.50	176.73 (57.5)	9.19 (3.0)	15.82 (5.1)	18.35 (6.0)	42.97 (14.0)	8.23 (2.7)	28.95 (9.4)	1.12 (0.3)	5.62 (1.8)	0.52 (0.2)		

(续表)

年份	合计	工业 (比例)	基本 建设 (比例)	农林 水气 (比例)	运输 邮电 (比例)	商饮 服供 (比例)	城市 公用 (比例)	科教 文卫 (比例)	金融 (比例)	机关 团体 (比例)	其他 (比例)
1975	376.53	203.09 (53.9)	19.64 (5.2)	27.85 (7.4)	24.58 (6.5)	50.00 (13.3)	8.49 (2.3)	35.43 (9.4)	1.30 (0.4)	5.78 (1.5)	0.37 (0.1)
1976	399.27	209.76 (52.5)	22.02 (5.5)	33.31 (8.3)	26.19 (6.6)	53.34 (13.4)	9.34 (2.3)	37.67 (9.4)	1.39 (0.4)	5.91 (1.5)	0.34 (0.1)

资料来源：《上海劳动志》。

由表四可知：

第一，从 1965—1976 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除了机关团体人员减少了近 1 万人外——这主要是“文革”运动通过“五·七”干校、干部下放“战高温”、“四个面向”等被逐渐驱逐的结果——其他各大口的职工人数均有所增长，例如工业系统增加 61.72 万人，商业服务系统增加 11.16 万人，科教文卫系统增加 7.19 万人等。固然，这与各大系统的基础有关，但终究证明了“文革”期间上海国民经济各部门仍处在扩大规模的状况中。选取工业和科教文卫系统作进一步的剖析，可发现“文革”十年间，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的重工业部门增加了 30.36 万人（所占比例增长 4.98%）；轻工业部门增加了 10.39 万人（增长 0.99%）；纺织工业增加 1.78 万人（增长 5.97%）。而教卫系统中的高等学校教师数量基本保持在 1.1 万人的规模，中学教师的数量则因入学人口膨胀净增了 2.07 万人，小学教师甚至出现负增长（-0.01 万人）。^[6]看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职业人口有所增长的背后，其内部或因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因人口变动的需求，而使在业人口的分布出现了新的变局。

第二，在职业总人口增长的前提下，深入观察上海“文革”十年间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人数占全市职工总数的比例，可发现比例有所提高的是基本建设、农林水气、运输邮电等三个部门。金融行业维持

原有的比例。其余如工业、商饮服供、城市公用、科教文卫等部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此，“农林水气”的职工比提高 5.1%（职工数净增 24.6 万人），主要是因为市属 18 个农场（位于郊县 15 个，外地 3 个）先后吸纳了 30 多万的市区毕业生。虽然这属上山下乡的任务，但“农场职工”的身份，仍划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统计范畴之中。而“基本建设”、“运输邮电”的职工比上升，则应认为是上海经济在“文革”十年间，较注重“以工业为主导”的“基础”和“规模”的建设。反之，关系并直接有利于人们生活的商饮服供、城市公用、科教文卫等职工比均下降，应认为是当时上海的城市功能有所弱化。关于上海社会劳动者人数三次产业分布的统计可引为证验（如表五）。

表五
上海社会劳动者人数按三次产业分布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社会劳动者人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65	460.76	188.70	40.95	160.68	34.87	111.38	24.17
1970	540.87	199.65	36.91	229.59	42.43	111.63	20.64
1975	646.88	237.00	36.64	277.19	42.85	132.69	20.51
1985	763.52	126.75	16.60	442.27	57.93	194.50	25.47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志》。

由表五所知，在整个“文革”期间，上海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人数比虽有所下降，终究因为幅度太小，仍保持在三分之一强的水准上。而“文革”结束以后的十年，该项人数和人数比才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坠。与此同时，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的人数和人数比均持续上升，甚至达到二分之一弱。然而，恰恰是这第一产业人数比的些微下降和第二产业人数比的持续上升，挤压并压缩着上海的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从四分之一减少到五分之一。

其实,上海是集金融、贸易和生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历史上曾“第二产业强盛,第三产业发达”。迨至解放初的 1952 年,上海第一、二、三次产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比尚为 5.9 : 52.4 : 41.7,与当时国际先进城市的差异不大。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978 年,因上海经济坚持“以发展工业为主体”(实为传统工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便从 52.4% 上升到 77.4%;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 41.7% 下降到 18.6%。如此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7]在此,如果说 50 年代上海经济的发展路向,已决定上海城市的定位发生了功能性失误,那么,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政治需求的发展,更使这种失误走向了尽头。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重建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才得到调整,城市功能才得到恢复。

四、职工分类和性别构成

下面在职工队伍构成方面,选取“职工分类”和“性别结构”作简要阐述。先看表六。

表六
若干年份上海市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职工分类比例统计表

年份	总人数	单位:万人、%					
		工人 (比例)	学徒 (比例)	技术人员 (比例)	管理人员 (比例)	服务人员 (比例)	其他人员 (比例)
1965	118.59	85.85 (72.4)	6.33 (5.3)	5.77 (4.9)	9.38 (7.9)	7.85 (6.6)	3.41 (2.9)
1976	161.12	115.29 (71.6)	9.57 (5.9)	5.73 (3.6)	13.50 (8.4)	12.73 (7.9)	4.30 (2.6)

资料来源:《上海劳动志》。

由表六可知：从1965年到1976年，上海全民单位职工队伍中除技术人员的总人数、人数比均下降外，其余分类中“学徒”、“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总人数、人数比均上升。作为职工分类中主体存在的“工人”，则总人数有所增加，人数比却有些微的下降。这就是说在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且在管理和服务的岗位上（属非生产人员）有所增多。如果这仍属正常的变化，那么技术人员总人数、人数比均下降的事实，则应是违背企业管理规律的，属非正常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文革”运动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煽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纵观《上海劳动志》记载的该项统计（从1957—1990年），技术人员的总人数、人数比均年年增扩，只有“文革”这一段是凹陷的。确实，这段凹陷是孤独的，是触目的。然而也正是这一段从职业人口分类变化的角度，证实了“文革”运动排斥技术人员，排斥技术进步的荒唐和不幸。

关于职工队伍“性别结构”的统计可看表七：

表七

若干年份上海市女职工人数及比例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份	职工总数	女职工数 (比例)	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职工总数	女职工数(比例)	职工总数	女职工数(比例)
1965	272.13	104.90 (38.5)	212.37	63.07 (29.7)	59.76	41.83 (70.0)
1970	307.50	116.63 (37.9)	244.53	74.37 (30.4)	62.97	42.29 (67.2)
1975	376.53	158.47 (42.1)	293.84	103.43 (35.2)	82.69	55.04 (66.6)
1976	399.27	168.80 (42.3)	312.26	111.48 (35.7)	87.01	57.32 (65.9)

资料来源：《上海劳动志》。

由表七可知,从 1965 年到 1976 年,上海女职工数随着总职工数的增长而增长(人数增长 63.9 万,总数达 168.80 万人;人数比增长 3.8%,达到 42.3%)。这说明在女性就业的问题上,或许源于“革命理念”的指导;或许出于社会的集体认同,“文革”期间的政策和做法因高度强调“性别平等”、“同工同酬”,是没有产生任何偏差和歧视的。从某种角度去阐述,这确也反映了“文革”的时代特征。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可发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数、人数比呈现出大幅度直线上升的态势(人数增长 48.41 万,人数比增长 6.0%);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数却增长缓慢(人数增长 15.49 万),人数比甚至出现了持续下滑的状态。

存在于其中的原因首先是“文革”十年间,全民单位(含国营农场)大规模地从中学毕业生中吸纳职工。集体单位则因“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至少在 1968 年大批“老三届”进入工矿时,没有被有关计划指令打开门户。以致“文革”前五年,上海集体单位的女职工数只增长了 0.46 万人。直到“一片红”的上山下乡政策被废弃后,集体单位才开始按照“一工一农”的分配原则接收毕业生。何况,在“文革”时代的社会集体认同中,毋宁说集体所有制总有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嫌,它的单位的性质定位也就天然地低人一等(伴随着的“身份认同”也就低人一等);就是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规模(多为区属小企业及商业饮食服务单位)、福利等也是无法与全民单位比拟的。所以,不论是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面对集体所有制的单位,总是有些无奈的。这应是集体单位女职工数相对增长缓慢的社会心理因素。

其次关于女职工人数比的问题,应看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开创时期,存在着“解放妇女”的时代需要,所以集体单位的女职工人数比甚至高达 85.0%(1957—1960),“文革”运动开始前的 1965 年也高达 70%。反之,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人数比在 1965 年前就没有超

过 30%，直至 1970 年才到达 30.4%。其实，正是这种由历史形成的原初状态的人数比差异，才构成了表七中的数据分布和走向。这就是说它并不证明“文革”十年间全民单位偏重于吸纳女职工，而恰恰证明两者对此是同样采取自然态度的。所以，由于全民单位女职工基础人数和基础人数比均低，吸纳大量职工后，无疑人数和人数比均上升。而集体单位职工总数少，女职工人数比却很高，接受分配的新职工后，无疑职工总数上升，女职工人数比下降。总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文革”期间强调以阶级“差异”消灭其他各种“差异”的社会思潮，在对待“性别差异”的问题上，确是没有任何比较和选择的。

另外，具体察看“文革”期间女职工人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比例关系，可见“科教文卫”系统是始终排列首位的，例如其 1965 年时在全民单位所占比例就达 43.3%，1976 年时达到 47.5%。“金融”系统的女职工人数比也很高，1976 年的统计比例为 33.6%。相反，“基本建设”和“运输邮电”系统的女职工人数比一直较低。^[8]这主要因为各行业对女性工作的适宜性要求是不同的，所以有关分配部门便“确定一定的男女比例，基本上运用行政手段，解决青年就业中的男女平衡问题”，^[9]以达到合乎常规性分布的目的，在此就不赘述了。

注 释

[1] 李家齐：《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0 页。颜德纶：《上海统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3 页。

[2] 沈智：《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8 页。

[3]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6 页。

[4] 沈智：《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4 页。

[5] 同上书，第 174 页。

[6] 李家齐：《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8—362 页。

[7]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0—333 页。

[8] 沈智：《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8 页。

[9] 同上书，第 79 页。

第五章

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

一、初始期与上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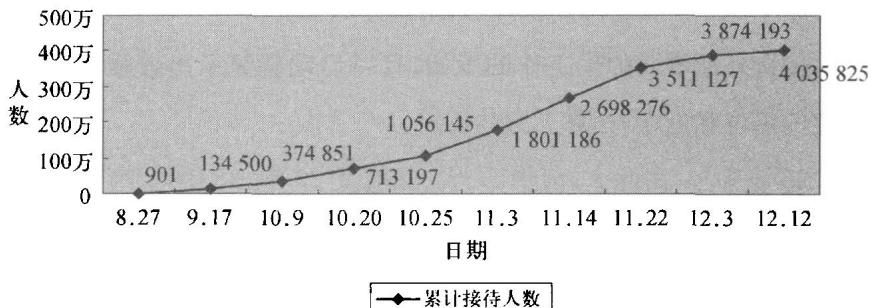
根据 1966 年 8 月至 12 月(8. 15—12. 12)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编印的《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统计,在整个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忽略少数基层单位直接接待或寄居在亲戚家的人数,上海累计接待全国各省市红卫兵数达 400 多万人(具体登记数据为 4 035 825 人);而上海当日接待全国各省市红卫兵的最高统计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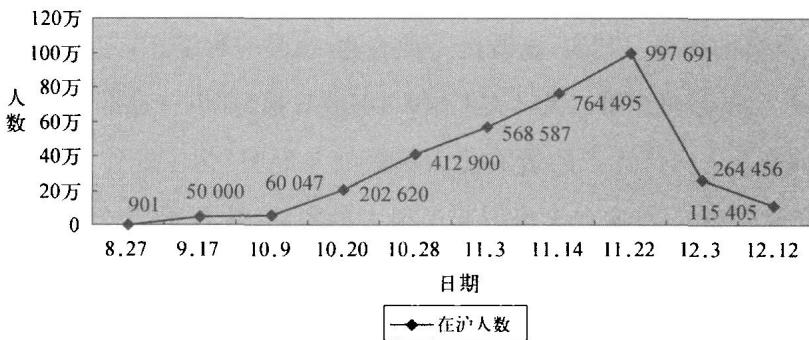
红卫兵大串联

(即在沪人数)为 11 月 22 日的 99 万多(具体登记数据为 997 691 人)。^[1]再根据整个接待过程中形势、任务和人数的变化,大致可将接待过程分为初始期、上升期、突破期、高潮期、回落期等五个阶段。

为了说明问题,现编辑图一与图二,为展开的论述提供参考。



图一：上海市接待全国各地串联学生累计人数



图二：上海市接待全国各地串联学生在沪人数

资料来源：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编印《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

说明：1. 本表为市接待站的统计数据。少数基层单位直接接待或寄居在亲戚家的不在此列。2. 本表数据为原始资料的直录。

初始期(8.15—8.27)

1966 年 7 月下旬,上海的大中学校里零星出现过一些外地来串联的学生。其实,这些多为正在北京读书的上海籍学生,他们是或回母校,或到上海同类的高校探访“文化大革命”开展形势的。8 月上

旬,有少量的外地学生到达上海,但北京方面频频传来“红卫兵南下”的消息,终于促使上海方面有所准备。8月15日,以团市委所属的市学联宣布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并在有关基层设立了工作点。至25日的十天中,市学联共接待了352名串联学生,“除103人住在上海团校外,其余都分散在各校”。^[2]应该说,这是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师生工作的肇始,且一启动就显示出较强的组织功能的定位和运作,亦属上海的特点。

26日中午,由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及26中、28中等14所学校的170多位北京红卫兵抵沪,“北站月台上,红旗招展,鼓声喧天,副市长李干成、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市学联主席郭醒民,会同华东师大、复旦、交大、华东化工等院校的五百多名红卫兵代表”,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和领队座谈会。^[3]应该说,上海的党政领导给予了北京红卫兵很高的礼遇。其实,这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姿态,甚至更是一种政治的策略。第二天,《文汇报》、《解放日报》即以首都部分红卫兵“前来上海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经验”为主题作了报道(属首次报道)。^[4]这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数百所学校打电话给团市委,要求联络北京红卫兵前往作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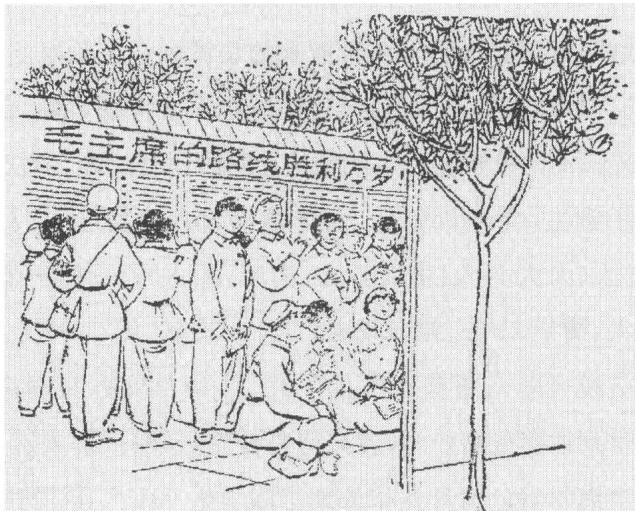
北京红卫兵看上海(网络图片)

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红卫兵的一次“组织”行动,一些人甚至连介绍信、钱粮都没带,他们是在所搭乘的京沪列车上临时组成“南下造反队”的。只因为集中性地来自首都,且人多势众,消息传来才引起了上海方面的高度重视。当天到达上海的还有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的大中学生,合计 366 人。经学联安排入住复旦 33 人(北大 5 人、清华 8 人、人大 3 人、南大 3 人、南邮 14 人);入住华师大 35 人(北大 15 人、清华 11 人、北京政法 9 人);入住交大 256 人(主要是哈军工、北航、杭大等);还有入住上外 32 人,华东政法 11 人等。当这些串联学生到达接待高校时,各接待高校均敲锣打鼓,夹道欢迎。^[5]至 27 日,上海学联已累计接待外地串联学生 901 人,^[6]其中北京学生达 512 人,占一半为多。这说明在大串联运动的初期,在上海这座远离北京的城市里,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成为大串联运动的主导力量。同时,可见上海学联的接待工作一直进行得很有条理,显示了较高的服务和管理的水平。

上升期(8.28—10.18)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后,上海便是继续串联的主要目的地(含北京红卫兵)。据记录,自 8 月 28 日起外地来沪串联学生数急剧上升,当日即达 140 批次,共 793 人,几乎与 15 日以来的累计接待数持平。^[7]以后,每天到沪人数均超千人,9 月 3 日为 4 069 人,9 月 11 日为 9 501 人,9 月 17 日甚至达到 13 500 多人。

正是预测到了这样的态势,上海市委于 8 月 28 日下午 4 时半发出急件《通知》,决定“由铁路局和市学联抽调人员,在上海北站建立接待办公室”,各高校则“建立接待组,并派人入驻市接待办公室,以利联系”。同时,《通知》申明:外地学生缺钱粮的,先由接待学校解决就餐,将来到市接待办结账;市内可凭学生证免费乘车;回原地由市接待办免费发给车票。“三免费”的正式实行,标志着上海接待外



外地红卫兵来沪串联(摘自 1966 年 11 月 20 日《文汇报》)

地学生串联的门户彻底撞开了。又因上海地处交通枢纽,江浙两省涌来了大量学生,例如“江苏南通三中的学生几乎统统来了,浙江平湖中学整班级来,一次就来了二百多人”。^[8]9月初,市接待办腾出新亚等四大饭店作为串联师生中转站,即保证每一个抵沪的串联师生都能在宾馆休整一夜,第二天再进行分流。应该承认,上海在开发接待的应急功能和提高接待质量方面,不仅尽心尽力,而且还是很有办法的。

为缓解北京的串联压力,铁道部宣布自 9 月 16 日零点起,增加北京—上海列车 7 对,并将京沪 21 次列车等改变为运输学生的专列,这使上海的接待任务更加吃重。^[9]同时,相当一部分北京学生以参与运动为名久住上海,例如住华东师大的北大、清华学生,住第一医学院的北京育英、女八中的学生均已在校一月。有的外地学生则整天忙于游玩、购物,例如已抵沪半个月、住上海冶金机械学校的青岛十四中几个学生“每天打篮球、游泳、捉蟋蟀”;住上海工学院的南昌洪都中学几个学生整天“逛马路、商店,买了各种鞋子 25 双,各色手帕 15 块,以及其他衣物、玩具等”。^[10]由此,上海接待工作中的住



1966年9月，上海市领导劝阻
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徐建刚提供）

宿困难突显而出，据反映，9月中下旬时，在上海各高校住宿的外地学生“少数占本校学生的三分之二，多数超过本校学生两倍以上，如交大原有学生六千多人，现住各地学生五千多人，最多时达七千人；上海戏剧学院原有学生四百人，住了各地学生一千多人”。市接待办只得不断开放中专和完全中学，并“考虑开放全市所有的完全中学和部分有条件的初级中学”，以解燃眉之急。〔11〕

10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各部委、市人委、各局、各区委、各大学党委负责干部会议，宣布成立“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由李干成任组长，张浩波（兼任办公室主任）等任副组长。下午，李干成即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落实30~50万人的住宿方案（据10月20日统计，在沪外地学生达20多万。累计接待人数则已达70多万）。会议决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生活组负责日常工作。大学、中专的接待工作分别由高教局、教育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区统一思想，落实接待方案。在当时纷乱的政治形势下，各区立即传达了市委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黄浦、南市、闸北等区召开

了学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卢湾区召开街道办事处主任会议,南市、长宁、卢湾、静安、徐汇、普陀等区均建立了区委领导挂帅的指挥小组。上海的接待工作开始从高校、中专等学校系统,全面地向地区系统铺展,并通过地区系统调动各方资源和人力,迎接即将到来的串联大军。

二、突破期、高潮期与回落期

突破期(10.19—11.3)

10月中下旬,以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关于落实30万~50万人的住宿方案为目标,不仅各区县有所发动,例如黄浦区腾出党校、文化馆等用作接待,^[12]川沙、上海等郊县均成立接待站,上海的各局机关也纷纷动作,例如为了让出房屋,市粮食局机关迁出东海大楼至面粉厂办公,市科委机关迁至自然博物馆内,市环卫局迁至下属的肥料公司等,上海手工业局组建的“红卫兵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竟多达190人。^[13]

此时,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大量集结北京,广州又因“广交会”召开,两座城市均宣布“只出不进”。于是10月21—22日,共有11万多(登记数为112 481人)外地师生涌入上海,上海当日接待人数已达25万多(登记数为255 432人)。23日,北京、哈尔滨、郑州、徐州、株洲均有直放上海的列车抵达北站,至晚10时,北站仍聚集着2万多外地学生。据统计,全市当天共接待外地学生72 305人,在沪外地学生30万的界线终于突破了。

10月24日上午,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必须采取措施,落实接待50万外地学生住宿的计划,并研究制订全市接待80万人的方案。具体计划分配如下:市级机关负责接待10万人,大学、中专接待12万

人,10个区接待33.6万人,其中虹口、杨浦、南市各接待4.2万人,静安接待3.5万人,闸北、黄浦各接待3.1万人,普陀、卢湾各接待3万人,徐汇接待2.8万人,长宁接待2.5万人(以上共计55.6万人)。^[14]应该承认,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任务,上海在接待外地红卫兵大串联方面,一直是措施得当、指挥有力的。然而可悲的是,一方面红卫兵大串联是要依赖于这套组织体系的,否则无法动弹和运行;另一方面却又从根本上通过“串联—造反”,攻击着、摧毁着这套组织体系,企图使之不得动弹和运行。

截至10月28日,9万多外地学生到沪(登记人数为91 128),以致当日上海累计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升达130多万人(登记人数为1 306 782人),在沪外地学生达到41.29多万人。短短的一周之内,40万人的界线瞬间被突破了。在此,一是京广线因广州“只出不进”不能通到底,必然导致京沪线人流拥塞。二是尽管每天离沪的人数达三四万,且离沪的火车票、船票已发放至11月上旬,但进出的人数仍相距悬殊。市接待办便决定开设上海真如接待站,日计划接南下列车8趟,并配备工作人员72人,运送串联学生的汽车30辆。31日晚,上海真如接待站正式开放,当即接待6 000多人。11月1—3日,多达23万人(登记人数为238 559人)的外地师生进入上海,3日上海累计接待外地师生总量达到180多万人(登记人数为1 801 186人),在沪外地学生达到56万多人(登记人数为568 587人)。短短的一周,50万人的接待界线终于被突破了。

高潮期(11.4—11.22)

进入11月,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因气温骤降,运输积压,发动群众的目的基本达到等诸多原因,已悄悄地进入关门阶段。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信号;11月10日,经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划,

赴京各地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单位倡议书》就是一个证明。毛泽东也突击性地在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日完成了第六至第八次对红卫兵的检阅活动。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终于下达了《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布停止本次串联(21日生效),待第二年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故要求各地师生立即返回。

既然全国是一种收缩期的状态,怎么上海的接待工作会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呢?

原因正在于这种全国性的收缩,必然会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短暂的“聚力—释放”的功能,而上海所处的位置和地位,上海在接待方面显示的绩效和水准,恰恰使之成为这种“聚力—释放”功能的承载地,即成为千千万万外地师生在结束串联之前,所选择的最后的一个串联地。统计显示,在11月4日至11月22日的18天里,每天到达上海的外地串联师生数都在10万上下,以致全市累计接待外地师生总量从200多万飙升至350多万(登记人数为3 511 127人);当日在沪外地师生数从62万多飙升至99万多(登记人数为997 691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公布后,市接待办立即布置在各大、中学校,各区、局机关外地学生接待站和车站、码头普遍张贴,并指示接待人员广泛宣传,周到服务。部分外地师生积极响应,表示应尽快回校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地学生向接待站提出种种变通的要求,例如有的非北京籍学生提出解决上海去北京的车票;有的则要求提供装备,由乘车串联改为徒步串联;有的索性表示继续留在上海,等待明年春暖后的第二次大串联(如长春九中几个学生拿了车票不上车又回到住宿地)。也有头脑活络的外地学生相互交换两地车票,于是该回哈尔滨

的去了广州,该回广州的则去了哈尔滨,顺畅地将串联进行到底。

21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开始生效。据统计:当天上海仍接待外地来沪学生129 907人。25日,有关方面曾对当日抵达上海的4辆列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70%的学生是违反中央《通知》继续来沪串联的。这部分学生有的越站来沪,如有洛阳学生从西安返回,不下车直达上海;有的返程途中遇大城市下车,如有苏州学生从金华返回,沿途在杭州、上海串联;有的反向乘车,如有北京学生从天津、烟台南下来沪。更有在外地的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换票,致使大批外地学生持票到沪(这属上海串联学生的拿手好戏)。^[15]

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师生高潮期的发生既是独特的又是必然的。

回落期(11. 23—12. 12)

所谓收缩的“聚力—释放”的功能,尽管很强烈,终究是短暂的。其实,就在11月22日在沪外地学生数达到99万多人的高峰时,上海也首次出现了离沪学生数多于到沪学生数的情况(到沪登记人数为71 898人;离沪登记人数为80 658人)。这即显示了高峰期与回落期在瞬间的交错和共存,而后便是大幅度的相背而行。所以,一直到12月初,上海每天的外地串联学生离沪数均保持在10万人上下,到沪数则连续稳定在2~3万人左右,这便直接导致了当日在沪外地学生数的迅速下降。据统计,11月25日在沪学生数为82万多,27日为68万多,29日为52万多,12月3日为26万多。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学生的工作准确地进入了“回落期”的轨道,其特征和效果不仅十分鲜明,也是十分踏实的。固然,中共中央的《通知》显示了巨大的效力,上海的各级接待部门在执行时付出的种种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11月26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驻沪部队、各区接待办公室干部会议,专题研究外地学生返校事宜。静安区、普陀区等分别介绍了经验。会议强调了“先来先走,分期分批、照顾重点”的返校原

则,尤其要求做好对 100 人以上团体的登记和运送工作。同时,针对市十五中学、继光中学接连发生上海外出串联的返校学生张贴布告、驱赶外地学生的情况,要求各接待单位注意动态,协调关系,以防冲突。

为了促进外地学生离沪工作顺利展开,市接待办公室于 27 日决定向每位返校的学生赠送一枚有机玻璃语录牌。这种上海产的有机玻璃语录牌红底金字,很有光芒。在当时兴盛的像章收藏热中,属很时尚、很别致的一类。市接待办公室的这一举措,竟然赢得了广泛的响应,一些犹豫着、拖拉着的外地学生纷纷办票返校。当天,各基层接待站就领去语录牌共 24 万枚。大、中专系统一般采用办离校手续时赠送语录牌;各区接待站一般采用发车、船票时赠送语录牌。在今天看来很荒诞的一幕,在当时人们的精神向往和行为追求中恰恰是很真诚的选择。

与此同时,上海铁路局自 11 月 8 日起即在上海站、蚌埠站等地,组织开行了 20 趟学生专列,以疏散上海及沿线的串联队伍。^[16]12 月 1 日,根据铁道部命令,又将福州至上海的 55、56 次直快列车延伸到北京,以加强京沪线的运能。再据上海铁路局截止于 11 月 30 日的统计,由上海站提供免费乘车的外地师生数已达 3 282 341 人,^[17]而本文所依凭的主要史料《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显示 11 月 29 日的上海累计接待人数为 3 778 740 人,将两项数据比照分析,大致可证实此时绝大多数的外地学生已经离沪了,且主要是由铁路承担运输的。因全国的步行串联仍在进行(实际上,变相的乘车串联从未中断),自 12 月中旬起,进入上海与返回家乡的外地串联学生数均保持在每天 2 万人左右,在沪外地串联人员则稳定在 12 万人上下,并缓缓地下降。

1967 年 2—3 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通知》,宣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联,并指示撤销接待站。于是,1967 年 3 月 7 日,市革委

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接待人员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上海1500多个接待站停止工作，15万接待人员返回原工作岗位。^[18]就此，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师生的工作基本结束。

三、组织与活动

北京及外地红卫兵到达上海，除了少数人直接参与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建起了驻沪联络站，如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简称“哈军工”）驻沪联络站等，绝大多数人还是来仰望、来探求、来感觉这座城市的（即便在街头、校园听听辩论，抄抄大字报，也是浮光掠影的过场），恰如甘肃师范学院一串联红卫兵的日记所写：

上海，我在小学的教科书上就认识你了。今天，我来到你的身边，请你告诉我：毛主席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那里开的？五卅惨案的血是在那里流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又在那里站的岗？^[19]



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教上海中学生跳“革命舞蹈”（徐建刚提供）



来自辽宁的红卫兵访问一大会址(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确实,这就是大多数来上海串联的外地红卫兵的冲动和意愿。他们因所接受的教育而产生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上海的寻觅目标;他们因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精神气象,决定了他们在上海的心灵洗礼。同时,上海表现在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城市功能,一向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即便遇到红卫兵大串联这样的非常状态,它也总能通过开发潜能,调度四方,以保持整齐而有序的运作。既此,一方面是外地串联者殷切的企盼;一方面是上海接待者良好的素养,两者的遇合必然形成属于上海的独特接待模式和特征。

大凡经历过串联的人都知道,一般外地学生到达串联地,不管是在市内参观访问,还是办票离去,多处于散乱的流动状态。然而,上海的许多接待单位却将这种“流动”调控起来,积极组织外地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串联活动。在上海的大串联还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市有关主管部门就曾组织北京红卫兵出席劳模座谈会、观看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百万群众》、集体参观万吨水压机等。^[20]据报载,当红卫兵们观看工人操作数层楼高的水压机时,便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语录歌。许多红卫

兵还如获至宝地将锻件上掉下来的氧化铁皮留作纪念。^[21]每天，中共一大会址门前更是“人如潮涌，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响彻云霄”。^[22]如果参观的人群处于自然流动状态中，就不会有这般的阵势。当时，顾正红烈士塑像，国棉二厂厂史展览室，抗大校史展（工人文化宫、青年宫），交大穆汉祥、史霄雯烈士墓，均是各接待单位组织参观的地点。^[23]



上海老工人向外地红卫兵讲述厂史



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到基层单位访问工人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与此同时,许多接待单位注重在接待站里召开各种讲用会、交流会和联欢会等,既增进了各地师生之间的沟通和情谊,又加强了组织管理。当时在报纸上介绍经验的有第四师范、番禺二中等。其中第四师范举办的讲用会出席者竟达 400 多人,各地师生纷纷走上讲坛,交流大串联的见闻和体会。^[24]上海嵩山中学的接待人员还开发了外地学生的资源,当得知人大附中的几位红卫兵曾是北京“收租院”展览会的讲解员,并携带着画片时,立即请他们在接待站举办展览,同时派了五位上海同学跟随学习,以此创办了接待站的特色节目。

那么是否因为中等学校接待人数少,灵活机动,便于开展各类活动呢?自 9 月份起,复旦大学就入住了包括新疆、西藏等地的 5 000 多名外地学生。复旦党委书记率领各系总支书记、各年级指导员及一批学生,深入到接待第一线,“分楼分层,按系包干,广泛与外地师生谈心”。^[25]同时,还两次组织了劳模蔡祖泉与外地师生的座谈会,分批邀请外地师生参观复旦的电光源室。还有如交大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请劳模、三轮车工人程德旺为串联师生忆苦思甜。上海外国语学校邀请外地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讨论“我们是为什么而来的”、“在革命串联中如何突出政治”等问题。^[26]各区、局的接待工作也注重对外地学生的教育,例如市轻工业局接待站组织人员当向导,带领串联学生登高楼,观上海全景,并详细讲解大楼的变迁史。显然,属于那个时代所有的“宣传—教育”的方式全都启动了,以致上海的红卫兵接待突出地具备了“组织—管理”的功能和倾向。当然,其中也产生了富有创意的项目。最经典、最精彩,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例证,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接待站举办的“外地师生市内徒步参观”活动。具体可见 1966 年 11 月 21 日《解放日报》的报道:

十九日清晨,市区的街道上,出现了一支由二百多个革命青少

年组成的引人注目的队伍。他们昂首挺胸，步伐矫健，一面前进，一面倾听着扩音喇叭介绍附近有革命意义的建筑，以及他们所经过的街道的今昔对比情况。这支正在市内徒步行军参观的队伍，就是住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来沪进行革命串联的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队伍来到肇嘉浜路，这里林阴夹道，马路宽阔。当红卫兵得知这里原来是劳动人民聚居的棚户区，是有名的上海“龙须沟”，便关心地问原先的棚户到那里去了？当得知已迁到新建的工人新村时，都高兴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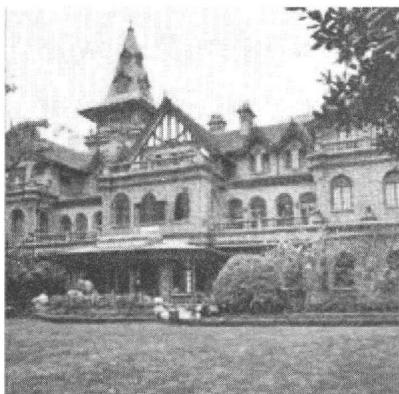
队伍行经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时，串联学生倾听了今昔对比的介绍。这里曾经是帝国主义以赛马赌博的方式骗取劳动人民财富的地方；这里曾经是日寇侵略上海的大兵营；这里曾经是侵华美军寻欢作乐的“俱乐部”。安徽一同学说，听了介绍后，对人民广场的一砖一石都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在广场上，一医的宣传队还表演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舞说唱节目，激起了串联学生的强烈反应，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队伍最后到达虹口公园，小将们仔细地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由此看来，上海的大串联接待工作不仅仅表现在迎来送往方面，还在引导串联、参与串联上有所开创，那就是主动地把外地学生的串联活动和内容纳入到接待中去，成为接待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各种富有成效的运作，达到介绍上海和加强管理的目的。^[27]当然，这不是说有个指令要求上海所有的接待单位都这么做（也有北京红卫兵指责上海的接待单位故意“把大学生分配到中学，把中学生分配到大学”，是阻碍串联，且各接待单位均“没有很好地介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

况”);也不是说上海所有的接待单位都这么做了(也有北京红卫兵身备匕首,结伙到高桥海滨游逛,被当地群众视为“形迹可疑”的人,交海防部队查问处理的事),而是上海有这方面的条件和能力,有这方面的素养和职分,自然就构成了上海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特征。

四、管理与服务



上海团市委让出机关“马勒公寓”接待红卫兵

1966年10月中下旬以后,因北京、广州(“广交会”召开)两座城市宣布暂时“只出不进”,大批的串联红卫兵涌入上海,使上海的接待人数骤然上升,连连突破同时接待30万人、50万人的界限。因之,在上海主管接待部门的紧急调度下,许多机关纷纷腾挪房屋接待串联学生。例如上海团市委机关让出了整幢马勒别墅,

市粮食局机关迁出东海大楼至面粉厂办公,市科委机关迁至自然博物馆内,市环卫局迁至下属的肥料公司等。据统计,自10月24日下达指令后,上海各局在三天内腾出办公大楼56 000余平方米,并对每幢大楼重新布置,共安排住宿了3万人。后来,“大世界”等公共剧场也宣布停止演出,改作接待串联学生之用。^[28]

其实,在偌大的上海一纸令下,腾空部分公共房屋还是容易做到的,秋冬以来,为几十万人准备铺垫和棉被却是棘手的问题。当外地学生来沪串联还处于“上升期”(8月28日—10月18日),即整个接待工作主要是在学校系统进行的时候,许多学校就已为此煞费苦心,

例如复旦大学“买、租、借了四千条草席,三千多条被子和毛毯”,当9月9日一次接收1200名串联学生时,便“立即动员教职工家属突击缝制了五百条棉被”。^[29]以后,上海的红卫兵接待进入“突破期”(10月19日—11月13日)和“高潮期”(11月4—22日),各区、县、局机关均组织力量投入接待,也就悉力在系统内挖掘潜力,向机关、企业、医院,甚至包括幼儿园抽调被褥。

10月26—27日,北方冷空气南下,上海气温骤降。市接待办调拨库存稻草20万斤,棉被8.7万条;市人委机关、各大专院校、中专自筹棉被20多万条。各区也积极采取措施,如普陀区增发草垫2万条,卢湾区向居民借棉被5400多条,南市区向居民借棉被14764条,其中半淞园街道的居民听了动员后,有的从床上抽出自己盖的被子;有的从箱子里翻出簇新的被子;有的拿出为家人出门准备的被子;有的甚至到朋友处、亲戚家商借被子。不少居民还将棉被拆洗干净,端端正正地写上“向红卫兵致敬”、“支持革命大串联”等字样送到居委会。据统计,各区接待办前后共发动群众筹借棉被10万余条。^[30]同时,一些接待站召集外地学生代表开会,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再说明情况,最后合理地调剂床位和被褥,一般均有良好的效果,例如住在东风中学的5位辽宁籍学生听了动员宣传后,表示东北人耐寒,又自带了棉大衣,便让出了分配给他们的3条棉被。从党政机关到民间群众,如此广度的发动,如此深度的落实,既是一种责任和承担,又充满了关爱和呵护,在寒流侵袭之际,上海基本上保证每两个外地串联的学生能合盖一条棉被。

住房、被褥的问题解决了,部分外地学生身着单衣又成为突出的矛盾。12月1日,新一轮寒流降临,市接待办公室便召开各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在全面听取情况汇报后,决定新制棉衣1万件,每天生产1100件,作为常备借用品分配给市人委机关2000件,各区2400件,

600 件调剂给各大中专学校。其余 5 000 件劳动防护棉衣则用来更新各工厂企业的旧劳防用衣,同时,市接待办还分别向公安局借用更新的旧棉制服 1 000 套,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 200 件,向旧货商店购买棉衣 300 件,向区体委筹集运动服 200 多件,并迅速地下发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学生。^[31]应该承认,市接待办采用了制作、商借、购买、调剂等多种手段来解决外地学生的衣着问题,确属尽心尽力了。

与此同时,据各接待站报告,由于天气转凉,奔波劳顿,水土不服等原因,外地来沪学生患病率大幅上升。尽管 9 月初市委办公厅就已通知团市委(学联),解决外地学生看病问题,住在大学的由校医院负责;住在中学的到各区医院就诊,并统一记账,但每个接待点平均每天都有百十人的就诊数(70% 的病例为感冒、喉炎、扁桃腺炎、气管炎等),有些接待点甚至发现了流行性传染病,如普陀区光新中学有 4 人患暴发性痢疾等(在全市猩红热、白喉、急性肝炎等也发现多起)。各系统接待办均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有的供应姜汤,有的增设卫生站,有的加强巡回医疗,许多医院还开辟了外地串联师生“方便门诊”和“观察病床”。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抽调出 20 多位医护人员,常驻虹口区所属 12 个接待站,“不分昼夜随时服务”,个别危重病人得以及时发现和救治。^[32]当时在上海住院的外地学生达 50 多人,其中 10 多人病情严重,例如长春市一学生患心肌梗塞,武汉一学生脑癌恶化。至 11 月 18 日统计,经医院抢救无效,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已先后死亡 12 人,这些学生的病情特点一为暴发性急病,因来势猛,病人迅速进入休克状态,如湖北黄石遵义中学某学生、广西象州东方红中学某学生入院即昏迷,死于急性脑膜炎;北京某中学学生死于亚急性肝坏死;湖北沙市三中某学生、福建南平建新中学某学生发病骤急,迅速恶化,甚至“来不及诊断就突然死亡”(其中存在医务室警惕性不够,转院迟缓等原因);二为慢性病急性发作,如湖北黄石二中某

学生原患风湿性心脏病,因疲劳过度引发心力衰竭,在离沪排队上船时,“突然跌倒死亡”。面对串联学生中的危急病人,接待单位和医院方面高度重视,市、区接待办的负责人均亲临现场,医院则派出有经验的医生参与抢救,甚至由市卫生局组织会诊。死亡学生的善后工作亦都处理得入情入理。^[33]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别外地学生在串联活动中,难以排遣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疾病。例如住宿在曹杨三中的武汉纺织工业学校的某学生,气管炎复发住进了校临时病房,因感觉“做了坏事”,竟在头颈上连刺 6 刀,自杀未遂;住宿在大连中学的广西南宁中学的某学生,因病住院。当他得知同来的几位同学准备办票离沪,精神恍惚,竟然从四楼跳下来,幸亏落在一丛冬青树上,仅造成数处骨折。如此两例证明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所形成的种种非常的境况和情势,对人的精神刺激不仅是存在的,甚至还会是十分严重的。

另据各接待站报告,外地来沪串联学生也多次发生偷窃和打群架等事件。例如哈尔滨 94 中某学生、武汉肖家院中学某学生在南京路扒窃,被捉拿后送回住宿单位。普陀区前锋中学、南市区沪光职业中学发生外地学生动用凶器的斗殴事件。此类事件均由接待单位实施劝阻和教育。

由此看来,上海的大串联接待工作不仅仅表现在迎来送往方面,还在深入服务、全面服务上有所承担和追求,那就是接待主管部门始终把握着形势的变化,始终做到指挥果决、指令通畅,因此在接踵而来的房屋、被褥、冬衣和医疗等困窘面前,都能及时而有效地调动四方。同时,四方的呼应和运作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呼应时就有积极的启动,启动后就有有序的运作,运作后就有可靠的落实。如此上下通达,全力以赴,终于使上海的整个接待工作顺利地度过一道道

关隘，且在管理水准和服务质量方面，显示出了较高的素养和品质，这自然也就构成了上海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特征。



供外地来沪串联学生使用的《上海交通简图》

五、角色与态度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上海接待了 400 多万外地串联师生。为此，共有 15 万的接待人员投身其中。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状况下，学校系统中除了有一小部分学生和教师参与外，多数是总务方面的员工。后来整个接待系统扩展到社会，各区、县、局抽调的第一线接待人员也以中年女性为多。应该承认，这么一批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的基层接待队伍不仅是适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独到的。她们大多工作踏实，办事认真，同时又心境平和，待人温厚，尤其当面对广大来自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外地串联学生，“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千里迢迢地奔波在外，衣着单薄，经济拮据，更会生发出一片怜爱之情。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类似“上海阿姨”、“上海妈妈”的内容多处可见，几乎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现象”。现摘编几个片断：

吉林九中一 14 岁的红卫兵穿着单褂来上海串联，接待站的阿姨问他，他只是说“我不冷”。原来他个子小，棉衣放在大个子同学的包里，结果中途走散了。接待站的阿姨便借他一套夹衣。一周后，这位红卫兵办了去北京的票，北京的气温已零下六度，阿姨们着急了，连忙将布料、棉花凑起来，六七个女同志，花了五个多小时，把一件棉袄缝好了。这位红卫兵当场高呼：“感谢毛主席！”^[34]

河北完县朝阳中学一红卫兵写信给报社，说接待站的朱妈妈发觉我病了，急忙叫来三轮车，抱着我送长征医院，结果医生说要住院，朱妈妈将我安顿好，又把我全身的脏衣服带回家洗了。此后，朱妈妈天天到病房照顾我，护士们称她为“红卫兵的好妈妈”。朱妈妈说，她有七个子女，大孩子也去外地串联了，她把大家都看成党的孩子，自己的孩子。^[35]

接待站周同志看到小同学雨天湿了鞋子，就为他们洗好晒干；看到外地同学的衣服掉了纽扣，就带针线缝钉；有些同学不舒服，她就买来馒头。许多外地学生都称她为“上海阿姨”。武汉的三个学生已到了十六铺码头，想起了她，再赶回接待站向“上海阿姨”告别。^[36]

静安区常德路四新食堂要为附近好几个外地师生供应伙食，负责人汪妈妈带领十多个工作人员不辞辛苦，配制出种种适合湖南、广东、辽宁等串联学生口味的饭菜。无论晚上十一点或清晨四点，外地师生都可以随到随吃。有位江西的女学生病了，汪妈妈亲自送去热腾腾的面条，还打扫了满地的呕吐物。两个多月，四新食堂收到了几十封感谢信。有的外地学生离沪前，特地列队到食堂辞行。^[37]

与此同时,面对满街的外地串联学生,一些理发店等服务部门主动上门,例如在机械学院、水产学院、华东师大都“可以看到理发工人临时设摊”。^[38]一些居委会也积极参与,例如南市半淞园街道组织了一批女职工,每天到接待站替红卫兵拆洗衣被,有的还帮着剪手指甲。紧靠交大的徐汇区徐镇街道华南里委的七八个大姐,则从家中取来碎布、针线,在交大门口设了一个“红卫兵缝补站”,仅两天就为200多名南来北往的外地串联学生钉了纽扣,补了衣袜。^[39]固然,当“革命”啸聚而起,成为社会主题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上海妈妈”、“上海阿姨”的忘我投入,确属一种真实的“为革命而行动”的话——这种“真实”或许是目标与动力,或许是服膺与寄托。那么,当这些“上海妈妈”、“上海阿姨”处于忘我投入的过程中,由她们的身份角色和性别角色,所产生的对广大串联学生的呵护、关爱,确属一种真实的带有母爱特征的人性关怀——这种“真实”或许是情感与良知,或许是禀性与朴厚。于是,比照之下可发现,即便在非常的环境中,这第一种“真实”与第二种“真实”也并非必然相冲突、相抵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第二种“真实”甚至会比第一种“真实”——更“真实”!

由此看来,上海的大串联接待工作不仅仅表现在迎来送往方面,还在照顾生活、抚爱健康上有所关注和体现,那就是上海以中年妇女为主的第一线接待队伍,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年龄优势,显示了自身的性别特长,使整个接待工作充满了浓厚的“阶级情谊”(亦可称“人性关怀”)。同时,上海的中年妇女在关爱对象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细腻、周至、灵巧等风格,否则怎么会有零碎的布料、棉花缝合成一件棉袄;一个街道食堂配制出种种口味的饭菜;七八个里弄大姐设立“红卫兵缝补站”的故事,以及“拆洗衣被”、“剪手指甲”之类的细节呢?正是这众多的“上海阿姨”、“上海妈妈”的热情和参与,自然构成了上海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特征。

六、一个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上海的红卫兵接待工作因人数众多、季节更替而困难重重,但整体上因指挥得当、协同有力,使红卫兵的接待从生活安排到组织管理,均处于一种良性运作的程序中,甚至在引导外地学生串联方面,许多基层单位还有独到的创举。那么,这是否可以认为,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在内的主管部门,是高度认同和重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呢?

这是一个必须辨析明白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共上海市委是坚决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为此曾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提议早日结束串联。据新近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记载:“我当时要市委向中央反映,希望过了国庆节后,应停止华东六省一市的串联活动。”(具体容后研究)^[40]所以,在此应着重申明:“认同”与“重视”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即“认同”一般可以推导出“重视”的结论,反之,在非常的形势下,“重视”却并不因为“认同”,甚至恰恰不“认同”,才谨慎地“重视”,才格外地“重视”。

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主管部门正是处在这种相悖谬的境况中,凭借着经验与智慧,越是在理智上持反对的态度,越是在操作中如履薄冰地维护局面。由此,才如前述中能在房屋、被褥、冬衣和医疗等方面,全力以赴地解决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方面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体现,即以积极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行动,来证实上海方面是服从大局、严守纪律的;同时也衬托出上海方面反对大串联的意见是真诚的和磊落的。这两方面是面对着百十万的串联人流,面对着正在发生着,并随时变幻着的严峻现实,确实也容不得疏忽和懈怠。只有正视,只有承受,才是唯一的选择。何况,红卫

兵大串联毕竟还没有直接触及某些根本的利害所在,及时应对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之,此在的“认同”与“重视”是处于交错状态的,却又是不容混淆的。

当然,在这种舛杂的背景下,广大的接待人员是不明底里的,他们的“重视”不仅与“认同”一致,更因“认同”而真心实意地投入,真心实意地付出。正是这种来自基层的务实的“重视”,保证了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接待工作顺利而富有实效。至于前述中多次提及的“上海的城市功能”,具体表现在管理、服务方面显得比较先进和完善,无疑也是形成上海接待红卫兵工作特征的保证,在此就不赘述了。

注 释

- [1] “胜利完成接待毛主席的红小兵的任务”《文汇报》1967年3月8日记:“同时接纳了109万外地师生住宿。”
- [2]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团的情况》1966年8月26日第36期。
- [3]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团的情况》1966年8月26日第37期。
- [4] “首都部分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文汇报》1966年8月27日。
- [5] “近千名外地学生来沪串联的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8月28日第167号。
- [6] 据《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8月28日第167号记载:至27日已接待955人。此处直接采纳了《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的数据。
- [7]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三》1966年8月29日。
- [8] 上海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简报》1966年9月22日第99号。
- [9] 上海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编《上海铁路分局大事记》第138页。
- [10] 上海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简报》1966年9月22日第99号。
- [11] 同上。
- [12] 周太彤:《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0页。
- [13] 《上海手工业管理局“文革”大事记》,原档1966年第89卷。
- [14] 金大陆:《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 [15] 同上书。
- [16] 《上海铁路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上海铁路局档案 1966 年第 191 卷。
- [17] 同上书,1966 年第 193 卷。
- [18] “胜利完成接待毛主席的红小兵的任务”《文汇报》1967 年 3 月 8 日。
- [19] “好啊,毛主席的红小兵”《文汇报》1966 年 12 月 17 日。
- [20] 固然,这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有关,其中也就存在着政治的考量,甚至还引发了武汉、沈阳等地红卫兵要求“一视同仁”的上访。就此,参观万吨水压机的活动延续下来,成了各地串联学生趋之若鹜的节目。
- [21] “来沪革命串联的红卫兵在万吨水压机旁”《解放日报》1966 年 11 月 21 日。
- [22] “永远跟着毛主席彻底闹革命”《解放日报》1966 年 11 月 21 日。
- [23] 据《解放日报》1966 年 12 月 17 日记:在顾正红烈士塑像前,外地串联的师生们“有的站在烈士像前默哀,有的在笔记本上记下烈士光辉一生的事迹,有的激动得拿下自己佩戴的红卫兵袖章戴在顾正红烈士塑像的左臂上,有的将毛主席像纪念章给烈士戴上”。再据《红交大》1966 年 11 月 20 日记:在穆、史两烈士墓后的树枝上,挂满了串联师生留下的纸条。北师大陈荣芳写道:您的意念只有一个\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您的鲜血一滴又一滴\洒染成红岩\您的生命只有二十九个年头\光辉灿烂虽死犹生\您的精神啊给我们一个信念\共产主义的光芒必然照遍全世界。在大串联的前期,上海的这些革命遗迹,终于成了外地师生的精神寄托地。
- [24] “把接待站办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文汇报》1966 年 11 月 29 日。
- [25] 《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12 日第 215 号。
- [26] “热情接待来沪串联的革命小将”《支部生活》1966 年第 22 期。
- [27] 因北京的接待需要安排大规模的检阅,故在这方面主要是派出部队人员操练红卫兵走步,也有单位召开联欢之类的活动。
- [28] 上海抗战时期,“大世界”也曾改作收容难民的场所。
- [29] 《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12 日第 215 号。
- [30] 金大陆:《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8 页。据《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 年 11 月 1 日:10 月 27 日晚,入住上海共和中学的北京 91 中的红卫兵去闸北汉中街道办事处取棉被,当他们得知这些棉被是从劳动群众家庭中借来的,就提出要抄“黑七类”的家,声称“黑七类的被子是剥削来的,为什么让他们舒服,而让革命师生挨冻”?并当场要办事处交出“黑七类”的名单。虽然反复说服无效,北京 91 中的红卫兵便沿路找贴有大字报的人家搜

查。至凌晨二点半,这批红卫兵共冲击了16户(其中4户为工人家庭),抄得棉被7条,毯子2条,棉絮4条,被单6条。

- [31] 金大陆:《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 [32] “热情关怀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文汇报》1966年11月20日。
- [33] 金大陆:《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 [34]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上海人民在接待各地红卫兵小将的日子里”《文汇报》1966年12月8日。
- [35] 同上。
- [36] 同上。
- [37] “饭热菜热心更热”《文汇报》1966年11月20日。
- [38] “热情关怀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文汇报》1966年11月20日。
- [39]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支部生活》1966年第22期。
- [40]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附一：

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一览表(1969. 8. 15—12. 12)

日期	接待人数	离沪人数	在沪人数	累计接待人数	备注
8. 15— 25	352			352	市学联接待，主要是北京、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大、中学生。
8. 26	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待来自北京 14 所大中学校的 170 多名红卫兵。				另据统计：入住复旦 32 人（北大 5 人、清华 8 人、南邮 14 人、人大 3 人、南大 2 人）；华师大 35 人（北大 15 人、清华 11 人、北京政法 9 人）；交大 256 人，主要是哈军工、北航、北大、清华、人大、杭大等；上外 32 人，主要是北大、清华、南大、北二外等。
8. 27	309			901 (有记 955 人)	其中北京大学 325 人，中学生 170 人，中专生 17 人；江苏大学生 56 人，中学生 70 人，中专生 166 人；浙江学生 34 人；安徽 14 人；黑龙江 35 人。
8. 28	793		2 500 人 左右	1 694	140 批，另 100 多人自找学校串联。
8. 29	1 123			2 817	其中北京大学 639 人，中学生 150 人，中专生 39 人；江苏 182 人；陕西 38 人；山东 5 人；江西 4 人；河南 12 人；东北地区 54 人等。
8. 30	1 742			4 559	其中北京 914 人（大学生 718 人）；江苏 268 人；浙江 62 人；陕西 45 人；湖南 33 人；东北地区 296 人。

(续表)

日期	接待人数	离沪人数	在沪人数	累计接待人数	备注
8.31	1 006(另有10人未报到,被复旦学生接走)	358(其中北京学生220人)		5 565	其中北京619人(大学生354人);江苏107人;陕西21人;湖南65人;江西82人;陕西21人;浙江10人;福建5人;东北地区69人。
9.1	2 514	406		8 079	其中北京893人(大学生422人);江苏289人;浙江254人;江西603人;福建34人;四川43人;安徽1人;陕西181人;甘肃16人;湖北2人;东北地区144人。
9.2	2 680			10 759	共接待学生452批,来自16个省市的1 812所大中学校。江西达660多人。
9.3	4 069	606		14 828	其中北京1 501人(共243批,来自105所大中学校);江苏579人;浙江615人;江西498人。
9.11	9 501				其中大学生2 845人,中学生6 656人。北京1 073人;江苏3 456人。
9.17	13 500		约50 000	134 500	总计北京达3万多人;华东六省6.5万多人。
9.22					交大入住5 000多人;上海戏剧学院入住1 000多人。
9.28	391批				
10.5				325 000	至10月5日,市委接待来访外地师生6 000余批,共3.2万余人。
10.9			60 047 (北京 6 747人)	374 851	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
10.20	50 671	22 207	202 620	713 197	其中北京4 887人;辽宁10 966人;湖北8 637人;江苏6 691人。

(续表)

日期	接待人数	离沪人数	在沪人数	累计接待人数	备注
10.21	55 271	25 713	223 139 (北京 37 000 余 人)	768 468	其中北京 4 515 人；辽宁 10 976 人；湖北 7 949 人；江 苏 7 497 人。
10.22	57 210	25 000 左 右	255 432		其中北京 3 864 人；辽宁 13 148 人；湖北 7 000 余人。
10.23	72 305		突破 30 万		其中北站接待 69 022 人；团 校及各临时休息处登记 1 092 人。
10.24	78 861	38 000 余 人	322 000 余人(北 京 45 000 人)	976 844	其中北京 4 930 人；辽宁 16 350 人；湖北 8 423 人；江 苏 8 214 人。
10.25	79 301	38 000 余 人	347 000 余人(军 队院校 4 600 余 人)	1 056 145	其中北京 4 322 人；辽宁 15 935 人；江苏 9 026 人。 驻沪三军和第二军医大学 相继成立接待机构。二军 大已接待万余人，空军 1 700 人，东海舰队 439 人，警备区 160 余人。
10.26— 27	159 509	120 000 余 人。外 地 学 生 离 沪 船 票 已 发 至 11.6。	381 200 余人	1 215 600 余人	其中北京每天 5 000 人左 右；辽宁每天 12 000 余人。
10.28	91 128	47 000 余 人。外 地 学 生 离 沪 车 票 已 发 至 11.3；登 记至 11.5。	412 900 余人(北 京约 6 万 余人)	1 306 782	其中北京 5 969 人；辽宁 15 486 人；江苏 9 711 人；湖 北 7 878 人；浙江 7 035 人。 同时，据近日统计：北大 16 名教师，南京 65 名教师，哈 尔滨三、四批几十名少先队 校外辅导员，福州市 14 名机 关干部来沪串联。
10.29— 31	255 000 余人	155 599	489 685	1 562 627	其中每天北京 5 800 余人； 辽宁 9 000 余人；江苏 8 000 余人。真如车站接待站开 放，31日晚接待 6 000 余人。

(续表)

日期	接待人数	离沪人数	在沪人数	累计接待人数	备注
11.1—3	238 559	109 596	568 587	1 801 186	其中北京 17 028 人；辽宁 28 329 人；江苏 22 122 人；湖北 19 297 人。铁路局在各区、市人委机关、部队、大学设立外地学生签票点。
11.4—6	243 038	174 927	627 013	2 044 224	其中 4 日接待 77 490 人，5 日 77 955 人，6 日 87 593 人。每天接待北京 5 000 余人；辽宁 8 000 余人；江苏近 9 000 人。
11.7—9	262 989(7 日 87 281, 8 日 83 455, 9 日 92 253)	190 231	683 168	2 307 213	其中北京 6 535 人；河北 11 762 人；辽宁 8 557 人；江苏 9 607 人。因复旦炊事员罢工，市接待站决定三天不安排外地学生入住复旦。
11.10	5 万余				火车因故未照常运送。
11.11—13	每天 8 万				
11.14	96 526	75 421	764 495	2 698 276	其中北京 6 605 人；河北 12 413 人；辽宁 11 176 人；江苏 9 481 人。
11.15	88 523	76 320	773 112	2 786 799	其中北京 5 715 人；江苏 9 794 人；河北 9 536 人。
11.17	99 582	62 726	812 115		其中江苏 12 786 人；辽宁 12 785 人；河北 10 072 人。
11.18	95 526				据 18 日统计：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因患病医治无效死亡者已达 12 人。
11.19	113 130	74 940	853 566	3 173 947	彭浦、新龙华、南翔、莘庄等车站开始放行。其中北京 7 931 人；辽宁 14 043 人；江苏 14 674 人；河北 12 281 人。
11.20	135 375				

(续表)

日期	接待人数	离沪人数	在沪人数	累计接待人数	备注
11.21	129 907		1 000 000		
11.22	71 898	80 658 (出现“离多进少”的情况)	997 691	3 511 127	其中北京 6 743 人；江苏 5 760 人；河北 6 378 人。一批艺术团体如山东京剧团、武汉京剧团、宁波越剧团等 15 批 168 人次到沪串联，并要求享受学生待遇。
11.23— 24	101 016 (23 日 52 153, 24 日 48 863)	212 851	881 604	3 612 162	其中北京、辽宁各 8 000 余人；江苏 1 万余人。
11.25	37 300 余人	96 796	825 897	3 649 462	其中北京 2 723 人；辽宁 3 287 人；江苏 5 405 人。
11.26— 27	70 486 (26 日 37 061, 27 日 33 425)	202 666	689 978	3 719 948	其中北京 3 000 余人；辽宁 5 000 人左右；江苏 1 万余人。
11.28— 29	58 792 (28 日 30 387, 29 日 28 405)	220 763	526 909	3 778 740	其中北京、辽宁、浙江各 4 000 余人；江苏 1 万余人。
11.30— 12.3	95 453	355 952	264 456	3 874 193	其中北京 6 000 余人；浙江 9 200 余人；江苏 16 000 余人。
12.8— 11	每天 2 万人左右	每天 2 万 余人	12 万人		
12.12			115 405	4 035 825	

资料来源：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编印《接待各地革命学生情况简报》、《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及有关简报。

说明：1. 本表为市接待站的统计数据。少数基层单位直接接待或寄居在亲戚家的不在此列。2. 本表数据为原始资料的直录。

附二：**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直属接待单位一览表**

单 位	建立日期	负责人	地 址	电 话	联系人
上海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	8. 15	张浩波	陕西南路 30 号	567200 转	郭醒民等
北站接待站	8. 28	郑迅夫等	北站军人候车室	244486	
十六铺接待站		徐英华	十六铺码头	282737	
市学联接待站	8. 15	庞华仁等	陕西南路 5 号	567200 转	
新亚饭店	9月初	高宗智	天潼路 422 号 204 室	242210	沈天麟
安东饭店	9月初		湖北路 131 号 201 室	296525	
大方饭店	9月初		福建南路 33 号 208 室	282100	
长江饭店	9月初		汉口路 740 号 233 室	291199	
真如车站接待站	10. 31				

资料来源：各类简报。

说明：10月18日，上海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成立，李干成任组长，张浩波（兼办公室主任）等任副组长。

附三：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

据 1966 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 53.4 万人，中专生为 47 万人，中学生为 1249.8 万人。^[1]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严格以文件为准，从 1966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到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取消原定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的计划”，整个大串联的时间跨度为半年。但事实上，从缘起上探究，再从后续上跟踪，可见整个大串联是伴随着 1966 年 6 月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而兴起；1966 年 8 月至 11 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达到高潮；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渐渐从社会返回校园而消退；1967 年下半年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功能趋于式微而停息的，前后大约持续一年多。

那么，红卫兵大串联究竟是由下而上自发兴起的，还是自上而下发动促成的？应该承认，这是两个方面互动的结果，是两个方面合力的作用和显现。

1966 年 6 月 1 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拥向北大，北大校园人山人海。当时北大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

一个讲台，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以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不久，西安、长沙、天津等地发生了学生与当地领导部门的冲突事件，一批批学生便滚雪球般地奔赴北京上访取经。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6 年 7 月 29 日到 8 月 28 日的一个月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万人次，其中 8 月 12 日一天就达 17 万人次。^[2]同时，北京学生的特殊的政治身份——由首都的政治地域的性质所决定——便被大多数外地学生簇拥着、信赖着，即一般外地学生多为诉说者、寻问者；北京学生多为倾听者、指点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沟通，北京学生陡然升腾起一种“救世主”的情怀和气派，便气势如虹地“杀”出京城，展开了北京红卫兵运动史上称为“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行动（其中，上海是北京红卫兵“南下”的主要目的地）。

如果说发生在 1966 年 6 月，人们拥向北大声援聂元梓仍属于北京市内群众间的串联活动，尽管这已超越了单位，超越了行政管辖，显示了“走向社会”的趋动；那么，接着发生在 1966 年 7—9 月，大批的外地学生赴京，大批的北京学生赴外地，则说明整个串联活动已超越了地域，超越了行政区划，显示了“走向全国”的态势。且这种从“走向社会”到“走向全国”的跃迁，正是以北京为首的全国的红卫兵们集体运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针对各地的青年学生揭竿而起的造反行动，有史料证明毛泽东于 6 月 10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还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在此，从大串联研究的角度看，不仅 6 月上旬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还必须抽取并把握住几个关键词如“去北

京”、“免费”、“乱”等，这说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思考中，就已经形成了类似“大串联”的预判，并准备积极地推进。所以，后来当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造反时，徒步向北京进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4]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军装），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面对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5]此时，毛泽东不仅对这个场面和结果是满意的，对导致这个场面和结果的过程，即大串联运动也是满意的。十天后，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大串联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并潇洒地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6]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在毛泽东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强调“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而把大串联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此，之所以大量引用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新近公布的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一是为了替本文立定一个坐标，以瞄准和把握

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来龙去脉；二是为了证明，从大串联的缘起到大串联的勃兴，其驱动，其路径，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和思想来展开的。且联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错关系，可发现在红卫兵大串联的问题上，群众的诉求与领袖的指点，群众的情绪与领袖的意志，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统一。

然而，恰恰是红卫兵大串联——从肇始时超越单位，超越行政管辖的“走向社会”；到勃兴时超越地域，超越行政区划的“走向全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的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为“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因为正是在这次关涉红卫兵大串联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看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7]这就是说，毛泽东原本存在着 1966 年底结束“文革”运动的设想，因为大串联搅动得全国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便延长了这个时间设想。确实，红卫兵运动已通过大串联，突破了固有的组织依附和区域管辖，构成为一种青年特征鲜明、自由度大、游动性强的社会势力。且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又因立场和利益的歧异，而形成了一种团体特征鲜明、独立性强、战斗性强的社会集团。于是，它们要行动，要张扬，要团聚人力和占据领地，它们怎么可能很快、很自动、很轻易地刀枪入库，听从召唤呢？换言之，即便“文革”运动的具体内容如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等很有震撼力，甚至“夺权”行动等很有爆破力，若是一直被限定在原有的各级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展开和动作，即没有红卫兵大串联所导致的打开所有单位和区域的门户，以致各阶层的群众奔涌而出，完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化的背景下，重新按照“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划分和集合力量，“文革”运动的节奏和收放，大致会被毛泽东把握在所设定的时间表中。

综上所述，红卫兵运动（青年运动）的非理性倾向和毛泽东的政

治意识,决定了大串联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大串联又决定了“文革”运动必然是要失控的。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串联是“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闹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而这个天大的祸,只能由天大的代价来补偿了。

注 释

- [1] 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 页。
- [2]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0 页。
- [3] 同上书,第 193 页。
- [4] 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 页。
- [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1436 页。
- [6] 同上书,第 1438—1439 页。
- [7] 同上书,第 1439 页。

第六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一

一、正式的外出途径

“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领导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性的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的。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其实,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作了直播,“在同一时刻,上海千百万人民,冒着滂沱大雨,和首都人民一样,纷纷上街,开始了庆祝游行”。^[1]第二天下午,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军又在人民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全市实行交通管制),魏文伯、曹荻秋和正在上海的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与欢呼



上海市民欢庆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的群众一起走上了大街。^[2]沸腾的北京,沸腾的上海,尤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为了红卫兵的总司令,更激发了广大的上海红卫兵“去北京”、“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冲动和向往。

8月22日晚,近2000名上海中学生红卫兵聚集在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联。上海铁路局面对因形势突变而既不可推却又难以应答的境况,只得向铁道部请示。结果,铁道部一方面回电同意免票加派一班列车,一方面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秘书长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做工作,“最好不要去那么多”,“派少数代表去”。^[3]尽管在说法上有所劝阻和限制,但终究是退让的态度,以致这一批情绪激动、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搭上了北上的列车。显然,上海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串联集体行动,不仅是成功的,更为往后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撕开了裂口。

第二天(23日),市委即根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一、尽量说服初中学生不去北京,因年纪小,不好照顾。若说不服,可推少数代表有组织地去。二、高中生原则上十人推选一人,可灵活掌握,五六人推一人也可以(该意见不作为市委规

定,作为区委建议)。三、各区委组织召开家长座谈会,要求家长做子女的工作。四、半工半读学生因有生产任务,可推少数代表去北京(该意见不作为市委规定,可作为局党委建议)。五、有组织去北京由单位出介绍信,向铁路局登记。六、车上吃饭自理,到北京带粮票、伙食费,碗筷被子要随身带等。^[4]确实,市委的通知很无奈,一面吞吞吐吐地说“不”;一面断断续续地说“可”,有些地方还必须遮遮掩掩。何况,这是一条针对中学生红卫兵的电话通知,在大串联肇始之时,大学生红卫兵们更是畅通无阻了。据上海红卫兵运动风云人物胡守钧回忆:“8月20日前后,我们一行四人到北站交涉去京事宜,铁路局工作人员查看学生证后,二话没说,便发给我们一人一张有座的火车票。一切是这样顺利。”所以,胡守钧等人判断“学生大串联的事,有关当局早作了安排”。^[5]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拿捏局势的判断。然而,“有关当局”是谁呢?不是基层党政领导,不是中共上海市委,是来自北京的决断。正如8月24日市高教局举行会议,就大学生串联问题向各校打招呼时所宣布的:关于上海学生外出一度有曲折,先是不同意,后向市委反映,市委再向中央请示。现同意上海大学生每天去1000人,中学生每天去2200人。各校迅速向红卫兵们作了传达。

上海红卫兵外出串联终于获得了正式的途径,许多人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有的甚至还写了血书,表示要去声援西安交大的学生运动。然而,涉及大局的态势还是微妙多变的。当天(25日),上海二医、化工、交大等院校的部分红卫兵,就针对“每天一千大学生去北京”的传达,向全市高校发出了《呼吁书》,并要求市委和高教局撤销这一决定。其理由为:一、应先搞好本单位运动,再向毛主席汇报;二、去北京的代表都为骨干,会影响上海各校的“文革”运动搞深搞透;三、加重北京红卫兵的接待任务,会影响北京的“文革”运动。^[6]

为此，二医还组织小分队到上外等院校进行宣传，在上外引发了大讨论；华东师大“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主席团”则召开各系代表会议，就“要否上北京”进行了专题辩论。当晚，许多持《呼吁书》观点的大学生赶赴北站，对持有赴京车票准备出发的同学进行劝告和拦挡，直至成功地将列车阻截在站内。从 22 日到 25 日，短短的四天里，上海北站因红卫兵大串联加编了一趟列车，又阻截了一趟列车。如果说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客运非常事件，且都是通过采取行动而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为了“去北京”，后者是为了制止“去北京”；前者是增开列车，后者是减开列车；前者是借助北京（中央）的指令而通畅，后者是依凭上海（市委）的态度而堵塞，其内里的抵牾和悖谬，实际上是当时红卫兵中两种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滥觞，令今人却是难以理喻的。

26 日，上海市委适时地抓住机会，再次就上海学生去北京串联事宜发出电话通知。一方面表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支持革命同学的这一革命要求”，应做到“有组织地推派代表去”；另一方面又赞成交大等“很多学校，很多同学”，“提出倡议不去北京，以便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因此，考虑原定列车未开出的事实，市委建议：“已经拿到票子的同学暂时不走。请各校同学讨论一下，意见取得一致后，再研究去不去，怎么去。”^[7]应该承认，市委的这个电话通知是相当周至而圆通的，它既在大节（方向）上表态“支持串联”，又在枝节（技术）上赞成“暂时不走”，大节的炫示终于遮掩了枝节的真实。更高明的是它将结论交给学生“讨论”，以求取得“意见一致”，恰恰是顺应了当时主导的话语体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又不必担待“去”或“不去”的责任。

然而，发源于北京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已在全国成浩荡之势，谁又能真正抵挡得住呢？没过几天（30 日），市委只得又通过口头传

达,告知仍按 8·23 通知精神处理本市学生串联问题。甚至申明:如果是学生讨论推选的各校代表,经单位出具证明,就可以向铁路局办理乘车事宜,不必经市委有关部门和高教局批准。如此反反复复地变换和拉扯,终于还是辟出了条“去”的道路。因为 8 月 31 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正式宣布全国各地全部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这是一条从天而降的“圣谕”,这是一道兴师动众的饬令。9 月 5 日,上海市委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并在全市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有关单位内布置张贴。一时“去北京成为广大师生议论的中心”,不仅学生们“挤到高教局和校党委、筹委会,强烈要求早些去”,“有些青年教师和干部也强烈要求去”,“还有人提出到四川、甘肃、广东等地去”(另有一些非“红五类”子弟则不敢去北京,怕出身不好挨打,提出去广州等)。^[8]于是,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上海市委、市人委于 9 月 7 日发出通知,宣布成立“上海组织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副市长李干成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教育局局长孙兰任办公室主任。^[9]据统计,至 9 月 7 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 5 000 多名学生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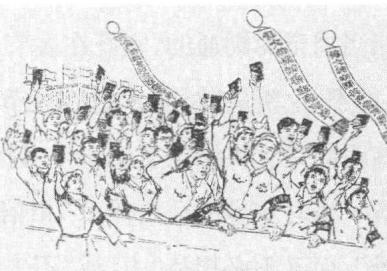
在天安门广场上

上海南汇区红卫兵团 陈鹤松

还有什么比这更骄傲?
在那天安门广场上,
我们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呵,毛主席!
他是那样慈祥,
他是那样健康,
他是那样俊秀,
领袖引着革命的航程,乘风破浪,
我们激动,万寿无疆;

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
在那天安门广场上,
红旗簇拥,人海欢腾。
毛主席来到了革命群众之中。
欢呼跳跃,我们的欢呼,
个个把臂欢腾在旗。

还有什么比这更光荣?
在那天安门广场上,
毛主席亲渡了衣带红丝带。
毛主席是天门红玉的旗帜,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一定克服困难攀援高,
利刃何惧?色魔,
一切困难皆可克,
誓叫世界变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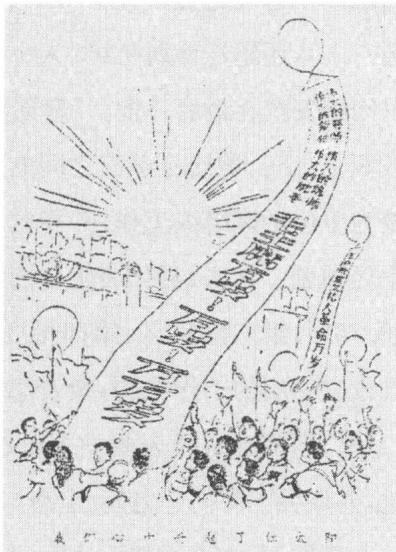
毛主席万岁! “我们这次最热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上海光明日报摄影组 李本杰 摄影于天安门广场

上海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摘自《解放日报》1966 年 9 月 23 日)

4 000 多名。至 11 日,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外贸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分批走完。上海大学生红卫兵外出串联出现了倾巢而出的境况。



上海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摘自《解放日报》1966年11月14日)



上海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摘自《解放日报》1966年11月30日)

与此同时,上海中学生红卫兵外出串联因涉及“推选少数代表”而连连出现争辩不休的场面。例如据团市委少年部报告,杨浦区某重点中学分配到 61 张去北京的车票,结果,因“红五类”标准的核定(当时,市委通知也强调“一定要红五类”),因两派观点的对峙,全校竟然有三分之二的班级推选不出代表,只得申请延期。有不少学校甚至还发生阻拦、围击赴京代表的事件。

9 月 12 日,市领导小组针对中学红卫兵的情况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的几点意见》。《意见》申明中等学校去京参观的范围包括普通中学、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社办农校、厂办中学、子弟中学等。凡属业余性质的学生和教职工则不组

织去京(如干校、广播学校、队办农中等)。《意见》指出根据中央十人推选一人的规定,上海学生代表总人数应为 81 756 人。教职工按百名学生产生一名代表的规定,代表人数应为 8 175 人。截至 9 月 8 日的统计,扣除已去京人数 9 862 人(中央指示下达前,高中按每五人推选一人),还超过计划 9 463 人。超出名额将请示中央适当增加,去京时间则安排在最后一批。《意见》要求为统一口径,避免矛盾,学生与教职工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代表名额不得调剂。赴京代表以学校为单位做好组织工作,并指定或推选负责人。随车医务人员由卫生局抽调。各区、县代表将分四批安排去京,第一批计 25%,第二批 18.75%,第三批 25%,第四批 31.25%,尽量做到相对集中。各区、县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思想教育、制订规划和票务等。最后,《意见》强调赴京代表要学习首都各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并加强上海同学之间、上海与北京同学之间的革命团结等。^[10]

显然,在中央通知下达后,上海有关方面尽管有意见、有疑虑,还是顾全大局,努力将大串联运动纳入规范和程序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十分精确地统计了人数,更表现在十分合理地设计了流程。同时,为增强京沪线的运能,从 16 日 0 点起,铁道部共增开了北京—上海列车 7 对,北京—南昌列车 2 对,北京—福州列车 1 对,^[11]从而保证了大批红卫兵代表顺利抵京,保证了中央关于大串联的指示顺利执行。^[12]

直至全国大串联进入收缩阶段的 11 月 30 日的统计,从铁路上海站办理免票上车的上海籍串联学生共达 443 890 人次。^[13]其中,



由铁路上海站签发的红卫兵乘车证(网络图片)

大多数是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的全部在校大学生和推选出的中学生代表,也有前述中因围击成功而增开列车的人数和有关部门特批的人数等,总之,多是通过正式或半正式的途径外出的——这也就是说,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还存着“非正式”的途径。

二、诉求和企盼

自8月下旬以来,因出现了推选代表“去北京”的途径,其“推选”的过程和“去”的结果都成为合法的了。然而,能够被推选的代表在学生群体中,甚至在全体“红五类”中都只是少数,所以,更多多数的学生便通过上访寻求着加入这种合法的途径,并力求使之扩展开去。据《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143号记载:

23日上午,大批学生拥来接待站,六七十批,四五百人,200号(市委接待站)室内和草坪上站满了人,外面的人还源源不绝地拥来,绝大部分是学生。接待同志应接不暇,无法接待,他们都要求去北京。

他们提出到北京的理由是:1. 去见毛主席。2. 去学习斗争经验。3. 上海市委革命造反精神不够。4. 提出的问题(如“兰州事件”、“西安事件”的真相等)上海市委都不能解答。^[14]

显然,这批没能纳入正式途径而要求外出串联学生的情绪是激动而怨愤的——面对如此激荡的形势,如此荣光的使命,如此令人神往的时运,怎能因推选条例的限制而恭顺地放弃而游离于外呢!于是,他们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要求主管部门解释和回答,实际上是企求主管部门启开正式途径的闸门,但这又谈何容易呢?如果说这

种成群结队地走访,仍属于采取正常的举措,那么,当天还有“三四千个同学等在车站里,有一部分同学冲上车子”,^[15]则属于直接采取非常的行动了。

不久,红卫兵外出串联的正式途径确实拓宽了,那就是中央宣布全部的大学生可到北京串联。事实上,上海各高校确也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以致骤然地许多“学校里冷冷清清(指都去北京了)”,^[16]这便更大程度地刺激了广大中学生、青年教师的情绪波动,不必说市委接待站、教育局被中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就连高教局每天都要“接待十几批来访,其中较多的是教职工和附属中专、附中的学生,也有一些是刚从外地回到上海的大学生。他们主要是要求解决去北京的问题”,“有不少是要求去其他地方进行串联(包括南昌、南京、广州等)”。^[17]他们指责高教局阻碍将高校的学生余票调剂给附中,他们声称教职工比例太低应增加名额。其中,“铁道学院中专部来访和来电次数最多,有时一连打来四五个电话,有的通话长达半小时”,并表示“你们只要给开证明就行,铁路局我们自己会联系”。^[18]也有中学的“红五类”子弟愤愤不平地责问接待人员:大学生中的“黑五类”都能去北京,为什么我们反倒不能去?!师大二附中的8个“红五类”上访者,联名要求高教局向中央反映:凡是“红五类”子弟都应去北京见毛主席。相比之下,在中学生群体中,中专、技校,尤其半工半读的学生因有“生产任务”的制约,各生产局便在有关部门的默许下,进行拖延和阻挠,致使有些单位的学生采取了较为激烈的行动。例如“船舶工业学校有数百名学生,静坐在党委门口,要求答应开介绍信才罢休”;^[19]“纺织技校的学生,为了要求串联,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住进纺织局机关不走了”,^[20]最后惊动了市委,险些引发了冲突。

与此同时,还有大批没能通过正式途径外出串联的中学生、教职工或者个人署名,或者集体签名,写信、打电报给毛主席、党中央和上

海市委(约占总量的 80%)“请求批准他们到北京学习取经”,因“愿望十分强烈,有的连续发出两次电报”。^[21]为此,市教卫部文化革命办公室经请示,根据“革命热情,应加以鼓励”;“不能满足去北京的要求,应进行思想工作”的原则,拟定了统一的口径,分别以“市委‘文革’办公室”、“市委人民来信室”、“市教卫部办公室”的名义,作出了回应(有的还派出联络员举行座谈会),那就是“上北京的问题,中央已作出具体规定”,“你们选出的代表,已经源源奔赴北京”,“你们的代表会把去北京学习的经验带回来的”,现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条件,不能满足需要”等。^[22]

很明显,从走访市委到电报中央,一方面是强烈地要求破除推选代表的限制,拓展外出串联的正式途径;一方面是严紧地坚持推选代表的原则,扼守着正式途径的襟要。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烦难的纠缠呢?此处的焦点正在于广大学生对“批准权”的服膺和认同,这就是说“批准权”依然是公认的权威,依然是不二的筹码。于是在双方的博弈中,学生们只有诉求和企盼,“批准权”的掌握者才是主动的。其实,这种主动不仅仅存在于“批准权”本身,甚至更存在于学生们的心目中——这正是学生们反反复复请求“批准”的动因,这也正是学生们反反复复不得“批准”的缘由。

三、抵 御 与 挑 战

然而,大串联的浪潮终究已在全国呈现席卷之势,且不断地在政治上显发出主导性的倾向,以致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种种信息和举动,开始抵御并挑战“批准权”和“正式途径”的权威,尤其 9 月中下旬以后,这种抵御和挑战公然将“批准权”悬置,演变出了一场开通“非正式途径”外出串联的活剧。

首先,一部分按“正式途径”赴京的红卫兵代表,在京“接受检阅”、“学习取经”以后,并没有按“正式途径”回到上海,而是星散般地流向了全国。毋宁说前述中的红卫兵风云人物胡守钧等,在京“游览了定陵,凭吊了古长城后,乘车南下广州”,^[23]就连曾对大串联持有成见的一复旦普通女生(《复旦“文革”日记》作者),也于9月9日赴京后,又转向西安、武汉、长沙等地,在外串联了27天后才回沪。^[24]确实,上海关于通过“正式途径”赴京串联的种种纪律,在北京只需凭学生证就能办票的事实面前,在千千万万的串联学生南来北往的行动面前,显得绵软而苍白,这又怎能不搅扰、不动摇代表们的心绪和立场呢。例如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30名代表擅自独立行动后,引发了该院赴京大队部的辩论,有的认为这是“脱离组织的问题”;有的认为这是“大好的革命行动”。结果,主张延长串联时间的意见占了上风,便派代表将申请延期的信函送到中共中央接待处。^[25]如果说上音采取的是规行矩步的处理,那么摆脱了“集体行动”的行动者,确实是自由地飞翔了。以致9月下旬,仍有许多属“正式途径”的赴京者流转在千里之外。例如据上海中医学院9月27日报告:700多名学生赴京串联,“还有一百人左右,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分赴成都、武汉、广州、南京、杭州等地”。^[26]上海交大也报告:“许多人去向不明。”

应该承认,这部分通过“正式途径”赴京的“正式”代表,最终是违背了推选的原则和推选者的意志的,且赴京的“正式”与回沪的“非正式”所形成的叛逆性的反差,更突显了它对“正式途径”,实质上亦是对“批准权”的颠覆。所以对广大的非代表来说,正是由于这批代表“失踪”的事实,这批代表“不在场”的结果,终于使他们看到了“批准权”的虚脱和摆脱“正式途径”的可能。

其次,一部分按“正式途径”赴京,又按“正式途径”回沪的红卫兵代表,因目睹了全国大串联热烈而又激荡的场面,领受到了那种风发

而又畅达的刺激,情绪和思想便跳脱出了“正式途径”的规范,积极寻求着第二次外出串联的途径。或许他们已获取过资格,便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有的说:“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就像游行一样,根本挤不上去”,“像上海放焰火一样,尽是人”;^[27]有的说:到北京“没有取得什么经验,那里斗争简单,左派右派划得很清”。^[28]不管这部分学生的意愿能否实现,终究在更大部分的学生中引起了波动。或许他们已有了经验,便驾轻就熟地选择捷径,例如同济大学城建系7个回沪的学生,“买几角钱的短途火车票到站不下来”,径直去了广州。^[29]不管这部分学生是否是多数,终究给更大部分的学生提供了示范。甚至还有赴京返沪的学生正谋划着大规模的串联行动,例如中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于23日晚召集了“云南、杭州、武汉、南京、广州等几所中医学院的同学开了一次会议,由各校推出代表一人共同主持,讨论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中医学院大串联会议”。^[30]

应该承认,这部分通过“正式途径”赴京,又通过“正式途径”回沪的“正式”代表,确实没有违背推选的原则和推选者的意志。就此而言,这部分代表的表现是坦然和令人信服的。然而,恰恰就是这部分代表回来以后策动“第二次串联”的举措,尤其是以经历者的身份所表达的言论和所采取的行动,确实是更实效、更有力地构成了对“正式途径”,实质上亦是对“批准权”的瓦解。所以对广大的非代表来说,正是由于这批代表再度“外出”的事实,这批代表第二次“在场”的结果,终于使他们看到了挑战“批准权”和突破“正式途径”的可能。

与此同时,大批的外地红卫兵到达上海串联,并超负荷地寄宿在许多的学校中,对“本地学生有冲击和影响”,他们责问:“我们要出去串联,学校和市委不同意,为什么外地同学可以到上海来?”^[31]实际上,面对此类关涉上海与外地、与全国在大串联方面存有差异的责问,有关部门是难以解说的。何况,不断有外地红卫兵利用多余的证

件,或者为了支持造反,或者出于友谊带走了上海籍同学,例如:“航空工业学校有一北京来沪学生将五十张回京车票,送给该校学生,让他们去北京”(甚至还发生因外地男生带走了上海女生而进行追击的故事)。因之,这一系列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的上海学生对所谓“批准权”和“正式途径”的信任。



四、非正式的外出途径

终于,在广大“红五类”“非代表”同学的集体行动中(出身职员、教师等当时称为“红五类”“外围”的同学则跟随着。大部分“黑五类”、“黑七类”的子弟则不敢动弹),上海开辟了“非正式”的外出串联途径,领头的主要是大学附中和船舶、航空等几所重点中专的学生(高中生,年龄稍长,接近大学,消息灵通),几百所初级中学的学生则四处打探,紧紧尾随。据 1966 年 9 月 9 日,《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 201 号“部分中等学校学生自发去外地串联的一些情况”报告:

有一部分学生没有选上代表,千方百计设法外出。据向船舶、冶

金、航空、电机、师院附中等校了解，自发去外地的达一千余人（船舶五百多人，冶金五百多人，各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师院附中八十五人）。同济附中前些时候自发去北京的也有四百多人。

如果说9月上旬的情况只是一种“启动”的话——“启动”的阵势已是相当规模了——9月中下旬至10月，通过“非正式途径”外出串联的上海籍学生更是成群结队，甚至在沪宁线、沪杭线上闹出了很大的“事件”。

当时，因为“正式途径”仍在运行，一般采取“非正式途径”串联的上海籍学生不便在北站上车，除了前述中有少数是被外地红卫兵主动带走的，还有如铁道学院中专部、冶金学校的学生通过担任列车乘务员、客轮宣传员（上海—天津）的办法外出，大多数是采取“买短途票不下车”（软性）和“冲击车站、拦车、扒车”（硬性）等手段达到外出的目的。

在软性手段方面，学生们以“正常”的短途赚取“不正常”的长途；以少许的付出换取目标的实现，且动作比较隐秘，比较安全，一般多是10人左右的队伍悄悄进行的。例如船舶工业学校的不少学生“有的买票到苏州，有的买票到无锡、南京”；同济附中的许多学生则开了去松江二中串联的介绍信，“估计很可能从松江上车到外地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学生在外地乘车照样不要钱，只要“离开上海就好办了”。^[32]在此，值得记载的是，当时上海各学校流传着“北京红卫兵在浦口设卡，检查进京学生三证（红卫兵证、学生证、“文革”联席会议串联证）”的说法，以致很多非红五类子弟不敢贸然北上，而是选择从沪杭线买短途票外出的。^[33]文中船舶学校的同学北上（“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已强调“阶级路线”）。一般情况下，船舶、航空等重点中专招生时，是讲究阶级出身的），同济附中的同学南下，大致可察觉出其

中的端倪。

在硬性手段方面,学生们标树“造反”的旗帜,索性以“非常”为“正常”。他们拉起队伍,打起标语,公然地进入车站,进入作业现场。例如“冶金机械学校的学生到真如、南翔等火车站拦货车,在火车旁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等口号,工人没法,只得允许他们上车”。再例如“师院附中四十二个学生,到真如车站要求去新疆落户。车站同意发给车票后,他们到了西安就下车了。”^[34]同时,十六铺码头也发生了影响海运的扒船事件。尽管只是为了外出串联,为了去寻求动荡的感觉和刺激,但这部分学生以“革命”的名义,阻遏交通动脉,则是加剧了动荡的局势。尤其当部分上海学生搭短途车后为了换乘长途车,竟采取了类似“暴力的行动”,据9月23日《浙江人委驻沪办事处反映上海学生在杭情况记录》:

前晚(21日)361次火车有300多学生(大部分是上海中学生)去杭州,要上南昌,杭州站同志说服不去,他们就卧轨。609次车(至杭)人数比上次多,要上广州快车不让上,有1000多人冲上去,使车误点二小时。22日631次车到松江后被扣,有700~800人卧轨,最后上了车。目前,上海同学在杭有4000多人(3600人是中学生),省委接待站要我们向上海市委反映,是否可以派人去做工作,也希望加强车辆管理,特别是对几个小站采取些措施。

再据10月10日《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308号“9月中下旬以来人民来信情况”和同日上海市委《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21号“上海等地数百名学生在高资站拦截14次特快”报告:

上海铁路局常州站长打电话说,9月24日有上海工学院等校

学生一百余人在该地要冲上火车，引起旅客的气愤，把他们制止了。25日又有上海东海、太湖等中学卅多个学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该站吵闹，在往火车上冲时，打碎了检票大门的玻璃，打开了广播室，开广播时烧毁了机件。当晚又有上海的一百多学生要冲上火车，在旅客和工农兵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10月6日中午12时23分，由上海开往南京的652次临时列车，停靠沪宁线高资站避让上海—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652次列车上乘坐着上海、浙江、福建等236所学校的1861名串联学生（其中上海有212所学校的1686人），这些学生均属中央分期分批计划以外自发赴京的。此时，652次列车上下来十多名串联学生，他们站在线路上，挥舞着红卫兵袖章，于12时40分时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因14次列车的尾部车压住了咽喉道岔，导致沪宁线行车中断达1小时28分。后经说服动员，约五百多名串联学生重上652次列车。另三百多串联学生则等待搭乘618次列车进京。652次列车到达南京后，铁路南京分局、南京军区交通部负责人会同列车员对串联学生进行了登记，经铁道部同意后，652次列车直达北京。该次事件直接导致20趟列车晚点。^[35]

在上海人的眼中，总以为北京红卫兵才是气焰嚣张，胆大妄为的。殊不知，这些上海红卫兵（非推选代表）在非常的氛围下，在非常的环境中，照样意气用事地制造了这种种惊扰四方的事件。同时，也不要以为这只是学生们年少气盛的莽撞和冲动，它实际上是被一条由中央“文革”操纵着的路线，自上而下地纵容和催生着的。否则，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上海籍红卫兵（在这一点上确与北京红卫兵不同），怎么敢于屡屡地兴风作浪，惹是生非呢？否则，拦下14次特快列车达1个多小时，怎么可能非但不处理，还将一趟上海至南京的临

时列车改为直达京城呢？或许，那个时候热烈而奔放、流行而旷达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主旨和旋律，可为此作出绝妙的注解。^[36]

在此，还值得记述的是：9月中下旬以来，针对上海红卫兵通过“正式途径”或“非正式途径”集中外出串联的情况，有一种声音在不断地鸣叫，那就是类似贴在交大的《十万警报》的大字报和电机学校“急呼”战斗组在全市散发的《最紧急呼吁》的传单，它们共同指认：当前的大串联已使“部分学校中学生寥寥无几”，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时”，“正在调虎离山”，“这是个大阴谋”。所以，外出串联的学生应“赶快回来搞革命”，“搞它个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37]尽管这种声音很呼啸，很尖利，但在万众的奔腾中，仍显得单薄而弱小。不过，应注意的是此时关于“停止外出”的呐喊，与初期大串联时关于“暂缓进京”的呼吁相比——虽然两者在形式上很近似，但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异。

注 释

[1] “上海人民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解放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三版。

[2] 为此，郭沫若在上海填词一首，记录如下：水调歌头《上海人民广场庆祝大会》，鼙鼓云霄入，火炬雨中红。千万人群潮涌，上海为之空。昨日天安门外，主席亲临检阅，今夕一般同。请莫徒惊讶，主席在心中。颂公报，歌决定，庆成功。普天同庆，八届新开十一中。创造上层建筑，扫荡蛇神牛鬼，除去害人虫。深入新阶段，革命鼓雄风。又：据复旦一女大学生的《复旦“文革”日记》19日记：人民广场与天安门城楼紧紧相连。在风雨中我们纵情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们一遍接一遍唱，越唱越有劲，越唱越热，大雨算得了什么，革命歌声早把你压得无声无息了。大会在春雷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中开始了，在（曹荻秋等领导）讲话中，连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接着，数十路纵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游行队伍点燃了熊熊火炬，广场四周

大厦上红灯高照，广场上红旗如林。我们昂首阔步走过主席台，接受华东局与市委首长的检阅。我们是一支向着旧世界开火的队伍，今晚在此接受检阅，明天我们将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奋勇前进英勇杀敌。回到校已十点了，衣服贴在身上，冷得直发抖，心里无比兴奋、激动。

- [3]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第 88 页。
- [4] 同上书，第 89 页。
- [5] “你从哪里来——我的一张大字报”《社会科学报》1989 年 1 月 26 日第二版。
- [6] 1966 年 8 月 25 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团的情况》。
- [7] 沪委(66)发字第 300 号。通知还说：“前一时期，要求去的人很多，又没有组织起来，有些同学到了北京以后，经北京红卫兵审查，凡是不符合‘红五类’的已被退回上海。”同时，“最近全国去北京的学生很多，住的地方也没有”等。补记：据《大会会刊》“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队代表的发言”记载：曹荻秋还竭力反对和阻挠上海革命师生到外地去串联。他指使高教局去组织交通大学的一些学生写了一份“我们不主张外出串联”的倡议书，广为散发，企图阻止革命大串联的开展。
- [8] “高等院校近两日情况简报”《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 185 号。
- [9] 沪委(66)第 092 号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 [10]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工作》1966 年第 26 期，第 15 页。又：不久，因北京集聚了大量的串联学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8 日通知暂缓进京。但上海仍于 19 日作出规定：上海学生去外地串联停止登记，已登记的也不走。上海学生去北京串联，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 9·5 规定办理。20 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向各区委、县委党组转发该《意见》，并“请参照执行”。
- [11] 《上海铁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 页。
- [12] 例如，据新编地方志 1990 年版《川沙县志》第 38 页记载：“1966 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川沙县委组织中学红卫兵一千余名分四批赴京，接受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检阅。”1993 年版《嘉定县志》也记载：“本县各中学派出师生代表 546 名赴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的编者在记录大串联运动时，仍然使用着“接受……检阅”；“学习……运动”等语句。
- [13] 上海铁路局档案，1966 年第 193 卷，第 11 页。
- [14] “二十二、二十三两天采访中几个突出问题”《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8 月 23 日第 143 号。同材料还指出：“工学院、二医、同济都有同学来访，提出铁道医学院已经有二百多学生到兰州支援，铁道学院也去了，要求市委支

持他们到兰州、西安去。”再据 1967 年 7 月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材料组编印《斩断刘少奇伸在华东地区的黑手——魏文伯》第 27 页记载：1966 年 8 月底，有一批上海师院的学生要求华东局解决去西安的串联车票问题，遭到魏文伯的拒绝。

[15] 《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 143 号。又见，“罗明威的口述资料”《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2 页：8 月 23 日下午，我正在南京路上刷标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北站在发放免费上北京的学生票。火车站里人声鼎沸，挤满了渴望进京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上海各高校的大学生。车站当真辟有一个发放学生票的窗口，排队的长龙首尾不相见。突然，广播通知说因进京列车严重超员，当天发的临时乘车证全部作废。接着市委领导之一的马天水发表现场讲话，劝学生们回校，说可有组织进京。接着先前领到车票的学生纷纷拥向检票口，并与工作人员拉拉扯扯地发生冲突。

[16] “近几天高教局接待学校师生员工来访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13 日第 218 号。

[17] 同上。

[18] “近几天高教局接待学校师生员工来访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13 日第 218 号称：“该中专部共一千多人，已去京和外地的达八百人（其中包括当列车员的），留下的一般政治上比较差的。最初他们要求把大学部去京车票调剂给他们，现在他们吵着要去外地。”

[19] “部分中等学校学生自发去外地串联的一些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9 日第 201 号。

[20] 1967 年 3 月 26 日，《工人造反报》、《新北大》等合刊《大会专刊》，王少庸：《我的检查》。该《检查》说：“对上海的学生要求外出串联，我更顽固地抵制它。对大专院校控制不住了，对中学，特别是半工半读学校还是顶，不管是大字报贴到头上，还是当面的严厉批评，我都听不进去，还错误地认为大串联造成交通运输和生产上的‘困难’，说什么‘上海七八十万学生放出去，非把东南半壁搞个天下大乱不可’”，对于纺织技校学生的行为，“我立即认为这是在捣乱，闹到机关里来了，非镇压不可。我埋怨纺织局的领导，无力控制局势，我要他们到学校去，组织另一部分红卫兵，釜底抽薪，等他们剩下少数人的时候，要红卫兵把他们揪回学校去。并且还说。不要怕死人，幸亏我的这个黑主意受到抵制，没有完全执行”。据《中共上海党史》第 725 页记：王少庸 1965 年 3 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1983 年被开除出党。

- [21] 1966年9月14日,市教卫部文化革命办公室《对于给毛主席、党中央以及市委负责同志的函电处理意见》。
- [22] 1966年9月14日,市教卫部文化革命办公室《对于给毛主席、党中央以及市委负责同志的函电处理意见》。又:《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有上海红卫兵运动风云人物、复旦学生安文江在《我不忏悔》中关于赴京的记载:1966年9月,赴京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
- [23] “你从哪里来——我的一张大字报”《社会科学报》1989年1月26日第二版。
- [24] 据《复旦“文革”日记》8月24日记:(某人)听说上北京去了,擅自走了,也没有与指导员讲一声,这样走难道是去取经、去学习的吗?十六条中明确指出: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别的单位最好的支持。十六条不好好学,毛主席著作不好好学,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让运动来证明吧!
- [25] “音乐学院学生赴京串联的情况反映”《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12日第214号。
- [26] “中医学院学生赴京串联回校后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27日第275号。
- [27] “部分赴京学生返校后的一些反映”《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15日第229号。
- [28] “近几天高教局接待学校师生员工来访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13日第218号。
- [29] “同济大学部分赴京学生返校后的动态”《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21日第249号。
- [30] “中医学院学生赴京串联回校后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27日第275号。
- [31] “最近几天外地学生到市教育局直属中专校串联的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10月5日第294号。
- [32] “同济大学部分赴京学生返校后的动态”《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21日第249号。
- [33] 笔者也是如此。“上午,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即就会发生变化,变化成‘外地赴浙大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路线是

当时上海的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下午，我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大家手中紧紧攥着车票不敢喘气。直到那声尖厉的汽笛划破凝固的空气，火车重新晃动起来，才算回过了神来。晚上，我们到达杭州，原来以为出站是道鬼门关，结果却像鱼儿出游般地顺畅。接着，就是在马路对过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学生证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金卡’，大家欢天喜地”。

- [34] “部分中等学校学生自发去外地串联的一些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9日第201号。
- [35] 据上海铁路局档案 1966年 192 页记载：高资站事件以后，沿线车站发生拦车、爬车的情况日益加剧。23日晚(18时)至24日晨(6时)的十二小时内，有12趟列客货车被阻拦。上海分局管内的62趟列车，晚点51列，正点率仅达18%。
- [36] 该语录歌的内容取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激昂而富有战斗性地唱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 [37] “交大两名学生去京回沪后的动态”《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10日第206号；1966年9月25日，上海电机学校“急呼”战斗组传单《告全国串联学生》。

附一：

寻找“蒋如毛”——我的大串联之一

1966年10月，上海街头已到处可见北京红卫兵了，各大中学校的“红五类”代表也已一批批地赴京受阅。我们这般非“红五类”子女当然没有资格，因为据说从南京过浦口北上要检查三个证明：成份证明、红卫兵证明和学校“文革”联席会议证明。但我生性好奇，总是想出去感受一番，于是和几个同学一起从松江站上车，当天傍晚到达杭州。

我们被安排在浙大附中住宿。不知什么原因，学校那天断电，整个大楼显得阴沉。吃完饭，我们躺在地铺上休息，心中有欢喜也是担忧。突然，走廊里响起一阵急促而嘈杂的声音。紧接着，房门被踢开了，几支大号手电冲着我们直照，领头的红卫兵（显然也是北京的）大声吼着：“是不是上海的？”我们说：“是。”“是不是汽车技校？”我们说：“不是。”“这里有没有蒋如毛？”我们无言以对。

“走，上楼去，”那领头一挥手，满屋子的人呼啦啦地拥出去了。他们就这样，一间不漏地寻找上海人，寻找着蒋如毛，情绪非常激动，像是准备决斗一样。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紧张地跟在后面。在三楼一间房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蒋如毛，几支雪亮的手电一齐照射着，场面很是恐怖，我看清了蒋如毛，小小的个头，尖尖的头，尖尖的嘴和鼻子，他吓晕了，缩成一团，躲在角落里。他的几个同学在惊慌中护卫着他。一个个子稍高的在帮他说话。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什么“红卫兵外围组织”、“表现还好”之类。“他的名字反动透顶，罪该万死”，那领头的红卫兵语音未落，几只胳膊就把蒋如毛拽出来了，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耳光。

“要文斗，不要武斗”，那领头的红卫兵显得很威武，打他的人住手了。“把他揪出来批斗”，于是蒋如毛被众人推拥着站上了高台，低下了

头。“什么成分？”“小业主。”“为什么叫蒋如毛？”蒋如毛嗫嚅着说：“我生出来时，很小，像小猫，就起名叫蒋如猫。后来读书了，人家说不好听，就改成蒋如毛了。”“这个名字非常反动，你知道吗？”蒋如毛点点头。

在场的许多红卫兵、非红卫兵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都吃惊和气愤，叫喊声、口号声连成一片。我站在一旁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我的名字也曾被人议论过，说“金”是“进”音，金大陆就是进攻大陆，我为此事问过母亲，母亲说，你出生时，正好全国解放，取“金色大陆”之意，如果有人议论，就改名吧），同时也很可怜蒋如毛。

“现在进行批判”，那领头的红卫兵一挥手，七八个人跳上高台，指手画脚地“声讨”起来。我大概听懂了，“如毛”是“多如牛毛”之意，蒋指蒋家王朝，蒋如毛是指蒋家王朝的人多如牛毛。还有，这个名字更污蔑了伟大领袖。

这时，一个小个子“红卫兵”，不顾一切地冲上高台，满脸涨得通红，操着一口浓重的南京音，大声喊着：“以后不许姓蒋，姓蒋的统统改成姓毛。”

我暗自庆幸，还好没有姓蒋。突然，又一个声音在头顶上炸开。“上海的统统报成份”，挨到我了，我非常镇定地说：“教师。”可我的心却在怦怦直跳，我真害怕我的同学中会有一个人突然地说：不，他家有问题。可我的同学没有一个吱声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浙大附中校门口看见两张布告，一张是勒令蒋如毛回上海，不准外出串联。一张是蒋如毛的改名声明，他将名字改成“毛向东”。

几天后，我们离开杭州，在向塘车站转车，突然我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蒋如毛，我没有和他打招呼，反正我知道他没有回上海。

附二：**三进山城——我的大串联之二**

山城，重庆。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一个十六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三次去了那个地方，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

记得六六年八月，上海的街头出现了北京的红卫兵。他们穿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以前，上海的红卫兵好像没这般装束，自然也没这等威风。在复旦，我看见过一圈圈的人把他们围在操场上，猛烈地为他们的演讲鼓掌；在我就读的中学，我看见过他们演示了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不久，学校也有了选派红卫兵去北京串联的名额，我们这些非红卫兵只得乖乖地靠到一边去。可我很不甘心，并非因为家庭问题的麻烦，而是因为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这时，关于串联的种种说法已经如同片片翅膀在校园里飞翔着了。说外地红卫兵可以凭学生证在上海站办票；说上海红卫兵在外地乘车照样不要钱；说北京红卫兵在浦口设卡检查三证（红卫兵证、学生证、“文革”联席会议的串联证）。一天和班上几位并不煊赫的同学说起串联，个个眼睛发亮，竟然第二天就出发了，那天是十月十日。

上午，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即就会发生变化，变化成“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路线是当时上海的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下午，我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大家手中紧紧攥着车票不敢喘气。直到那声尖厉的汽笛划破凝固的空气，火车重新晃动起来，才算回过了神来。晚上，我们到达杭州，原来以为出站是道鬼门

关，结果却像鱼儿出游般地顺畅。接着，就是在马路对过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学生证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金卡”，大家欢天喜地。

离开杭州的时候，我们准备去韶山。排在我前面办票的是位重庆的学生，我问他《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他说那都是真的，都是可以参观的（《红岩》在我们这代读者的心中曾是块燃烧的碑石）。原定的走向就这么很突然地被改换了。

去重庆的二十三次列车挤得水泄不通。两天三夜中，我们起码有一天一夜是站着的。我小时候得过肾炎，望着混浊的车灯下一片耷拉着的脑袋，几次下意识地掐掐头皮，试试有没有肿胀起来，很担心自己坚持不住，结果，还真挺过来了。

一个薄雾袅袅的清晨，我们到达了重庆，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顺山势而筑的房屋像堆积木拥挤一片；高高的石阶像堵直墙从头顶上压下来。乘上稀奇的缆车，看汽车在山脚下走，谁知头顶上还开着跟上海一模一样的无轨电车。大家忘记了疲劳，兴奋地在马路上追逐起来。

重庆的接待站开了一张路条，我们便循着指示找到了一中。一中总务处的老师刚刚上班，见我们站在办公室门口竟慌了手脚。原来，这是一中负责接待的第一批“红卫兵”。一中的同学知道我们从上海来，来寻访他们这座城市的故事，非常热心地告诉我们，一中就在沙坪坝，沙坪坝就是《红岩》英雄战斗过的地方，并主动提出带我们去中美合作所。

白公馆、渣滓洞是中美合作的两座魔窟。其实，这本是两幢不错的建筑，坐落在歌乐山的半山腰，本应有飘飘然的诗意。但是高墙上的铁丝网、散布在四周山坡上隐约可见的碉堡群，使它显出很狰狞的模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不悔的生命在涅槃；有不屈的灵魂在

呼喊。我感到脚下生成着奔突的地火，整座房屋都为之燃烧起来。记得那天下着凉飕飕的秋雨，我们穿行在这阴森森的山谷里，心中一会儿冰凉，一会儿火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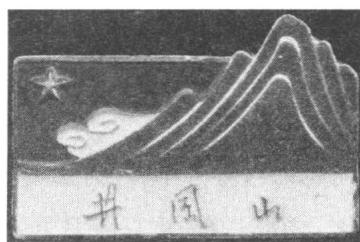
当时，我们为什么放弃韶山，选择重庆？（《红岩》的诱惑固然是原因）去韶山是朝拜，去重庆是凭吊；朝拜是仰视辉煌，凭吊是领悟悲壮；朝拜是添幸福之情，凭吊是增英雄之气。也许，我们心灵中的密码更偏重于后者——我至今没把这个问题想明白。

二

六六年年底，北京通告全国：提倡红卫兵徒步串联，不过说法上还留着一条晃动的尾巴：开春以后乘车串联将继续进行。春节前，一个高年级的球友（我是业余少体校乒乓球班的）告诉我，大多数徒步串联的红卫兵还是乘车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便吵着要我们也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被说动了，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也算老经验）。

谁知到达杭州的第二天，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门口围满了上海学生，我们去那儿转了一圈，见大家紧张地交头接耳，显得慌乱又无奈，心生一计，豁然开朗，便坦坦然然地走开了。我们瞄准了同一接待站的一位重庆学生，并非因为他矮小，傻乎乎的，而是因为他一人手上竟有七八张学生证（实在不傻）。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

如果说，一进山城是为了寻找英雄，二进山城则是巧合（如果那个



一枚纪念章换两张车票

同学是广州的，不就去了广州啦）。何况，当时大串联的本原意义也不再那么纯粹和完整了。记得第一次在重庆的时候，我们还忙着抄大字报，集传单（重庆的许多传单是用黄草纸印的），开座谈会。一方面往家里传递情报，二方面也带动别人，真正像似革命的样子。这一回，心里真正想着的却是过三峡。

前后不过三个多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想，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的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则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应是根本的缘由。由此，生发出周游大地、探访亲友也就不为怪了。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这里存在着一种告诉：告诉人们的心里萌动着生活的渴望；告诉社会的运动产生了恢复平静的需求——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竟然有许多和我们一样赶在最后的日程里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眉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他们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人便被大自然融解了（那天，我曾想到过毛泽东诗词，同样面对“苍茫大地”，为什么毛泽东会发出“谁主沉浮”的询问，我们则会被陶醉而融解？因为毛泽东是伟人，我们是凡人）。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总算记录了这段经历。

回家的路上，竟碰到一桩很蹊跷的事情。那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记得晚会是在底舱开的，串联的师生中竟一下子走出了许多文艺高手，有独唱，有吹奏，有舞蹈，像是享受了一场精神沐浴，热闹的气氛使人轻松高兴。回到舱房，我的铺上却躺着个陌生男子，起先以为人家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至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也不搭理。他的身上黏着些泥，像从田间走来，他很壮实，有一个抵两个的感觉。背枪的乘警来了，他的眼神晃动着，有人递给他纸和笔，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在

纸上写：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正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乘警的脸色有点发白，嘴里嗫嚅着往后退去。有人说这是疯子，有人便立即叫来了船医。船医很和蔼，摸着那汉子蓬乱的头发，为他号脉，问他来路，他仍不吭声。这时船医悄悄取出了银针，掐着那汉子的手指向深处扎去，那汉子的身躯像遭受鞭打似的扭曲起来，头上滚出了豆大的汗珠，只是仍不吭声。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愤愤地骂人，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与船长交涉。船长和乘警来了，不知他们与那男子说了什么开窍的话，那男子麻利地翻身下床，嘴角上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师生们叫喊起来，一致要求复旦的同学作为代表处理事件。半小时后，复旦的同学有点沮丧地从船长室出来，告诉大家船长已决定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

夜已深了，江面上风很大，密密的细雨不知什么时候从天上飘落下来，使人心寒。人们渐渐地离去了（我想，这件事若发生在三个月以前，一定会是不同的结果），坚持到最后的七八个人在深深的沉默中看着乘警把那男子交给了站上的人。突然，复旦的同学大声叫起来：不是说好派出所接人吗？为什么不是？乘警抬头看看他，也是深深的沉默。此刻，一位立在一旁的服务员说话了：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说下去便是底牌。

复旦的同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停止了旅行，决然地在又一个停靠站下船了，他说要赶快去向公安机关报告。尽管，我后来曾去复旦寻找过那位同学，但一直没有找到，这件事在我心中就一直是个问号。

三

六七年五月，本应了结的运动脱轨了，全国烽烟滚滚，燃起了武

斗的战火。山城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着。我们停课在家，无目的地寻找着欢乐和刺激。一天，找球友练球，球友班级的同学又嚷嚷着要出去闯闯，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同学不顾我们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但我不同意去重庆，于是一大帮子人瞒着各自的方向出发了。

当时，全国已停止串联，不接待，不办票。我们潜进了火车站，试图混上客车，但客车管制得很严，没有可钻的空隙。一辆工程车发动了，我们便爬了上去。谁知敞篷的车厢里早已躲着两个贼溜溜的人，我们立即拉紧了脑门里的那根时代之弦，想到了阶级斗争，想到了车毁人亡。车在南翔站停住了，我们很英勇地把那两人押送到车站，车站上的人有点漫不经心，说他们是流民，反而劝我们回家去，我们多少有些失落和没趣。原来，以革命的名义并非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热烈和响亮的。

南翔站负责编发上海往北去的货车。一车头正呼呼地吐气，我们便呼呼地往上爬。列车运行了十分钟，大家欢喜地探出头，两边竟不是空旷的田野，而是拥挤的房屋，是我们这些上海东区的孩子经常见面的房屋。原来列车是沿淞沪线往何家湾开，大家骂天骂地，哭笑不得。何家湾车站的检车工很讲义气，他告诉我们如何判断货车的走向，如何听懂车站的广播调度，并让我们爬上当晚由何家湾车站发出的最后一趟货车。这趟货车到达了新龙华，新龙华站编发上海往南去的货车，我的方向和目的又被调整了。当晚，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包括我球友在内有雨衣的被派出去侦察，我和其他没带雨具的五人缩在一张拉开的塑料布里。可是，直到天亮，派出侦察的也没有回来，在那位一心想着女朋友的同学的极力催促下，我们爬上了南下的货车。还没有离开上海，我就和球友失散了。在这五人的队伍中，我

成了其他四人同校异班的“外人”。

也许铁路对客运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也许货运站、客运站处于不同的位置,也许货车比客车更随意,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以生与死的抵押,追逐着隆隆的货车。为了躲避风雨,我们曾在飞驶的货车上行走,一手抓住这边的车厢板,一手拉住那边的铁把子,脚踩在车厢的接合器上,身下快速退去的铁轨,像两把闪着寒光的铡刀。腿一弯,臂一收,身子往上一腾,从这个车厢飞到了那个车厢;为了填充饥饿,我们挑破箩筐,割裂布袋,结果把肥田粉当作白糖塞了满嘴(后来,听失散的球友说,他们扒车时曾遇到一箱箱红枣,不仅吃个痛快,还每人装了满满一书包)。从浙江到湖南还算顺畅,有好几次向押车的递上一枚像章,就能平平安安地坐到尾车里。进入铁路柳州局管辖的线路就处处磕磕碰碰了。在柳州,我们被抓进了办公室,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刚要说话,同学中一声凌厉的“走资派,靠边站”弄得他张口结舌;在独山,军代表无奈我们的学生身份,要我们去找民政局借钱买车票(在独山镇上,我们看到了猫样大的老鼠穿街而过),民政局竟然向我们大叹苦经,弄得我们像发慈悲一样。这件事提醒我们,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把学生证上的姓名全改了,我的改法是在“金”字右边加一个“戋”,在“大”字上加一横,“金大陆”成了“钱天陆”。也许为了保证抗美援越输血线的畅通,这一路甚至连不知名的小站也进行严格的检查,我们总是埋头躲藏,抓下来后再沿着铁轨往前走,等火车重新驶出站便一声号令飞身跳车。有一次,碰到一位革命者(责任者?刁难者?),他像蚂蝗一样叮住我们。我们一跳车,他就举红旗,列车吼叫着停下两次,直至他狠狠拉住我们的书包,列车在山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才得意地告诉我们,今天已没有列车在此停靠了。我们只得在云贵高原上走了整整一个下午。还有一次,执意要去重庆见女朋友的那位同学,跳车时不知是手上抓得太松,还是脚下踹得太

轻，突然像遭受电击被车厢刮倒在地，吓得语无伦次，一脸死白，我的心头也起皱似的生出了一层恐惧。望着茫茫的深山峡谷，感到可能回不了家，想起妈妈、弟弟和妹妹，曾背着其他四人伤心地哭过一次。

一路上，在衡阳、在贵阳我曾两次提出转换路线，但一颗少年的游戏之心怎能抵挡得住人家青春之情的萌动呢。那位同学还威胁我，说要丢弃我，我的方向被他的意志决定了。虽然这是那么的勉强和偶然，但是大串联中发生这种雷电般的爱情故事，却是那么的热烈和必然。我还坚持什么呢。

到达重庆的当天下午，那位找女朋友的同学就离去了。我们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走，不知当晚睡在哪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支威武雄壮的红卫兵队伍，一律的黄军装，一律的大袖章，“首都红代会”的战旗像头火凤凰在队伍的前头舞动。我们尾随着队伍，队伍中也有人亲切地向我们招手，直至邀请我们上了他们的车，送我们到达了重庆政协礼堂。不一会，来了位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他不穿军装，不戴袖章，文质彬彬的样子。他问了我们的情况，宣布由我们四人正式组成“上海中等学校红卫兵驻渝联络站”，并给了我们安顿的房间。我们对重庆的运动情况基本不了解（我还算知道些大概），更没有“支左”的热情，所以，每晚看到解放碑四周黑压压地坐着听广播宣传的人群，心中很茫然；看到两次悲壮的抬尸游行，心中有点害怕。复旦的红卫兵给我们分派过两次任务，一次是去听《红岩》组画的画家遭受迫害的控诉，一次是为红卫兵的大型演唱会送份声援信（那个时候“小分队”很火热，它除了为自己的派别做宣传，还具有其他可研究的意味）。还有一次来了一屋子人，说复旦红革会的头头劳元一来看大家，这个名字在上海如雷贯耳，眼前的此人白白的、圆圆的、很清秀的脸，操一口好听的北京话，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某一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有人给我们发自卫武器（不过藤帽、

木棍之类),有人通知我们到三楼集合,有人说当晚要发生大规模武斗。结果,那一晚很平静,倒是第二天晚上有百十个人围着政协礼堂,吼叫着往里扔石头。从此,每天传来恐怖的消息。像听见了死神的吆喝,我们商量着逃亡,但一想到又要用火热的身躯去碰撞几千里冰冷的铁轨,又像听到了死神的狞笑,我们坐卧不安,束手无策。一天早晨,政协礼堂的前厅突然摆满了旗幡,旗幡上写着世界上最动人的话语。接着,首都红代会的红卫兵和山城的“左”派举行了泣鬼神、动天地的告别仪式。一位清华大学的同学严肃地对我们说:必须在五天内离开重庆,否则就回不去了。作为特例,重庆站可以凭学生证办票。我们奔向车站,看见车站上到处贴着由中央文革签发的这条命令,我们别无选择,张皇地逃离了重庆。(据后来相识的重庆朋友告诉我,现在山城还有一座红卫兵墓地,每晚,那儿有百十个不安的灵魂在对话。我盼等着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去听听,因为我们曾走到过那场悲剧的边缘。)

以后,我曾以会议者的身份赴重庆,为了追寻少年时代的足迹,不仅放弃了飞行,还整日整夜地让窗外的景物冲击记忆。车过重庆长江大桥的时候,不知怎么,泪水突然泉涌般地淌出来,弄湿了好大一片衣襟。

第七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二

一、徒步串联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连海运学院15名革命学生“徒步两千里,串联到北京;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的消息和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声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大连海运学院

的学生“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1]

此时,全国免费乘车大串联正处于高潮期,对广大的红卫兵来说,这突如其来 的消息,究竟意味着推进串联——却又不主张乘车呢,还是预示着收缩串联——却又宣布是一个“创举”? 总之,这就犹如面对行进中凸显的拐点,是按原定的轨迹乘车在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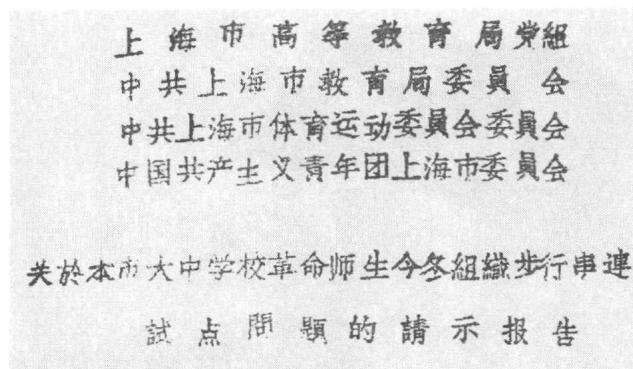


上海红卫兵徒步大串联
(摘自《文汇报》1966年11月20日)



上海红卫兵徒步大串联
(摘自《红卫兵》1966年12月10日)

间继续前行,还是重新描绘路线徒步在田野间跋涉,确实需要作出判断和抉择。或许乘车终究是便利的,徒步终究是艰难的;或许在红卫兵串联大军中,能够被此类理想点燃,并勇于以远征的行动付诸实践的人终究是少数,所以,尽管社论发表后,甚至11月15日,周恩来、陶铸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全程步行抵京的三十多支长征队,周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支持你们!”“今年冬天试行,明年春天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联”^[2]——确有材料证实,上海的各类学校也有积极的响应,例如上海铁道医学院18个学生写血书,准备先乘车到瑞金,而后花一年时间按长征的路线走到陕北;华东化工学院25人也准备按长征路途步行,表示“去熟悉农村,熟悉社会,熟悉地理,不打仗不回来了”^[3]——但与上海约几十万通过“正式途径”和“非正式途径”乘车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相比,其数量和规模都是难以匹敌的。何况,在提倡徒步大串联的时候,全国的乘车串联并未完全中断,这又怎能做到实质性地推广徒步串联呢?!



1966年11月26日，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党组等发出
《关于本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今冬组织步行串联试点问题的请示报告》

也许徒步串联包含着节制和收缩乘车串联的因素，比较符合上海市委一贯的意见；也许中共中央、国务院已正式下发了“关于今冬明春有组织地进行步行串联试点”的通知，^[4]上海的有关部门对开展徒步串联持较为积极的态度。11月26日，市高教局、市教育局、市体委和团市委联合向市委、市人委提交《报告》，建议今冬先在江苏、浙江两省有组织地举行试点，跨大区的长途步行串联的试点工作，拟选择几个学校着手准备。《报告》对徒步串联所需物质条件和费用开支作了具体规定，例如可提前发给1至3个月的人民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补助每天1角至2角；粮食可在每人每月45斤的范围内申请补助；10人规模的串联队可发红旗一面；串联队携带宣传品按每人5角至1元标准掌握；药品费每人1角据实报销；商业部门供应一部分旧军鞋、塑料布、水壶等低价商品；往北方去的师生可酌情补助布券和棉絮券等。《报告》还建议立即建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联办公机构”。^[5]与此同时，市委有关部门连续于11月22日，12月6日、9日，通过200号接待站向下传达口径，一方面表示“支持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联的革命行动”，制定统一的《行军注

意事项》，努力创造“思想准备从严”、“物质准备从简”和“艰苦奋斗搞长征”的经验；一方面布置在六个郊县设立了十多个步行串联中途接待站；责成商业部门组织军鞋、塑料布、水壶等货源，粮食部门为步行串联学生解决粮票的申请补助；指定有关部门对参与步行串联的经济困难者提供适当生活补助；突击印刷一批“毛主席语录”和“语录歌”纸片供各串联队领取；拨发一些宣传活动经费，定点向徒步串联队供应毛主席彩色相片、老三篇、语录歌本及地图等，并公布了具体的购买地点。

表一

中等学校购买毛主席彩色相片、老三篇、语录歌本、地图指定供应点

序号	区属	地址	序号	区属	地址
1	黄浦区	南京东路 360 号	6	虹口区	四川北路 847 号
2	卢湾区	淮海中路 721 号	7	徐汇区	衡山路 944 号
3	南市区	中华路 1520 号	8	普陀区	长寿路 353 号
4	杨浦区	平凉路 1467 号	9	闸北区	虬江路瑞和坊 10 号
5	长宁区	愚园路 1360 号	10	静安区	南京西路 771 号

资料来源：1966 年 12 月 9 日，市委接待站《关于接待步行串联问题的答复口径》。

说明：凡大专院校校内设新华书店的在校内购买。其他院校凭介绍信在河南中路 221 号购买。步行串联队要求购买毛主席像章，可凭介绍信（写明人数），到南京西路人民公园 5 号门登记，优先供应。

很明显，不管是在务虚的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务实的管理、行动方面；不管是客观地为了执行中央的通知，还是主观地为了引导串联的方向，上海主管部门面对徒步串联的态度和决策是主动而积极的，这不仅在于对徒步串联能相对起到保障交通、节约开支的认识，更源于对徒步串联的目标似乎已倾向于“熟悉社会，锻炼意志”，而不是“革命造反”的判断了（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运作形式的改变，遮掩了原有功能的释放）。所以，上海主管部门才会迅速地开展从设立中

途接待站到提供各项困难补助,再到印发宣传品等一系列具体而周至的布置,才会高度而又急迫地重视这项工作(甚至具有促成这项活动的意图)。当时上海的报刊(包括属“保守派”的《红卫兵》报)积极地对此进行了报道,现将相关信息搜索列表:

表二

1966年11月—1967年1月上海报刊宣传红卫兵徒步串联相关信息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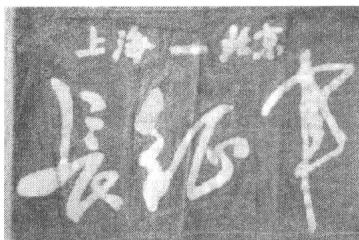
单 位	队 名	目的 地	人 数	时 间 信 息	来 源	备注
上海市公用事业学校	长征红卫队	上海—北京		10.21 出发	1966.12.15 《解放日报》	11.12 在沂蒙
上海市红卫兵南市区总部	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	上海—北京	20	10.25 出发	1966.11.11 《红卫兵》	12.10 到北京
上海工学院	金相远征军	上海—井冈山		10.26 出发	1966.12.15 《解放日报》	11.22 到茨坪
上海市商业学校	继抗大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0.27 出发	1966.12.18 《解放日报》	
	井冈山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0.28 出发	1966.12.10 《红卫兵》	
上海冶金工业专科学校		上海—井冈山	109	10.30 在杭州	1966.11 《支部生活》	参加蔡永祥追悼会
华师大中一[2]班	长征队	上海—韶山		11.1 出发	宣言书	
华师大中四[3]班	红旗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1.3 在茨坪	1966.12.10 《红卫兵》	
第二医学院	韶山长征红卫队	上海—韶山		11.6 在杭州	1966.12.10 《红卫兵》	
上海铁道学院中专部	宣传毛泽东思想挺进队	上海—井冈山			1966.12.10 《红卫兵》	
上海市商业学校	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1.10 在金华	1966.11.14 《解放日报》	
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继红长征队	铜川—延安	11	11.19 在延安	1966.12.22 《文汇报》	悼念 张思德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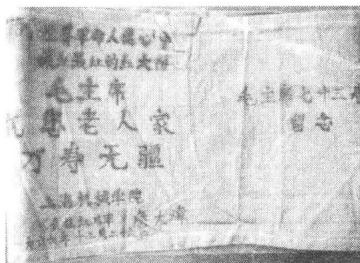
单 位	队 名	目的 地	人 数	时 间 信 息	来 源	备注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白求恩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2	12. 12 出发	1967. 1. 8 《解放日报》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966. 11. 19 《红卫兵》	办《长征》报
上海第一医学院	红 卫 兵 串 联 队	上海—井冈山			1966. 11. 19 《红卫兵》	
上海外国语学院	硬 骨 头 长 征 队	上海—井冈山	15		1966. 12. 12 《文汇报》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永远革命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遵义	14		1966. 12. 12 《文汇报》	往杭州途中演出12场
上海第四师范学校、华东化工学院	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4		1966. 12. 12 《文汇报》	
上海铁路中学	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3		1966. 12. 18 《解放日报》	
上海第一医学院	长征红卫队	上海—韶山			1966. 12. 18 《解放日报》	
交大、同济	长征队	上海—井冈山			1966. 12. 18 《解放日报》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红卫兵》等。[6]

以表中的统计情况为标本可知：其一，上海对中央倡导徒步串联的反应是比较积极的。自10月25日起，就不断有串联队出发（有的徒步串联队甚至在《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之前就出发了，说明与大连海运学院串联队的思路和行动是一致的），以至既呼应舆论，又构创氛围。其二，从上海的地理位置分析，同时考量“徒步”、“红色据点”等诸因素，除了有些徒步串联队前往北京，那主要是与企盼毛主席接见相联系。总体而言，大约77%的上海徒步



上海红卫兵“上海—北京长征军”
袖章正面



上海红卫兵“上海—北京长征军”
袖章背面



上海红卫兵徒步串联中宣传毛泽东思想(徐建刚提供)

串联队的目标是指向井冈山的。这条路线方向西南，气候温和（北方寒冷），路势平顺，沿途有嘉兴南湖、钱塘江大桥蔡永祥牺牲处、上饶集中营等可供抒发豪情、寄托哀思的纪念地，且绝对距离约行进一月便可到达，终究是比较适宜的。其三，在徒步串联队伍的年龄构成中，大学生最多，约占 55%；中专生次之，约占 32%；中学生最少，约占 13%。按常规推理，普通中学生基数最大，外出徒步串联的人数却最少，确实缘于这一群体缺乏各方面的优势。相比而言，大学生、中专生年岁稍长，体力、能力稍强，且大学、中专均有条件提供较充足的物资准备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属“保守派”红卫兵的“上海市大

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南市区总部”，也以跨校的组队方式派出了队伍，这再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上海的主管部门是赞成和推进徒步串联的。

二、曹锦清教授的故事

然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那就是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随机进行口述访谈，很难见到完整地实施徒步串联的内容，即徒步串联的真正发生率应是比较低的。在此，如果推算前述中上海报刊提及的 23 支串联队，若占上海徒步串联总队伍的三分之一，那么，从上海出发的徒步串联队应有 690 支；若占上海徒步串联总队伍的五十分之一，那么，从上海出发的徒步串联队应有 1150 支。尽管这已是十分饱和的推算，但相比于上海红卫兵乘车外出串联的情况，其人数、其规模、其声势都是难以比配的。

于是，这就牵涉到“怎样的人才可能投入到徒步大串联中去”的问题。坚定而热烈地响应号召者有之；勇敢而坚韧的探索者有之；冲动而好奇的跟随者有之——其中有一点应是共同的，那就是这部分投入者或者被一种信念，或者被一种意志，或者被一种情绪牵引着、催促着。著名社会学家曹锦清教授的事例可谓典型，现摘编他的串联回忆录《往事寻踪》：

某日上午，我先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我还悄悄地从天安门城楼红墙上刮下一点红粉，怀着极其庄严崇敬的心情将红粉包入一张洁白的纸内，以作永久的纪念。一日，我在北大校园听到几个上海男女学生争议明日游玩地点：是去八达岭还是去天坛？我心中油然而生出一阵厌恶之情。真想冲上去训斥他（她）们一番：“你们

到底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游山玩水的？！”

不久，报导了大连某大学红卫兵步行大串联的事迹。听说北大正组织二万五千里长征队，我便匆忙赶去报名。接待站的人说，你连被子衣物都没有，怎能穿越冰山草原？于是我急忙回沪，组织长征队。一下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我便直奔敬业中学。敬业中学依然是外地来沪学生的天下，同学们大多外出未归。我坐在门房间，心情虽然沮丧，然仍希望“逮住”几个可能来校的同学。

行军的目的地与其说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教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宣传决定的，那就是到革命圣地去。我们决定第一站到瑞金，第二站到井冈山。1966年11月11日清晨，我们一行六人集中在敬业中学校门，整装待发。从上海到上饶，我们只是沿着铁路、公路行军。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我们研究了一个颇有创意的行军方案：在地图上把上饶与瑞金两地连一直线。有河无桥怎么办？趟水过去；有山无路怎么办？我们准备了砍刀；遇到野兽怎么办？我们有匕首；没有接待站怎么办？我们自备米锅，自己做饭，晚上则投宿老乡家。这一方案给我们渴望“革命锻炼”的头脑以新奇的刺激。

我们购置了布做成长米袋，每人一只，每只内装五六斤大米。买了一只铝锅、一把锅铲、一只铝质洗脸盆。脸盆能用来洗脸、洗脚，并当锅盖，一举三得。还买了若干瓶酱和酱菜算是菜肴。还准备了一把砍刀，既可劈柴取火，又可防野兽。购买这些行军物品的钱是从上饶红卫兵接待站借来的。次日，我们举着红旗，穿着旧军装，背着被子、背包、米袋（每人重负三十余斤），唱着革命歌曲，神气活现地向所议定的路线进发。再见了，沿铁路步行的朋友们。^[7]

在此，之所以长篇幅地述说曹锦清教授的故事，既是为了直观地展示徒步串联的情景，更是为了证实只有类似曹锦清教授这般精神品质（包括理想、意志和激情）的人，才可能以昂扬的战斗的姿态和情

怀,投入到艰苦的徒步串联中去。三十多年后,曹锦清教授深入中国农村作田野调查,完成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黄河边的中国》,无疑与他青少年时期的追求和经历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只是在总的人群中,类似曹锦清教授这样的人不会是很多的;在理性至上、精于计算的上海人中,类似曹锦清教授这样的人更不会是很多的。这也便从一个方面说明,尽管徒步串联曾使人激动过一阵,真正开拔启程且坚持到达目的地的毕竟是少数。

1966年12月28日,周恩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赴京长征队经验交流大会”,接见“来自祖国各方的数千支长征队的十万多革命小将”。^[8]如果说这是全国步行串联达到高潮的标志,那么,或许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使“文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许是部分红卫兵寻找着种种饰词和假托(包括借口徒步串联办理回程票)继续乘车串联,以致交通运输不堪重负。两个月后的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停止长途步行串联的通知(2月7日生效,至2月21日24时止),明令五百公里以外的串联学生十五天内办票回校,五百公里以内的则一律步行回校,并指示各地开始撤销接待站。^[9]十多天里,正是因为中央下达了这条通知,终于使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上海籍串联学生纷纷返回,“他们有的从峨眉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他们背着照相机”^[10]——后来,针对类似的情况曹锦清教授说过“现在想来,他们才是聪明人,而我是十足的笨蛋”。^[11]曹锦清教授真的是“笨蛋”吗?!

就此,全国规模的大串联运动基本停息了。

三、后期串联

为了巩固基本停息的大串联运动,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的通知》。《通知》严肃指出：凡外出串联的师生(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为此，复旦大学《新复旦》、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群众报刊均全文刊登中央通知。同济东方红兵团总部还两次发布通告，要求在外串联的兵团成员按时回沪，“否则将作严肃处理”。^[12]同时，外地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也纷纷有所动作，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通知所有在沪人员“十五天内务必返校”。^[13]3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宣布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取消原定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的计划。就此，以中共中央文件的规定为依据，由红卫兵兴起，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的全国规模的大串联运动完全停息了。

由此，怎么还会产生“后期串联”呢？其中的缘由和症结是什么？

其一，对身心正处于“狂飙期”的青少年来说，以“革命”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间、各革命圣地间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甚至免费吃饭，真正是“盛大的节日”。且整个过程处于颠连的动荡中，高度考验着人的意志和忍耐、智慧和能力，真正是“经风雨，见世面”。所以，大串联的激荡和刺激，依然对部分青年学生产生着强烈的诱惑。何况，中央曾宣布春暖后再串联，突然地一声废止，也就废止了部分青年学生心中的期盼。他们多半是要寻机行动的。其二，学生们返校后，面对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或许因为大半年板荡而困厄的时局，使人看不清路径，也就丧失了关注的热情；或许因为前期涉入不深，难以跟上运动的节奏，也就缺乏参与的动力；或许因为处于矛盾的焦点，处于流水落花的境地，也就萌生失落的情绪和逃避的意愿。总之，依照大串联的先例，外出寻找山水间的意趣，不失为一种选择。例如，复旦大学红卫兵风云人物安文江在《我不忏悔》中写道：

“红卫兵运动在1967年1月达到巅峰，也开始了衰败。我心里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北、安徽、江苏……”^[14]何况，当时学生的身份是相当特异的，即便已宣布停止串联，交通部门面对“扒车”、“短票长乘”的学生仍很难应付。其三，进入4月以后，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形势，尤其西南地区不断传来骇人听闻的消息，促使一部分学生产生“支左”的冲动。如果说前两则因素还浸染着个人逍遙的色彩，那么开赴武斗前线，一定是信念和大勇燃烧着、冲腾着，确是难以阻遏的。

4月中旬，交大反到底兵团、上海中学等掀起一股“支援四川”的浪潮，华纺、科大等院校的红卫兵纷纷上访，社会上也流传着“中央考虑上海、北京可去串联”、“支援水平要初中以上”、“有的学校拿到二百张票子”等说法，^[15]还有些北京红卫兵窜到了上海进行鼓动。据铁路局上海站火线指挥部反映：至18日，已有红三司、交大反到底、上海、继光、长阳、孝和、惠明、五十六等中学和上钢二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通过买月台票、短途票上车，还有在龙华、莘庄上车，并“打算到杭州、嘉兴、金华，下车后采取集体行动，冲上去四川的火车”。^[16]4月19日，市革委会在车站、码头等地张贴《布告》，宣称：“接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中央文革小组已作出决定，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故要求本市师生“不要自行去外地”。^[17]

不要外出串连

本报评论员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可以用十二个字来归纳，即：大批判、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逐步结合起来，以革委会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三结合”。有些单位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看自己末日来临，于是，他们就挑唆学生外出串连，企图使本单位的斗、批、改瘫痪。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这是一个阴谋，必须予以揭穿。

目前，仍有少数学生喜欢这里串串、那里冲冲，对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安不下心来，这种情形必须予以改变。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不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不要反对。”党内外猖狂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我们往外跑，我们敢偏不跑。我们的头脑里必须有三根阶级斗争的弦。我们认为，目前不要外出串连。正在想往外面的同学，应立即打消这个念头，不要上别人的当。

留下来，要干的事情多得很。既要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进行大批判运动，又要逐步展开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的劲头，要用到当首这股最大的政治斗争中去，要集中力量打好这场歼灭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好好动员起来，调查研究，踏实实地发挥作用。

上海革命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积累了很多阶级斗争经验，他们懂得怎样对待敌人。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不会中敌人的“调虎离山计”！

“不要外出串连”

《文汇报》1967年4月23日

上海《文汇报》等也接连发表群众来信和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是“末日来临”的走资派在“挑唆学生外出串联,企图使本单位的斗批改落空。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这是一个新阴谋”。^[18]事实上,在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已被“革命”颠倒以后,再试图稳定秩序,也会面临“革命”的挑战的。所以,不管是权力机构的指令,还是舆论单位的告诫,都不能有效地制止青年学生的冲动。21日,上海吴淞中学31名高中学生为去广州、重庆,“在嘉兴站卧轨拦车,造成列车误点一个多小时”;在杭州站,也有不少上海学生为去西南地区强行上车;23日,“莘庄有11个学生拦火车”,“上海中学、南郊中学部分学生在南火车站吊火车外出”。^[19]

确实,对已宣布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形势而言,事态是严重的。在学生外出的源头上堵截不住,有关部门只得在返程上开口子,试图以返程的宽容和便利来化解这个症结。1967年5月2日,铁道部就“返往学生乘车购票问题”,向各地铁路部门下发通知,在关于“学生自行外出串联”的一节中指出:“返程应由学生自行购票乘车,如确无力购票时,应由当地政府或接待单位代为购票”;“乘车途中,经过劝阻,或主动提出要求返回原地的,也应当购票乘车。如无力购票时,由车站编成‘客运记录’送回原地处理”。^[20]很明白,凡学生自行外出串联,返程时原则上(名义上)应购票,但事实上均可安全地“代购”返回。应该承认,这条规定对促进外出学生返回是具有一定效用的。但同样是这条规定,反倒将源头上的“口子”越拉越大了。

5—6月间,通过上海各站外出串联的学生(主要是中学生)仍然不断,虽然不成规模,但零零星星地散布着、连绵着,终究也是一种惹眼的社会现象。为此,上海的传媒开展了广泛的批评,批评外出串联者所持的种种口实,例如“革命不需要批准”、“造反不需要介绍信”、“冲和闯是造反派的脾气”等;^[21]再例如“我们要到外地取经”、

“本单位武斗现象严重，蹲不下去了”、“外地出现了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要去支援革命派”等。^[22]其实，对热衷外出串联的学生来说，这种批评如同耳旁风，并不能对其内心的翘企起到压抑和震慑的效用（对彷徨者，对家长的管束能起到一些作用），因为此在的决定因素不在于宣传教育的功能，而在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执行中央指示，勿再外出串连”《文汇报》1967年7月6日

7月，震惊全国的“武汉事件”爆发了，河南、湖南以及同属华东地区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均发生激烈武斗，这些地区的部分组织和群众甚至跑到上海，在上海建联络站，办小报，^[23]贴大字报，招募志愿者，呼吁支援。^[24]一时间，社会上又传出“北京已停止复课闹革命”、“北京接待站也办起来了”、“搞第三次大串联，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流言。尤其市革委会关于上海“文革”运动的“八·五决议”，没有提及“复课闹革命”，没有指出“革命派不要到外地去”，更引

发了学生们的议论和猜疑。

在上海北站，自 7 月下旬始，就不断有红卫兵“以支援某地革命派为由”冲击列车，数次致使 49 次（往广州）、14 次（往北京）列车无法准时开出，有的甚至“晚开六个小时”。^[25]还有一些红卫兵“不经师部批准，偷着盖章证明，有的宁愿自己出车费，也要跑到外地去”，^[26]据反映：“同济、交大、复旦各校已有数百人去外地”，上海音乐学院“陆续去外地达四五百人”。上海五十一中红代会刚成立，“就有一百多人准备到外地去，红代会个别常委也准备走”。^[27]如果说前一阶段（3—6 月）学生自行外出是处于零散状态，是集中于西南方向，且裹挟着不少周游的人群，那么 7 月以后的学生外出，不但有自发集合的，还有红卫兵组织派遣的，例如复旦、交大、华师大都派出红卫兵小分队前往武汉；方向则散布于四面八方，例如交大有红卫兵在宁波，师院有红卫兵在苏州等，且主要目的是“支左”、“锻炼”，甚至连一些原“保守派”的同学都表示：“我们也要到外面去见见世面。”^[28]

在上海大串联系列研究中，所谓“后期串联”确也别有一番景致，那就是它构成了当时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一个情状。至于“后期串联”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大概是无从考证了，因为“后期串联”不像上海接待外地红卫兵，处于组织体系的有效管理之下，日日都有统计和报告（上海红卫兵通过车站办票外出的也有统计）。据估计，其总人数不会大于徒步串联，大约万人而已。至于“后期串联”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就当时的景况而言，例如上海市革委会为贯彻毛泽东南巡讲话，于 9 月 14 日在文化广场隆重召开“外地来沪革命群众大会”，工总司等 24 个群众组织发言表态，既“要求上海去外地串联的学生和其他革命同志一律迅速回沪”，又敦促外地来上海的群众“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29]所以随着毛泽东南巡以后的形势变化，至 1967 年第四季度，“后期串联”也就渐渐地消停了。然而在整个

“文革”期间,大串联作为特异的运动形式,1969年国庆40周年期间,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乃至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上海方面都有学生(已属非“老三届”中学生和非“老五届”大学生)以大串联的名义到达北京,只是都属个别的情况。

四、钱粮往来与清理

大串联实行“三免费”,乘车、住宿等因国家单位全部承担,不发生具体的费用关系,也就似乎遮掩了经济的矛盾,但吃饭问题却是每个接待单位必须向市场购买,即必须直接发生费用往来才能解决的,所以在大串联刚刚勃兴的时候,伙食费和粮票的矛盾就已经凸显了。当时,上海高教局召集部分学校的财务科长开会,得到的一致反映和意见是外地学生“不带粮票、饭费的较多,故欠款、欠粮数字较大,现都由接待学校暂垫,这笔账一般较乱,吃饭人数无法统计。今后只能按实际欠款、欠粮数分别向粮食和财政部门报销”,据统计“到9月17日止各校垫付的伙食费,多的学校约一千元左右,少约有二三百元”。^[30]另外,还有“外地来沪学生提出参观本市工厂(如重型机器厂的万吨水压机),已有学校组织去,此项费用开支较大”;甚至有些“离沪时要求借支旅途伙食费……向原校和中央打电报、长途电话,要求接待学校报销”等。^[31]当然,上海学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尤其往北方去的学生会因穿着单薄申请借衣,外地也多是采用类似的办法解决的。因之,就产生了串联学生异地互借钱粮物的问题。

1967年5月,上海市革委会接待组根据中央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决定,发出《抓紧做好接待物资清理、回收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大串联和革命活动中,国家调拨和出借了大量的衣被、交通工

具、宣传用具等，目前已经归还的只是一小部分。有的被强占、盗窃；有的被私人或群众团体占有。现要求各单位，不论使用与否，均应迅速、全部将上述物资交市革委会接待资财回收站（南京西路 1400 号）。本市师生去外地串联所借的各种物品，也应迅速送交回收站。^[32]

如果说这份通知是个信号，它更多地关涉公共物品，那么紧接着的动作就是要清理被个人借用的钱粮物。6月30日，市财政局向各主管局、各级革委会下发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步行串联费财务清理的意见》。^[33]该《意见》指认：当时“对于步行串联的红卫兵，采取了普遍发放生活补助费或任意扩大补助金额”，是“本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企图腐蚀革命小将”的行为^[34]——呜呼！不啻说这对于当权派是个致命的轰击，就是对参与步行串联的“革命小将”，都是顶难以承受的政治大帽子（成为“被腐蚀者”）——所以，凡领生活补助费而没有外出步行串联的全部退回；外出串联但生活上没困难或多领补助费的自觉退回；退清有困难者可分期却不得超过三个月；确有困难者可酌情减退或免退。其实，领受者却没有外出；外出者却多领受，都是应该退回的。但事先给予一个政治高压，究竟是为了有效追讨？还是开展阶级斗争的习惯行为？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是存在的。

7月12日，市粮食局、财政局、教育局、高教局根据已收到上海籍师生（含企业职工）在外省市借用钱粮物凭证的大致统计情况，联名向市革委会提交“速件”，报告在大串联期间，上海方面向外省市接待单位所借“预计粮食 1 千万斤以上，现款也有几百万元”；同时，上海方面向外省市师生“借出粮食 2 千万斤，现款五百万元”。按照各省市遵守的“就地收还，就地入库”的原则，及该项任务“工作量大，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等特点，拟建议成立专门机构，由粮食、财政等四局

派干部、群众代表各一人组成。^[35]7月24日，市革委会决定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串联借粮、借款、借物清理组”（简称“钱、粮、物清理组”），各区、县、局也相应建立工作机构。上海清理大串联钱粮物往来工作正式启动。

在不同的职业构成中，尤其在上海这种经济、商业发达的地区，财会人员“管家”的角色，以及由此形成的认真而细腻、谨慎而隐忍的职业特点，致使相关机构建立后，必然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清理组一方面在全市开展宣传教育；一方面着手编织指导和联系各级清理小组的网络（落实专人负责），特别在一些中学建立了清理工作点。同时，清理组对各地转来的100多万张单据进行编排整理，并建立相关的手续和制度。据当时的统计数据，上海已收到各地转来的单据“计有粮五百万斤，款三百余万元”。^[36]后现金单据又增至“四百万元”。^[37]

11月23日，市钱粮物清理组发出《关于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意见》提出：（1）步行串联领取生活补助费的可按实际天数每天1~2角计算；（2）未在中央文件规定期限内返回，或在中央通知后继续外出、绕道串联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领用外地垫付的车船票），必须清理收回；（3）外出串联所借款项已用于购买音乐器材、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等物品的，由本人申请经区级清理小组同意后，以原物抵还；（4）借粮外出步行串联因未外出，或天数不足者，多领部分按粮食补助每天不超过4两的标准收回；（5）所借用的物资，应以原物归还，不计折旧，遗失要按借欠凭证注明的价格（未注明则参照上海市价格）赔偿，棉织品免收布票；（6）对在校领取人民助学金，家庭享受生活补助费、社会救济费的，可通过申请经审查批准予以减免所借欠款，口粮偏紧归还困难者可适当减免，减免中应贯彻阶级路线，适当照顾工农子女；

(7)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启发自觉归还,不硬性扣发粮款等。^[38]应该说,这是一份相当完备的文件,既强调原则性,又考虑灵活性,尤其针对已发生变化的事实,例如所借款项购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等,便提出“以原物抵还”,确属实事求是的措施。正是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上海清理大串联钱粮物往来工作全面展开。

196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过去串联、上访、参观人员借支的现金、粮票和物品,凡能归还的,要主动归还。借出单位和有关单位要认真清理,应当收回的,要限期收回。”如果说此前的工作依凭着市革委会的指示,平顺地进行着,那么此时有了来自中央的指令,也就壮大了对这一被称为“小五子”工作(指“非中心”工作)的支撑。28日,市钱粮物清理组马不停蹄地借助着中央文件的东风,再通过市革委会财贸组、教卫组的批转,下发了《关于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意见》承认“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讨债”有“畏难情绪”;中等学校(指中专)“尚未建立班子”;十个区的大部分中学“正在内部整理单据,任务没有布置下去”;除崇明县外其他郊县“还在抓点摸索阶段”等。转而,《意见》严肃果决地指出:目标即在“上半年内基本完成清理任务”,具体要求为:二月份落实任务,做好准备。三月份歼灭战,基本完成任务。四、五月份连续作战,完成任务。六月份扫尾。^[39]应该说,这份《意见》凭借中央号令,信心之足,决心之大,既在于造势,更在于推动。确实,“文革”中间的很多事情都是靠自上而下的一纸号令,以攻打“战役”的方式,急风暴雨般地进行的。也正是在这种模式中,上海清理大串联钱粮物往来工作进入了突击阶段。

在这一阶段,各区、县的统计资料也渐渐浮现了,例如至1967

年,上海南市区共支出造反组织经费、接待站经费、大串联经费等791.2万元(不包括区属各单位支出数),其中全区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群众的费用共计50余万元。^[40]上海虹口区在大串联中先后设立了85个接待站,接待外地师生和群众30.25万人次,调集接待人员约4000人,接待经费约48万元,其中借资给外地学生达27.74万元。^[41]上海嘉定县革命串联粮物清理小组核准由县财政局支付的经费就有45.68万元等。^[42]应该承认,突击阶段的工作确实是取得成效的。当时许多财会人员坐镇中学,凭借据对号入座地催讨;大学则有专门的清理组开展工作,例如上海师院清理组一方面积极宣传上海与外地互为借助的粮食总共达3000多万斤,现金达千万元之多。经计算“这些粮食相当于五万亩田一年的产量,它是两万五千个贫下中农辛勤一年的成果,可供一所容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的中学用上五十年。而一千万元的现金则相当于六百所中学(每所以一千五百人计)一年的学费”等;^[43]一方面又高度警惕地叱喝拖欠串联时所借粮钱物的行径,是“胜利关头,阶级敌人又在蠢蠢欲动……以此来达到腐蚀群众、瓦解斗志、颠覆革委会的罪恶目的”。前者是空疏的责任义务,后者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前者是高扬的道理,后者是低垂的棍棒,这种一放一收,一拉一打,两手互为比配、互为应答的斗争手段堪称“文革”惯用的策略(只是用在此处显得张冠李戴了)。

其实,许多借过钱粮物的串联学生,还有家长们是积极配合的。这倒不在于因宣传而有所觉悟,而是对“借东西要还”的道理的认同。尤其人在外地,人在窘迫之中得到过搀扶,自然存有一份谢意和感念。所以,许多学生主动送来所欠的钱粮(有的还专程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和衣物(有的洗净后还进行织补)。这是人之常情——即便“文革”动乱中——仍然存在着正常的道德判断和社会情感。无疑,借钱粮物的串联学生中,也有抵制和赖皮的,例如“有人说毛主

席批准大串联，借的钱粮为什么还要还，有的说等我毕了业发了工资再还”，^[44]以致3月上旬，在上海同济大学收到外埠转来的粮食1.2万余斤、钱款8600余元的欠单中，“只还了一千九百余斤”和“一千一百余元，其他还有布票、衣服、鞋、帽等物资归还的很少”。^[45]其实，这部分迟还者和不还者的情绪也是正常的——那就是“文革”1968年的形势——已使一些人变得彷徨和焦躁，甚至还有少量的颓靡和坠落，于是伴随着无政府主义的盛行，社会上就呈现出一种迷茫、惝恍和鄙俗的精神气象（上海“有吃不吃猪头三”的说法，就是在那个时候流行的）。所谓“迟还者”、“不还者”的出现正是这种社会精神气象的表现。在此，第一种“正常”，即“借东西要还的”道德判断和社会情感，是恒久的、普泛的，是超越“文革”动乱景况的；第二种“正常”，即寻找理由“迟还”、“不还”的行为，是即刻的，是反应性的，是裹挟在“文革”动乱中的。更何况前者是多数的，后者是少数的；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偶然的。所以，互为衬托，第一种“正常”比第二种“正常”，更说明民间良知的依然存在和可贵；第二种“正常”则比第一种“正常”，更证实社会集体心理已发生的蜕变和扭曲。

经过1968年上半年的突击清理，至1969年下半年，此项工作正式划归市财政局革委会管理。此时，尽管所欠钱粮物的总量已所剩不多，但当年的串联者均通过参军、上山下乡等离校而去，一些欠单转向家长单位催收，确实困难重重。家长们推托“小孩在外串联，究竟借没借，借多少，做家长的不知道”；更有家长抱怨“子女已交给国家了，还要叫来归还这笔钱？”^[46]如果说1968年时部分串联学生拖欠这笔钱粮，是受到上述所论社会精神气象的影响，那么1969年后部分家长的拒付，则是公然表达了对子女上山下乡的不满情绪，并将其迁移、发泄到了此处。据棉纺、冶金行业的测算，属于这种情况的单据约占未清理的一半。^[47]

至 1971 年底的统计,在外地转来的粮食(票)500 万余斤、现金 400 余万元的全部欠据中,“除去查无此人的疑难单据计粮食(票)九十余万斤、现金七十余万元外,共收回粮食(票)三百余万斤,现金二百四十余万元,各种物品二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48]1972 年 3 月 28 日,市财政局革委会根据“还有一百万斤粮食(票),八十万元现金尚未收回”,而工作“进展缓慢”的实际情况,向市革委会提议“撤销各级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机构”。^[49]同年 5 月 10 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等签署文件同意,各级清理机构旋即解散,上海的大串联钱粮物清理工作宣布结束。

注 释

- [1] 1966 年 10 月 28 日,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称:“大连有十五位同学从大连跑到北京来,还有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同学,上海同学走得比大连还长,不登报是因为走了一段路,坐了一段车。他们都很可爱。”
- [2] “赞扬长征小将树立全程步行串联的好榜样”《解放日报》1966 年 11 月 16 日新华社稿。
- [3] “普遍要求外出串联”《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10 月 24 日第 341 号。
- [4] 1966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有组织地进行步行串联试点的通知》下达。《通知》同时宣布停止全国乘车串联,于 11 月 21 日生效。但因运送红卫兵返校的车票还在办,列车还在开,故漏洞很大。
- [5] 1966 年 11 月 26 日,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党组等《关于本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今冬组织步行串联试点问题的请示报告》。
- [6] 1966 年 12 月 23 日,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表《强烈抗议》,指责《文汇报》刊于 22 日的文章《在张思德同志墓前》,大肆吹捧该校铁杆保皇干将组成的“继红长征队”,是“对我校革命造反派的公开挑战”。当日,《文汇报》编辑工作小组即写出《我们的检讨》,并铅印散发。检讨全文如下:“十二月二十二日本报第三版发表的《在张思德同志墓前》一文,内容与事

实有不符。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十一名同学是从陕西铜川步行到延安的。文中提到同学们在烈士墓前‘宣誓’，‘宣誓’两字应改为‘默念’。最后一段应删去。这篇报道发表后，客观上对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主观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足，对革命造反派支持不够，在具体采访中，缺乏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我们特此作书面检讨。今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7] 金永华主编：《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0—436 页。
- [8] “热烈庆祝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长征演习的伟大胜利”《文汇报》1966 年 12 月 29 日新华社稿。
- [9] 据(67)上铁客字第 125 号文件《几点补充说明》称，根据铁道部的意见：1. 发给免费乘坐票时，必须查明返回所在地，应在学生证上加盖日期/车次/站名戳，并在记事栏内注明发到地的站名和公里。2. 进站检查及车上验票时，均须核对学生证，并注意日期、车次、发到站相符。该免费直达票除换车外，中途不得下车。3. 对无票或短途越站乘车的师生，应严格按章补票。无钱补票，记录姓名、校名，通知学校追补。4. 截至 2 月 22 日，五百公里以外的串联师生返校必须自理车票。又：据 1967 年 2 月 17 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接待组《通告》称：上海各接待站自 2 月 19 日 0 时起一律停止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来沪中转除外）；正在长征途中的应立即停止前往上海；现住上海各接待站的外地师生，必须立即办理离沪手续，至 22 日起，返回车票自理。
- [10] 《我的大串联——漂泊在红海洋》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三进山城》。
- [11] 金永华主编：《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2 页。
- [12] “东方红总部通告”《东方红》1967 年 3 月 10 日第 15 号。
- [13]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紧急通知”《红卫战报》1967 年 2 月 16 日第 24 期。
- [14] 《大串联》，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8 页。
- [15] “本市学生要求去支援四川的趋势在发展”《文教卫生简报》1967 年 4 月 19 日第 13 期。
- [16] 同上。

- [17] 1967年4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布告》沪革(67)第16号。
- [18] “不要外出串联”《文汇报》1967年4月23日。
- [19] 1967年4月,《接待动态》。
- [20] (67)上铁指客字第118号《关于学生返程乘车购票问题的通知》。
- [21] “有些学生、工人仍然一心想‘到外边去闯’怎么办?”《支部生活》1967年6月第23—24期。
- [22] “执行中央指示勿再外出串联”《文汇报》1967年7月6日。
- [23] 当时外地各群众组织在上海办的小报主要有:江苏无锡主力军、红代会驻沪六三〇联络站《在险峰通讯》;苏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新轻校革委会支苏兵团《红卫兵通讯》;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联络站《苏南火线》;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办事处《苏州火线》;无锡主力军、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红卫通讯》编辑部《苏南快讯》;浙江湖州《红湖怒涛》编辑部、交大红师(筹)红卫兵通讯社《“文革”动态》;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组、工总司浙江沪办联合大队《浙江通讯》;浙江省嘉兴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上海红三司《迅雷》编辑部《“文革”通讯》(上海版);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记者组《浙武造反报》;石家庄红二司河北师大东方红公社赴沪宣传组《石市狂人》;红反一会、打倒王恩茂新疆驻沪火线指挥部、南江县红代会(筹)《新疆风暴》;兵团“文革”联络站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大会战上海战区、红卫兵上海新师大战新疆兵团《新疆“文革”》;新疆红二司赴沪学习调查团、上海航务东方红新疆问题联络站《新疆通讯》;武汉“三钢”赴沪战团《武汉“三钢”》;湖南工联、湘江风雷、井冈山驻沪联合兵团、上海高校支湘联络站《湖南通讯》;上海市大专院校四川问题联络站、工总司上海纸盒印刷厂工人造反队《四川简讯》。
- [24] 复旦大学一度住进了上千名因两派武斗流落到上海的安徽某派人员。这些安徽人曾因食宿问题与食堂闹矛盾,贴了大字报,打了人,引起复旦学生的公愤,便通过校园广播要求驱逐他们。结果,这群安徽人中有理智者站出来,指责同伙为食宿打人“太丢脸”、“太不争气”、“把武斗的习气带到复旦”,并表示道歉,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 [25] “严守中央规定,切勿外出串联”《解放日报》1967年8月19日。
- [26] “高校刮起一股外出串联风,影响大批判和复课闹革命”市革委会《政宣简报》1967年8月9日第59期。
- [27] “要到外地去串联的人多了”市革委会第一接待站《接待情况简报》1967年8月

- 19 日第 104 期。
- [28] “高校刮起一股外出串联风,影响大批判和复课闹革命”市革委会《政宣简报》1967 年 8 月 9 日第 59 期。
- [29]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1967 年 9 月 15 日。
- [30] “当前运动中大学财务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市教卫部文化革命办公室《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 年 9 月 28 日第 280 号。又据《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一览表》:9 月 17 日,在沪外地学生共 5 万人,累计接待人数为 13 万余人。
- [31] 同上。
- [32] “抓紧做好接待物资清理、回收工作”《支部生活》1967 年 5 月第 16 期第 48 页。
- [33] 上海“文革”史中有“保密委员会”事件,即市保密委向市革委会递交报告时,沿用原市委文件编号。结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均作出批示,认为是否定“一月革命”的严重事件。在此,上海财政局不仅沿用原名称、原编号,还将该文件抄送给财政部、市革委会财贸组、教卫组,各区县财政科等。可见,所谓“保密委员会”事件并不偶然。
- [34] 1967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财政局(67)沪财行发字第 18 号《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步行串联费财务清理的意见》。
- [35] 1967 年 7 月 12 日,上海市粮食局、财政局、教育局、高教局《关于革命师生、工厂职工等在外革命串联的借粮、借款、借物收还工作的请示报告》。
- [36] 1968 年 2 月 28 日,市革委会“钱、粮、物清理组”《关于革命串联钱、粮、物清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
- [37] 1972 年 3 月 28 日,上海市财政局革委会《关于撤销各级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机构的请示报告》。
- [38] 1967 年 11 月 23 日,市革委会“钱、粮、物清理组”《关于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 [39] 1968 年 2 月 28 日,市革委会“钱、粮、物清理组”《关于革命串联钱、粮、物清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
- [40] 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历史大事记》,1999 年内部版,第 174 页。
- [41] 中共虹口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3 页。

[42]《嘉定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43]“自觉归还粮款”《上海师院》1968年2月29日。

[44]“谁说同济无浪费？看看数字吓死人！”《东方红》1968年3月6日第100期。

[45]同上。

[46]1972年3月28日，上海市财政局革委会《关于撤销各级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机构的请示报告》。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附：

从上海走到上饶

· 步行串联纪实

陈 军

1966年10月，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组织“长征红卫队”，步行二千多里到北京去串联。《人民日报》为之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股步行串联之风很快刮到我们学校——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当时已改名“抗美军政中学”）。我与孙胜光、黄承勇等几位同学一商量，决定步行串联去。往哪儿去？当时一般有三条线路：一是上井冈；二是去韶山；三是奔延安。去井冈山吧，那是毛主席亲自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就是从那里燃遍全国的！主意已定，便着手准备。

其实，当时各地政府在铁路、公路沿线都设置了接待站。住宿由接待站指定，吃饭由接待站安排，下面的行程由接待站提供线路图，返回原地的车票也是凭介绍信在接待站领取。因此，我们的准备从两方面进行：一、每人向学校借了18元钱，以备路上应急之用；开了一份介绍信，便于各地接待站接待；还向体育老师借了几根体操棒，作为防身之器。二、在家里，按照步行串联的要求，准备了雨具、被单、棉被、换洗衣裤及餐饮洗漱用具，整理后是一个重重的背包；还向父母要了十几斤全国粮票。当然，作为班级干部的孙胜光，他的事情就多些，像制作队旗、准备宣传资料等。

1967年1月9日上午9时，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在北火车站出发，向革命圣地井冈山行进。队员是：孙胜光、吴崇华、黄

承勇、沃金华、陈军、邝国伦(因为是平脚板,不适宜走长路,第二天就离队了)和张云生(因为有事,在杭州与我们汇合)。

两队合并

第一天,我们沿着铁路行走了六七十里,在松江住宿。对于生活在城市、没走过长路的学生来说,一天走下来,好几个人脚上都起了泡。我的问题最严重,脚在热水里一烫,鼓鼓的水泡有五六个,还有一个血泡;而肩膀也被行李带勒得肿起了两道杠。明天怎么办?接待站的同志教给了我们一个对付脚泡的办法:先把缝衣针在火里消毒,然后拔一根头发,穿进针孔里,用针把脚泡穿透,把头发一半留在泡里,另一半留在泡外。这样,泡里的黄水就沿着头发流出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水泡就会干瘪,而且很快会变成老茧。虽然我按照这个秘方处理了水泡,但第二天走起路来仍旧是一拐一拐的,疼得钻心。还好我们是沿着铁路走,当时火车也不多,我就走上铁轨,前脚掌腾空,后脚跟踩在枕木上……

正当我一跳一跳地跟着队伍艰难行走时,一支举着“跟随毛主席长征队”旗帜的女红卫兵串联队从我们身边快速走过。她们共有5个人,也是背着沉沉的背包,走得比我们精神,飒爽英姿。大老爷们怎能落后于女同志?于是,我们两支队伍较上了劲:一会儿你走在



前面,一会儿我超过你;一会儿你走在铁路的左边、我走在右边,一会儿为了超过对方又互换位置……不知什么原因,那时我的脚也不疼了,走路也快了。这可能印证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老话。这样你追我赶,大家很快到了住宿地枫泾。

在接待站吃过晚饭,孙胜光、黄承勇和我在上厕所时说起了她们:这几个女同学太厉害了,吃饭吃三大碗,走路不比我们慢,一边走还一边唱歌……谁知道隔墙有耳,这几位女同学中的两位也在上厕所。当时的接待站设施很简陋,男女厕所只是用薄板隔开,而且也没有隔到顶,上面是空的。因此,我们的背后议论,全部被她俩听到了。她们回到宿舍,把听到的与同伴一说,大家哈哈大笑。出来两天,吃的菜都是白水煮萝卜丝,一点油水都没有,而且饭又是米在水



里浸泡过的“炒米花”饭,一天六七十里走下来,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吃三碗也不多。在议论中,她们对我们插在背包上的几根体操棒很感兴趣,称是打狗棒。据说江西野狗很多,这几根打狗棒可能会发挥大作用。言谈中还流露出想和我们一起走的愿望。当然,这些趣谈是两队合并后才知道的。当时在各方背后议论时,反正我的耳朵没有发热,也没有打喷嚏,好像孙胜光打了三个喷嚏。

正是由于路上的你追我赶,在住宿地的背后议论,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才会出现后来她们放心借给我们照相机的事情。第三天中午到达嘉兴后,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前去南湖瞻仰“一大”会址时,在红船边上,我们又碰见了已经参观完毕的这几位女同学。看到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照相机,很是羡慕。在革命圣地,在党的创始

人开会的红船边，拍一张照，留一个影，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呵！不管是否认识，也不考虑对方是否会同意，急性子的我厚着脸皮向拿照相机的那位提出了请求，恳请她为我们几个拍张照。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位拿照相机的女同学笑了笑，爽快地说，这里要留影的地方很多，我把它借给你们，你们好好参观，多拍几张。说完，就把照相机塞到我的手中。这个举动让我手足无措，不知怎么感谢才好。要知道，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照相机对我们中学生来讲可是稀罕之物，如此轻易地借给一个不知姓甚名谁的人，需要多大的肚量，给对方多大的信任！

这里要插入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可能因为太激动，也可能对照相机这稀罕之物比较陌生，后来在拍摄时，多次出现忘了卷胶片的差错。到了杭州，胶卷冲洗后一看，有好几张影像是重叠的，其中还有一张与她们几个人的合影重叠。顿时，大家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傻了眼。

当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参观完毕回到接待站还照相机时，才知道她们是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图案设计班的学生，那个借给我们照相机的叫赵晨，其他四位是王果婉、庄宝球、肖曼华和王芝芸。于是，在共同“朝圣”的过程中，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商定：两队合并，共赴井冈。

饱览美景

不知是哪位队友写了这样一首诗：

山川大地收眼中，五洲风云满心胸。

万众高歌《东方红》，四海齐颂毛泽东。

长征战士心潮涌，冬夏常青学劲松。

革命不拣平路走，“无限风光在险峰”！

步行串联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工农战天斗地的革命风采，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经过 6 天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浙江省会城市杭州。我虽出生在绍兴，离杭州很近，也早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称，但杭州一次也没来过。为了畅游杭州，也为了与因有事晚来的张云生老师汇合，我们商定，在此停留 3 天，进行休整。于是，我们游西湖：迎着温暖的阳光在苏堤徜徉，冒着初冬的小雪在断桥观景，等日头西斜看雷峰夕照……于是，我们去灵隐、登六和塔：在飞来峰上，手捧红宝书集体留影；在钱塘江大桥上，抒发革命豪情……那时虽是非常年代，但爱好文学的我们这几个 66 届高中毕业生，几个具有一定审美眼光的准图案设计者，面对大自然的美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情调”，常常“啊”、“啊”不停！当然，在游玩时，我们也时不时看到红卫兵扫“四旧”的“战绩”，如飞来峰山坡上的佛教石窟造像，有的断了胳膊缺了腿，有的甚至被割了头，真是惨不忍睹。我们也是红卫兵，但我们知道这些可都是不可复制的艺术珍品啊！

经过 3 天的休整，18 日一早，我们又踏上征程。在队伍中，多了一位成员、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张云生老师。这天要步行七十余里，住宿地为富阳。走在富春江边，如同进入仙境，风光无限，美不胜收。这里抄录赵晨写给“一切支持我们长征的同学”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们走的是山路，一会儿背山临水，一会儿又沿江傍山；山外青山，层层叠翠，在雾气笼罩下，山略带蓝灰色，越远越朦胧。由于晚霞的映照，江水泛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行人、船只、桅杆、山峰的倒影，映在江面上，如同一幅惊世骇俗的山水画。我们站在高处，面对有生以来从未看到过的景色，真想放肆一下，感叹几句。这时，我体会到诗人的幸福，羡慕他们的生花妙笔；更体会到长征的幸福，不然，我们就看不到祖国如此美丽的山河。”这些写于 18 日当天夜里的文字，虽非

美文妙句，但鲜活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真情实感。真的要好好谢谢赵晨：一是感谢她及时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感知；二是感谢她把这些资料珍藏了 42 年。真的不容易呵！

过桐庐，到建德，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这里看到的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工美景。据工人介绍，新安江水电站建于 1957 年 4 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它位于建德市白沙镇（现在称新安江镇）以西 6 公里的桐官峡谷中。水库坝高 105 米，长 462 米；水库长约 150 公里，最宽处达 10 余公里；最深处达 100 余米，在正常水位情况下，面积约 580 平方公里，比杭州西湖大 104 倍，蓄水量可达 178 亿立方，比西湖大 3 000 多倍。当我们登上水电站大坝，第一次看到千岛湖时，那种震撼心灵的感觉顿时激荡全身：高峡出平湖，我们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而欢呼；碧波万顷，群山竞秀，我们被“千岛碧水画中游”的景色所陶醉。说真的，这些年，我去千岛湖多次，或休假，或开会，或改稿，条件虽然越来越好，但与 1967 年初那第一眼的感觉是没法相比的。

“煽风点火”

就这样，早起上路，日落宿营。步行了十多天后，我们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躁动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决定像当年红军那样，沿途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宣讲“十六条”。正当我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机会从天而降。从浙江常山到江西玉山的途中，在古城我们遇到了两位求救的农民，说他家的媳妇被人拐骗走了，心急如焚请求帮忙。



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们红卫兵的困难，全体队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改变行军路线，直奔事发地。于是，由这两位农民带路，步行10余里，到玉山县双明公社梨园大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贫下中农的朴实和热心肠令人难忘。“上海红卫兵来了”的消息在这穷乡僻壤一传出，梨园大队立刻热闹起来。生产队长连忙把大队的仓库腾出来给我们住（一间用泥和稻草垒起来的房子，中间用稻草和木板一隔，就成了宿舍，男女各一间）。好几家贫下中农热情地拉我们去他家吃饭，红米饭，南瓜汤（当然，我们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好饭后每人付了一角钱和半斤粮票）。晚上，不断有人来向我们反映村里的“不正常现象”：现在大队里掌权的还是过去的“走资派”；大队的“文革”小组成员不是大家选出来的；贫下中农说话不起作用……听完一拨一拨人的述说，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但我们没有半点睡意，有的只是“大仗”前的激奋。我们连夜举行“梨园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统一认识，认为梨园大队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必须排除干扰，打开局面。会议最后决定：明天两人一组，分头访贫问苦，调查情况，发现问题，再制定对策。

第二天一早，我们各自手捧红宝书，拿着笔记本，前往老俵家走访（江西称老乡为“老俵”）。我和谁搭档已记不起来了，总归是一位女同学，访问的对象是昨晚来反映情况的人。一进这家门，给我的印象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空空——整个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只破凳子外，其余似乎什么都没有。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暴风骤雨》中工作队走访“赵光腚”家的情景。贫下中农穷呀，贫下中农苦。因此，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行？！

三天的访贫问苦结束后，我们开始“行动”：首先，向大队“文革”小组提出，我们要举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演出，要求他们在两天内搭好一个舞台，并通知四邻八乡的农民；第二，公开排练节目，散发纺

专女同学带来的宣传品，在村里的交通要道刷出大标语，把“文革”的气氛搞得浓浓的；第三，有针对性地深入贫下中农家，动员和启发他们揭露和批判生产队存在的问题，以及“走资派”压制、阻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来梨园后的第五天晚上，文艺宣传演出开锣了。大队干部的工作效率也真高，他们在打谷场上用桌子木板搭起了舞台，台四周挂着四盏煤油灯，我们的两面队旗插在舞台两边，被晚风吹得哗哗直响。梨园大队百分之九十的贫下中农都来了，有一百多人，把整个打谷场挤得满满的。演出在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开始。五音不全的我这时也大胆登台，引吭高歌。主持人沃金华，是当天的风云人物。他那带卷舌音的普通话，音量高，一张嘴，一开口，不用麦克风，整个会场都能听见。他体操运动员的基本功，强烈的表演欲，在舞蹈“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引来阵阵掌声。演出的高潮出现在赵晨独唱时。她演唱的歌曲是“不忘阶级苦”，由王果婉、肖曼华口琴伴奏。应该说，赵晨是有一些演唱天赋的，至少在我们这些人中是头牌。她一开口：“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整个会场瞬间鸦雀无声……当唱到“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时，赵晨哭了。顿时，台下也哭声一片，“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张云生老师不愧为我校的团委书记，他一看时机成熟，等赵晨的歌声刚停，就立刻站到台前，宣讲《十六条》。他说：“贫下中农们，父老乡亲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半年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这些天听到你们反映，梨园大队存在许多不符合《十六条》的情况。譬如，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大队的‘文革’小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选什么人，怎么选法，都要经过群众

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可是我们梨园大队的“文革”小组是怎么产生的呢？”他的问话刚提出，台下不少人立刻说：“领导指定的！”张老师转身向大队“文革”小组的成员发问：“是这样的吗？”大队“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喃语：“是的。”“怎么办？”台下沸腾了，齐声说：“改选，撤换！”这时，一位群众跳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走资派”怎样迫害他……

演出后的第二天，我们离开梨园，重新踏上奔赴井冈山的征程。

过春节，观旧址

到了玉山县城，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上井冈山朝圣的人太多，饮食卫生状况极差，已经大规模爆发流行性脑膜炎，死了好几个人了。现在已经封山了。怎么办？“到上饶后再说。”不知谁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获得大家认可。

到上饶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一路走来，整个城市没有一点节日气氛。我们被安排在上饶茶厂的一间放茶叶的仓库里。吃过“年夜饭”，召开决定我们这支步行串联队伍前途的“上饶会议”。可能是“年夜饭”太差了，大家刚落座，黄承勇就提出先讨论年初一怎么过，是否自己动手改善伙食，犒劳一下肚子。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七嘴八舌，各述高见。到底是女同学，生活经验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周全，提出了包馄饨的方案，既好吃，又简单省事。于是一致通过，并决定了人事安排：吴崇华、孙胜光和我上菜场买肉和馄饨皮子；黄承勇和几个女同学去挖荠菜；张老师、沃金华去和接待站食堂打交道……接着，会议进入正题。经过分析形势、摆出困难、交流观点、提出方案、统一认识等程序，最后决定：我们这次步行串联行动到上饶结束；以后将以车船代步，去南昌，登庐山，回上海。会议结束时，还对这几天在上饶的活动作了安排，主要是参观上饶集中营。

大年初一，我们起了个大早，各自分头行动。原担心菜场关门或

者供应的东西太少，谁知道今年春节不放假，菜场照常营业，而且东西还比往日丰富，我们除买了肉和馄饨皮子外，还意外地买到了两条鱼。而挖荠菜的那几位，去了茶厂不远的沟边，大家都是早当家的孩子，什么是野草，什么是荠菜，一看就清楚，用小刀片一挖，荠菜连根拔起，不到一小时，就满满三大篮子。包馄饨，人人动手，个个献技，满桌子的馄饨，形状各异。当然，最难看的是我们几个男同学包的。吃馄饨了，每人热腾腾一大碗，上面还有绿绿的葱花，又香又好吃。可是，肖曼华的反应令人吃惊，她一点胃口也没有，直想吐。再观察她的脸色，两眼黄黄的，一副病态。一人向隅，举桌不欢。大家赶紧把她送医院。一检查，不得了，是急性黄疸肝炎。于是，整个



下午大家围着她转，有的陪她看病，有的联系火车票，有的帮她整理行李，直到把肖曼华送上火车，看着火车远去，才长长舒了口气。

年初二，我们前往上饶集中营参观。上饶集中营在上饶市南郊茅家岭。1941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将皖南事变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600余人，以及在东南五省被捕的共产党员、抗日青年和爱国人士80余人囚禁在茅家岭的七峰岩、周田、李村等处，如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关在七峰岩的禁闭室。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干部、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42年5月25日和6月17日，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成功地举行了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冲出了牢笼。这些成功越狱出来的革命志士，大多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曲折，重返了革命队伍。在学校里，我们都读过《上饶集中营》，也看过汤化达、江俊等

主演的电影《上饶集中营》。今天,当我们走进偏僻山坳里的那一片低矮阴森的房屋,那四周构筑了围墙、铁丝网、岗哨林立、警戒森严的“狱中之狱”,亲眼目睹铁刺笼、老虎凳等残酷刑具,聆听当年新四军被俘指战员英勇斗争事迹的介绍,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不由从内心深处升腾起一股对革命先烈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最后,我们在刻有周恩来总理题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烈士纪念碑前合影留念,作为我们这次步行串联结束的浓重一笔。

第八章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销

一、流产的“串联联络站”

1966年8月15日,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属市学联宣布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标志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师生的工作正式启动。因整个接待工作尚处于“初始期”,团市委所属市团校(静安区陕西北路500号)率先成立了中心接待站。^[1]因之,早先入住的北京红卫兵,便在市团校的大门上挂出了“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以示此处为北京等外地来沪学生的集聚地。

再据8月27日《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的统计,在市学联已累计接待的901名串联学生中,北京红卫兵竟达512人(恰巧26日有170多位北京红卫兵集中抵沪,分别安排在复旦、交大、华师大等校)。这不仅是到达数量的集合和显示,更证实了北京红卫兵的能量和在外地串联学生群体中所处的地位。正是这几个因素的交汇,自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在市团校策划了一场筹建“串联联络站”的行动。

8月27日,借宿在市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牵头向分

散在全市各校的北京红卫兵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8 日上午 8 时 10 分在市团校大门口张贴出“北京大中学校南下革命串联联络站筹备会议，今日上午九时在上海市团校食堂举行”的通告。^[2]显然，此中生成着一种需要，那就是企图通过某种程序，标立一个核心，来集合、来召唤散落着的北京红卫兵，以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然而，需要只是触发一种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碰撞和交织。

会议于 9 时 20 分正式开始，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二外、人大附中，以及借宿在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等 30 多人出席。据参加会议的代表说：“会开得不成功”、“也没办法开”，有的甚至一头雾水，例如清华的代表（秦建国，住复旦）抱怨“这会啥人召开也不知道”，“会客单也没人签名”。^[3]原来，当牵头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一提出“号召到团市委看大字报”、“吃饭坐车不该花钱”、“应给我们创造良好的条件”等建议时，立即就遭到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红卫兵的猛烈反击，他们当场指责掌握会议的人“开这个会的目的不纯”、“参加会议的成员也不纯”、“不去调查研究，就设立联络站没有意思”。^[4]结果，会议没有展开讨论，更没有进入程序，在一片吵闹中，于 9 时 50 分不欢而散。

接着，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的红卫兵冲到门口，将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张贴的通告和“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全部撕下，并于 10 时 30 分、10 时 50 分贴出两份内容类似的大字报《要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们的看法》。大字报对科大红卫兵“动不动就伸手要这要那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气愤！！！”，认为这“纯粹是占革命的便宜，投革命之机”。他们还对团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维护北京红卫兵的荣誉”。^[5]

显然，试图建立一个“串联联络站”的计划流产了，导致这种流产的原因，既不是外界的干扰，更不是上层的阻抗，而是其内部萌发的

需要,在初始阶段就遭遇到了不同观点的冲撞——以致产生需要是必然的,导致流产也是必然的。在此,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群体,因为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或同一学校、或同一组织),也就没有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依附;因为没有共同经历的遭际,也就没有相互间的心理认同和权威依附,且初来乍到,情况不明,情绪飘忽,怎么可能迅速地或聚合、或附着于一个机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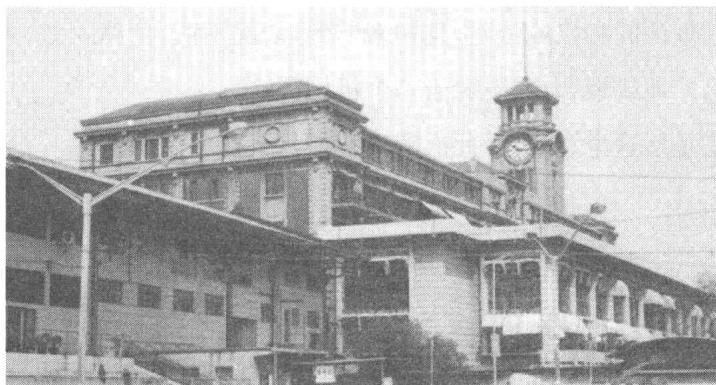
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此次的流产便是下次顺产的前奏。

二、10月以后的“顺产”

据《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自8月28日起,外地来沪串联学生数迅速进入“上升期”,且多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后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例如8月29日,共1123人到达上海,828人为北京红卫兵(其中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为639人);8月30日,共1742人到达上海,914人为北京红卫兵(其中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为718人)。^[6]正是这一流动的群体,下车伊始,以北京的“革命”眼光感觉上海的运动“温良恭俭让”,便挑起了“9·4冲击上海市委事件”(容后研究)。在这一行动中,各校红卫兵之间有招呼、有策应,但因事件骤然起落,也就没有形成稳定的组织构架。^[7]

9月10日以后,以调查“9·4事件”为名,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派遣南下兵团抵沪。^[8]该兵团上设总部(位于人民广场市体育宫内),下分纵队、支队,看似体系严整,实为松散型的临时机构。所以,尽管该兵团抵沪时曾受到摩托车队的开道迎接,也有组织地与市学联、工人劳模举行了座谈会,但当各纵队、支队分散、深入开展行动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眼光依然与上海的运动形势形成强烈的抵牾,以致这群北京红卫兵上街宣扬“红色恐怖”,下基层演示打人,

甚至将“鬼见愁”的对联张贴在国际饭店门口。后来，上海有关方面通过种种途径，促使北京方面向总部下达了“国庆返京”的指令，这一轮北京红卫兵南下也就没有形成持久的组织构架。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驻地(网络图片)

10月以后，因部分北京高校红卫兵对上海的“文革”运动已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已有深入的参与，便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决战姿态，以“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选择（在当年红卫兵们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有关教科书中所说五四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工农大众的“主力军作用”，上海工人阶级罢工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网络图片)

“标志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等概念,是深入人心的),正式提出立足上海,在上海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络站。不仅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上海市委,更企图以发动、组织上海的工人群众为突破口,影响全国的运动走向(事实上,北京红卫兵是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10月25日,北航“红旗”三十余人(住交大)率先在交大革命楼317室挂起了北航联络站的牌子。接着,他们又围攻市委负责人,并占领南京西路市委外地学生接待站的两间房子,逼迫市委必须在交大附近落实三四间空房。他们声称北航红旗已有200人到上海(北航全院共7000名学生,“红旗”组织有2000人左右),应将人员集中在交大和复旦,因为“这两个学校搞好了,其他学校也可以带起来”。当市委未能满足北航“红旗”的要求时,北航“红旗”就自行强占了余庆路161号,宣布建立驻沪联络站。^[9]

10月29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称“第三司令部”)先遣队领队姜涛持总部介绍信,正式向市委提出设立驻沪联络站,并附一份“物质要求”清单:一、将延安西路28号市委对面的办公大楼作为联络站。二、配给一辆装有三个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三、配给廿辆自行车、一辆摩托车。四、配给一架打字机、三架手摇油印机、五块誊写钢板、十支铁笔。五、准备刻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字样的公章。六、拨给五千元活动经费。经研究,市委表态:除自行车减为十辆,办公地址、活动经费待进一步商讨外,其余均予满足。在落实物质给予的过程中,首都三司先遣队的红卫兵“态度强硬,催逼紧迫”,不仅要接待人员“写条立保,限定时刻”,还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提供沿街房屋,并设宣传广播站;给予手提式电喇叭及八开纸十令、二十桶糨糊等。据31日的消息,短短两天时间内,除了沿街房屋、经费、电喇叭尚未落实,其余均已到位。^[10]后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落户于愚园路311号,

他们又提出借用照相机、录音机等要求。当不能及时获得满足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便施展拿手好戏,以“革命”的名义,对资本家采取造反行动,除掠得照相机、自行车等,还将一幢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准备办展览会的资本家房子占为宿舍。^[11]同时,三司向外宣称:目前三司在沪红卫兵已达300余人,总司令部还将派出大批人马到上海,“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等。^[12]

再至11月9日的报告和统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野战造反兵团、全国红色造反团、首都长征造反队、北京红卫兵造反队等,均强行冲进市委28号办公大楼,并各占一方,自行建站。与此同时,除了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分别入驻余庆路161号、愚园路311号外,其他已落实地点,并宣布建立联络站的还有首都红卫兵武工队驻沪联络站(襄阳路55号)、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延安中学内)、全国十大医学院串联联络站(上海第一医学院内)、河南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外贸学院内)等。^[13]

如此看来,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能够在10月下旬纷纷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经历了种种类似“9·4冲击上海市委”、“国庆返京”等事件的冲撞和较量后,红卫兵造反势力在政治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动,以至所采取的行动均被赋予“革命”的含义而畅行无阻;二方面是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大串联,从红卫兵们松散、飘浮和游击式的运动中,必然积聚出一些新的力量组合,并或以一所学校(如北航红旗)、一个团体(如首都三司)、一个地区(如山东红卫兵指挥部)的稳定构架为支撑而展开阵地式的“革命”。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汇合,即前者以大势庇护着后者的组织落实;后者以组织落实推助着大势的张扬,包括主管单位在内的许多部门,不管是无奈地屈从,还是有意地认同,多采取了顺应和协助的态度。

于是,11月11日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联合向市委写报告,声称目前来沪串联的外地学生总量已超过240万人,滞留量达70余万人。所以,根据形势的需要“必须在政治上给予积极支持,在生活上给予热情关怀——还需要帮助解决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设立联络站的办公住房、交通工具、宣传设备等”,并进一步提出“今后随着来沪人数不断增加,这方面的需求也将增加”。^[14]应该承认,这次实际主管单位是十分主动的,他们不仅明确地要求解决“建立联络站”的物质准备,指出过去总是被动地“临时向有关部门借调,既牵制各单位领导精力,又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引起外地学生不满”,更明确地向市委建议:应“由房管局负责解决外地学生设立联络站所需房屋问题;由计委交通局负责解决汽车问题;由仪表局及交电公司、人民广播电台负责解决广播器材问题;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向各局及区借调一部分物资,由市接待办统一掌握使用”。^[15]甚至还直接提出这些物资的来源可以“(一)从机关使用的设备中挤出一部分。(二)从抄家封存的物品中动用一部分。(三)拨一笔经费,必要时增添一部分设备”等几个方面统筹解决。^[16]

表一

**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
借调房屋及各种物资的具体要求**

类 别	品 名	数 量	负责单位	备 注
房屋		空房20处,每处3~5间	市房管局	静安、卢湾、徐汇、黄浦、长宁等五区
印刷工具	手摇油印机 手推油印机 打字机 钢板、钢笔	30架 50架 5部 100块、200支	机关事务管理局	向各局抽调

(续表)

类 别	品 名	数 量	负责单位	备 注
车辆	自行车 摩托车(或机械脚踏车) 三轮车 卡车	200 辆 30 辆 15 辆 5 辆	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通局	从抄家物资中抽调，向各局、体委抽调
广播器材	宣传车扩音设备 收音机 留声机	15 套 10 台 15 台	仪表局交电公司、人民广播电台	借调，及从各区抄家物资中抽调
办公用具	办公桌、长条桌 长凳、折椅	80 只、160 只 500 只	机关事务管理局	向各局抽调
棉被、棉衣	棉被 棉衣、棉大衣	400 条 50 件	机关事务管理局	向出租商店借用，从各工业局抽调劳防用品
其他	红旗、红布、横幅	需要	商业一局	调拨

资料来源：1966年11月11日《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联合给市委的报告》。



由表一可知，接待指挥部向市委申请的房屋达20处(每处3~5间)、宣传车扩音设备达15套等，确实是颇具规模的。这证实当时外地红卫兵要求在沪建立联络站已形成一股势头，如果说这种要求是“进入”的动因，那么接纳方面的姿态和举措，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过程是否平顺，结果是否成立。现在，负责接纳的主管部门主动敞开了门户，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自然也就“顺产”了。

三、一 项 发 现

现检阅《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相关章节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自成立以来的所有文献(含前引中的文档),将涉及“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信息整理列表如下:

表二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首次出现时间	频 次	备 注
1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1966.10.25	22	余庆路 161 号。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起草单位
2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1966.10.29	28	愚园路 311 号。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起草单位
3	首都红卫兵武工队驻沪联络站	1966.11.9	1	襄阳路 55 号
4	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6.11.9	2	延安中学内
5	全国十大医学院串联联络站(大连医学院发起)	1966.11.9	1	上海第一医学院内
6	河南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	1966.11.9	1	上海外贸学院内
7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1966.11.9	25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起草单位
8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6.11.9	8	
9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	1966.12.11	13	

(续表)

序号	名 称	首次出 现时间	频 次	备 注
10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6. 12. 12	25	威海卫路 348 弄 22 号；南昌路 69 弄 5 号。《紧急通告》起草单位
11	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 1. 1	11	黄陂北路 190 号（市体育宫）
12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1967. 1. 1	16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起草单位
13	中国人大红旗驻沪联络站	1967. 1. 4	3	
14	大连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 1. 4	1	
15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 1. 4	3	
16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 1. 5	6	
17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 1. 5	6	
18	东北工学院反帝反修远征军驻沪联络站	1967. 1. 5	2	
19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7. 1. 12	7	
20	首都一司驻沪联络站	1967. 1. 16	1	
21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 1. 25	6	南京东路 680 号 409 室，电话 293260
22	首都红卫兵八一八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7. 1. 25	2	
23	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驻沪联络站	1967. 1. 28	1	
24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一八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1967. 1. 28	4	
25	内蒙古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驻沪联络站	1967. 1. 28	1	

(续表)

序号	名 称	首次出现时间	频次	备 注
26	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驻沪联络站	1967.1.28	2	
27	鞍钢红卫兵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7.1.30	1	
28	武汉新华工总部驻沪联络站	1967.1.30	1	上海第二医学院 反修楼 212 室
29	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沪联络站	1967.1.30	5	肇嘉浜路 687 弄 7 号
30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967.1.30	3	
31	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1.30	2	
32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1.30	1	
33	南开大学卫东队驻沪联络站	1967.1.30	2	
34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2.2	2	
35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2.2	1	
36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驻沪联络站	1967.2.3	1	
37	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967.2.5	1	
38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驻沪联络站	1967.2.5	2	
39	南京航空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2.21	1	
40	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驻沪联络站	1967.2.25	2	
41	北京大学“战上海”兵团	1967.3.2	1	
42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驻沪联络站	1967.3.2	1	

资料来源：1.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内部版）1994年版。2. 工总司办公室 1967 年 7 月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第一、第二册。

说明：1. “首次出现时间”指该驻沪联络站首次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记录。
2. “频次”指该驻沪联络站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累计次数。

联系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为安置“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曾向市委申请调剂房屋 20 处，并要求集中在“静安、卢湾、徐汇、黄浦、长宁等五区”的情况，再看表二中“北航红旗”、“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新北大文革委”等主要驻沪联络站在上海的位置，基本可判断这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是散布在人民广场以西、中山西路以东、肇嘉浜路以北、北京西路以南的区域内。确实，这是上海文化、商业、交通发达的高档地段，更为重要的是市委机关所在地，且有交大、一医、华政、华师大、华纺等高校分布。这证明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目标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针对市委的。因为这样的选址和布局不仅往来便捷，消息通达，更将市委机关与各高校红卫兵组织串联起来，以至前方攻击目标清晰，后方支援系统厚实，真正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如果说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选址确有预期目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些“外地红卫兵”进入上海？它们从何处来？其流动和驻扎的方位与当时的“文革”大势存有何种关联？从表二中可获得一项有意味的发现。

首先确认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大多来自北京，相关记录中的大学有北大（新北大捍卫团、新北大文革委、北大“战上海”等）、清华、北航、北电、北京体院、中国人大、北师大、北京地质、中央财政、北医大、北京广播、北京政法、北京机械、北京外国语（共 14 所）；跨系统的有首都三司、首都一司、武工队、南下纵队等。其他方向有黑龙江省的哈军工；辽宁省的东北工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工学院、鞍钢红卫兵；天津市的南开、天大；江苏省的南大、南航、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湖北省的华中工学院、武汉地区红卫兵；解放军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技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以及安徽、内蒙古、山东、河南、江西等地的红卫兵组织。

如果说这只限于从上海工总司文件中罗列出来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即存在着“疏漏”的可能——尽管工总司成立后，上海“文革”造反派（含外地红卫兵）的所有集体性重要活动（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均由工总司挂帅和牵头，其涵盖面是十分广阔的——于是，在大量梳理同时段其他造反组织的文件时，也只是在极少数“声援工总司”的相关文件中（即“工总司”不署名），见着少量新出现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名单。例如 1967 年 2 月 16 日，在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主持的“迎头痛击反工总司的反革命逆流”的公告中，除了原有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公社驻沪联络站、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等 10 个单位外，新见的是南京工学院东方公社驻沪联络站、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工业大学新曙光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等三个单位。

综上所述，在所有已见的近五十个“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名单中，18% 的单位是沿长江一线东进的，如武汉、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红卫兵组织；82% 的单位是以北京各大红卫兵组织为轴心南下的，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西安军事电讯“文革”临委会、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甚至远至北方的黑龙江、内蒙古等边远省份；小至北方的鞍钢等地方城市——比对之下，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来自上海以南的城市！即没有浙江省的杭州，没有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没有湖南省的长沙，没有广东省的广州，更毋谈广西、贵州和云南了——以红卫兵集中地的高校而言，那就是没有浙江大学、没有厦门大学、没有湖南大学、没有中山大学、没有广西大学、没有贵阳大学、没有云南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建立联络站。

为什么只有来自北方的驻扎，只有北方的喧嚣；没有来自南方的落脚，没有南方的声息？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惊诧的图景！

北京是中国“文革”运动的策源地，尤其“6·1”北大大字报和“8·18”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北京的“文革”运动，包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改组市委”、“撤销工作组”等，一律成为全国运动的标杆。此时，北京的红卫兵更是得“天时、地利”（政治地理）之先，以放眼全国的视野，以指点江山的豪情，以“救世主”的姿态，浩浩荡荡，一路南下（北京红卫兵也有“西进”、“北上”，但主要是“南下”）。因之，中国的“文革”造反运动由北向南传播（改革开放的时代，则是“南风”吹拂）——北方是爆发地，南方是波及地；北方是攻势，南方是守势；北方输出革命造反，南方承受革命造反；北方以首都为大本营，策动各地“炮打司令部”，南方扼守自闭，纠缠于自身的矛盾冲突（南方也有“北上”的，那只是“求援”和“学习”）。

再则，上海成为北方红卫兵造反势力的汇聚之地，不仅在于这座城市经济、商业、交通的地位和国际的影响（南方城市的制高点）；在于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蕴涵（这里曾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对北方红卫兵来说，愤愤之中些许还夹杂着称羡和嫉妒，所以要坚决地占领它、改造它）。然而，就革命造反的使命和意义而言，更在于这是北方红卫兵打开整个南方的门户之地；进军整个南方的前哨之地。所以，上海（华东局所在地）必然成为北方红卫兵强力攻占、突破的堡垒。尽管此时北方南下的红卫兵也已进入杭州、福州、广州等南方各城市，并播撒下了大大小小的火种，但终究因为不是南下红卫兵的主力队伍，终究不是决战性的战役，以至南方各城市、各大学的红卫兵除了应对自身的种种冲突，则集体地观望着、揣测着上海的事变（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这种观望和揣测不是参与，是等待；不是投入，是期盼——是等待上海的事变有个结果；是期盼北方的红卫兵能够带来（或带走）至关重要的变化。由此，北方红卫兵的“进入”与南方红卫兵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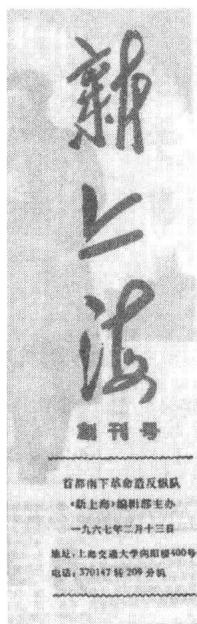
守”，也就在特别的环境中，构成了一种定势。

同时，通过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视角，大致可见中国“文革”运动从北京走向全国的基本情状。

四、短促的尾声

大约 10 月下旬至年底的两个月间，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完成了建立的过程。据此检阅上海工总司自成立起的所有文献，可以发现或许是立足不久，或许是还需仰仗基地组织的声威，这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一开始并不独立地标举“驻沪联络站”的称谓，例如在 1966 年 12 月 3 日，由红革会、工总司牵头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火线指挥部联合声明》中，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署名是“红卫兵北京市第三司令部”；在 1967 年 1 月 1 日，由工总司、红革会牵头的关于“昆山事件”的《紧急通告》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仍回避“驻沪联络站”的字样，而签署基地组织的全称。直至 1967 年 1 月 3 日，在关于“康平路事件”的《联合声明》中，才首次正式出现了“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原毛泽东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等称谓。此中的遮掩和犹豫，大致说明这些外地红卫兵进入上海时，多少还有些焦躁和慌忙。此后，外地红卫兵组织均以“驻沪联络站”的旗号和签名参与上海的“文革”运动了。

应该承认，在 1966 年 10 月至 1967 年 2 月间，这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直接参与上海的“文革”运动，并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因本文无意于上海“文革”运动史的研究，只是着力于梳理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情况，便通过对工总司所主持制定总 54 项文献的统计（表二），按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在文献中出现“频次”的累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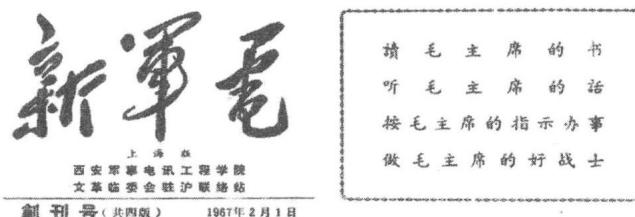


1967年2月13日
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新上海》创刊号

数,得知排列在第一类的依次是首都三司(频次28,下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26)、清华井冈山(25)、北航红旗(22)、西军电临委会(16)等五个驻沪联络站。第二类主要有新北大捍卫团(13)、北京体院兵团(11)、天津大学八一三、安徽省八二七(6)等8个驻沪联络站。第三类则是中央财政八大战斗队、南开大学卫东队、山东红卫兵指挥部等29个驻沪联络站。

在此,所以作出这般分类,一是为了证实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不仅呈现出有主导、有支撑、有奠基的宝塔状,且在组织构架上具有相当的规模。二是为了说明尽管其间也会存在跟随的甚至是投机的组织,但其第一类以首都三司为首的五个主导型驻沪联络站——除累计“频

次”最高外,更以参与起草被毛泽东高度赞赏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为划分的依据——确实在上海的“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它们不仅建立了活动的据点,还创办了铅印的报纸,如《首都红卫兵》(上海版)、《红旗》等,并时时发表《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十五点看法》、《对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等长篇大论;^[17]它们不仅参与了



1967年2月1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新军电》创刊号(上海版)

《解放日报》事件、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反击经济主义风潮等运动的全过程，更在一系列大关节目上，做出了影响时局走势的举措，如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主持了上海工总司的建立；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率先在上海贴出了“刘××（指刘少奇）代表着中国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字报。正是立足这个角度来读解、来认识，可见此类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所作所为，完全秉承了中央文革的战略意图，执行了中央文革的政治路线。可见此类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上下贯通，南北呼应，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在上海的别动队。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在全国推广以后，中央文革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从纵容红卫兵冲杀造反到指示“革命师生一律返校”，举行“军政训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明确要求停止大串联，撤销各地红卫兵联络站。恰如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在《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告别上海人民》中所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行装，就要向新的战斗岗位进军了。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将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18]正是具有这般的意识和态度，其作为中央文革“别动队”的角色和定位，也促使必须不容置疑地表示响应，不容置疑地落实行动。2月17日，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率先发表《通告》，宣布自18日起撤销联络站。接着，2月28日，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表示“奉总部命令，即将全部离沪返校”；^[19]同日，



部分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发表《告别书》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发表《声明》，声称自3月5日起撤销联络站；3月6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发表《通告》，宣告《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停刊，自3月8日起撤销联络站；3月9日，新北大文革委、西军电文革临委会等13个驻沪联络站，在《文汇报》发表文章集体《向英雄的上海人民告别》。^[20]

与此同时，再查考工总司文献，可见在3月2日《砸烂红卫军指挥部的一小撮反革命头头，彻底解散非法的红卫军组织——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中，首都三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12个驻沪联络站，留下了最后的签名；在3月10日《揪出上海京剧院炮打中央“文革”罪魁祸首的联合通告》中，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则孤单地夹杂在工总司、红东北等众多的上海造反组织的名单里，扮演着遗留者的角色。如果说前者的签名还存有集体告别的含义，那么后者的“夹杂”则显得有点滑稽了。

就此，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撤离了，在工总司等上海造反组织的所有文献中，也从此消失了它们的踪影。自1966年10月下旬起，这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历经四个多月的“革命造反”，终于匆匆地演完了告别式。

注 释

- [1]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团的情况》1966年8月26日第36期：据8月25日统计，在市学联接待的352名串联学生中，有103人住在市团校。
- [2]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五》。
- [3] 同上。
- [4] 同上。
- [5] 同上。
- [6] 参见拙文《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的五个阶段》，《青年研究》2005年第9期，第

47页。

- [7] 据“华纺反映北京学生和本校少数派的两个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1966年9月18日第239号记录：“9·4事件”后，部分北京红卫兵才在华东纺织工学院设立了“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不久，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抵沪，“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即宣布撤销，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北大蓝某、北京机械学院蔡某某、姜某某等，及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清华陈某某参加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移交给了南下兵团。
- [8] 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资料：1966年9月10日，“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周恩来到会讲话。周特地对赴上海的南下兵团说：要做宣传队，不要做工作组，不要包办代替。同时提醒北京红卫兵，上海有国际朋友、海员、外国商人等。
- [9]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年11月6日第7期。
- [10]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年10月31日第4期。
- [11]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年11月9日第8期。
- [12]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年10月31日第4期。
- [13]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1966年11月9日第8期。
- [14] 1966年11月11日，《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联合给市委的报告》。
- [15] 同上。
- [16] 同上。
- [17]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主办《首都红卫兵》1967年1月1日上海版。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红旗》1967年1月24日。
- [18] 《首都红卫兵》1967年3月6日上海版第5期。
- [19] “向上海市革命群众告别”《文汇报》1967年2月28日。
- [20] “向英雄的上海人民告别”《文汇报》1967年3月9日。

附：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在上海工总司文献中出现情况一览表
(1966. 12. 3—1967. 3. 10)**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12月3日	《火线指挥部联合声明》	红卫兵北京市第三司令部
12月11日	《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挑战，彻底打倒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海报	北京市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航红旗战斗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12月12日	《第四号通令》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12月30日	《上海各造反派十二月三十日事件联合指挥部决议》	北航红旗战斗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月1日	《紧急通告》	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
1月3日	《联合声明》、《端正斗争大方向》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1月4日	《打倒上海市委大会重要通告》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1月4日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1月4日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红旗驻沪联络站、大连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1月5日	《最坚决地支持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解放日报〉的联合声明》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东北工学院反帝反修远征军驻沪联络站

(续表)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1月5日	《热烈欢迎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员返回厂参加生产》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月5日	《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1月7日	《联合声明》	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南下挺进纵队
1月9日	《紧急通告》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月12、13日	《联合紧急通令》、《特急补充通令》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月16日	《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首都一司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1月17日	《特急通告》	首都第三司令部
1月21日	《通告》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1月22日	《联合通告》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1月25日	《欢呼金山县万人大会的伟大胜利》	首都第三司令部
1月25日	《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大闹革命——紧急通告》	首都第三司令部、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月25日	《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月25日	《我们的调查》	首都红卫兵八一八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续表)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1月25日	《郑重声明——告全市人民书》	首都红卫兵八一八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1月28日	《就当前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有关问题的联合声明》	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驻沪联络站、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1月28日	《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紧急通告》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1月28日	《联合通告》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新北大驻沪联络站
1月28日	《联合紧急通令》	东北工学院反帝反修远征军驻沪联络站、内蒙古革命造反派司令部联合总部驻沪联络站、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驻沪联络站
1月29日	《紧急通告》	首都第三司令部、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
1月30日	《倡议书》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中央财政学院八八战斗队驻沪联络站、鞍钢红卫兵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武汉新华工总部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月30日	《联合声明——告上海人民书》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文革委员会驻沪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中央财政学院八八战斗队驻沪联络站、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驻沪联络站、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续表)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1月30日	《当前市场宣传要点》	中央财政学院八八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1月30日	《特急声明》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公社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南开大学卫东队驻沪联络站
2月1日	《热烈欢呼〈上海晚报〉又一次夺权》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2月2日	《“停刊”还是“夺权”》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2月2日	《关于保障公安机关档案资料安全的通令》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三司)、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机械学院东方公社驻沪联络站
2月3日	《紧急呼吁书》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2月3日	《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驻沪联络站
2月4日	《通告》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2月4日	《紧急呼吁》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2月5日	《郑重声明》	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红卫兵山东指挥部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续表)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2月7日	《联合声明》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2月9日	《关于街道里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通告》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八八)、新北大文革委员会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2月16日	《关于节约粮食的紧急倡议》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2月21日	《关于上海医务界夺权斗争的联合通告》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2月21日	《联合通告》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南京航空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南开大学卫东队驻沪联络站
2月22日	《紧急通令》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红卫兵山东指挥部驻沪联络站
2月23日	《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问题的通告》	新北大文革委员会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2月25日	《严正声明》	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驻沪联络站
2月27日	《“支农司”一小撮人罪责难逃》	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驻沪联络站
3月2日	《联合声明》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驻沪联络站

(续表)

日期	文件名称	驻沪联络站
3月2日	《砸烂红卫军指挥部的一小撮反革命头头，彻底解散非法的红卫军组织——告全市人民书和红卫军战士书》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文革委员会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公社驻沪联络站、中国人民大学红旗驻沪联络站、北京大学“战上海”兵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驻沪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3月10日	《揪出上海京剧院炮打中央“文革”的罪魁祸首——联合通告》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资料来源：1967年7月，工总司办公室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第一、第二册。

说明：1. 该表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参与上海工总司活动的记录（以形成文献为准）。2.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独立的活动，参与其他造反组织的活动均不在此记录中。3. 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在文献中的称谓和位序，按原始状态记录。

第九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服饰演变

一、标树崇“武”的审美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 1949—1976》记载：1966 年 8 月 18 日，“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1]即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接见中，北师大附中一女生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俨然成了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2]当时，两人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即席对话，8 月 20 日《光明日报》载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作了披露：

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8 月 22 日，这段关于“要武”的对话便通过新华社电讯稿刊登在全国的报刊上，并富有喻义地统一配发了《解放军报》记者的现场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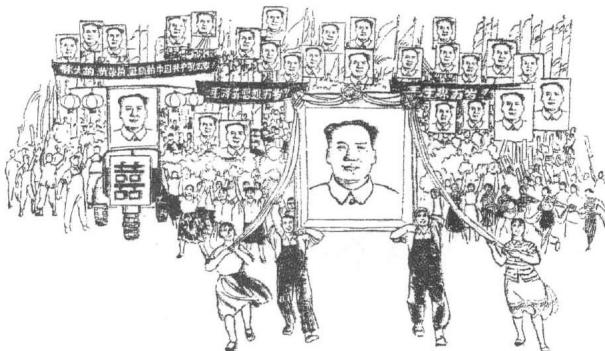
描画：一位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肩挎语录包的红卫兵正指挥着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见图一）。由此，从领袖到群众，从统帅到卫兵，“要武”的精神通过一身军装抖擞起来，显发起来。一身军装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份认同和标识；成了向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姿态和象征，以致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向往着它，追慕着它。确实，一身军装是飒爽而威风的，它显现出的崇“武”的审美，在内涵上、在形貌上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



(图一)

然而，这种崇“武”的审美在上海流行起来是慢了些节拍的。殊不知，“文革”爆发时的6月上旬，上海服装鞋帽公司还举办过“春夏季新花色品种展览会”，尽管被指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终究是五彩缤纷，仪态万方。^[3]8月下旬，中国出口服装交易会又在上海开幕，据报道海内外商人云集，交易额大幅攀升。^[4]即便是在8月19日，为欢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上海百万群众举行浩浩荡荡的集会游行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配发的整版

照片和现场速写图中，仍未见“一身军装”的身影，有的是白衬衫、蓝裤子，甚至是花衬衫、花裙子（见图二）。在此，北京与上海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趣和倾向显现出了差异，其中除了存有这两座城市文脉之间交错的缘由外，更与这两座城市红卫兵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相关。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中心，是策源地；上海则是追随和响应。所以，以“一身军装”为特征的红卫兵装束必然在北京登台和发飙，必然在开展“破四旧”以前就风靡起来；而上海则是通过“破四旧”，通过翦除大街上的奇装异服，再进一步，则是通过“大串联”，通过满街南下的“一身军装”的北京红卫兵，来领悟这“一身军装”的风姿和意味的。



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胜利前进

（图二）

终于，“一身军装”在上海流行起来了，不仅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穿着它，工人造反派们、财贸造反派们，甚至机关造反派们也都有人穿着它（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回沪时也经常穿着它）。倒是在上海被称为“徐老三”的徐景贤似乎没有穿过军装）。查阅 1966 年岁末和 1967 年年初上海的影像资料，可见这种“一身军装”的打扮，已成为游行队伍、批判会场和宣传舞台的主要形象了。然而，或许上海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大院，军装来源的渠道并不宽敞；或许上海市民的潜意识中先天性地留存着抗拒“要武”的情致，一种温润典雅的生活意趣仍挥之

不去,以至“一身军装”在上海的流行,主要是集中在红卫兵和各类造反派的骨干队伍中(包括许多“小分队”的演出人员中),而没有成为群众性的集体衣装。

那么,群众性的集体衣装呈现出了怎样的样态呢?这是否可以说上海的“破四旧”运动没有起到荡涤的作用?!

其实,上海的“破四旧”运动是相当激烈的,南京路、淮海路上的老介福、协大祥、蓝棠皮鞋店等均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查封,以

至长期以来“服装鞋帽的传统工艺和时新款式被禁止生产”;“商店只能销售蓝、黑、灰‘老三色’的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类似军队服装),人们称之为‘老三装’”;“鞋店不准出售尖、扁、翘、窄的男女皮鞋,只准出售‘大众化’的‘工农式皮鞋’”;“针棉织品的传统花色品种因带有‘封资修’而受到批判,不能上市供应,毛线色谱从 72 种减至 20 种”;全市时装店统统改为“男、女、童装综合经营”。^[5]由此可见,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前期,一方面是“一身军装”的威武和神采,一方面是“千人一面”的灰暗和简便(见图三)。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比配,即前者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后者又迎合“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簇拥着前者的卓立——这里既有理念的批判,更有行动的批判。这里的崇“武”的审美既是一种标树,更是一种泯灭。



上海红卫兵刘德保(刘德保先生现为上海红色收藏家,此身军装是他被选为大串联代表赴京时,向邻居一复员军人商借的)



在“一身军装”的威武背后是“千人一面”的灰暗

(图 3)

二、悄悄启动的消解和蜕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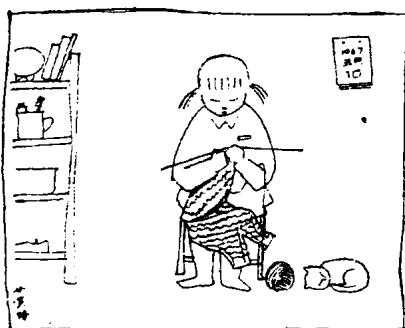
1967年6月8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以“生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抓手，举行全市电视实况转播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指认陈、曹等当权派是“推行奇装异服的吹鼓手”，是“从生活领域打开缺口，妄图复辟资本主义”。^[6]固然，这是大会的主题和要旨，如此规模的揭批和声张无非是要达到诬陷的目的。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就在这驳杂的批判中，有一种声音却在竭力地提醒和强调：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然而,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因为“目前,社会上的流氓阿飞一反往常,提前两个月出来活动,破坏社会风气”。^[7]

洵属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刚刚展开一年的光景,这边“破四旧”的呐喊还没有停息,那边“三包一尖”就已故态复萌——确实,一些被称为“流氓阿飞”的人开始公然挑衅“革命”,他们被描述成“叼着香烟,哼着小调,穿着怪装”,三三两两地招摇过市。其实,还有更多被称为“逍遥派”的人正躲避着“革命”(见图四),她们织起了毛线,裁起了衣裳,甚至连在校的大学女生也“热衷于搞女工,如绣花等。据说复旦有的女生自己手工做人造革背包。

海运学院为便利外地同学缝补,系里置有缝纫机,一度刮起‘裁衣风’。财经学院的人听到这些消息都很羡慕”。^[8]在此,如果说挑衅“革命”的人是对崇“武”审美的反叛,那么躲避“革命”的人则是对崇“武”审美的疏远。反叛者,尖锐一些,荒诞一些;疏远者,委婉一些,平和一些,终究都是对“一身军装”的抗拒,终究都是对“千人一面”的鄙弃。

1968年7月16日,新华社供全国各报刊统发稿《苏修堕落,美帝喝彩——苏联阿飞服装在美展出博得大老板欢心》称:在华盛顿举办的“苏联时装设计展览会”中,有模仿西方瘦腿裤和超短裙设计的“宇宙世纪”装、“革新”装等;有沙皇时代的“俄罗斯贵族”式等,这说明今日苏修在“整个生活方式,甚至衣着上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



精工细作“促生产”。
“生产能手”谁人夸?

(图四)

‘时髦’”，“从灵魂到躯壳都已腐烂透顶”。^[9]显然，这篇官方报道客观地描绘了一套国际时装的流行标本，因为同时赋予它“复旧”、“西方化”的政治蕴涵，也就借此比照和证实：只有中国式的崇“武”的审美，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品质，而这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指向——但是，对广大“生活着”的市民群众来说，尤其对“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市民群众来说，谁能说类似的消息不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心弦呢？不会诱惑一部分人去尝试呢？曾记得一部批判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一部纪念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引得多少观众贪婪地观看其中的大厦、小车、衣装和舞蹈。因为此时已进行了二三年的“文化革命”，终究抹去了人们的生活色彩，窒息了人们的生活情趣；终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美好的希望，人们怎能不像前述中的反叛者和疏远者而有所反应、有所表达、有所动作呢！

因之，恰是在 1967 年至 1968 年间，即以“一身军装”为典范的崇“武”的审美正处于风光之时；以“千人一面”的着装模式已基本定型之时，一种从社会底层、从社会内部分蘖出的审美取向萌生了，且悄悄地流播着、漫溢着，不仅构成了民间的喜好和渴望，更表达着民间的情感和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审美取向开始消解起崇“武”的审美；崇“武”的审美则在这种消解中渐渐地发生着蜕变。

三、“一身军装”的变形

这种消解和蜕变大致是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和所谓“奇装异服”三个方面展开的。

先看“一身军装”。

实事求是地说，以“一身军装”为标志的崇“武”的审美，尽管也曾受到某种程度的藐视和抵御，毕竟因为其属“文革”运动者的身份符

号,属“文革”路线的外在形貌的表达和显现,即毕竟在服饰的象征意义上处于主流和强势的位置,所以,直至“文革”运动中后期,尤其是在“批林批孔”、“反潮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仍然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和追捧。只是在上海,这“一身军装”的装束如前述中提及的原因,多是在激进的骨干分子、积极分子中流行,并未真正地普及于广大的群众。即便 1968—1970 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时,当局曾为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的上海知青配发军棉袄、军大衣等,那也是为了张扬“走革命之路”的身份认同,为了标树“战天斗地、屯垦戍边”的精神气象,只是这些棉袄、大衣等或许是已废弃的旧制式;或许是非军用的代用品,即将布料染上类似军装的草绿色。只是不少知青在出发前,就已将这类肥大的“一身军装”作了收腰、衬领等改动。以后,在“学军”、“拉练”等活动中,也有一些青少年(称谓“后期红卫兵”、“红小兵”)裁制并穿着此类的假军装。

如果说这些变化有些空泛,有些滑稽,在风格上尚属“文革”初期崇“武”审美的延续,那么,“一身军装”的真正蜕变是发生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革军”、“革干”子弟。这类人的家里有穿不完的军装,但因为 1966 年以后干部家庭多少会受到运动的冲击,他们的“一身军装”一般也就不表示参与“文革”运动的态度,而是为了怀旧式地向社会显露出身和身份,有的甚至从箱底里翻出父辈的将校呢军服套在身上,既抒发心中的情绪,又迎合小市民的倾慕。此时,有意味的是这类人的“一身军装”已换去了“战斗式”的军鞋,先是北京产的灯芯绒松紧鞋,以示摇晃逍遥的神态;后是上海产的高帮白色回力鞋(8 元一双,可抵一市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再配上一辆 13 型的双铃锰钢自行车(180 多元一辆,可抵一青工半年多的工资),以显摆虚荣和骄矜。

另一类是所谓有“流飞”习气的小青年。这类人的军装来之不

易,有军官装,更多的是士兵装。他们只着上装,即上装是军装,以贴近崇“武”的审美主题;不着下装,即下装是黑杆裤、黄包裤之类,以表达反叛的审美取向。同时,他们一定戴军帽,但一定不是端端正正地戴,要么把四周的帽檐高高地托起,要么掐出几个尖角,甚至还有直直地撑起前帽檐,摹仿电影中国国民党军官大盖帽式样的。由此,“一身军装”的崇“武”的审美发生了蜕变,但这种蜕变的轨迹不是走向它的对立面,而是本身的失真和变态——以至“革命”和“战斗”的意味,被一种浮华、一种荒诞所浸染、所取代。

四、化解“千人一面”

再看“千人一面”。

应该承认,是1966年8月“一身军装”的标树,才导致了往后“千人一面”的沉闷,即“千人一面”是被“要武”的行动扫荡出来的。于是,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没有资格、没有心愿,以“一身军装”的打扮来炫示崇“武”的审美时,就只能“千人一面”了。于是,面对“千人一面”的局面,有人口服心服,便自觉地认同和归顺;有人口服心不服,便默默地等待和忍耐;甚至有人口服心也不服的,便只能在私下里抱怨和愤懑了。这就是说,一方面“千人一面”是被强力凝固的;另一方面“千人一面”的内部也存在着垮塌的构造——其中既有人心的背离,又有纺织业的促进。

也许,上海人天然地与崇“武”的审美存在隔膜。所以,即便是在动荡的“革命”中,以及在由这种“革命”催生的“千人一面”的景况中,上海人仍然经典地通过变换“领袖”的色彩和式样(如戴绒线领圈等),通过改换“三围”的尺寸,点缀着、修饰着自身的装束,从而使蓝、黑、灰的“老三色”,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的“老三装”变得清丽一

些，俏巧一些（在这方面，当年许多上海女知青通过变换不同花式的“节约领”，通过为旧毛衣缝接上新袖子，每每为“革命”的衣装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曾引得北京、哈尔滨等地知青们的啧啧称羡）。



“文革”前期的上海中学红卫兵（老三届），在校园里跳“革命舞蹈”时，穿着白衬衫、蓝长裤（徐建刚提供）



“文革”后期的上海中学红卫兵，在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时，穿着白衬衫、花裙子

如果说上海人的这种集体心理认同和聪明创意，是解构“千人一面”的主观要素，那么，上海化纤产业在六七十年代的飞跃发展，则为这种解构提供了客观的支持和保证。据《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记

载：1966—1967年，上海自生产棉/维棉毛衫裤、羊毛/腈纶中粗毛线开始，至1970年后，化纤绒衫裤、弹力锦纶衫裤、针织腈纶薄绒运动服、腈纶围巾、纬编色织涤纶女式两用衫、薄型经编男衬衫、竹节绒、圈圈绒、棒针绒等毛/腈及纯腈纶毛线等花色品种，还有涤毛粘三合一花呢、涤毛凉爽呢、华达呢以及涤丝纺、特纶绉、尼丝纺、星纹绉、华春纺等合纤印花绸均通过试制试销投入市场。这些化纤混纺织品有的滑爽挺括，有的丰满柔软，且色泽鲜艳，手感好，牢度强，又因少收（甚至不收）布票，深受消费者欢迎，成为大众化的热销商品（见图五）。此处，引用一条骇人听闻的史料以为证实：1968年8月18日（恰巧是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两周年），南京西路红缨服装店出售的确凉时，曾因争购，人多拥挤，橱窗玻璃被挤倒，造成1死6伤的严重事故。^[10]正是此类产品的供销具有这般的势头，据统计，1965年至1967年上海年均销售化纤布6135万米，1968年至1974年年均销售达12356.43米；上海1978年销售的化纤针织品总额比1966年增长87.5%。^[11]



上海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是解构“千人一面”的客观动力

（图五）

由此可见,正是在“文革”十年间,上海的纺织服装行业完成了升级换代——尽管它表现在技术产品方面,但它的质地、色泽以及各种适宜的样式(如棒针绒、凉爽呢等),恰恰迎合了人们消解“千人一面”的意愿,满足着人们享受生活的渴求,丰富并美化起人们的穿着——按照毛泽东“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说法,此处的“美化”(即“红装”)虽然没有直接挑战“一身军装”式的崇“武”的审美,但它强力针对“千人一面”的灰暗,在广大的人群中显扬大方、明朗和亮丽的审美风格,确实在瓦解托举崇“武”审美的基础。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千人一面”压缩着人性的丰富性,只能流布于某个特异的时段。它的审美形态的死寂,必然随着“文革”运动走向中后期,随着人性丰富性的复苏而走向本质的死寂。

五、“江青服”在上海

在论及“千人一面”的主题时,必需提及“江青服”。1973年9月12日,江青在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出人意料地穿了一套仿古连衫裙,在崇“武”的审美氛围中,令国人惊诧。原来这是江青召集有关人员参照“唐宋以来各朝代宫女服”设计的“开襟领裙衣”,^[12]并声称是所谓“国服”(有评论认为江青推行“国服”,如同她指使“梁效”吹捧吕后一样,是“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前奏曲”)。

接着,1974年江青趁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自上而下地推进“服装革命”,公开号召“女干部、女党员、女团员带头穿,女同志都要穿”。^[13]于是,上海纺织局拨出专料,各大服装店照样复制,9月4日集体性地陈列在市区大型百货店、服装店的橱窗中,以显声势。1975年1月,江青又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指示各级党政机构“要告诉群众连衫裙是民族服装”。^[14]4月,市服装公司广泛印发《开襟领连衫裙介绍》材料,

既趁春夏换装之机宣传动员，又强调“江青服”的造型和式样应严格掌握，例如“规定开襟领连衫裙裙长应在膝盖以下三寸”等。^[15]

殊不知，这种“开襟领裙衣”一件用料九尺，上古（和尚领）下洋（百褶裙），领子有五层之多，外形蓬松肥硕，穿着闷热拖沓，既没有“武装”的飒爽；又没有“红装”的妖娆。尽管后来各照相店均奉上级指示展示“江青服”的大幅照片，各布店也开设“江青服”剪裁专柜，仍问津者寥寥。据统计，全市原计划生产“江青服”8万件，后一减再减，实际投产1.8万件，仅售出2000件，且多为文艺团体购买作了演出服。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服装业职工从仓库里翻出积压的“江青服”1.6万件，“江青衫”（开襟领衬衫）3万多件，“浪费各类纺织品原料20多万尺，损失资金达40余万元”。^[16]



江青服

与此同时,大街上却时时浮现出经改装的开襟领连衫裙,据内刊《文汇情况》报告:“在淮海中路见到一青年妇女穿一套花的确凉套装,不仅上身领口没了白衬领,下面的裙子也改成紧包臀部的旗袍裙式样”,还有“娃娃领连衫裙、西装领连衫裙、一字领连衫裙以及长方领样的连衫裙都穿出来了,长度一般都在齐膝盖和膝盖以上二三寸”。^[17]1975年夏季的上海,推广了近两年的“江青服”非但没有流行,一些女青年反而通过改装“江青服”,在大街上斗胆地显露身姿和风情了。固然,此中有“江青服”翻版宫廷古装其笼罩的式样缺乏起码的审美要素等缘由,但最根本还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是企图推广“国服”的“千人一面”。因之,这种从形态到本质的压抑感,违忤了民众在服饰方面由内(情趣)而外(款式)的审美选择,怎能不受到民众的唾弃呢!

六、所谓“奇装异服”

最后看所谓“奇装异服”。

从前文中已知,1966年至1968年,当“一身军装”的崇“武”的审美伴随着“千人一面”的灰暗定格为这座城市的流行色时,其消解和蜕变的因素也同时从内部滋长起来了。此中,除了“一身军装”自身的变异和民众追求大方、明朗之美,有一部分青年人索性公开以或浪漫、或风流、或倜傥、或荒诞,甚至以颓靡、低俗的着装风格招摇过市。

就此,查阅上海1969年至1976年的报刊,可见在数十篇批判“奇装异服”的文章中,出现了一连串惹眼的名词,如1969年时的“馄饨领”、“烧卖领”、“黑包袱”、“荷兰皮鞋”,以及蓬松的“中面积”、散乱的“云鬓”、“男子烫发”、“螺丝头”等;1970年时的“火箭皮鞋”、“八字胡”、“翻领照”、“纱巾照”、“墨镜照”以及“阿飞头”、“小包头”、“日本

式”、“高、松、蓬、塌、钩”的发型等;1971年时的“阔卷边”、“连腰头”、“尼姑鞋”、“男青年穿女式皮鞋”、“一边倒”的发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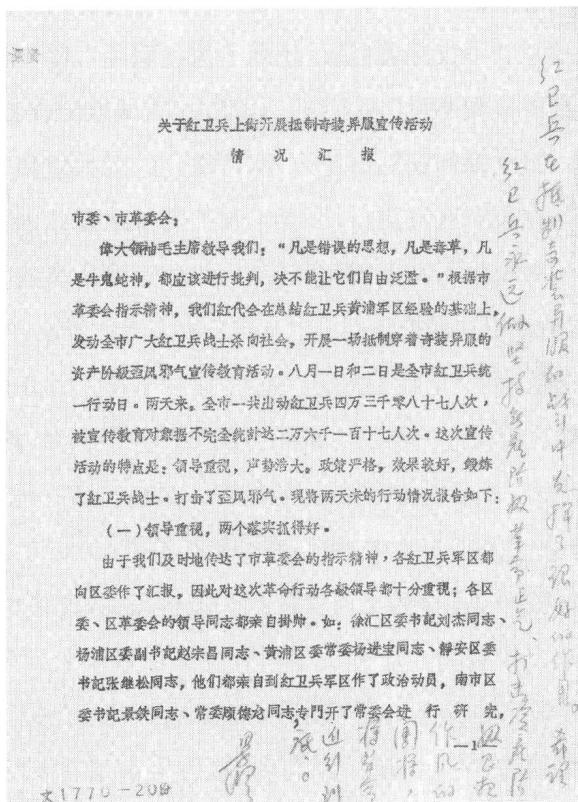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又见到一系列以“阶级斗争新动向”、“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争夺青年一代”、“否定红卫兵功勋”为主调的言论,叱责“生活小事”论、“无权干涉”论、“无益无害”论、“各人所爱”论、“多看习惯”论、“群众喜欢”论、“限制过严”论、“管得宽”论、“管不了”论、“大惊小怪”论、“柜台和平”论、“小题大做”论等。令人感叹的是还可看到一幕幕大批判的场景,如举办“专题学习班”、“现场批斗会”、“红哨兵活动”;在店堂里贴出大字报、小评论。更有甚者,一些单位在门口用啤酒瓶来度量青年职工裤脚管的大小(即将啤酒瓶倒过来,插塞被检查者的裤脚管,插塞得进是大裤脚管,插塞不进则属小裤脚管);一些单位叫来校外红卫兵对所谓“奇装异服”者采取“强迫行动”等。^[18]

1971年8月1—2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突击出动红卫兵43 087人次,并配以上海民兵2 386人次和市、区服装公司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大街上开展了“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教育活动(称“红卫兵统一行动日”)。徐汇、杨浦、黄浦、南市等区委领导亲自作战前动员,各校红卫兵团成立了由干部、工宣队员参加的领导小组。两天的统一行动时间于下午4时至9时(分两班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多名红卫兵、数名上海民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做到定时、定点、定人。统一行动在每个宣传点上拉起横幅,装起扩音器,宣传车则沿马路巡逻叫喊,以壮威势,“广大群众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辆上都议论纷纷”,“而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也不敢神气活现地在马路上招摇过市,知道红卫兵上街就偷偷地溜掉了”。^[19]

这次统一行动强调“论理教育”、“掌握政策”、“坚持‘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穿着一件奇装异服的人,一般采用个别说服;对全身奇装异服、态度尚好的人,一般采用集体

帮助；对态度恶劣的人，则针锋相对地召开“现场批判会”，例如云南路电话局一职工“不仅穿着怪服，还画了棕色眉毛”，静安区的红卫兵当场“把她批得狼狈不堪”。^[20]统一行动中，有诚恳配合者，一小学女教师经教育后，立即回家拆下花边领，再送到红卫兵宣传现场。也有牢骚满腹者，在长宁区宣传点，一青年女工挑衅地说：“因为布票发得少，所以裙子做得短”；在黄浦区宣传点，两个穿着奇装的女青年被教育后，提出“请红卫兵保护我们上电车”；个别人咆哮着说：“红卫兵怎么样，就好吃人啦，不要用红卫兵这块金字招牌来压人”；在南市区宣传点，甚至发生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被殴打的事件。^[21]同时，该份《情况汇报》还披露了统一行动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如有的红卫兵上岗时不佩戴像章和臂章，执行任务时吃棒冰；有的精神不振作，战斗力不强，见到奇装异服者畏葸不前；个别上海女民兵头戴柳条帽，身穿小包袖，下穿短裙子，造成工作被动。还有长宁区红卫兵在西郊公园发现两名海军官兵带的女朋友“穿着十分奇特”；虹口区红卫兵在提篮桥发现一名民警的女朋友“也十分‘飞’”，红卫兵上前教育时，均受到抵制等。^[22]

1971年夏季的红卫兵统一行动日不是偶然的，它在渊源上属于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延续，属于整个“文革”政治路线的延续。但就其规模、情状和态势而言，终究不是1966年的狂飙突进和摧枯拉朽了。更为重要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已不是1966年时面对着的——由所谓“十里洋场”、“摩登时代”和“封资修”孕育着、庇护着的——而是经过1966年“革命”、“造反”的扫荡和切断之后，重新萌生着、滋长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年以后出现的“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就既是对1966年前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又是对1966年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的摈除和反叛。值得一提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多为青年人，1966年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或



1971年8月，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关于红卫兵上街开展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活动情况汇报》原件

许是扫荡者、或许是旁观者，1971年时已赫然成为“奇装异服”者，甚至炫弄起落拓不羁、浪漫浮艳的姿态了。其实，这种服饰流行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外在的信号，它表明社会内在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涌动着。

1972年7月，市红代会再次向市委、市革委会提交《关于组织红卫兵上街宣传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请示报告》，《报告》针对社会上“穿超短裙的也出现了”的情况，请求批准红卫兵7月29—30日上街行动，但这个请求似乎没有着落。1973年1月，轻工业局团代会向市团代会筹备组反映：一些女青年开始烫发，有的“排了六个小时

队”,并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23]同年在上海报刊中出现的相关名词有:“大尖领”、“大贴袋”、“大纽扣”、“女式透明尼龙衬衫”、“男式大格子府绸衬衫”、“上装又长又阔又大,裤子又短又包又小”、“喇叭裤”、“波浪型发式”等。宣传教育活动则有“民兵小分队巡游公共场所”、“组织归口管理的裁缝、鞋匠集中学习”等。1974年1月,上海的团员、红卫兵、红小兵又组织了大批的宣传队,敲锣打鼓,抬着黑板报,演着活报剧,深入街道里弄宣传破“四旧”、立“四新”。^[24]这当儿,有关部门迅速下达指示,要求“不要搞劝说”、“不要刷大标语”、“不要集中搞十天”,而应“经常地深入里弄,进行正面宣传”,^[25]结果弄出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从1966年红卫兵上街剪碎奇装异服,赢来片片喝彩,到1971年红卫兵上街抵制奇装异服,遭遇种种反弹。再从1972年红代会申请上街行动没有下文,到1974年春节前夕团员、红卫兵大张旗鼓地深入里弄被紧急劝止,此中的轨迹线似乎越来越下滑,越来越低垂。难道是“文革”的路线发生了改变?难道是社会的控制有所松懈?事实上,“文革”路线在上海是一以贯之的,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特别严密和精细的。具体表现在服饰流行方面,尽管其方法有所改变,手段有所缓和,以“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宣传和行动,却从未停息过。至于主管方面显得越来越无奈,所采取的措施显得越来越无效,恰是因为越是到“文革”的中后期,由“文革”初期标树的“一身军装”和“千人一面”的取向,越是暴露出其独尊“武装”,泯没“红装”——以崇“武”的审美熄灭万紫千红的要害——是违背生活至理、人性至理的。正是跌陷在这个漩涡中,主管方面越是上纲上线,越是采取管束和压制的行动,就越是会在群众中引出抱怨和抵触的情绪,甚至越是会引出一波波新的“奇装异服”的潮流。

请看1975年和1976年的事实:

1975年7月19日下午,市服装鞋帽公司为建议有关组织“拟可开展一次抵制奇装异服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和西藏路设岗,对上海女性的着装情况作观察记录。据报告,约两小时内上述地段共有1095位穿裙子,裙长超过膝盖的204条,占19%;齐膝盖的102条,占10%;膝盖以上一二寸的580条,占55%;膝盖以上三四寸甚至五六寸的超短裙169条,占16%(1973年时,该公司也曾作过类似的调查,超短裙占总数的2%~3%)。1975年的超短裙有的“无叉、无裥,紧紧包住臀部”;有的则是做工考究的“隐裥、细裥、切细线”的式样。被称作“怪式样”的还有“领面狭长,领口开在颈项以下五寸”的长方领衬衫;领头“大而张开,再镶上六七市分阔尼龙花边”的猪耳朵衬衫。观察者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穿长方领的有30人,猪耳朵领的有16人,穿前胸绣花、小包袖衬衫的有42人等。^[26]

无独有偶,1976年7月,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豫园、南京路、人民广场、淮海中路等闹市地段设点观察。据报告:在中百一店门口“仅15分钟内,就有40多个穿奇装异服、理怪发型的人走过”,且1976年的“奇装异服”有四个特点:一、“长”,即衬衫包住臀部;二、“尖”,如“燕尾领”、“大尖角领”;三、“露”,即穿着“薄型透明衬衫,内系深色胸罩”;四、“艳”,如一身“深咖啡、深蓝色”的衣服等。另外,“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南京东路外滩,在二百米的距离中就有六百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其中将近二百对“动作不正常”。^[27]

1975—1976年的这两份观察报告,记录的是大街上的“奇装异服”,指对的是背地里的“阶级斗争”。这种将两者串联起来的思路和行动,不仅牵强附会,骇人听闻,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它一方面说明了这种政治指对的虚妄和脆弱,二方面也证实了“奇装异服”确实

蓬蓬勃勃。应该承认,这些“奇装异服”中确有些许是不拘形迹,放浪轻佻的;但更大多数的是在展示身姿之美、形态之美。它们共同面对着“一身军装”和“千人一面”的苍白(包括对由此衍生的“性禁忌”的抗争),又共同承受着“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政治指对。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以玩世不恭、夸诞不羁的行径调侃着对方;后者是以创造生活、创造美丽的姿态消融着对方。正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摩擦中、进退中,崇“武”的审美以及伴随着的“千人一面”,渐渐地发生着蜕变,渐渐地走向了反面。

再联想到以上的两份观察报告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夕的事实,难道不能从中——民众生活情趣之变化、审美理念之变化,以及社会心态之变化中——看出一些预示,看出一些征兆吗!

本文补记:〔28〕

在此,还必需提及“线衫、线裤”、“大翻领”的装束,那就是将专业运动员的运动服装变换为青少年的流行,比如春秋季节上身着运动线衫,冬季着厚绒翻领衫,若穿着外套便将层层领头翻出,有的还形成二三种颜色的搭配。下身则将线裤的裤脚露在罩裤的外面,故意给外界一个明亮的关注点。固然,运动服式样精神,色彩多样,能显扬青春的蓬勃和飒爽,与“文化大革命”突出“运动”的基调也存在着某种意喻的暗合。如果说这还只是外在的和形貌上的缘由,那么,“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造反派,身着各式运动服装,在上海的“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威风凛凛(“上体司”不仅参与各种事件,还在全市开展所谓打击“流飞”活动,震慑四方),以致成为革命造反的先锋,成为众多青少年称羡的一群,应是内在的缘由。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革”时期“线衫、线裤”、“大翻领”等运动装束的流行,一定程度是对崇“武”审美观的认同,而在效果上,则既是对“一身军装”的补充,又是对“千人一面”的搅扰。

注 释

-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1434 页。
- [2] 《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9 日。
- [3] 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 页。
- [4] 王祖康：《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03 页。
- [5] 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5、224、133、216 页。
- [6] 《大会专刊》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10 期。
- [7] “把移风易俗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解放日报》1967 年 6 月 9 日。
- [8] 《文教卫生简报》1967 年 10 月 6 日第 104 期。
- [9] 《解放日报》1968 年 7 月 17 日。
- [10] 史济良：《静安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 页。
- [11] 由月东：《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5、134 页。
- [12] 同上书，第 216 页。
- [13] “从所谓‘国服’看江青的政治野心”《文汇报》1976 年 11 月 29 日。
- [14] 同上。
- [15] “目前本市奇装异服有所蔓延”文汇报党委办公室《文汇情况》1975 年 7 月 29 日第 484 期。
- [16] “从所谓‘国服’看江青的政治野心”《文汇报》1976 年 11 月 29 日。
- [17] “目前本市奇装异服有所蔓延”文汇报党委办公室《文汇情况》1975 年 7 月 29 日第 484 期。
- [18] 《工人造反报》1970 年 2 月 15 日。
- [19] 1971 年 8 月 3 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关于红卫兵上街开展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活动情况汇报》第 4 页。
- [20] 同上，第 3 页。
- [21] 同上，第 6 页。
- [22] 1971 年 8 月 3 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关于红卫兵上街开展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活动情况汇报》第 6 页。
- [23] “团员、青年对烫发的反映”《团的情况》1973 年 1 月 20 日第 6 期。

- [24] “向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起一次新的进攻”《文汇报》1974年1月17日。
- [25] 《团市委电话记录稿》1974年1月9日。
- [26] “目前本市奇装异服有所蔓延”文汇报党委办公室《文汇报情况》1975年7月29日第484期。
- [27] 1976年7月28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
- [28] 2006年5月,笔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该专题的学术报告,社科院图书馆馆长吴刚先生提出,本文遗漏了“线衫、线裤”、“大翻领”的内容。吴刚馆长的意见千真万确,特此补记。

附一：

毛主席语录

几十年艰苦奋斗如一日

上海确变啦！

—

听说上海变了，风貌变了，一直是耳闻，今天算见了。

上海变啦！上海确变啦！！

天气极好，净蓝一片的高空，温煦的阳光洒满了街市，和风暖洋洋地拂面而去。郊外的开旷使我们神怡地蹬快了车子。山阴路一转弯，像卷进了山峡，一切激越了，一切也迟滞了。

我和小本观光的眼睛，便落在两旁的人堆里，按照耳闻的线索，寻找变异的特征。

二

倏忽，我感到不能写了，它很可能误会，简写算了。

我看许多油头，烫花的、卷波的、慵散的、箍紧的……我要抨击它们；我看许多奇服，无领的、蛇腰的、打褶的、包腿的……我也要抨击它们（都有名称，尽管说不出）。它们有损于社会的尊严，有损于民族的尊严，把我们著称于世的中华风格扔到哪里去了？在外滩，我看一个裤腿瘦到半膝的摩登女郎（在这里，我敢用这般风靡的词作为义愤），居然夹在三个颠簸而行的男人中间骚艳地笑；在南京路，两个狮面女人因为打扮娇媚，成了千万双眼睛瞄准的对象，恬不知耻，还洋洋自得。尼姑鞋也套上了脚，表示什么呢？洁正吗？无疑是最大的不要脸（卖？）……这是一种错误（什么错误，我不讲），反正不允许歪俗的癌细胞留在我们美好社会的肌肤里作怪，要挖剔它们（其

实,我应该用最激烈的词句去鞭挞这般人)。

当然,我看到更多的好人,美人。他(她)们朴实的装束,开朗的笑容,给我带来了慰藉。他(她)们肯定来自首都,是北京的光荣,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要告诉你们,我在南京路上还看到了当年八路军的形象(其实,我应该用最精湛的词句去颂赞他们)……

我被裹旋在这个油光黑亮的波流里,看一眼自己寒酸的装束(不用描写),心碎了。啊!我却成了点缀。大革命过去啦!变得太快啦!伤心、痛心、悲心,俭朴不会被埋葬吧?!

三

我想把这些都组织起来,好好成立一篇东西。但是,反作用力在制止我的笔——只能这么寥寥划几笔,归纳一下了。

许多次想记这样的杂感,都没能成功,这次算是成功了。真是怪事,创作心理这个东西啊!

72.3.10 晚上

说明:以上文字为笔者三十多年前的杂记。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旧文中翻找出来,觉得颇有史料的意义,原文照录,留存于此。至于文中所记“我感到不能写了,它很可能误会,简写算了”、“什么错误,我不讲”、“反作用力在制止我的笔”等,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革命过去啦!变得太快啦!伤心、痛心、悲心,俭朴不会被埋葬吧?!”可否构成注释?百般寻思,已完全记不清,说不明白了。至于文中表露出笔者当时的精神意象,今天读来有点汗颜。但三十多年后,笔者以《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为论题,评说上海“文革”服饰的变化,其间能否描绘出某种心灵密码的勾联和叠印呢?那就权当一份心灵史的资料吧!

附二：**领与袖的红色风情(文摘)**

经过最高领袖检阅的北京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下，开始全面南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在大街上拦截那些衣着时髦的人士，当场修剪他们的头发和衣裤，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街头暴力，一个被剪了头发的女人在高声叫骂，近乎歇斯底里，红卫兵开始痛殴她，而警察则不知去向。围观的路人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而另一派则在抨击红卫兵的粗暴行为。但资产阶级时尚最终还是遭到了彻底铲除。

第一支开进我们弄堂的，是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混合编队，大约三十人左右，乘坐解放牌卡车，俨然希特勒的党卫军。他们的清一色军装、鲜艳的红色袖章和严肃的表情，就是政治正确的标志。这是伟大的象征性时刻，革命终于降临了我的家园。

我对父母的最大怨恨，就是他们无法为我搞到军装。后来我自己用一只玩具狗从小朋友那里换来了一套军装上的纽扣，包括五粒大扣和两粒上衣袋的小扣。它们是一种半圆形的赭色塑胶物，正面是“八一”的阳纹，背面是坚硬的铜丝扣环。母亲把它们连夜缝到我的蓝色中山装上。这是公然用军扣伪造的制服，从此我无限自豪地加入了革命的队列。两年后，母亲又从商店里为我买了一条仿制军用皮带和一双军用胶鞋。我还曾搞到过一顶软檐军帽，但不久就被飞车党抢走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军帽，然后用每顶两块钱的价格卖给跟我一样的小孩。

然而，像我这样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拥有真正的军装及其正统造型。徐汇区的干部子弟，在1971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帮会。他们到处寻

衅滋事，向“下只角”（贫民区）的流氓群体示威。但他们最令人惊异的却并非群殴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前卫装备。他们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那样武装了自己：每人一辆轻便自行车，车把上安装着最时髦的双铃，身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腰扎军用皮带，脚穿黑色灯芯绒面的北京懒鞋，斜挎着军用书包，里面藏匿着锋利的菜刀。他们还说一种发音古怪的上海官话（我长大了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行政方言），藉此作为彼此辨认的标识。他们出动时通常有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停按动清脆的双铃，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种甚嚣尘上的气势，令所有的路人都目瞪口呆。

军装狂潮开始逐渐消退，但那些卖春的“拉三”（上海人对卖淫少女的称谓，来自英语“lassie”，原意为少女），却是女式军便装的最忠实的粉丝。我家隔壁有一位“拉三”，每天穿着军便装从窗下走过，扭动着与其16岁年龄完全不符的硕胸和肥臀，而我和伙伴们则在楼上窗口窃笑和吐口水。她有时不予理睬，有时却抬头向我们伸出中指骂道：小赤佬有种下来？不过侬还是先摸摸自家的卵泡，看长毛了没有！说罢，表情轻蔑地撇下这些十多岁的小屁孩，扬长而去。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女式军便装的无可争辩的象征，因为这种服饰领子开得最低，腰身收得更细，足以彰显其夸张的性感身段。上了中学之后，本班的两位“拉三”，居然也穿上了军便装，从一年级一直穿到了毕业。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使我更加坚信，女式军便装就是“拉三”的集体制服。在大革命的时代，它是展览情欲的唯一合法的容器。

70年代初某年夏季到来的时刻，一种俗称“的确凉”的人造纤维面料，突然开始盛行起来，取代了稀缺的棉织品，成为八亿中国人民的最爱。人们竞相穿上白色“的确凉”上衣招摇过市。越过半透明的布料，男人隐约可见女人的胸罩，女人隐约可见男人的乳头或背心。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晾晒着女人的月经带，犹如成片黄白色的海带。这是“文革”时代女体的奇异标志。它们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在“文革”中国的上空。

“的确凉时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降临了，它的特征就是夺目的洁白，似乎暗示着主体灵魂的纯洁性。但它在多次洗涤后很容易泛黄，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漂白剂，被用以捍卫这种脆弱的白色。但大多数穷人是穿不起“的确凉”的。念中学期间，我从未享受过这种光鲜时髦的服饰。我唯一的“的确凉”财产，是两只用“的确凉”碎料拼凑成的假领。母亲教我在毛衣外翻出这种假领，俨如出示一件高贵的华服。它的白得耀眼的色泽，照亮了无限灰暗的少年时代。

这种“文革”时期重现的假领主义，是“的确凉时代”的副产品，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殖民地时代上海贫民的伟大发明，“文革”中从上海扩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维系着中国人民的面子。另一项类似的发明是领圈，一种六到八寸长、两寸宽的毛线织品，两头缝有揿纽，围在脖子上后，可以有效抵御风寒。寒冬时节来了，女孩们戴着露指的绒线手套，围着彩色的绒线领圈，露出纤纤玉指和皎洁的小脸。她们梳着刘海的姿容，是我旧时记忆中最纯真的影像。

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在革命样板戏大获成功之后，革命样板服变得迫在眉睫。1974年（“文革”第九年）秋天，江青授意设计师制出新款连衣裙，作为“国服”在天津展出，尔后向全国推广。这是一夫人为中国人民准备的厚礼，它的上半身是小圆领（俗称和尚领）唐装，而下半身是苏式布拉吉。但这种中西元素的简单拼贴，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绝大多数女人反感这种没有翻领和腰带的僵硬

式样,更没有足够的积蓄去迎合江青的服饰美学。忙于阶级斗争的新政府,也无力资助革命样板服运动。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的国服,无人问津,逐渐积满了尘垢,变得黯淡无光。

但推行“江青服”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连衣裙款式被政治解冻,从而刺激了革命女青年的布拉吉热潮。到了第二年夏天,各种非江青化连衣裙在街头悄然出现,大多带有可爱的白色小翻领和飘逸的腰带,我家周围的邻居姐姐们,都穿着这样的裙子上街。这是“文革”晚期的服饰骚乱。沉睡的小资美学苏醒了,向城市审慎地推行推销着女人的风情。

就在 1974 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她身穿白色耸肩露背装,向毛泽东举止优雅地伸出了玉手,而动作迟缓的毛,出乎意料地用嘴唇行了一个吻手礼,弄得小伊梅尔达热泪涟涟。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伟大领袖的绅士派头,令广大民众顿时心猿意马起来。

来自高层的信号导致了误判,以为西方时尚即将得到解放。就在一周之后,马科斯夫人的性感露背装出现在上海西区。一位聪明美丽的神仙姐姐,穿上按报纸照片剪裁的伊梅尔达服,裸露着性感的玉背,袅袅地走在从五原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马路上,身后尾随着上千个看热闹的行人。十五分钟后,巡逻的武装民兵把她带走了。当我和伙伴们闻讯飞奔到现场时,只剩下大批围观者在交头接耳。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兴奋,犹如亲眼目击了外星人的入侵。

这是我毕生中所遇到的最富于勇气的时尚女人。在民兵指挥部,她因“流氓罪”而遭到残酷的拷打,随后被“公检法”判刑,从上海西区彻底蒸发,成为文化革命的最后祭品之一。就在她离去之后,有关她的传说开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她在狱中上吊自杀,有人称她被一位地方官员救出后去了香港。还有更为离奇的说法,说她是某

高官的私生女，盛装出行的目的，是要蓄意传递出某种特殊信号，如此等等。这是关于时尚女子的神秘传奇，它奔行在最高领袖日渐衰老的年代，像一首美艳而凄凉的歌谣。

（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6年第4期）

附三：**1969—1976年上海报刊关于批判“奇装异服”专题文章目录**

编号	日期	报刊	标题
1-1	1969年7月19日	《解放日报》	从“螺丝头”、“大前门”谈起
1-2	1969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	用革命的大批判狠狠打击“四旧”
2-1	1970年1月12日	《解放日报》	不许“阿飞头”死灰复燃
2-2	1970年2月4日	《解放日报》	粉碎资产阶级腐蚀，煞住歪风邪气
2-3	1970年2月5日	《解放日报》	坚决抵制奇装异服；抵制生产怪皮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把住照相柜台阶级斗争这个关；在木梳刀上打退资产阶级歪风
2-4	1970年2月6日	《解放日报》	一场腐蚀和反腐蚀的严重斗争
2-5	1970年2月7日	《解放日报》	“四旧”一露头就把它批臭；再来一次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群众运动
2-6	1970年2月15日	《工人造反报》	要造成一种社会上的自觉行动；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2-7	1970年2月19日	《工人造反报》	理发店里煞歪风
2-8	1970年3月5日	《工人造反报》	一家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发店——记榆林理发店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事迹
2-9	1970年3月13日	《文汇报》	抓好自身革命化，自觉抵制怪发型；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2-10	1970年3月20日	《解放日报》	教育青年像好八连那样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把扫除歪风邪气变成社会自觉行动
2-11	1970年4月25日	《解放日报》	把三尺柜台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3-1	1971年3月14日	《工人造反报》	这是那一家的兴趣？
3-2	1971年3月21日	《工人造反报》	“新”和“奇”是敌人引人上钩的诱饵
3-3	1971年3月31日	《文汇报》	坚决同毒害人民的歪风邪气斗到底；穿奇装可耻
3-4	1971年4月1日	《工人造反报》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这决不是“小事情”；要造成一种社会上的自觉行动

(续表)

编号	日期	报刊	标题
3-5	1971年8月23日	《解放日报》	商店是传播革命新风尚的阵地;大造无产阶级舆论,发扬社会主义风尚;争做社会上移风易俗的促进派
3-6	1971年8月28日	《解放日报》	就是要管;坚决抵制业余摄影中的歪风邪气
3-7	1971年9月16日	《解放日报》	摄影机前的斗争
3-8	1971年10月3日	《文汇报》	谈服装的美与丑;积极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这是哪家的“衣食观”;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业余摄影阵地
3-9	1971年10月20日	《文汇报》	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4-1	1972年2月13日	《解放日报》	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4-2	1972年4月28日	《解放日报》	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不做不穿怪服装;维护革命秩序,狠煞歪风邪气
4-3	1972年6月14日	《解放日报》	狠抓阶级斗争,加强青少年教育;把关
5-1	1973年1月26日	《解放日报》	商店也是破旧立新的战场;木梳底下的破旧立新
5-2	1973年6月6日	《解放日报》	照相机前也有斗争;设计新服装,抵制奇装异服
5-3	1973年6月11日	《文汇报》	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5-4	1973年6月13日	《解放日报》	让无产阶级新风尚占领市场阵地;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和教育;英姿照相馆见闻、店堂批判会
5-5	1973年6月27日	《解放日报》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营业员自身抓起
5-6	1973年7月16日	《解放日报》	发现苗子及时抓
5-7	1973年8月6日	《解放日报》	宣传新道德风尚,抵制奇装异服;柜台面前顶歪风;抓好发型上的两种思想斗争;评所谓“时髦”和“新奇”
5-8	1973年8月8日	《解放日报》	商业部门要警惕四旧复活
5-9	1973年10月25日	《文汇报》	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续表)

编号	日期	报刊	标题
5-10	1973年11月4日	《文汇报》	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5-11	1973年12月29日	《文汇报》	不要让旧货色冒充新生事物
6-1	1974年1月6日	《解放日报》	坚守摄影阵地,拍摄健康大方的照片
6-2	1974年1月13日	《文汇报》	剥削阶级那一套滚开
6-3	1974年1月17日	《文汇报》	本市广大革命小将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宣传破“四旧”、立“四新”;青少年要争做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员
6-4	1974年7月12日	《文汇报》	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坚决抵制奇装异服
7-1	1975年8月24日	《解放日报》	这是哪个阶级的穿着打扮;抵制奇装异服和怪发型;要教育青年分清两种审美观
7-2	1975年8月29日	《解放日报》	和青年谈谈穿着问题;评“体面”
7-3	1975年9月12日	《文汇报》	树立革命新风,抵制奇装异服
8-1	1976年7月29日	《解放日报》	深入批邓,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
8-2	1976年7月30日	《文汇报》	发动职工起来抵制奇装异服;发扬新风尚,把好服装关;穿着打扮上也有阶级斗争

附录一

始信人间有鬼狐

——从苏步青教授的《夜读〈聊斋〉偶成》谈起

据为复旦百年校庆出版的校长系列传记《苏步青传》记载：1968年9月6日，驻复旦大学工宣队突然扑向苏步青教授家查找电台、发报机之类“置人于死地的特大罪证”，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取走一些外文杂志。三天后，苏步青被关进隔离室，责令交代里通外国的“罪行”。原来这是一本在美国编辑，在日本出版的《微分几何杂志》，苏步青百般申辩，工宣队却认为证据“确凿无疑”。“这件事对苏步青刺激很大”，便写下了这首诗。

夜读《聊斋》偶成

幼爱聊斋听说书，长经世故渐生疏。

老来尝尽风霜味，始信人间有鬼狐。^[1]

实际上，这次对广大学生和教授采取的搜查行动，是很有来头的。从研究的角度说，它应标示为“九四”行动，或“大搜查”行动。因为它的源头发生于9月4日的上海师院，至于9月5日、6日发生在复旦、交大、二医、上音、水产等高校的联合行动，则是上海师院“九

四”行动的后续。

一、背景

1968年7月，全国不停息的武斗终于使毛泽东下定决心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等高校，并表态：“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自称工宣队的“黑手就是我”。^[2]

由此，7月28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工宣队领导小组（下设文教战线办公室由王秀珍负责），并决定向上海的各大专院校选派工宣队。8月24日，上海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和海运学院。^[3]2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当晚直至凌晨，全城“锣鼓喧天，欢声雷动”（《解放日报》语），上海各工矿企业、各大专院校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活动。第二天，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复旦、交大、师大等20所高校。第三天，第三批工宣队进驻二医、外贸、科大、铁道学院等院校。至此，从15个工业局所属250家企业抽调的1.1万余名工宣队员和218名军宣队员全部进入全市的26所全日制高校。^[4]

确实，每所高校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种仪式不仅在努力地构筑着氛围和场景，更在刻意地表达着一种态度和立场。例如26日的华东师大刷满了标语，“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中山路桥一直到‘九·一五’广场，夹道欢迎工人同志的到来”，欢迎大会上，校革委会主任宣称：“工人阶级进师大，比成立校革委会的意义还要大上千倍、万倍！”并向全校公布了《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公约。^[5]然而，通过造反起家的红卫兵们也是对此有怀疑和抱怨的。

例如复旦大学就有红卫兵散布“红卫兵的天下过去了”，“这次工人是来整学生的”。为此，驻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在《文汇报》上发表评论《坚决回击一切反对工人宣传队的言行》，义正词严地指出“少数表面敲锣打鼓，背后又在搞小动作的别有用心的人”，“想来较量一下，那就请吧！”^[6]当时，工宣队进驻高校，在舆论上认作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开端”。其实，这并非是产业工人对知识分子管理学校的颠覆。从策略上看，这是借助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威势，对纷扰的乱局进行整肃的政治手段；从内质上看，这是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造反派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即造反派内部的权力“更替”和“转移”。

二、起 缘

上海师院位于西南市郊的漕河泾镇，那儿的红卫兵从破“四旧”（冲击徐家汇教堂）到炮打张春桥均充当了急先锋，与位于东北市郊五角场镇的复旦大学形成了对角呼应（不同的是师院两派构筑工事，锻造长矛，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复旦则是数派纠缠着进行了激烈的文斗）。因之，在工宣队进驻高校以后，市革委会立即举办各工宣队团长、政委学习班，听取张春桥介绍驻清华、北大工宣队对红卫兵进行大搜查，“取得辉煌成果”的经验。张春桥在会上点名师院、复旦两校“情况复杂”，特别提示“复旦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炮打的“最早的地方”；上海师院是炮打的老窝，是“四大金刚”。于是，在原定 500 名工宣队员的基础上，又向师院增派了一倍多，总数达 1114 名，为全市各高校之冠。^[7]

1968 年 9 月 3 日，师院工宣队向王秀珍报告：师院留学生办公室为革会总部，其三楼不准任何人上去，有“马蜂窝”之称。且经常有人将大包、小包的东西（指材料）拿出院外，或趁夜间将东西扔出墙

外。王秀珍表示这个权要夺回来！并向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汇报，王少庸请示张春桥，张春桥指示立即动手进行搜查。^[8]

为了制造舆论，9月4日发行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刊登了署名驻师院工宣队“三个队员”、“三位老工人”的来信《师院的头头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来信声称师院校革委会的大印“上午是这一派使用，下午归另一派使用”，内战使“许多门窗和书橱被打坏”。工宣队进驻后竟然不提供宿舍，致使“有些同志就睡在地板上，有的甚至睡在走廊里”。有个教室的黑板上还出现了“工人宣传队进得来，出不去”的字句。^[9]显然，这两封所谓“群众来信”属精心策划之作，它同时出现在报刊上，以形成进击的声势。却又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师院“某些人对工人宣传队耍两面派的恶劣行为”，并说这已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愤怒的工人们将“坚决给予迎头痛击”。如果说这是一种煽动和宣告，那么，它恰是以“现象”、以“事实”为引导，既达到呼吁展开行动的目的，又将该行动目的之“目的”深深地遮掩了起来——那就是通过行动，搜查发生在五个月前的4·12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或隐藏着、或流散着的所谓“黑材料”。

这是“九四”行动的要害，这也是张春桥等人的心患。



“师院的头头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解放日报》1968年9月4日

编辑同志：

我们是进师院革委会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上师院的“三个”的老工人。我们快快一个

多星期来，所见新闻报道，吃恶恶

休会也恶，在田间食，我便尽

了力。但这些恶恶不

报负责者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大光明的的历史任务，使我们感到工

程，挖空心思的水们，上午是

革委会使用，下午是另一派，他

所，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革委会

会这个机构的作用呢？

江右，由于两次被打“倒”，

被革家时，革除了两个很重

的罪名：现在我们的内病

对叛乱、炒房、不道德的乱党

都因有政治目的的恶，革除，

这样的人数不齐，而革打

在分子数不齐，而革打

师院的头头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

编辑同志：我们是进师院革委会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上师院的“三个”的老工人。我们快快一个

多星期来，所见新闻报道，吃恶恶

休会也恶，在田间食，我便尽

了力。但这些恶恶不

报负责者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大光明的的历史任务，使我们感到工

程，挖空心思的水们，上午是

革委会使用，下午是另一派，他

所，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革委会

会这个机构的作用呢？

江右，由于两次被打“倒”，

被革家时，革除了两个很重

的罪名：现在我们的内病

对叛乱、炒房、不道德的乱党

都因有政治目的的恶，革除，

这样的人数不齐，而革打

在分子数不齐，而革打

革命群众出版社

三、行动

9月4日上午，师院工宣队开始执行大搜查计划。首先借助上海两报文章引起的震动，工宣队向全院发出了紧急通告：1. 全体同学回到原系、原班级宿舍，不得随意选择、占领房间。2. 个人和小集体占有的公物，私藏的材料立即收集上交，不得损坏和转移。3. 一切武斗工具立即上交。通告还发出严厉警告“不得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应该承认，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具有很强的挤压性和震慑力，它使那些正处于派性抵牾中的红卫兵们措手不及。

接着，下午1时整，师院广播台响起了宣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声音，这是大搜查行动的统一号令。进驻各系、各班级的工宣队员立即将所管辖的学生宿舍团团包围，进行了“上天”（捅穿天花板）“入地”（撬开地板）式的搜查。其间，有的红卫兵争先恐后地为工宣队通风报信，提供线索；有的则抱头痛哭，高声抗议。3时，张春桥亲自打电话给师院工宣队负责人，了解搜查行动的进展情况，强调这是一次“革命行动”，并指示工宣队要将“重要材料”（指“炮打材料”）派专人直送“康办”。^[10]师院的行动一直进行到凌晨（第二天又对校外的对象进行了“补课”），据统计，全院共有2500多人遭遇了这次抄家式的搜查。当晚，王秀珍、陈敢峰赶赴师院查看“战果”，“战果”除了有武斗工具、空白介绍信、公章、短波收音机、留声机、电话机、油印机及画报、照片、书籍（称为“黄色”）等，还有关于炮打的信件、传单和“很多重要的线索”。工人宣传队宣称：“这些线索我们要坚决地查下去，查到底。”^[11]为此，张春桥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师院的行动干得好，全市高校都要学师院。”^[12]徐景贤等便立即作出部署，并强调“重点是炮打的急先锋”，复旦“是重点的重点”。^[13]王洪文

则点名要求复旦工宣队特别注意“炮司”的几个头头，这是因为运动初期，炮司曾派出人员充当工总司负责人的秘书。（昔日并肩的“友谊”，成了今日烧身的“罪孽”，这是几位曾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万万没有想到的。年轻必然要为投身政治付出代价。）

9月5日清晨，王秀珍赶到复旦，一方面通报师院“九四”行动的情况，一方面催促复旦工宣队紧急行动。王秀珍表示“你们这里比师院复杂得多”，“时间不能太长，要泄漏风声的。你们去干好了，有什么事我来负责”。^[14]接着，王秀珍又赶到市革委会一办，主持召开全市高校工宣队负责人会议。会议先由师院工宣队介绍了“九四”大搜查的经验，再赴现场参观“战果”展览，最后作出9月5—6日在全市各高校采取“统一革命行动”的决定——以上海师院为突破口，以复旦为重点的“大搜查”行动全面展开了。

9月5日中午，驻复旦工宣队、军训团按照师院行动的模式，突然在全校广播《紧急通告》，声称最近复旦已连续发生“窝藏武器弹药”；“书写反动标语”；“烧毁和转移炮打材料”；“盗用国家财产和抄家物资”等严重事件。由此，“决定于今天采取革命行动”，即对所有的学生宿舍进行清查。当时，工宣队员“接到命令后，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冒着瓢泼大雨，分赴各个战场”。在整个清查过程中，尽管有部分红卫兵“纠集一小伙人，采取大家乱起哄的办法，时而围攻工人同志，时而蛮不讲理对这次行动攻击”，^[15]终究因为工宣队占据强势地位，采取强制手段，“所以对每一个人的东西都进行检查，把箱子、抽屉、橱打开检查”^[16]，以致“复旦大学全校5千多名师生员工几乎无一幸免”。^[17]确实，如此翻天覆地的搜查，其关键不是搜查表面可见的匕首、刀剑和书画、唱片之类，而是为了完成一桩秘密的使命，那就是前述中提及的搜查关于炮打的证据和线索。后来，复旦抛出的“胡守钩反革命小集团”的日记、信件、文稿等“罪证”，部分是通过这次行动收缴的。

复旦的“大搜查”行动还延伸到了“走资派”(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教授)。第二天,复旦工宣队组织一批“出身好”的红卫兵集体吃忆苦饭,据一本《无主日记》记载:大家吃着“难以下咽”的糠团子,想到“解放前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是靠这种糠团活命的,今天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这是“文革”时期典型的思维与语言。它既是真实的思想吐露,也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便“带着满腔的阶级仇恨,整装待发,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无主日记》之主作为一个女大学生,与两个工宣队员组成战斗小组,分配到中文系教授赵景琛家进行检查。再据《日记》描述:“我们在他家检查,简直无从下手,他家楼上楼下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几乎全是毒草。我们只挑了几本黄色的书,其他枪支弹药没有,收获不大。同去的一位工人同志看到赵景琛家奢侈的摆设、家具,很气愤。”^[18]查抄苏步青教授的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9月5—6日,交大、华东师大工宣队宣布接管图书馆,查封校革委会所属组织组、保卫组、档案室等机要部门的材料;华东化工学院工宣队将全校师生员工集合起来举办学习班,实为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在全校强制搜查;^[19]二医工宣队则利用晚间,对所有的部门采取了突击清查,查出了大批“打包成捆准备转移”的档案材料。^[20]其他如上外、上戏、水产等共26所大专院校的工宣队,均按照指令统一对学生宿舍进行了大搜查。据权威统计,在上海的这次由张春桥导演、王秀珍指挥的“大搜查”行动中,仅师院、复旦、交大三校就有13500多人被查抄。^[21]

四、结 尾

上海工宣队的这次统一行动,引起了许多师生的反感和抗议,有

的写信上访，有的公开与工宣队争辩，例如在复旦大学工宣队查抄教授家的时候，历史系教授苏乾英就“公开进行挑衅，别有用心地问工宣队，我家有一把菜刀，要不要上缴？”^[22]在上海水产学院甚至发生有人“破窗跳入查封的办公室和撬开这次革命行动战果展览会的门锁，大搞阴谋抢劫活动”的事情。^[23]检阅当时出版的各类报刊，可见师生中比较普遍的意见有两类：第一，工宣队“与运动初期的工作组一样，执行了新的资反线”；工宣队“不相信群众，镇压群众，把矛头指向红卫兵小将，大方向错了”。第二，工宣队“搞阶级斗争速胜论”；工宣队“打击了一大片，侵犯了人权，行动过火了”。这第一类意见属红卫兵固有的“革命造反”的习惯思维，但时过境迁，红卫兵确已到了被逐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还有什么能量和能耐呢？这第二类意见属青年学生意气用事的申辩，但激动幼稚、充满书生气的喊叫，又怎能撼动权力的运行呢？难怪《无主日记》之主、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起初还想：“如果相信群众的话，何不作个动员，让别人自动上交，为何一个一个都进行搜查呢？”但学习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后，便认为：“不矫枉便不能过正么，多一个突然的全面检查，只能使那些躲藏在角落里的阶级敌人发抖，只是他们的末日到来。”^[24]（然而，躲藏在这个行动背后的政治目的——张春桥等人为搜寻炮打的证据和线索，摧毁炮打的势力——又有多少善良的人们知晓呢！）确实，“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不受任何规则和法度制约的。它既为“纲”，就可以无限放大和上升；它既为“阶级斗争”就可以无比肆虐和残酷，而其内里的“政治路线”，在“纲”的笼罩下，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还有什么凶恶和肮脏不可以裹挟在其中呢？！

9月8日下午，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高校工、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张春桥、王少庸、徐景贤到会听取各校关于“大搜查”行动的情况汇报。张春桥针对群众的议论，一面告诫“公审会不宜开”，

“抄家必须慎重”；^[25]一面强调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并建议举办成果展览。

第二天，王秀珍便布置落实，要求各单位迅速上报工宣队采取“革命行动”的战果统计（同时委派公检法军管会对收缴的数台收发报机进行鉴定，结果为大学生军事训练用电台），例如华东师大公布的统计数据为：铁棍 15 根、匕首 21 把、大刀 15 把、长矛 11 根、弹簧钢丝鞭 1 根、土手枪 3 支、子弹 72 发、信号弹 4 发、纸壳手榴弹 1 颗及炮打的“黑材料”若干。^[26]其实，在当时全国武斗的情势下，从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大学中收缴出这些武斗工具（当时社会上习武成风，有的应属于个人的习武器具），是不足为怪的。据 9 月 14 日出版的《上海红卫战报》报道：师院、复旦、交大、水产、上外等高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行动辉煌战果展览会纷纷开幕”。但为了遮蔽要害，转移视线，各高校的展览会均已淡化了“黑材料”的内容，而突出展示了武斗工具和“黄色”书刊，复旦大学的展览会还布置了大量忆苦思甜的材料，其中有一工宣队员祖辈三代用过的破棉絮，与之摆放在一起形成对比的是从一些教授家中抄来的豹领貂皮、几百件衣料和各种餐具，还有“牛鬼蛇神”们保存着的被揪斗时穿的汗衫，记录的日历等，以证明阶级斗争的“触目惊心”和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好得很！”^[27]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年以后的 1972 年 7 月 18 日，复旦大学革委会向各系、办下发了《关于提出“九·五”革命行动物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坚持这是“工宣队一办对所属大专系统进行的一次保密检查”的同时，承认因该次行动存放在仓库中的物件，除了武斗工具和“黄色”书刊外，还有抄来的高档生活用品如电视机、电唱机、照相机、望远镜、手表、自行车、沙发、毛料服装、银元、存款、现金及少量外币、珠宝首饰等。但因“运动期间经过举办展览会等辗转环

节较多，加上管理不妥，失散现象比较严重”。对此，各系、办“应向革命群众讲清情况，以取得谅解”。^[28]那么，寻根问底，究竟谁是管理者，谁是责任者呢？不就是当年的查抄者、革命者吗！

呜呼！当年盛大的革命，成了今日的难堪；当年凛凛的威风，成了今日唯唯的尴尬！

大搜查行动作为上海“文革”中的一个突击性事件，很快就过去了，但它对许多人造成的创伤，却是很难抹平的。

注 释

- [1] 王增藩：《苏步青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6 页。书中记“九·五”行动发生于“1969 年秋天”有误，应为 1968 年。
-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1524 页。
- [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2 页。
- [4] 中共上海市教委党史资料征集办编：《党史大事记（1949—198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4 页。又：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422 页记：“到八月二十二日，一万一千名工宣队员已开进上海二十六所高等院校。”时间有误。
- [5] 《新师大战报》1968 年 8 月 27 日第 82 期。
- [6] 《文汇报》1968 年 9 月 3 日。
- [7]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第 299 页。
- [8]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423 页。
- [9] 《解放日报》、《文汇报》1968 年 9 月 4 日。
- [10] 中共上海市教委党史资料征集办编：《党史大事记（1949—198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5 页。

- [11]《上海红卫战报》1968年9月7日忠30号。
- [12]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第300页。
- [13]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24页。
- [14]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第300页。
- [15]《复旦战报》1968年9月6日第81期。
- [16]杜鹃整理《无主日记》，《档案春秋》2005年第4期，第30、31页。
- [17]中共上海市教委党史资料征集办编：《党史大事记（1949—198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 [18]杜鹃整理《无主日记》，《档案春秋》2005年第4期，第30、31页。
- [19]中共上海市教委党史资料征集办编：《党史大事记（1949—198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 [20]《二医战报》1968年9月10日第19期。
- [21]《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下），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 [22]《复旦战报》1968年9月18日第84期。
- [23]《上海红卫战报》1968年9月14日忠32号。
- [24]杜鹃整理《无主日记》，《档案春秋》2005年第4期，第30、31页。
- [25]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第301页。
- [26]《新师大战报》1968年9月16日。
- [27]《复旦战报》1968年9月18日第84期。
- [28]复旦大学革委会文件72第16号，《关于提出“九·五”革命行动物件处理意见的报告》。

附录二

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

——曹宠、秦邦廉访谈记

时间：2005年10月30日

地点：复旦大学老干部活动室

采访人物：曹宠（复旦大学图书馆离休干部）

秦邦廉（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馆长）

金大陆（以下简称金）：一年前，曾拜托曹老师与复旦图书馆通融一下，想对复旦图书馆留存的“文革”资料作一番检索和清理。说实在，我是满怀着期望的，并作好了艰苦工作的准备。因为我以为复旦图书馆这么重要的文献资料基地，一定会有较丰厚的库存的，如同我听北京的朋友说，北图、北大图书馆的“文革”资料都在地下室里躺着呢！所以，当曹老师第一次告诉我，复旦的“文革”资料应该在防空洞里，要花工夫去找，我就等待着。当曹老师第二次告诉我，防空洞里的“文革”资料找不到了，我还催促曹老师可否派人下工夫去找，因为终究是要找见的，我便仍然期待着。当曹老师第三次告诉我，防空洞里的“文革”资料因失火而毁灭了，联想到上海有些大学的“文革”资料还保存着，复旦却空无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失望。无奈之下，感到

这本身也是上海“文革”史研究的一个“可取之点”，也就以此为今天访谈的题目了。

秦邦廉(以下简称秦)：“文革”期间，复旦大学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单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因此，大家比较关注。上海“文革”中的几个大的事件都和复旦有关。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单位都赶到复旦来看大字报，包括全国各地的人也来。当时要有什么轰动事的话，都是复旦先有预兆的。这就是说，复旦在上海乃至全国“文革”运动中的影响很大，学生能量也大，所以对于各种信息也是比较熟悉、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得到的，这就形成了资料源。各方面的资料，各式各样的资料都是冲着复旦寄来的，都喜欢寄给复旦，因为各单位编的东西都希望复旦图书馆能够收集下来。

金：“文革”期间的“一月革命”以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都发过通告，向全国征集大字报、袖章、传单、报刊等资料。“一月革命”以后的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市一大会址等也专门发过正式通知，在上海征集反映上海“文革”运动的资料，当时也称“革命文献”。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把“一月革命”看得很重，理论上是说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一月革命”是解决了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构成了当时收集“文革”资料的社会环境。

曹宠(以下简称曹)：实际上，今天的题目讲的是“文革”史料的收集和保藏，这些史料反映了那一段时期的历史状况，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意义和价值，只是面对现实，感到可惜了。我考虑了一下，复旦大学真正开始收集“文革”资料确是在“一月风暴”以后。当时复旦图书馆已经造反了，造反派叫“排万难战斗队”，也就有意识、有条件来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那时传单满天飞，我们考虑既然是图书馆，就应该收集、保存这些资料。大致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图书馆

成立了“文化大革命资料组”。当时负责人是一位女同志,她出身好,胆子也大。我也是报刊组的,主要是协助性质的。因为复旦的名气,人家都愿意到复旦大学来打听“文革”的消息。当时复旦有条闻名的“南京路”,两边牌栏上贴满了大字报,几个小时就换一批,覆盖一批,来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所以称为“复旦南京路”。在那种情况下,收集资料确实比较容易。很多造反派都到这里来散发传单,形成了一个“资料市场”。

金:根据当下及未来的研究需要,我是想描画出一张上海“文革”资料分布图的,那就是以上图、上档为主体构架,包括各区、县、局,各高校、各专门机构留存的资料情况,即标记出哪里有,有多少,有什么,如何利用等。

秦:这项工作很有价值,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图书馆网络来完善这件事。

金:其实,一些单位的“文革”资料没有丢失,却也处于无人管理、无人理睬的状态。有的封存着,有的堆放凌乱,布满了40年的灰尘,有的本来就有分类,有的是我进去以后整理的。尽管如此,相比人家的“存在”,联想到刚才老曹提到“文革”时期,复旦图书馆还专门建立起“文化大革命资料组”,正式地进行工作,复旦“文革”资料的散失确实是个遗憾。由此,现在只能追问:当时是通过何种途径收集资料的?工作流程如何?对于收集的资料有无分类、装订和上架?当时是怎样理解这项工作的?社会如何认识?舆论又作何评论?

曹:我们收集资料一开始是没有计划的,主要是派人出去要、出去收、出去搞。后来通过人家主动寄来,寄给复旦图书馆,再后来逐渐形成相互交换资料的关系。当时北京有几份刊物和报纸,也是不定期的,武汉等地也有,都和我们交换。哪个报纸有地址的,马上就寄出去,互相寄赠。当时复旦有《红复旦》、《新复旦》等。具体收集的

资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固定的报纸，另一个是油印的手抄本，如首长讲话。有些是到市面上去买、去要，稍微固定的，如首长讲话也是可以买到的，有些资料后面有单位落款的，我们就和那些单位联系交换。大部分收集就是这样进行的。到了 1969 年以后，文化革命的形势有所变化，收集的形式主要就是互相赠送、交换了。

金：对，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属于“文革”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国外学术界甚至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革”到“九大”就结束了。从收集“文革”资料的角度看，因为运动从冲冲杀杀的阶段收缩了，各造反派的山头也渐渐地削平，各类小报、传单、资料等印刷品遭到了整顿、清理和查处，所以，到了 1969 年以后，就没有了大规模的资料流传了。当然，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资料还是有的，就看各图书馆是不是继续收集了。

曹：那时正式出版的报纸很多，如《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因有固定的出版单位，我们都有交换关系，可能还有一些订购关系。当时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后，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过分类的。一般传单性质的，我们不考虑分类。一些不定期的，但是有期号的刊物都分类。先按照种类性质分类，而后按地区分类，都有分类号，装了 2 个卡片箱。而且还有专人管理，有目录，我们有个库的。但是这些东西，据我的印象，基本不流通。来查看的，主要是些内部的人。80 年代以后这些东西可能就散失掉了。

金：我见到上海有些学校的“文革”资料也是这样分类的，比如北京的、河南的、四川的等不同地区的资料；比如工总司的、中学红卫兵的、复旦的、同济的资料等。当时上海各高校图书馆系统的造反派还专门编有《简报》，专门开过会，来交流、讨论“文革”资料的收集和保存问题。我见过这几份《简报》，记得当时在会上介绍经验的有华

东师大、上海师院、华东化工学院等。

曹：凡是有期号的我们都装订的，还编有目录。现在在复旦能够看到的，比如《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新复旦》、《复旦战报》等，这些我们还保存着，是比较正规的。现在想想，当时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很认真的。这个组大概有四五个人。这种专人管理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以后。

金：那复旦图书馆一定收有“文革”中后期的资料。因为一打三反、教育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复旦都是全市的重点。那实在太可惜了。我见到许多地方都只有1968—1969年以前的资料，中、后期的资料反而没有。对上海“文革”进行整体的研究，怎么可以没有中、后期的资料呢？复旦图书馆毕竟是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说明你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图书馆工作意识的。那么，当时有没有人来阅读、查找、利用这些资料呢？

曹：来看这些资料的人是有的，当时我们馆里有一个房间，就是“文化大革命”资料室，箱子里面放着卡片，供人来查，但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过，没有专门成立一个“文化大革命资料阅览室”。后一阶段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那时我已经“靠边站”了。

金：我跟曹老师是在“文革”后期认识的，曹老师刚才提到复旦仍可看到的那几份“文革”报刊，是作为开架的品种，当时我就利用过的。那么，在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值得讲述的细节？

曹：这个印象不深了。有一点，就是关于“复旦南京路”。当时我还拍过照片，后来连同底片全部上交学校了，应该查得到。当时真是人山人海。

金：关于资料的交换，我还想问一下。一个是看到人家资料后面印的地址，主动去给人家交换；还有就是人家写信来，要求交换的。那时复旦也编印了几份报刊资料，一期一期地出版，如《红复旦》、《新

复旦》等。当时是不是出版了以后,送到复旦图书馆来?

曹: 是有的,定期、固定的供复旦图书馆用于交换。

金: 当时图书馆除了收集和整理“文革”资料,还有没有主动翻印、编辑过这些资料? 因为我发现,当时有些单位,有些图书馆还有过翻印、出卖这些资料的情况。

曹: 这个好像没有。复旦图书馆没做过这样的事。

金: 当时复旦图书馆除了交换资料,还要购买、采购资料,那么有没有专用的资金呢?

曹: 有一些资金用来购买,作为书报费用可以报销。

金: “文革”中,很多人来查看 30 年代的报纸,复旦图书馆有没有接待?

曹: 30 年代的报纸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是作为图书馆的一项正常的业务。

秦: 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要查某某人的历史,就来了。从图书馆的业务来说,我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解放前的报纸。

金: 这类事情在上海“文革”史上,还有一个专题,叫“上图事件”。上海图书馆为这件事情,不少人受到了很严重的迫害。

曹: 复旦图书馆也有不少人来查找、利用这部分资料,因为复旦的馆藏比较完整,比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特别是保留了 30 年代的各式各样的小报。其中有些是关于当时政治人物的文章。前来看的都不是一般的读者,都是专案组的。来查看的人一拨一拨的。还有的从创刊号开始查,所以 30、40 年代的报纸都翻烂了。当时是没有复印机,所以很多人就拍照。

金: 这方面的报刊资料有没有丢失?

秦: 也有丢失,但总体保存得比较好。这毕竟是有财产号、有登录号的,而且都是很有规则的收集和利用。

金: 联系今天的访谈主题, 我讲个有趣的插曲。记得是 1967 年夏季的一天, 我和一同学到复旦打乒乓球。天极热, 有三十多度, 又是中午, 复旦校园里人很少, 知了倒是叫得很响。那同学是复旦的子弟, 我记得他一度还是红革会校友兵团的, 门路熟, 胆子大。当时复旦的乒乓房就在学生会底楼, 现在拆掉了, 后面有幢二层的小楼。因为天太热, 没打几下就浑身湿透, 大概是为找水喝, 还是为乘凉, 反正我俩跑到二层的小楼里了, 扒住窗口一看, 整整齐齐的一个资料室。近三十平米, 有桌子, 有椅子, 四周全是斜插的书架, 架上插满了各种“文革”书刊。你别说我们当时只是初中生, 看到满满一屋子“文革”资料, 心中一阵狂喜。那同学从天窗爬进去打开了门, 我俩关上门飞快地将架上的资料堆放在一起, 刚准备找绳子扎, 门开了, 一个高高个子的大学生突然站在我们面前, 他有点严肃, 但不凶。复旦的学生是文明些, 复旦“文革”中没有明显的武斗。他说早已发觉我俩了, 并要带我俩到保卫组去。我俩低着头往楼下走, 那楼梯又窄又陡,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子, 我走在第一个, 我同学走在第二个, 那大学生走在最后。快到楼底了, 我同学一声叫“快跑”, 我记得当时脚下很重, 像绊住了似的, 毕竟没有经历这样的场面。那同学猛推我一把, 又喊一声“快跑”, 不知哪来的勇气, 我一撒腿飞也似地跑到很远的地方躲起来。那大学生急得在后面直叫“站住”, 但已无济于事了。我想: 这是不是与我现在在复旦、在上海寻觅“文革”资料有一种寓意关系呵。这次偷资料没有成功。曹老师说复旦图书馆有个“文革”资料室, 现在我可以证明, 复旦的红卫兵组织也设有资料室的。

秦: 不知复旦红卫兵组织的这批资料, 后来是不是归入了复旦图书馆的“文革”资料室。

金: 秦老师真是具有良好的职业敏感和职业素养。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到了复旦后, 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秦：我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复旦图书馆系专业毕业的。记得当时有句话，图书馆在上海，除了上图，就是复旦大学的图书馆算图书馆了。一开始，我就进了报刊部，跟着曹先生等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复旦当时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有很多的老报刊。“文革”资料应该说是有的，我也看到一部分，记得主要有这样几个部分：（一）领导讲话。内容比较凌乱。（二）各类小报。凡是红卫兵组织都有小报，凡是造反派，第一个任务就是出小报。出小报是标志着这个组织的存在。（三）“某某事件”的专题传单。（四）比较多的是当时认为属于公开发表的“文革”报纸，主要是《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的都有。当然，还有“文革”期间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曹：我插一句，秦老师看到的这部分“文革”资料是我保护下来的。那是1977年的春天，因为上级有个通知，所有“文革”资料要进行处理，一般的单位都要上缴、销毁，统一规定由上海图书馆保留一套。我作为一名老报刊人，当时正负责管理资料库。我认为，这批资料不管对错，作为史料来讲，是可以保留的。所以处理这些资料不是我的本意，领导叫我处理，也只得执行。那天废纸厂的卡车就停在图书馆楼外面，从早上9时一直到下午3时，我们一包一包地把“文革”资料从窗口扔下去，当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肚子也饿了，那时粮食紧张，不够吃，容易饿。更主要是心里也不想干了，因为内心是感到这批资料还是有价值，还是应保留的，于是，我就对下面挥挥手说没有了，结束了。这样就保护下来三分之一。应该说复旦图书馆三分之二的“文革”资料是通过我的手丢出去的。前天碰到图书馆的老同事，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天你在上面丢，我在下面接，废纸厂的卡车开走了，地上散落了好大一堆，还点火烧毁呢。为了不使火焰熄灭，还不断用铁棍往纸堆里捣。

金: 1977 年的上级通知很重要, 它说明这次销毁资料的行动是较大规模的, 复旦执行得也比较坚决。不知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如何执行。从性质上说, 这应是一次否定“文革”的实际行动, 但从长远看, 从本质看, 只有深入研究了“文革”, 才能真正否定“文革”。

秦: 下面我来讲讲被曹老师暂时保护下来的那三分之一资料的命运。我进入复旦实际上形势已经相对稳定, 属拨乱反正的时期了, 尤其随着 80 年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报纸、刊物日益增多。复旦图书馆很可惜, 当时不是一个很大的物理空间, 所以库房就不行了。我们最早存放资料的是理科馆, 当时就在两个理科馆的花园里造房子。我们报刊部搬家在图书馆是有名的。当时认为有部分一定很有用的, 如《人民日报》不能动, 那些认为不是很有用的, 就往上推。等到理科馆的花园里都放满了, 地方还不够, 还放不下, 领导就给了防空洞地下三楼。于是, 把这部分“文革”资料, 还有外文报纸等, 都推了下去。这一次是有损失的, 因为认为这部分是不重要的。普通卡片有分类、有登记, 但没有登录, 不登录就不算固定财产,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曹: 确实如此, 当时图书馆有这么个观点, 只有登录过的, 才是固定资产, 将来要清点的; 只是在卡片上登记, 没有登录过的, 散失问题就不大了。

秦: 等到文科馆造好后, 资料就要从防空洞拉上来。这一拉, 损失就更大了。没搬上来的, 就散失了。有登记但没登录号的, 这部分资料就是所谓的传单、领导讲话等。后来我们也找过, 但是找不到了。到后来, 中文期刊等都处理掉了。在搬运过程中, 我们还招聘过两批搬运工, 由于这批人对文献认识程度很低, 没有保护资料的意识,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东西搬空, 就算完成了。最后, 防空洞还失过一次火。同时, 不能不承认, 当时对“文革”资料是忽视的, 可能

认为这些资料不正式，多是油印的。或许从历史价值上说，这部分资料已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可以发现了，有些内容也可能是夸大的等等。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到今天为止，我只能说，“文革”时期公开发行的那些报纸还在。

金：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某某事件”的专题传单，应该很宝贵。不管夸大还是失实，终究是原始的文献和记载，尤其是将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材料汇总起来，进行比照，可发现许多问题。其他有“文革”资料的地方，似乎这样分类的不多。我还想问一下，防空洞失火是怎么回事？

秦：因不在现场，也只是听说。

曹：听说救火车一来，用高压水枪一冲，留存的资料就全冲毁了。

秦：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没有登录和搬来搬去上。当时上面要求立刻搬运，规定你几月几号搬到位。推到防空洞里面的大部分资料是我们报刊部的，推上来的时候很急，在搬运的过程中，就没了。有的来不及搬运，就处理了。我记得有两个编目录的卡片箱，是有价值的。

金：我同意秦老师的观点，材料不能随意搬动，一搬动，就丢失，就破损。我现在见到的几处留存“文革”资料的地方，大多是没有搬过家的，所以积了四十年的灰尘，一动，就呛人。有的地方还被野猫筑了窝。

曹：那也总比丢失了好。再过许多年，复旦有人要研究这段历史，就会感到困难了。

金：我这儿有份收藏，是铅印的《巴金图书目录（供批判用）》。这份资料扉页上印着“复旦大学图书馆，1967年9月”，几乎将巴金所有版本、所有文章的目录都收齐了，资料竟然厚达40多页。巴金逝

世后在嘉兴召开了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将这份史料带到会上,那些研究巴金的博士生大为惊叹。

秦: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 也编过书目。复旦图书馆有这个传统, 也有这个能力。

曹: 我想想, 1967 年的时候, 既没有靠边, 又有能力, 大概只有几个人。你把这份收藏带来, 这件事应该查得到的。对了, 金老师你现在是上海“文革”史料专家, 你也应该给我们讲讲这些年奔波的经历和体会。

金: 简单点吧。这些年我是以“戴口罩进库, 一身灰出库”、“斜背书包上路, 一手捧着资料, 一手握着面饼”的形象, 跑了上海许多地方寻找“文革”资料, 应该说是有许多见闻和收获的。仅就面对的人来说, 第一种是明显带着“阶级斗争”的警惕眼光来瞄你的, 总觉得你是在干坏事。同时, 也有人认为这个人行动很可贵, 是对历史负责, 应该支持。第二种是关“学术禁闭”的, 就是我们还没有启封、利用这些资料呢, 你怎么可以先来利用。如果属于个人的学术收藏, 当然不能随意进入。其实, 这是一所大学, 或一座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收藏, 况且, 起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 他们那里是不会有人专门利用的。同时, 也有人认为图书馆的资源, 有人利用就显示价值, 就是好事, 应该支持。第三种是市场运作“拿钱来”, 看一次资料, 付一次钱。不是复印费, 是利用费, 平心想想似乎也算合理, 毕竟是人家的资源, 但开价很高也蛮难承受的。同时, 也有人认为这项工作很艰难, 很有意义, 甚至是功德无量的, 应该支持。三种情况, 碰到前类型的就麻烦, 就要花许多心思和工夫去解决; 碰到后类型的就顺畅, 心里就乐开了花。当然, 也有的地方是一点儿都打不进的, 真可谓“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 也许是时候不到, 还需努力。这件事一是靠意志, 二是靠工

夫，三是还得有点运气，有时机缘来临，会给你绝大的惊喜。另外，民间仍有收藏者的，捂着的。我知道上海还有个废品收购系统，或因拆迁搬家、或因长辈去世、或因单位撤销，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档案会不断流落出来，其中有不少相当精彩的东西，包括各种会议记录、文件、笔记、日记、通知、通告、信件、检讨等，都有人捡出来，弄到文庙去，专门有人收购和买卖。关键就看你投入的程度了。

今天就交流到此，感谢各位。

附录三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引 文

“文革”发生在中国，是当时郁积着、纠缠着的许许多多矛盾的总爆发，且对改革开放是个反衬，固然是中国的课题。“文革”震动并影响了全世界，当时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发生了与中国红卫兵运动相呼应的学生运动（其主旨是相异的，容后研究），“文革”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主题，所以“文革”也是世界的课题。

中国“文革”的政治路线及其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进程（国外有观点认为“文革”至 1969 年结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值得追问、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承认，国际上还是比较关注的，即从 1966 年开始伴随着“文革”的进程，就已有所展开了。具体来说有课程、有论著、有资料库等等，但总体的水准不高，主要表现在关键的第一手史料没有开掘，一些见解的树立缺乏中国式的体悟（近年，从国内出去的一批学者显得较活跃）。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甚至只有取决于国内学者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文革”研究确实具有成为世界“显学”的

品质)。

同时,我还坚持认为,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即“亲历过‘文革’运动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不是回忆录,不是口述史,而是认真的研究论著,将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批“‘文革’亲历研究者”的思考和视野一定会有局限,也一定会有许多独到的感悟(尤其在细节和心态方面)。可为数十年后年轻学人(“非‘文革’亲历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照和补偿。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鼓励并支持“‘文革’亲历研究者”的工作,也就具有了“抢救”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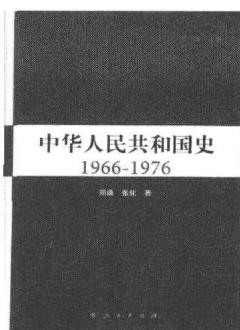


张化、苏采青主编：
《回首“文革”》

建设编著《周恩来的最

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郑谦、张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一些重大的研究项目,如《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毛

就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而言,一方面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不断推出相关著述,如席宣、金春明合作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张化、苏采青等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安



郑谦、张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76》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和一些纪实回忆,如《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都关涉较多的“文革”内容。所属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曾宣布:国史研究已成熟,《国史简编》、《全编》、《大事记》、《长编》等四个计划正在执行中。另外,中共中央党校有金春明教授在公开招收“文革”专题的研究生等。这都说明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另一方面,更广大的学术机构却没有开展“文革”研究,以至既没有资料积累,又没有学者队伍,更毋论学科建设了。其中的主要缘由恐怕在于该项研究具有很强政治敏感性,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坚持从史料出发,坚持学术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正确的路径。何况,进行“文革”研究,除了政治史的方向外,还有社会史、生活史、经济史、教育史、外交史等多方拓展的空间。2006年初,从正式渠道传来一条正式消息,那就是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申报指南《党史党建》一栏中,首次增设了“要注意开展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的内容。以此为契机,希望“文革”研究得到关注和重视。

正 文

上海在中国“文革”史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特别的,这不仅因为“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江青也与上海有很深的瓜葛),更在于“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以及后来的“整党建党”等,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势。再联系“文革”运动中上海的经济状况,上海的国际影响等因素,从上海的“切口”进入,既能扎实地做好上海“文革”史的研究,又能拓展和丰富全国“文革”史研究的内容,尤其对“了解

‘文革’这场灾难中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有着重要作用的”。[1]

关于上海的“文革”研究，尽管迄今没有定规划、成规模地展开，例如除复旦大学已正式开设“文革”史课程外，华师大、上师大、上大等综合类高校均未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社联没有专门的研究会，出版界没有专门的刊物。但因为上海“文革”的特殊地位，许多年来，终究还是有一些研究关注着它，追踪着它，终究还是涌现出一些值得记载的成果——上海的“文革”研究并非是块“不毛之地”，但还有待辛勤地开垦。我们都是开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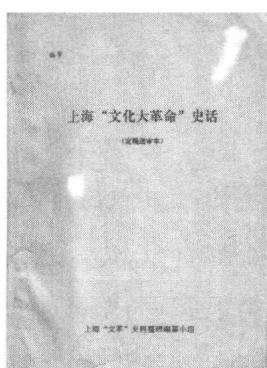
现对这些成果和史料作简介，第一部分为出版物（含未刊稿）。

一、著作类。

1.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内部印发）

该稿两大册，约五六十万字，内部印发，编号登记。1988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由市清查“四人帮”办公室的一批老干部组成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利用工作中掌握的大量资料，以及后

来上海各级党组织编写的《“文革”大事记》，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92年8月完成初稿本，1994年6月完成定稿本。全稿37章，1001页，从“‘文革’前夜发生在上海的几件事”到“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比较完整地涉及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因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刊发，本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本稿在写法上不是学术著作的路数，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

也不是报告文学的样式，且牵涉到不少“具体的人”，故没有正式出版。

2.《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第7、8章，熊月之主编，陈祖恩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内容为上海通史“当代政治”卷的一部分。尽管篇幅不大，因符合通史的体例，也就从“造反：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到“四人帮和上海爪牙的末日疯狂”，比较简略却又完整地记述了上海“文革”运动的过程。同时，本卷对“文革”发动前形势和“文革”结束后“揭批、清查、审判及平反昭雪”等内容有所展示，线索清晰，结构完整，充分显示了通史体例的长处。

3.《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李逊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

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后利用编写《上海工运志》的机会，接触了上海工总司的档案材料，并有心地作了收集和记录。1992年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写作了该书。该书21章，592页，主要以上海工总司的造反史为线索，约3/5篇幅的内容集中在1967年8月4日“踏平联司”之前，即后期薄弱一些。该书资料较丰富，许多分析也颇有见地。作者还与美国裴宜理教授合作完成了英文版的《“文革”中的工人们》。

4.《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叶永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此为叶永烈著“四人帮”全传中的三卷。每卷名为“传”，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文革”时期。叶永烈接触了一部分档案，但这不是他的长项。叶的长项在于作了大量的口述访谈（并附录音，叶称为“活材料”），有关上海“文革”的访谈对象有贺绿汀、陈波浪（常溪萍夫人）、陶勇家属、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耿金章（二兵团司令）等许多人。叶著披露的许多史料很有价值，如姚文元日记等。也许叶著过多地依赖口述，有些地方需要核实。

5.《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本书初稿成于 1992 年 10 月，重点回忆了作者“文革”十年的亲身经历。因作者身份特殊（“文革”前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经历直接关系诸如“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等事件的内情，及其被囚禁八年的情况，有其独特的价值，“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2]本书 4 章，303 页，就作者亲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还应有更宽阔的展开余地。

6.《我的“文革”岁月》陈小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作者陈小津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儿子。“文革”爆发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和制造专业。作者以其“黑帮子女”、“反动学生”、“现行反革命嫌疑犯”、“农场劳动改造”等遭际，以及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等的频繁来往，为“文革”史书写了特别的内容。同时，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和档案（如 1974 年毛泽东对陈丕显信件的批示影印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他与上海“文革”运动相关联的著述还有《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张文清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80 年》（冯小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该两书均是上海党史机构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建党八十周年而编撰的，编者非但没有回避“文革”时期，而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进行了研究，结构完整，内容全面，首次公布了一些史实和数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随想录》（巴金著，多种版本），该书为巴金先生的“文革”遭遇及其反思，可为研究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行为和心态”提供例证，为进一步反思“文革”提供启示。

《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司马东去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版）、《重大事件亲历》（刘回年著，新

华出版社 1999 年版)该两书的作者均为跟随苏振华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书中的有些材料相当可贵,如 1976 年 10 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给中央的电报等。

《苦难与风流》、《东方十日谈》等,主要记述“老三届”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另外,《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也很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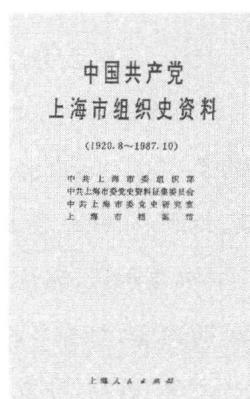
二、辞典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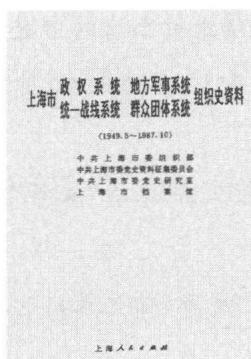
1. 《上海党史大典》(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该《大典》在第二篇重要活动与事件(1949.5—1978)中,共列出 138 个属“文革”运动时期的条目,其中除“康平路事件”、“风庆轮事件”等政治性内容外,还列有“小三线建设”、“第一座黄浦江大桥建设”等条目。同时,《大典》在第四篇重要会议中,列出 197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条目;在第五篇重要人物中,列出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条目;在第六篇重要文献中,列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等条目;在第七篇重要报刊中,列出《学习与批判》等条目,总体设置是比较周全的。

2.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内部版)

该《资料》按时间顺序专列第六章为“文化





大革命时期 1966.5—1976.10”，具体内容有“概述”，并分节列出“中共上海市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工作机构”、“上海市市级政、军、统、群系统党组(党委)”、“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下属党组织”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沿革表”等。同时，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中，也都专列“文化大革命时期”机构沿革和人员变化的内容，均可供查阅，且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3.《20世纪上海大博览》(夏东元主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该《大博览》按时间顺序排列，以与其他时期相同的规格处理“文革”部分，即一月一页(少数二月一页)，每页有大事简辑，有主要消息，并配发照片，做到图文并茂。据统计，“文革”部分约占100页。《大博览》的内容主要采编于当时的报刊，所以可与其他出版物形成互补。

另有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大辞典》，其中“文革”部分有近200个辞条。

三、方志类。

1987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2002年，上海共出版县志10种、区志12种、专志96种以及乡镇、街道志、行业志上百种，高校志十多种等。

应该承认，因认识的局限，绝大多数志书没有设“专记”记录“文革”的内容，但志书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又决定了它必然绕不过“文革”时期，即或多或少地有所记录。所以，除了仅有的几本外，

还是能从绝大多数的志书中检索出“文革”内容的，尤其《中共上海党史》、《上海工运志》、《上海青年志》、《上海劳动志》等，都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文革”中的工人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上海价格志》、《上海卫生志》、《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日用品工业志》等则可提供大量“文革”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

2005年，《上海通志》(全十册)正式出版。《通志》第45卷专列“文化大革命纪略”，分五节以纪事体记录了39个专题，如“上海市委写作组”、“同济五·七公社”、“上海地下党冤案”等，所选内容重大，材料和数据准确，具有权威性。

四、大事记类。

继清查“四人帮”工作以后(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1983年10月起，上海各级党组织又集中进行了历时三年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教育。据此，在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全市各部、委、办、区、县、局党委、党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党组，均组织力量编写了《“文革”党史大事记》(后不少单位在时间跨度上进行了扩展，成建国后的党史大事记)和专题调查报告。这些大事记少则数万字，多的达到数十万字；有的单位正式出版，如《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党史大事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有的则内部刊印，如《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历史大事记》、《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等。尽管这些大事记是某一部委、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记事，目前也散见于各处，但汇总起来，串联起来，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

五、报刊类。

“文革”期间，上海连续出版的正式报刊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支部生活》（包括《新民晚报》等均停刊）。上海“一月夺权”前，该“两报一刊”作为市委机关报，为维护大局，坚持从正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宣传和报道（即从不刊登“革命造反”的消息），例如上海人民如何热情接待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等。“两报一刊”夺权后，则完全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甚至直接发布“通告”之类，最终成为“四人帮”集团的喉舌。

在“文革”初期创办的造反报刊中，尽管也有一些通过邮局发行，唯有《工人造反报》被列为正式报刊（后合称上海“三报一刊”）。1971年4月，经调整后《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宣布停刊。“文革”中期，上海又创办了连续出版物《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正是这些报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涉及广泛的政治评论和社会报道等，决定了它们作为“文革”研究资料，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

第二部分为非出版物。

一、档案类。

因上海“文革”没有经历军械性的全面武斗，各方面的管理也比较规范，所以，上海在“文革”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方面，还是做得很有成效。不仅市档案馆保存了相当部分的“文革”档案，如C33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档案（1966—1976）3 968 卷；B60 上海市“五七”干校档案（1967—1978）3 766 卷；B61 上海市革委会地区组档案（1968—1978）133 卷；A87 上海市审判“四人帮”办公室档案（1979—1982）552 卷等。^[3]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等也都保存着部分的“文革”档案。应该承认，这些档案（会议记录、通告、文件、简报、批示、报表、往来信件等）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只是因为目前尚不开

放，其利用价值也就有待以后开掘了。

二、群众报刊类。

1. 上海“文革”运动中市级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所谓“市级造反组织”是指或跨地区、或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因规模大、联络广，注重宣传舆论，均创办了铅印的报刊（约三十多种），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红总部）、《红卫战报》（革会、红上司）、《上海红卫兵》（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财贸战报》（财革会）、



《财贸战报》

《体育战报》（上体司）、《文艺战报》（上艺司）等，这些报刊大多创办于1966年年末至1967年年初。以后，在大批判高潮中，又有全市性的《大批判通讯》（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政法战线》（上海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教育革命》（市红代会）等创刊。这些报刊既有自己的组织立场，又参与全市的“文革”运动，且因多数通过邮局、新华书店发行，有一定的权威性。后市革委会着手进行整顿、整肃，这些报刊大多于1968年9月停刊，最晚的如《体育战报》、《红艺战报》则拖延到1969年5月停刊。就此，一般市级造反组织的报刊均连续编发2—3年，少的几十期，多的则达到上百期，是研究上海前期“文革”运动的重要资料。



《体育战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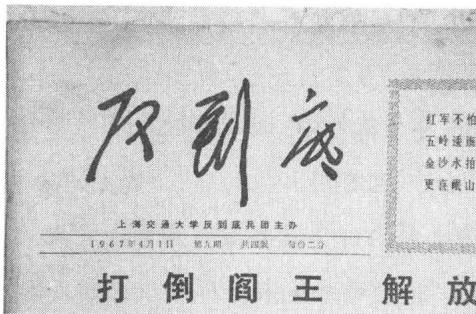
《文艺战报》

2.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众所周知,各高校(尤其重点高校)的造反组织在“文革”中均充当了重要角色,即这些组织不仅以学校为战场,更“杀”向社会呼风唤雨。因之,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就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辐射力,在上海主要有《东方红》(同济东方红兵团)、《反到底》(交大反到底兵团)、《革命楼》(戏剧学院“革命楼”)以及《新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已发现铅印版总量约六十多种)。这些报刊虽然不在邮局、新华书店发行,仍能通过交换、街头叫卖达到较高的发行量。高校造反组织间会有很多变数,其报刊的存在时间也就会有长短,短的数周,编发几期;长的数年,编发上百期。至1969年5月,上海各高校报刊全部奉命终刊。上海高校报刊独特性强,内容丰富,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有



同济《东方红》



交大《反到底》



《复旦战报》

的保持了长久的连续性，是研究上海前期“文革”运动的重要资料。

3.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基层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此处所说的“基层群众组织”是指各区、县、局一级的造反组织。

这些组织有的很庞大,很有资源和实力;有的则很有关系,上通下达,所以都能独立地拉起编辑部,主办铅印版的报纸,如《铁路工人造反报》(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红医兵团》(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卢湾区大批判》(卢湾区大批判宣传组)、《房产工人》(上海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史学批判》(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等。据统计,现已发现的此类报刊有200多种。应该承认,此类报刊中只有小部分立足于反映本系统、本行业的情况,办得较有模样,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前例);大多数则迎合了群众博取“小道消息”的兴趣,版面上充塞着“首长讲话”、“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内容。这些报刊除了供内部交流外,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外销售,所得钱款多作为组织经费。另外,也有同人报刊、地下报刊混入其中。此类报刊众多而杂乱,作为史料的价值需要有所检索和发现。

4. 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1966年8月中下旬起,随着北京红卫兵大批南下,至年底逐渐形成了以“首都三司”为代表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群体(规模不等达五十多个)。这些外地红卫兵组织驻扎上海,以“指点江山”的姿态参与上海的“文革”运动,趁“一月革命”兴起之时,办起了铅印版的报纸,主要有《首都红卫兵——上海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新北大评论》(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井岗山报》(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1967年3月,中央宣布红卫兵返校,这些联络站纷纷响应,所办报纸随即停刊。

1967年6—9月间,全国发生大规模武斗,江浙一带及湘、鄂等地的部分造反派流窜到上海,在上海办铅印小报,以制造舆论,如《苏南火线》(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联络站)、《浙江通讯》(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站)等(约三十多种)。10月后,毛泽东南巡讲话发表,形势有变,这些联络站及报刊也就消歇了。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红旗》创刊号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红色造反报》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
兵驻沪联络站《八一三红卫
兵》创刊号

这两类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一类集中在“一月革命”时期,并直接作为舆论工具,参与了“一月革命”的全过程,突出表达了外地红卫兵的立场和观点;一类则是全国武斗情况在上海的间接反映。两类报刊的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研究这两个时段的上海“文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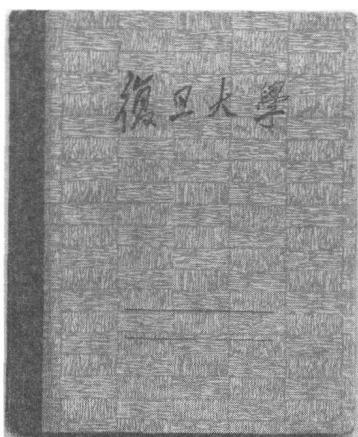
三、传单类。

“文革”时期,传单这种自由印发的宣传品,主要在1966年至1967年间大量使用。在上海,针对北京红卫兵宣扬“红色恐怖”、“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以及“炮打张春桥”、“冲砸联司”等,均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大量散发和张贴传单,有的甚至从上海的高楼大厦上往下飞撒。应该说,这些传单的内容最直接表达了参与者的立场和态度,是最具有现场感的史料。但是,传单零散性的特征不仅使之难以汇总,也不宜保存。所以,对“文革”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就有个不断寻觅和汇编的过程。笔者曾经在几处布满灰尘的书库里;人家的床底下、楼板上,发现或散乱、或堆积的传单,真属于“可遇而不可求”。

四、日记类。

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习惯写日记,尤其经历“文革”这段激荡的岁月,甚至会有人坚持数年,成册成本地记,如葛剑雄教授整理出版的《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就有谭其骧记于1966年5月至1970年12月的“文革”日记达200页。时下,上海有个民间图书文档收藏网络,一头连着分布全市的废品收购站,一头挂在文庙的交易市场。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单位撤并,家庭搬迁,便有大量留存多年的文档流入了这个网络。笔者曾在一专业收藏者手中,见到

数套非常完整的“文革”日记和家庭账册，其内容中虽然有不少空洞的豪言壮语，一些具体的记录无疑很真实，甚至可为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提供细节上的佐证，应属十分宝贵的研究史料。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文革”时期的照片、信件、交代、检讨、思想汇报，甚至档案、文件等在这个网络中交流，关键是“文革”史研究工作者要有眼光和耐心，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金在其中淘洗。



复旦大学一女红卫兵的日记本



上海一职工“文革”时期的家庭账册

综上所述,关于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分为“出版物”和“非出版物”两大类。出版物中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非出版物中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事实上,尽管这些史料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真正进入专题研究,还是要融汇一体,并相互比对,相互参照的。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展开,有所建树,必须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正是缘于这个判断,本文列举了相关信息,以供参考。

注 释

- [1]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页。
- [2]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 [3]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市档案馆简明指南》,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432页。

附录四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和 包含“文革”内容的情况简介

根据《上海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和公布办法》第七条规定：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一般应当向社会开放；到期仍不宜开放的档案经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可以延期开放。

一、A部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系统

A-1、A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	A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	1949—1976	10 017
2	A23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	1954—1969	2 211
3	A24	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	1954—1971	235
4	A33	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1949—1990	3 510
5	A38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	1949—1967	1 156
6	A41	中共上海市委国防工业委员会	1965—1968	12
7	A52	中共上海市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1958—1968	1 508
8	A55	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设设计委员会	1954—1969	591
9	A73	《解放日报》社	1949—1990	1 109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0	A76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949—1990	2 986
11	A78	中共上海市委高级干部自修班	1956—1968	9
12	A8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敌伪档案小组	1967—1976	424
13	A84	中共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	1950—1967	3 584
14	A94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1949—1990	8 711
15	A98	上海市财贸五七干校	1969—1976	837
16	A10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党委	1973—1979	80
17	A11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宣队清档小组	1967—1969	83

A-2、A部类全宗号举例：

A-2-1

1	A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委员会	1949—1976	10 017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市委、市委革会直属机关党组织工作计划、总结；第四届党代表大会材料；市革委会成立大会材料；市委、市委革会全委、常委和扩大会议记录；市委、市委革会领导讲话；市委、市委革会编印的《情况简报》；市委、市委革会机构设置、人事任免的决定、通知；市委、市委革会对部分干部进行批判、专案审查的批示；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寨；市委、市委革会对上海民兵工作、征兵、拥军爱民、野营拉练、国防基建、防空战备等批示；有关文攻武卫、工人武装的批示、通知；市委革会外事小组及接待外宾工作的请示、报告；市委革会处理工资、就业、支农支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规定；有关梅山铁矿、石化总厂、万人体育馆建设工程的文件；“文革”期间的各项政策规定、实施计划、情况汇报、工作总结；粉碎和清算“四人帮”及其在沪余党的反革命罪行的请示、报告、批示等。

A - 2 - 2

3	A24	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	1954—1971	235
---	-----	-------------	-----------	-----

1967年1月,《支部生活》编辑部由造反司令部勤务组领导。编辑部下设编辑组、采访组、情况组、信访组、内务组。1971年4月,《支部生活》停刊,编辑部撤销。本档主要内容有编辑部工作计划、规划、总结;给市委革会的请示、报告等。

A - 2 - 3

9	A73	《解放日报》社	1949—1990	1 109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解放日报》社革委会、党委会会议记录;“文革”运动中的有关揭发材料、情况简报、大字报摘录;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整风资料和造反队组织名称、人员名单;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简报;编辑部关于政治运动报道的计划、总结等。

A - 2 - 4

12	A8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敌伪档案小组	1967—1976	424
----	-----	------------------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敌伪档案小组成立于1967年10月。其职责是组织清查敌伪档案的工作。历任主要负责人有:刘和德、刘欣生、刘广泽。内部机构历经变化,至1971年4月精简为秘书组、业务组和敌档组。1972年初该机构撤销。馆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敌伪档案小组全宗档案共424卷,档案排架长度22.4米。档案起止年代为1967—1976年,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该组贯彻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指示的意见、措施、情况报告；市革委会领导对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召开清档大会的材料；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简报；关于敌档材料汇编工作请示及敌档摘编；中央清档组关于抓紧查译外文档案的电话通知；战备档案转运后库的请示和情况报告及进库标准；接收及销毁档案的报告及清册等。

2. 组织人事类

有建立市革委会档案机构的请示报告；清查外文档案建立领导班子，人员调动、经费等问题的报告；抽调干部、复员军人、学生参加清档工作的请示报告；市革委会材料组工作人员通讯录等。

3. 业务类

有各区、县、局等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总结；对敌伪档案加强集中保管情况报告；处理抄家物资中敌伪档案的意见、报告；市区、县、局机关档案鉴定处理办法及鉴定报告；查阅敌伪档案材料的方法、审批手续等规定及接待查阅工作报告；上海市敌伪档案调出情况调查报告；敌伪材料呈阅件；编写英汉、法汉辞典及赴京学习的调查报告等。

4. 基建类

有建造后库工程和管理、调卷手续的请示报告等。

A - 2 - 5

14	A94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1949—1990	8 711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1967—1976年市委革会组织组核心会议记录；1967—1977年上海市党员、干部组织和行政关系介绍信；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组织路线罪行发言稿；揭批“四人帮”迫害干部及私藏档案的罪行调查材料、“文革”后干部解放审批材料等。

A-3、A部类全宗0号目录有关内容：

A-3-1、《文汇情况》(1971年1月至1976年8月)。文汇报党委办公室编印,共42期。系文汇报社在“文革”中编发的关于上海市工业、农业、政治运动等综合情况的内部参考资料。

A-3-2、《解放日报情况简报》(1971年2月至1976年8月),共37期。系解放日报社在“文革”中编发的关于上海市工业、农业、政治运动等综合情况的内部参考资料。

A-3-3、《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学术报告》(1971年8月)。杨振宁应邀于1971年在上海锦江饭店作系列学术报告,共4次。由上海市革委会科技组业务组、上海市物理所、复旦大学负责整理。

A-3-4、《文教简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编,共8期。主要汇集了1973年1月至1975年12月期间,上海市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反映。

A-3-5、《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报》(1972年2月至1972年3月),共38期。外交部接待组编印。

A-3-6、中共上海市委编印(1970年)《情况反映》、《会议文件》。

二、B部类：上海政府系统

B-1、B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8	B3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	1961—1967	257
19	B6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五办)	1961—1967	667
20	B7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交通办公室	1955—1967	469
21	B11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	1962—1967	215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22	B12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	1949—1967	1 906
23	B17	上海市有色金属工业公司	1956—1969	440
24	B18	上海市钢铁加工工业公司	1956—1969	283
25	B19	上海市农业新技术办公室	1970—1975	20
26	B23	上海市人事局	1949—1969	532
27	B29	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	1952—1968	1 828
28	B30	上海市物价委员会	1957—1967	117
29	B31	上海市统计局	1949—1968	2 234
30	B42	上海市机电设备成套局	1955—1969	426
31	B43	上海市生产技术局	1958—1969	317
32	B45	上海市农业局	1955—2004	7 666
33	B47	上海市多种经营领导小组	1963—1968	37
34	B48	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档案馆	1949—1975	1 204
35	B50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	1956—1990	4 042
36	B53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视察办公室	1955—1968	52
37	B60	上海市五七干校、上海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6—1979	3 777
38	B6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地区组	1968—1978	133
39	B62	上海市七二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1970—1980	49
40	B64	新桥矿工指挥部	1971—1983	191
41	B66	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1971—1973	794
42	B67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	1966—1991	3 587
43	B68	上海市后方轻工业公司	1970—1988	2 112
44	B69	上海市后方机电工业公司	1969—1991	1 531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45	B70	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	1966—1992	2 082
46	B71	上海市后方化学工业公司	1970—1992	1 285
47	B74	上海民兵指挥部	1967—1976	1 894
48	B76	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上海第二重工业局	1955—1995	13 362
49	B77	上海市航空工业办公室	1972—1989	1 822
50	B82	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	1956—1991	5 363
51	B84	上海市第一建筑材料工业公司	1957—1986	1 761
52	B85	上海市第二建筑材料工业公司	1964—1987	905
53	B89	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	1955—1986	3 954
54	B90	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1956—1986	2 313
55	B9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949—1972	2 185
56	B97	上海市税务局	1949—1973	2 513
57	B98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	1950—1994	16 251
58	B99	上海市纺织器材工业公司	1956—1987	1 621
59	B102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	1962—1991	1 277
60	B103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	1960—1995	7 838
61	B104	上海市财政局	1949—1988	3 763
62	B105	上海市教育局	1949—1995	14 390
63	B109	上海市物资局	1957—1994	5 909
64	B112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	1955—1996	13 002
65	B113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1959—1990	1 201
66	B116	上海市汽车工业总公司	1958—1990	2 159
67	B118	上海市财政贸易干部学校	1958—1969	220
68	B119	上海市建筑工程管理局	1953—1993	7 834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69	B120	上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1949—1990	1 288
70	B123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	1953—1995	21 086
71	B125	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	1950—1992	1 998
72	B126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4—1977	1 557
73	B127	上海市劳动局	1949—1998	6 366
74	B134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	1958—1995	20 649
75	B135	上海市粮食局	1954—1997	4 622
76	B136	上海市广播电视台工业局	1970—1986	1 078
77	B137	上海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	1970—1986	1 401
78	B138	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	1970—1986	946
79	B144	上海市电影照相器材工业公司	1973—1986	1 001
80	B146	上海市电机工业公司	1961—1989	3 219
81	B150	上海市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	1955—1986	2 904
82	B154	上海市交通运输局	1955—1996	8 711
83	B155	上海市缝纫机公司	1955—1986	2 001
84	B157	上海市搪瓷保温瓶工业公司	1955—1986	2 707
85	B158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	1953—1995	7 717
86	B159	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	1954—1986	1 640
87	B161	上海市文化体育用品工业公司	1962—1968	310
88	B162	上海市建筑构配件公司	1964—1986	1 480
89	B163	上海市轻工业局	1952—1995	13 352
90	B165	上海市木材工业公司	1956—1968	805
91	B166	上海市轻工业装备公司	1975—1986	1 352
92	B167	上海市出版局	1955—1987	3 096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93	B168	上海市民政局	1949—1990	1 710
94	B170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	1954—1987	6 341
95	B171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全宗汇集	1950—1971	212
96	B172	上海市文化局	1949—1995	8 034
97	B173	上海市机电工业管理局	1954—1995	8 071
98	B177	上海市电影局	1949—1995	4 469
99	B178	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	1949—1988	4 896
100	B180	上海市农垦局	1960—1968	330
101	B181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1958—1968	892
102	B182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49—1979	14 744
103	B183	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	1956—1986	1 789
104	B184	上海市粮油工业公司	1964—1987	1 821
105	B189	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	1949—1986	3 742
106	B190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	1954—1987	1 857
107	B191	上海市第二织布工业公司	1965—1984	627
108	B194	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	1957—1984	978
109	B196	上海市日用五金公司	1956—1986	3 354
110	B200	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	1958—1986	5 304
111	B201	上海市毛巾被单工业公司	1966—1986	1 678
112	B206	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	1955—1986	1 556
113	B207	上海市纺织机械工业公司	1954—1986	3 145
114	B210	上海市电器公司	1960—1986	2 352
115	B212	上海市化工装备工业公司	1966—1986	1 828
116	B213	上海市液压气动元件公司	1960—1986	1 796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17	B214	上海市标准紧固件工业公司	1965—1970	673
118	B218	上海市照明灯具公司	1975—1986	1 027
119	B219	上海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	1965—1986	2 006
120	B220	上海市化学原料工业公司	1956—1986	2 606
121	B221	上海市包装装潢工业公司	1978—1986	982
122	B222	上海市化肥工业公司	1963—1986	1 219
123	B225	上海市轻工业机械公司	1953—1986	2 580
124	B226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1953—2000	4 296
125	B22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组	1967—1968	91
126	B228	上海市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8—1983	584
127	B233	上海市工具设备金属制品工业公司	1962—1978	522
128	B238	上海市家具公司	1962—1986	1 814
129	B241	上海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	1962—1987	1 046
130	B242	上海市卫生局	1949—1990	5 343
131	B243	上海市高等教育部	1949—1994	4 813
132	B244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	1967—1994	7 056
133	B245	上海市粮食供应公司	1962—1996	1 417
134	B246	上海市经济委员会	1967—2003	15 696
135	B247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7—1990	4 794
136	B248	上海市商业委员会	1967—2003	7 730
137	B250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1967—2003	7 148
138	B25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收安置复退军人办公室	1968—1976	32
139	B25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	1969—1977	346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40	B253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	1967—1990	5 353
141	B255	上海市水产局	1949—1992	4 370
142	B256	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1963—1990	617
143	B257	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1949—1990	7 195
144	B258	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	1949—1990	26 338
145	B262	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958—1996	4 178
146	B263	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修建公司	1975—1985	395
147	B265	上海市染料农药工业公司	1956—1986	1 275
148	B266	上海市有机化学工业公司	1959—1979	708
149	B271	上海市公用事业设备修造公司	1960—1986	823
150	B280	上海第六钢铁厂	1950—1968	113
151	B282	上海市内河航运公司	1955—1978	767
152	B284	上海市内河航运管理处	1966—1978	385
153	B285	上海市广播电视台	1973—1995	5 445
154	B335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968—1990	557

B-2、B部类全宗号举例：

B-2-1

35	B50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	1956—1990	4 042
----	-----	-----------------	-----------	-------

1968年10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建制撤销。1973年5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1967年后档案按“年度—问题”分类排列。本档主要内容有办公会议记录、通知，年度工作规划、总结、工作简报、情况简报、调查报告，有关领导关于

机关后勤工作的讲话指示；局机关和基层单位革委会成立的通知、批复、成员审批表；市革委会机关经费预算和经费支出情况报告、年度决算、利润指标及局属单位收支情况；市革委会办公室行政组关于中山故居等房屋设备修整、申购、调拨物资报告、批示及清单；市革委会机关关于基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整风情况汇报及会议记录；市革委会机关关于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工作打算、材料汇编；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的计划、小结、简报、清查工作报告、会议记录；对“文革”中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平反落实政策的意见报告、会议材料、记录、统计表等。

B - 2 - 2

37	B60	上海市五七干校、上海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1966—1979	3 777
----	-----	------------------------	-----------	-------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与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于1968年4月20日合并，成立上海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实行常委制，常委有徐景贤、王承龙等12人，下设政宣组、组织组、专案组、办事组，掌有审查、处理、分配干部和处理机关财产、档案、文书资料的权力。1969年10月28日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成立，联络站随之结束。1972年4月15日华东局机关“五七”干校与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合并，成立上海市“五七”干校，方杰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内部机构设办公室、政工组、教研组、生产组、后勤组、组织组、专案组。其主要任务是轮训在职干部和搞斗、批、改，1976年10月以后，主要任务是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9年5月，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干校撤销。馆藏上海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五七”干校全宗档案共3 777卷，档案排架长度14.4米，档案起止

时间为 1966—1979 年,按大流水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有关联络站和干校的批示、讲话记录;联络站与干校的各种会议记录;联络站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及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市革会的报告;干校大事记;整党建党材料及市委、市人委等机关的档案数量统计、移交清单、销毁目录等;《社会动态》、《社会简报》、《红卫东通讯》等简报。

2. 组织类

有成立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文件;调整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革委会成员的报告与批复;联络站、干校及华东局机关人员名册;干校关于干部分配、安置的报告及批件、干部退休审核表等。

3. 专案类

有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材料,干部隔离审查的请示与批复,干部定案处理报告及处理决定;有 11·10、9·24、10·24、12·5 及浙甬等事件的专案材料等。

4. 复查类

有干校复查小组领导班子组成情况及工作总结;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记录;各兵团反对“四人帮”案件重新处理意见与批复,坚持平等干部的复查结论、报告与批复,部局级干部复查、平反情况的报告,“文革”中受审查人员名单及揭矛盾等材料。

5. 轮训类

有干校各期轮训班开学典礼、结业大会材料、教学计划、学员情况调查汇报、学员名册、全市干校轮训经验交流大会材料、四个面向工作计划总结等。

6. 财务类

有干校行政经费总账, 经费发出明细账, 银行现金明细账及现金日记账; 干校人员工资表, 干校党团费收缴、支出情况报告; 干校办事处财产房屋等资料。

B - 2 - 3

42	B67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	1966—1991	3 587
----	-----	------------	-----------	-------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5 年 10 月的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 曾先后更名或改组为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即二二九工程指挥部)、八一二指挥部、上海后方基地党委。1979 年 3 月,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成立。其主要职责为管理上海后方基地的建设。1988 年撤销。历任负责人有: 罗白桦、黎崇勋、孙更舵、陈汉运、李彬山、韩克辛、侯建君、王祥举、苏博、王昌清、王志洪。

馆藏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全宗档案共 3 587 卷, 档案排架长度 27.2 米, 档案起止年代为 1966—1991 年, 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关于三线建设的批示; 中共上海市委、南京军区、安徽省工办等有关小三线建设指示; 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会议材料; 该局年度工作总结、简报、大事记; 上海市后方企业整顿总结; 上海后方建设会议纪要; 后方民兵工作、人武工作、保卫工作材料; 三线工人抗洪事迹等。

2. 组织人事类

有该局及所属单位机构设置、调整、撤销、领导体制改变及人事工作材料; 机构沿革材料; 科技人员、老干部工作、统战落实政策材

料；劳动工资工作材料；各种先进材料等。

3. 党团工会类

有党委会议记录、党代会材料；党建工作、宣传、纪检工作材料；该局工会代表大会材料；团代会材料；工会、团委工作材料等。

4. 业务类

有上海后方基地十年发展规划，主要军工产品、军工生产计划；常规兵器工业基本情况统计表；物资、基建、原材料年报；小三线兵器生产试制计划；兵器鉴定定型材料；工业学大庆材料；重大科技成果材料等。

B - 2 - 4

47	B74	上海民兵指挥部	1967—1976	1 894
----	-----	---------	-----------	-------

1967年8月成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1972年8月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该部负责市区及郊县民兵工作和全市野营训练工作。历任负责人有：翁默清、李彬山、朱万国等。内部机构曾设：办事组、政工组、后勤组、指挥组、作战组、训练组、特种兵组等。1976年该机构结束。

馆藏上海民兵指挥部全宗档案共1 894卷，档案排架长度为40.8米，档案起止年代为1967—1976年，按问题分类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该部办公会议、支委扩大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作战、后勤、表彰等各类会议记录；工作计划、总结；民兵工作材料；张春桥、王洪文、江青、马天水、王秀珍等关于民兵工作的讲话；第二武装材料；组织民

兵野营训练、参加阶级斗争的材料；接待外国代表团的材料；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帮”材料；查封各省市驻沪办事处材料及各沪办清理结束工作报告；各类简报、证章、旗帜、照片集、剧本等。

2. 战备类

有上海民兵武器装备规划、报告、统计表；战地救护、军事训练、军事表演、人防战备、节日游行、保卫工作、野营训练等材料；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兵力部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材料；各类案件处理材料；文攻武卫进驻老大难单位的材料；进行政治大扫除及冲击清查行动材料；业余京剧小分队、地下音乐会等组织的调查处理材料；打击支疆倒流犯罪人员材料；追查“总理遗言”材料；追悼毛泽东大会材料；冲击对象、隔离人员、遣返对象材料；民兵组织教育青少年材料；各区县维护革命新秩序办公室情况简报等。

3. 组织类

有机构编制、干部任免等材料；建立、发展文攻武卫组织、民兵组织的规定、请示、批复等；各级领导班子问题的讨论记录，民兵基层领导班子调查、考核情况该部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名单，政审表，干部、党员统计表；干部战士违纪处理情况；民兵整顿组织材料，三位一体四部合并工作材料；各类学习班、读书班材料；民兵组织各类情况统计表；上海市文攻武卫各师团营连通讯录、队员名册等。

B-2-5

55	B9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949—1972	2 185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历年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有关录制毛主席语录、舞剧《白毛女》、样板戏宣传的意见、指示；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广播会宣传计划等。

B - 2 - 6

57	B98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	1950—1994	16 251
----	-----	----------	-----------	--------

主要内容有局革委会成立大会纪要、局革委会会议记录、工作计划及编制的《情况汇报》；日用品购货券发放的规定和管理办法；副食品凭证供应的方案报告、统计资料；蔬菜收购价变化情况和价格综合材料；“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项政治运动的计划、情况分析、总结；干部复查的报告批复；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和发言材料等。

B - 2 - 7

60	B103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	1960—1995	7 838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局革委会会议记录、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各类简报；处理抄家财物的规定、通知；局“文革”运动材料、《仪表局文革大事记》；揭批“四人帮”运动材料；“文革”复查工作材料；清理“三种人”材料；落实政策工作材料等。

B - 2 - 8

61	B104	上海市财政局	1949—1988	3 763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局革委会、造反队会议记录、工作计划、总结；“文革”运动和揭批“四人帮”的清查材料；“文革”经费开支的规定、办法；全市“文革”期间粮款物借支、催收、清理的报告、通知；冻结存款的处理意见和报告等。

B - 2 - 9

62	B105	上海市教育局	1949—1995	14 390
----	------	--------	-----------	--------

1968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革委会和上海市高等教育部革委会合并为上海市教育局革委会。本档主要内容有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军工政三结合领导小组会议记录;1966年组织革命大串联材料;东方红公社于1967年1月13日在人民广场大会发言材料;三结合领导与运动联络员会议记录、交流运动情况、研究大批判材料;造反派组织成立及接管教育局的材料;揭批“四人帮”的清查材料等。

B-2-10

70	B123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	1953—1995	21 086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局革委会会议记录、工作简报;局“文革”大事记、专题材料;上海市场主要商品价格表、统计表;整党建党情况报表;调整充实局革委会班子的请求和批复等。

B-2-11

72	B126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4—1977	1 557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市体委革委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精简机构的决定和有关组织整顿文件材料;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会议记录;《体育战报》;市体委革委会委员、工作人员名册;纪念毛主席七月十六日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材料等。

B-2-12

73	B127	上海市劳动局	1949—1998	6 366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上海市劳动局革委会成立、建立核心小组问题

的请示报告；上山下乡的工作意见、通知；汇编“文革”以来上海市工农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和职工人数基本情况的统计资料等。

B - 2 - 13

100	B180	上海市农垦局	1960—1968	330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上海市农垦局机关造反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农垦局革委会的请示；知青口粮供应、基建投资拨款办法；市革委会关于农牧场粮食管理、播种青玉米计划的批复；市革委会经济计划组下达基建计划的通知等。

B - 2 - 14

125	B22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组	1967—1968	91
-----	------	---------------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组成立于 1967 年 3 月，负责联系全市的劳动工资工作和接待工作。组长肖习增。内部机构设有：秘书组、工资组、调配组、管理组（劳动力管理）、保护组、接待组。1968 年 5 月机构撤销。馆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组全宗档案共 91 卷，档案排架长度为 1.6 米，档案起止年代为 1967—1968 年，按时间顺序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上海市革委会关于机构设置、刻章印章等的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 1967 年核心组会议记录，月份工作打算，工作小结；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流毒与节约闹革命的规定、通知；该组编印的《劳动工资组情况简报》；接待组核心碰头会议记录和接待组汇编的《情况反映》；徐景贤在上海市街道里弄和集体事业工作人员抓革命、促

生产誓师大会的讲话材料等。

2. 劳动工资类

有职工、学徒、复员退伍军人、大专毕业生、研究生工资待遇、转正定级问题的批复、通知；复员退伍军人、半工半读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恢复职工探亲假的意见、通知；老年职工退休、职工子女顶替、职工对调等问题的请示、意见、通知；社会闲散劳动力、劳动妇女、街道劳动服务队和临时工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江西小三线职工劳动工资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报告及经济计划有关通知；来沪探亲的支疆青年返疆路费问题的通知等。

3. 劳动保护类

有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劳防用品、保健食品和矽肺诊断、矽肺病职工待遇问题的通知、复函，召开锅炉安全工作斗、批、改座谈会和了解锅炉受压容器事故情况的通知函及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的情况汇报；召开彻底批判劳动保护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的座谈会、防暑降温防尘防毒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的请示、通知、会议纪要；职工伤亡事故的报表文字说明；蒸汽锅炉情况统计表；劳动保护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稿)等。

B-2-15

126	B228	上海市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68—1983	584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于 1968 年 7 月，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一个常设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实施、动员、安置、巩固上山下乡的青年的具体工作。历任主要负责人有：张芳信、王一平、贾晋等。办公室下设五个组：办事组、政宣组、组织组、生产后勤组、计财组。1981 年 1 月机构撤销。馆

藏上海市人民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全宗档案共 584 卷，档案排架长度为 4.8 米，档案起止年代为 1968—1983 年，按问题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调整国务院知青办小组成员的通知，国务院知青办工作安排、干部任命的通知，市委、市政府关于知青办领导任职、机构调整等问题的批复；市知青办关于建立上海市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机构归并和人员安排等问题的报告、通知，本办任务职责和工作人员名单，历年办公会议记录、领导小组会议记录、干部学习计划、本办关于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升级干部调动问题的报告、历年的工资表、工资年报表等。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国务院知青办和市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人物材料汇编、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统计资料；本办关于刻制印章、编辑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学习文选的报告知青工作打算和工作情况汇报、工作小结，知青上山下乡基本情况年报表及信访反映等。

2. 中学毕业分配类

有市知青办关于历届中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分配方案、情况反映、统计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报告、通知、情况反映；欢送知青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材料；动员城市居民下乡落户、安排残缺青年、犯错误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意见，处理中专、技校半工半读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函等。

3. 统筹安置类

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转发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纪要，市委关于贯彻中央文件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若干措施；市知青办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意见、报告，上海

市知青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传达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情况反映等。

4. 善后工作类

有中央关于召开知青工作会议的通知;国务院知青办关于积极解决知青闹事问题的简报;市知青办关于加强下乡知青巩固工作、困难补助工作和物资支援等问题的报告;动员机关干部四个面向和学习慰问团工作的报告、疏散人口、闲散居民安置的报告,知青办业余函授教育工作和向知青赠书的报告,关于信访工作的简报等。

5. 经费管理类

有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下乡知青安置费拨款、知青经费使用问题的通知,市知青办和财政局关于下乡经费决算、预算的批复、报告,市知青办关于知青下乡经费的报告、通知、经费决算预算表等。

B - 2 - 16

130	B242	上海市卫生局	1949—1990	5 343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及所属单位成立革委会的请示、批复、委员名单;局革委会的会议记录;中医针刺麻醉研究工作情况汇报;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报告、通知;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名单、工作汇报及有关简讯;上海工总司卫生系统总站活动纪要;有关区县卫生机构建立联络站报告及造反队组织统计表;造反派“七一兵团”成立大会材料;局高级知识分子调查表;局团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会议材料等。

B - 2 - 17

132	B244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	1967—1994	7 056
-----	------	----------------	-----------	-------

196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教育卫生组成立。本档主要内容有市革委会教卫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记录、办公会议、座谈会记录;市革委会教卫组大事记;核心领导小组的报告、批示;文艺座谈会记录、样板戏普及工作;赤脚医生培训材料等。

B-2-18

134	B246	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	1967—2003	15 696
-----	------	--------------	-----------	--------

1967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业交通组成立。1980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本档主要内容有市革委会工交组历年工作计划、会议记录、有关请示、批复;上海工交系统出席中共九大代表、上海人大代表及赴北京国庆观礼代表的产生文件;加强上海后方建设会议纪要、整顿后方机构请示报告及后方建设项目的报告、批复和通知;全市工业系统建立、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意见、报告;市交通战备会议、交通运输情况汇报;小三线、大三线建设和生产工作的计划、报告、批复及会议文件;新建万人体育馆、地下铁路试验工程、金山黄浦江大桥落成通车等情况汇报;七二一大学情况调查汇报;援助越南、朝鲜、尼日利业、罗马尼亚等国物资、成套设备、工程项目的计划、要求、人员培训及外事接待等文件、会议记录;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工作的规划、报告;工交系统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文件;干部审查落实问题的规定、通知;专案工作的《情况简报》等。

B-2-19

136	B248	上海市商业委员会	1967—2003	7 730
-----	------	----------	-----------	-------

“文革”时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财贸组。1971年3月,原市

财政局、市税务局、人民银行市分行合并为市财政局。1996年更名为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本档主要内容有市革委会财贸组历年工作计划、总结、组领导讲话、报告；历年市场供应计划报告和执行情况检查总结；上海市场主要商品、农副产品价格表、统计表、物价年表；关于成立市财贸组党组的批复、工作要点、会议记录；市财贸组关于工业品收购、调运、供应市场的汇报；贯彻国务院和市革委会的规定与批示及关于粮食、棉花等通知；有关农副产品生产、收购和供应市场的情况；市财贸组报请审批市财政决算、财政收支计划报告、追加财政支出预算的请示报告与批复等。

B - 2 - 20

137	B250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1967—2003	7 148
-----	------	----------	-----------	-------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成立于1980年1月，其前身是上海市革委会农村组、三秋指挥部等。本档主要内容有市革委会农村组的工作计划、报告、总结；农口总部、工宣团负责人、机关核心组办公会议记录及市驻郊县联络组会议记录；郊县三级干部会议、农村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干部会议文件、简报、情况报告；市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会议文件；农口郊县成立造反组织，成立革委会，农口造反总部要求加入上海人民公社的报告；各郊县革委会、党委成立的报告、批复等。

B - 2 - 21

138	B25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收安置复退军人办公室	1968—1976	32
-----	------	---------------------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成立于1969年10月，负责全市复员退伍军人的接收与安置工作。负责人才玉

俭。1976年该机构撤销。馆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全宗档案共32卷，档案排架长度0.8米，档案起止年代为1968—1976年，按问题分类，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有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市委有关文件精神的报告、情况汇报、工作小结；历年接收安置工作的报告、规定、分配计划、总结等；处理复退军人口粮供应、户口申报、住房问题及病残军人安置的材料；修改接收安置复退军人若干具体政策界限问题的文件；各区县接收安置复退军人情况汇报、工作小结、会议简报等材料；办公室历年情况简报等。

B-2-22

139	B252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	1969—1977	346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12月，1958年6月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1967年3月改为市革委会经济计划组，1986年4月并入市革委会工业交通组。1969年10月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其基本任务是编制上海长期和年度的国民经济与文教发展计划，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检查与督促计划的实施，协助解决中央在沪企业在计划执行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市政府所属各部门、各企业的计划与统计工作，并对物价、基建等项目开展调查研究。主要负责人韦明，内部机构设有综合计划组、工业交通生产计划组、农业计划组、基本建设组、财贸物价组、统计组、秘书组。1977年11月市革会综合计划统计组撤销，恢复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全宗档案共346卷，排架长度6.4米，档案起止

年代为 1969—1977 年,按年度—问题分类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该组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全国清查仓库和节约燃料、电力经验交流会的会议文件和上海市计划会议文件;国家计委关于电影工业产品试行归口分配办法;该组关于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中央各部、各省、市、区在沪设立办事处机构及编制人员、组织关系、建立上海农机局、上海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副食品领导小组、环保领导小组、石化总厂地区办、华东物管处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市委、市革委会的批复;经济工作、外贸出口、造船工业和县社工业的情况汇报及调查报告;对职工在郊区居住问题、改进工厂职工福利补贴问题、征用农田和对地少人多地区征地中的政策问题以及对个体户情况调查请示、报告和市革委会的批复;学习、工作及保密工作的情况和揭批“四人帮”的材料及运动简报;《计划统计简报》、《年度计划参阅资料》、《调查研究简报》、《综合计划统一资料》、《上海简况参考资料》、《情况简报》、《情况反映》、《“四五”规划研究情况》和调查资料等。

2. 计划类

有市革委会下达的各年度上海市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业生产计划及主要指标,该组对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该组草拟的上海五五规划汇报提纲,五五基建计划初步设想,1976 年至 1985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稿)及工业、交通、教育、水产等系统十年发展纲要;基建计划、基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市、区、县(包括农场系统)基本建设计划,部队、公安、民政、劳改、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城建、园林、机电、冶金、化工、轻工、纺织、铁路、科技、邮电、海运等系统及单位基建项目的安排、意见、请示、报告和市革委会的批复;上海市农业机械化发

展规划；外贸收购计划和出口工业产品专项贷款计划的请示和批复；筹建上海石化总厂、万人体育馆、上海铁路新客站、电讯大楼、海洋气象站、天文馆、开发建设崇明岛、七二八核电站工程和原子反应堆等重点项目的规划、设计、征地、动迁、投资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及市革委会的批复；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财政收入安排意见，出口产品专项贷款问题，使用地方外汇进口原材料、仪器、仪表、药品等的请示和市革委会的批复；军工产品、军事装备、国防科研试制协作计划项目；驻沪部队、民航、公安、民兵建造战备监房、武器弹药库等战备设施的请示和市革委会的批复；五废治理、城市绿化、城市规划的意见、请示及市革委会的批复；小三线建设计划的建议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增加援越产品和提前交货的通知；对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和知识青年的安排；对全市各系统各单位征地、用地、拆迁的意见、请示及市革委会的批复；资金使用管理问题，改进住房分配办法，住宅建设资金安排意见和市革委会的批复等。

3. 物价类

有转发国家计委有关物价政策、规定和物价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及检查物价政策执行情况等文件；调整制定商品价格和某些商品收购价格，调整、核定、降低工业产品出厂价、农副产品销售价以及市场商品销售价的意见、请示、报告及市革委会的批复；物价政策调查报告和物价工作情况以及加强物价工作的报告；《上海市物价资料》等。

4. 统计类

有贯彻国家计委统计工作要点和布置各类统计报表、召开各类统计工作会议的通知，统计工作问题解答，统计工作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反映；《上海市国民经济基本统计》、《上海市国民经济基本统计资料提要》、《上海市统计资料及增刊》和各类统计资料；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制度；上海市工业总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年报；上海市

工业企业概况一览表；人民公社农副产品八项经济指标实绩比较，初步建成大庆式的工业企业概况一览表等。

B-2-23

140	B253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	1967—1990	5 353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成立于 1967 年 3 月，原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1980 年起改现名，是上海执行我国外交政策和处理外事工作的综合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和涉外法规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外事工作的指示和决定；指导、管理、督促和协调上海的外事工作；处理上海政治性、政策性涉外事项；负责重要的外宾接待工作；管理全市与外国友好城市之间的交往活动；归口管理全市出国工作、领导出访事宜、审核出国组团工作；办理出国人员的护照和申办签证工作；负责与外国领事机构交往和管理外国驻沪新闻机构和记者。下设政治处、秘书处、宣传联络处、友好城市工作处、领事处、综合业务处、接待处、党宾处、行政处、出国管理处、护照签证处、政研室、翻译室等机构。历任负责人有冯国柱、厉富训、赵行志、李储文、石奇、赵云俊等。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全宗档案共 5 353 卷，档案排架长度 86.4 米，档案起止年代为 1967—1990 年，按年度—问题分类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5 册。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市革委会外事组工作计划和总结；外事组会议记录和决定事项、外事工作会议材料、外事简报、外事组贯彻中央及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的文件等。

2. 组织人事类

有外事组及所属单位机构设置、变动、人员编制和工资福利的材料；外事组干部配备、培养、提拔、处理及出国访问、四个面向的材料；外事组干部定期统计表；外办系统职称改革的请示、批复、通知、函；外办系统升级增资情况的批表、请示、批复等。

3. 外事管理类

有中央部和委、局关于外事管理工作、领馆工作的规定、指示、报告、通知、外事活动及对外事务具体工作的请示、批复、报告；中央部门关于港口工作，出国管理，护照签证、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工作的规定和批示；外事组有关口岸工作、外侨子女入学、婚姻、遗产继承等涉外事项的规定及处理意见；外事组关于在沪外国机构和外国人房产处理、外国在沪领馆用房等向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及外交部的批复、通知；外交部关于各国在沪设立领馆的通知、情况汇报、来往函电；外交部、司法局、市外办关于领事认证业务的规定；涉外问题的处理材料等。

4. 涉外交往类

有外事组接待外宾的计划、请示、批复、简报；外事组审批面上各单位接待外宾的材料；上海做好外国实习生工作的情况；上海因公出访情况；外事接待统计；处理国外来信等。

5. 新闻文化类

有外交部、中宣部、文化部关于涉外宣传报导、驻沪新闻机构和记者管理的规定、通知；外国新闻团组和记者采访的接待计划、报告、通知；上海市领导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请示、批复及领导对外谈话摘编；举办外国驻沪记者座谈会、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的通知、简报等。

6. 出国及签证管理类

有外交部、上海市外办关于护照签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意见、函、颁发护照年报表、遗失护照的情况报告、函；因公出国管理工作的规

定等。

B-3、B类全宗0号目录有关内容：

B-3-1、《公安情况》(1971年1月至1973年12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办公室编印。

B-3-2、《法院工作简报》(1973年1月至1974年12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办公室编印。

B-3-3、《上海市机构编制历史沿革(1949—1985)》,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汇编了机构精简、调整的情况。

B-3-4、《上海市统计资料》(1976年1月至1976年12月),上海市计划经济委员会编印。

B-3-5、《上海市国民经济基本统计》(1973年3月至1975年),共17期,上海市计划经济委员会编印。

B-3-6、《统计资料》(1975年1月至1980年12月),共608期,上海市统计局编印。

B-3-7、《上海民兵简报》(1971年1月至1974年12月),共77期,系上海民兵学习、工作等情况的报道,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编印。

三、C部类：上海群众团体

C-1、C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55	C12	中国建筑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1949—1968	228
156	C18	外国驻沪机关中国职工工会	1949—1967	18
157	C2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1949—1992	5 687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58	C26	上海市青年宫	1956—1969	214
159	C27	上海市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1956—1969	212
160	C31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1972—1990	3 125
161	C33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1976	4 050
162	C34	上海工人政治学校革命委员会	1969—1978	300
163	C35	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1971	373
164	C36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分会	1950—1967	1 345
165	C41	上海市运输工会	1949—1977	1 040
166	C42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1949—1990	1 066
167	C43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1956—1990	1 477
168	C45	中国福利会	1949—1990	1 372
169	C52	上海市作家协会	1949—1967	402
170	C62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50—1990	76
171	C63	上海市红十字会	1938—1990	828

C-2、C部类全宗号举例：

C-2-1

160	C31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1972—1990	3 125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上海市妇联运动小组有关文件、情况汇报和打算；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沪破坏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罪行的大会材料。

C-2-3

161	C33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1976	4 050
-----	-----	---------------	-----------	-------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1973年4月改称上海市总工会，先后设置组织、政宣、办公室、保卫、《造反报》、工业、市政、交通、群运、接待、联络、党委秘书、郊县、办事、审干、总务等20余个组（室），主任王洪文。1976年10月结束办公。馆藏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宗档案共4050卷，档案排架长度54.4米，档案起止年代为1966—1976年，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的请示及会议文件；整风会议、学习会议、工作会议、扩大会议等会议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讲话；中国工会章程及说明；上海市总工会工会概况、上海市工人阶级状况的材料；女工工作调查汇报；举办工运路线学习班计划及第1、2、3期读书班名单；业余教育会议座谈会材料；“一月革命”展览会的有关资料；五一、国庆庆祝活动的计划、简报、照片及冬季开展活动情况；《工人造反报》登载的报告王洪文、徐景贤等的批示；《工人造反报》会议记录、内部参考及报刊合订本；进驻文艺、教育、卫生系统工宣队人员名单、考察材料及简报；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周年纪念大会材料；市总工会办公室专案组工作情况及统计表；批林批孔动态、经验交流大会材料；工总司一、二、三兵团、战到底兵团材料；追查“四人帮”材料；信访材料等。

2. 组织类

有组织工作的规定；机构成立、撤销的决定、通知、换发、销毁印章的文件；清队意见、整顿组织若干规定及实施细则；文教卫生系统工会体制整顿的调查材料；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交流会文件；工总司委员名单，各组室分布情况及工作人员名单；各区、县领导班子材料；各局干部登记表、统计表及对新干部的考察材料；所属单位职工队伍状

况调查及总工会系统职工数月报表；出席全国工会九大代表候选人的名册、材料、登记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人员名册；工总司造反队组织统计表；各区、县、局联络站犯错误人员处理情况；对全市劳动模范的了解情况；党员、干部年报表等。

3. 外事类

有接待日本、瑞典、新西兰、卢森堡、英国、古巴、美国、罗马尼亚等国友好访华团的计划、简报、名单；外事工作报批计划、培训等方面意见；工总司接待外宾工作人员名单、各区、各局报来外事人员材料；中央联络部外事活动简报等。

C - 2 - 4

163	C35	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1971	373
-----	-----	---------------	-----------	-----

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3月24日，负责领导上海市财贸系统各造反派组织的运动。历任负责人有陆志良、宋有福。1969年1月暂停活动，1971年10月撤销。馆藏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全宗档案373卷，档案排架长度4米，档案起止年代为1967—1971年，按时间—组织机构排列，编有案卷目录。

档案主要内容：

有该组织历史概况、大事记；印信启用的通知；信访接待工作；财产、物资清单；总部工作人员与干部的审查表、登记表和花名册；总部工作条例；整顿组织暂行规定；整风运动意见汇总、会议材料；各区、县、局财贸系统成立革委会及领导班子成员的报告；各区、县、局财革会委员登记表；调整所属单位革委会人员的批复；房屋使用权的批复；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情况报告；干部的检查报告、审查材料及处分决定；思想学习资料、大会文件；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发言材料；斗私批修情况简

报；总部及所属单位打击投机倒把人员登记表和简报材料；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材料、简报；大批判经验交流材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计划、名单；红卫军地下活动情况汇报；所属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基层单位揭批情况报告；右倾翻案材料；节约闹革命情况的检查汇报；财贸工代会委员名单、发言材料及情况简报；革命群众组织公有、公用车辆免税问题的报告；做好 1967 年财政决算编审工作的通知及印发的《财税革命》材料；立即恢复沪宁铁路运输的紧急呼吁等。

C-3、C 类全宗 0 号目录有关内容：

C-3-1、《团的情况》(1973 年 2 月至 1974 年 12 月)，共 181 期，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

四、D 部类：革命历史

D-1、D 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72	D1—1	革命历史文件	1919—1986	2 517
173	D—0	资料	1921—1991	336

五、E 部类：华东区行政机关

E-1、E 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74	E48	国家物资管理部华东物资局	1965—1971	39

六、F 部类：专门档案 1

F-1、F 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75	F1	人物档案	1905—2001	8 676
176	F2	已故干部档案		537
177	F4	地图档案	1855—1976	3 138
178	F7	家谱档案		4 189

七、G部类：上海企事业单位系统

G-1、G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79	G1	上海金星化工厂(5305厂)	1971—1988	2 105
180	G2	上海卫星化工厂(5355厂)	1970—1988	1 919
181	G3	上海红星化工厂(5345厂)	1970—1988	3 203
182	G4	上海燎原化工厂(5323厂)	1969—1984	918
183	G5	上海光辉器材厂(5304厂)	1970—1979	377
184	G6	上海万里锻压厂(5313厂)	1970—1986	185
185	G7	上海红光材料厂(9391厂)	1974—1985	73
186	G8	上海光明机械厂(5303厂)	1970—1986	977
187	G9	上海前进机械厂(5317厂)	1960—1969	74
188	G11	上海胜利机械厂(5307厂)	1969—1979	561
189	G12	上海协作机械厂(9383厂)	1969—1986	22
190	G13	上海红旗机械厂	1971	81
191	G14	上海联合机械厂(526厂)	1962—1980	40
192	G16	上海五洲电机厂(5337厂)	1971—1978	6
193	G17	上海八五钢厂	1974—1978	8
194	G18	上海汽车厂	1961—1991	1 857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195	G19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1958—1990	223
196	G20	文汇报社	1938—1977	2 181
197	G21	新民晚报社	1929—1998	1 370
198	G22	上海市针织品批发公司	1955—1996	4 015
199	G24	上海线带公司	1959—1996	1 889
200	G25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1952—1990	146
201	G26	上海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	1956—1996	4 555
202	G27	上海第十六棉纺织厂	1949—1997	1 085
203	G28	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	1949—1998	2 115
204	G29	上海第一、第二织带厂	1956—1996	657
205	G30	上海第五棉纺厂	1949—1999	818
206	G31	上海鸿章棉纺织厂	1950—1998	1 114
207	G32	上海渔轮厂	1939—2001	956
208	G34	上海密丰绒线厂	1953—2001	1 349
209	G35	上海丝绸公司	1956—1994	2 471
210	G37	上海灯芯绒总厂	1949—2000	1 532
211	G38	上棉十五厂	1949—2000	1 378
212	G39	上海第九棉纺织厂	1950—2001	1 676
213	G40	上海第十四棉纺织厂	1954—2000	2 004
214	G41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1949—2000	1 801
215	G42	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	1935—1997	800
216	G43	上海第七毛纺织厂	1955—1995	727
217	G44	上海元丰纺织总厂	1955—2001	736
218	G45	上海纺织帆布工业全宗汇集	1950—1997	1 519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219	G46	上海第二棉纺织厂	1949—2002	1 198
220	G47	上海沪西印染机械厂	1949—1998	828
221	G48	上海第十七漂染厂	1949—1998	754
222	G49	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	1950—2002	2 676
223	G51	上海第九印染总厂	1950—1996	915
224	G52	上海纺织织布工业全宗汇集	1938—2003	4 924
225	G53	上海鼎新印染厂	1949—2001	1 192
226	G54	上海嘉丰棉纺织总厂	1941—2000	731
227	G55	上海市第七印染厂	1938—2002	1 053
228	G56	上海市日用杂品总公司	1963—2002	907
229	G57	上海第十一棉纺织厂	1948—2002	853
230	G58	上海第四棉纺织厂	1946—2001	857
231	G59	上海第四漂染厂	1949—2003	973
232	G60	上海新丰印染厂	1951—1997	1 219
233	G61	上海市供销物资总公司	1956—2002	455
234	G62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	1948—2002	709
235	G63	上海达丰棉纺织厂	1949—2003	655
236	G64	上海第一羊毛衫厂	1957—2003	795
237	G65	上海安达棉纺织厂	1953—2003	533
238	G66	上海第十棉纺织厂	1933—2001	298
239	G67	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	1949—1999	610
240	G68	上海元通印染总厂	1950—2002	398
241	G69	上海纺织手帕工业全宗汇集	1950—2002	595

(续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242	G70	上海第一印染厂	1949—2003	926
243	G71	上海远东丝绸印染总厂	1963—1996	159
244	G110	大隆机器厂	1949—2007	1 488

G-2、G部类全宗号举例：

G-2-1

196	G20	文汇报社	1938—1977	2 181
-----	-----	------	-----------	-------

举例：涉及和包含的“文革”内容

本档主要内容有关于“文革”运动的计划、总结、汇报、调查材料、会议记录、简报等。

G-2-2

197	G21	新民晚报社	1929—1998	1 370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报社“文革”时期的情况报告等文件。

八、H部类：专门档案

H-1、H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246	H1	照片档案		158 522
247	H2	录音档案		3 647
248	H3	录像档案		446
249	H4	音像资料		1 865

H-2、H部类全宗号举例：

H-2-1

246	H1	照片档案		158 522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1966年上海市总工会、妇联接待各国代表团访沪照片；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所在地和部分所属分队活动情况照片；上海民兵指挥部及民兵在“文革”时期活动照片等。

H-2-2

247	H2	录音档案		3 647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曹荻秋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录音；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大会录音；讯问和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的录音。

H-2-3

248	H3	录像档案		446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审判“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录像。

H-2-4

249	H4	音像资料		1 865
-----	----	------	--	-------

本档主要内容有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党建教育片《人民的审判——上海公审徐景贤、王秀珍等参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纪实》等。

九、L部类：上海政协系统

L-1、L部类全宗号一览表：

序号	全宗号	全宗名称	档案起止时间	档案数量
245	L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1949—1992	3 472

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各类报纸有的成套，有的不成套，“文革”时期的报纸成套的有《红小兵》报；不成套的有《上炼造反报》、《红灯报》等。

注：本表摘编于《上海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附录五

从巧合到圆满

——陈国康先生(陈老头子)的“文革”资料收藏史

陈国康口述 林升宝采访整理

我收藏了大量“文革”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和传单资料,粗略计算有1297种、2781份(册),大部分是上海出的,最主要是在1966年8月到1967年9月收集的,2005年到2009年又补充了不少。这些资料现在已很少见,不少已成孤品。我能收集到这些资料很不容易,这里面有几个巧合促成这些资料的收集。

第一个巧合是时间上的巧合。从1966年初到1967年年底,我因为身体不好,正巧在家休养,属社会青年,我就有了收集这些东西的时间。那时,我每天从家里出发,先到浙江路,再到南京路,再从南京路到西藏路,然后从西藏路回到家里,路程大约500米,每趟总能带回不少小报、传单。我就在家里一点一点的看。

第二个巧合是空间上的巧合。当时我的家就在南京路边上,占有地理优势。南京路是上海的商业中心,“文化大革命”时期,那里就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上海凡有风吹草动,那里马上就会有所反应。大串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到上海,一定会到南京路散发宣传品。上海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也一定会到南京路造声势。一些组

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就会带很多传单和报纸到南京路来散发、张贴。当时，在南京路两边，从外滩到国际饭店所有的橱窗和墙面，都贴满了大字报，空中还不时有传单散落，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大字报上再贴大字报，不断更新。有一次，我看到有人从橱窗上撕下来的大字报，都有一寸左右厚。因为我的家就在南京路的边上，所以社会上一有什么动静我马上就知道了，我就会跑去看热闹，回来的时候总能捧回不少小报、传单。

第三个巧合是出身的巧合。我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因为我的这个出身不属于红五类，不能参加工厂的造反，只能是旁观。如果我介入进去，在“文革”中投入了这个运动，大概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东西了。

我当时收集这些东西，一是靠向人要、二是靠地上拣，三是靠空中抓。刚开始我收那些小报和传单都是不要钱的，因为当时革命的宣传品，是不作兴用钱买的，况且，他们印这些报纸、传单的费用都是国家出的，也没有成本。免费的宣传品给我的收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有一份 1966 年 9 月 1 号出版的北京《红卫兵报》，就是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在马路上散发的。几个月以后报纸就要买钱了，价格一般是二到三分钱。

记得收集这些传单还起过一定的作用。因为出身不好，家被抄了。当时我们里弄都是独幢独户，住的都是一些开厂、开店，还有医生、画家等一类的住户，估计有一半住户被抄过家。抄家后接着就是批斗，在批斗的过程中红卫兵叫我们子女去看，接受教育。有些红卫兵批斗动作有点大，我当时年轻气盛，就跟他们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我找出来一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传单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以后，还真的起了作用，批斗的动作客气了不少，强按下跪的动作也没有了。

我这个人喜欢看书，抄家以后书全都抄走了。没东西可以看，我就看马路上的大字报，看传单、小报。不管是什传单、小报，我都看，凡是可以说的我都带到家里看。看的目的，一是要了解当时的形势，了解“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情况；二是关心自己的命运，从中了解当时对我们这类人的政策。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所以我非得关心不可。

由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上海发生的几个大事件，我或多或少都有幸目睹。像红卫兵在南京路“破四旧”、关于“老子、儿子”对联的辩论、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红三司”静坐公安局、“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召开支联大会，我都看到过。《解放日报》事件时，我看到“革会”的人在《解放日报》社阳台上，把《红卫战报》从阳台上洒下来，下面的游行人群捡到后却把它撕掉。“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开支联大会是1967年的夏天。那年夏天天气很热，我居住的周围，不管老的小的，吃完晚饭，洗完澡，就拿着一张小板凳和一把扇子赶去人民广场听支联站的辩论会。那时陈卜昌有辆小卡车，上面装着喇叭，天天来宣传。陈卜昌这个人的口才很好。打“联司”也是从人民广场出发的，我看到不少喊着口号的队伍，有些人还拿着长矛等武器，向人民广场聚集，居民都很紧张。

我这样陆陆续续地收集“文革”资料，看了以后就放在边上。我有一个竹子做的书架，抄家以后书没有了，我就用来放报纸、传单。我的住房当时只有七个平方，收的多了，家里就发生矛盾，要我把这些东西当废纸卖了，可是我哪里舍得啊，辛辛苦苦收集，已成了爱好。就这样我在最乱的两年收集了很多这类东西，内中有不少重要的资料，现在已很少见了。当时没有集报这个概念，我收集这类东西只作为兴趣爱好。当时有这种爱好的人不少，上海南京路老杂技场边空地，有个交换报纸的集市，每天有几十人在那里交换报纸，我也常去。

一直到了1967年年底，我开始上班，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东西了。经过“联司”武斗后，这类东西也少了。上班后，我就把我收集的东西整理一下，也没有什么标准，我个人认为好的就放在一起，不怎么好的就放在另外一边。好的那堆分大小装订成册，装订了好几本。当时我住处底层是个印刷厂，他们印白猫牌洗衣粉的塑料袋。我就向他们要了塑料袋半成品，把装订好的那些东西卷起来放到塑料袋里面，两头给封扎了，放到走廊的桐板上，以后也就忘了，一放就放了三十多年。我认为不好的那堆资料，本来打算有空了再整理，结果被我老婆大扫除，卖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上班后，我一门心思在厂里面工作。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是虹口区最大的工厂，也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食品厂。它专门生产冷饮、罐头、糖果、巧克力、威化饼干等。这个厂当时是上海造反派最想要控制的工厂之一。造反派最想要控制的工厂，一个是手表厂，一个是自行车厂，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厂，因为这些厂生产的产品都是热门货。自行车厂、手表厂产量少，而我们食品厂的东西就太多了，只要当权领导签个条子，东西就一箱一箱地往厂外运，马振龙常来我厂。王洪文在北京常把上海生产的东西送人，拉关系，里面有罐头、酒心巧克力等，这些都是我们厂生产的。所以哪一派都想夺得我们厂的权，作为他们一个食品供应点。为夺权两派就武斗，一武斗我们就停产了。这两派我一派也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是因为我自知出身不好，敬而远之，没有被波及。所以，以后的一连串运动，像“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都同我无关。当时两派互相乱揪，揪出人数很多，而一旦被揪出来，必被抄家，抄家的内容之一就是书信，小报、传单这类东西也是重点，都要被抄走的。

记得1969年前后，上头有一个通知，规定职工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非正规出版物，如小报等这些东西全部交出来。同事都知道我有

这类东西,但我没敢交,不是故意不交,而是我的东西太多,内中有各类小报、传单,许多是已失势组织印发的刊物。当时我们厂里分两派,一派是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另一派是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他们两派还在派斗,我收集的报纸里面两派的宣传品都有,我要是交上去,追究起收藏这些东西的动机、目的,那就麻烦了。而且,我认为这些东西产生于一个很反常的时期,很有历史价值,应该保存下来,所以我不敢也不愿交出去。好在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好,也就没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文革”小报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遗留的不多,就是因为绝大部分在抄家、上缴过程中被销毁了,而我却有幸保存了下来。

还有一次更惊险,那是在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总理去世后社会上就传什么“总理遗嘱”等小道消息,还有“陈毅诗词”的手抄本。当时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文化生活很枯燥,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陈毅是上海的老市长,上海人民对他评价很高,很尊敬他,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上海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本《陈毅话陈毅》的油印小册子,流传很广,内容是陈毅的语录。陈毅逝世以后,还流传过手抄本《陈毅诗词》。后来有个同事借到一本,我们机修部门生产任务比较空,就借来转抄,几个人分页抄,抄好以后就装订,这样每人可分得一本。我们还没抄好的时候,追查政治谣言的运动就开始了,各个单位都在搞,要追查。我们抄《陈毅诗词》是很公开的,很快被查到了。就谈话、写交代,我谈了几次就没事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广东,他的老婆在香港,属有海外关系,就不好了,就有人到他家里去“清理”,把他所有书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小报。过了没有多少时间,“四人帮”被打倒,没多久,保卫科叫我过去,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警察找我,他通知我,因为抄《陈毅诗词》,公安局已经立案,现在要撤消,要把上缴的《陈毅诗词》

和检查还给我，问我还要不要。我没有要，他说就帮我销毁了。我自己还留有两本，这两本现在同其他资料一起送给了复旦。我真的不知已被立案，好在“四人帮”及时打倒，否则随着追查深入，我的那些东西也就保不住了。

我在厂里工作一直非常忙，把这些报纸的事情忘记了，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想起保存的报纸。久别重逢，动了感情，于是花了两年时间，把装订的报纸，一张一张给它拆开，学电脑，进行分类、编号、拍照、做目录，设计报夹逐张收藏，最后清点，里面有小报三百多种，七百多份，还有一包传单未计在内。

之后我就考虑这些东西怎么办。我想这些东西就是历史，我人老了，东西不能淹没掉。放在家里也不好，家里没人感兴趣。我在网上留意集报方面的消息，结果发现这方面的东西很少，没有我的珍贵。2004年的时候，我到档案馆、图书馆等地方去查这方面资料库存的情况，了解我收集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结果一查，他们那里的东西很少，还不如我多。我就发邮件到档案馆、图书馆，打算捐赠，但都没回音。

2005年我找到中国报业协会的集报分会，会长姓罗，是《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离休老干部。我跟他们联系，并把我自己编的目录还有部分照片寄给他们。他们很重视，说我的收藏很珍贵，在北京能排前三，希望我能够到北京来开报展。2005年9月，在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的主持下，我在北京开了一个“陈国康精品报展”，其实是全国首次“文革”报展。开幕的时候来了六十几个资深老报友，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的，还开了个研讨会，在会上会长和报友特地跟我讲，叫我好好保存，不要把这些报纸散失掉，不要外流。他还讲现在北京有很多外国人在收这些报纸，准备把它弄到国外去。在我的留言簿里面有一个老报友也特地留言：“愿文革资料留在国内，不要流

失国外,为创建文革展览馆作贡献。”他们的叮嘱,我一直记在心中,希望“文革”博物馆能早日建立,使我的收藏有个归宿。

我的这些收藏,是想为后人提供点研究资料,但要使研究者知道我的收藏,必须广而告之,我就学写博客,希望通过写博客来做我的收藏“广告”,并以此找到一个能保存、研究这些资料的可靠机构。2006年4月,我在新浪网开博,头一篇上去,可能是有“文革”的内容,一上去就删了。我又找了人民网,开了个“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专门写“文革”报纸的历史故事,三年多来,我累计写博文二百多篇,没一篇被删。我还被评为2007年度“《人民网》十大魅力男博”。《人民网》开博有四万多个,共评出十个“优秀”,二十个“魅力”,三十人中我年龄最大,学历最低,能评上不容易。我明白,能评为“魅力”,在于我拥有资料的优势,看图说报,以报说事,实实在在评说“文革”,使人对“文革”有了新认识。例如我有篇博文写张春桥在“积代会”上的31句口号,发表没多久点击率就五千多,这让我觉得人们还是很想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的。

我写博的目的,是要通过介绍我收藏的“文革”资料,把信息传出去,引起“文革”史研究者注意。很快,有不少“文革”研究者联系到我,跟我交流心得,寻找相关资料,他们都感到现在能找到研究这段历史的原始资料太少。同他们的交流,我是有原则的,我的收藏,研究者要参考可以,倒贴复印、邮寄也可以,但不外流,不卖钱。有人要我查找相关资料,我先问清楚他们的身份,外国人免谈。写博过程中,我结交了一些研究者,成了好朋友,我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他们也送我不少珍贵的收藏。

我在写博客的过程中,还关注网上“文革”资料的消息,见到有用的,尽量收入。我还认识一个“文革”资料经营者,他的东西大部分来自废品回收站,经整理后,再放到网上卖。我的《工人造反报》原先只

有开头的四十几份，我有一次去他家，发现他那里有很多《工人造反报》，都是后期的，一次就收进了近四百份，为以后补全这套报纸，打下了基础。

说起这套《工人造反报》，还有个红烧头尾的故事。它的创刊号和第 445 期终刊号，可能是一个出得早，一个出得少，都很少见。创刊号是我原有的，记得是 1966 年年末，有两个人在南京路上贴报，我向他们讨一份，不肯，我就帮他们刷糨糊，从时装公司刷到国际饭店，最后一张他们就送给我了，这样使我得了一份《工人造反报》创刊号。而 445 期终刊号，就是从那个报纸经营者那里得到的。当时他给我的只到 444 期，我说后面应该还有一份，他说有几份有破损，扔到垃圾桶里了，我就叫他拿回来，我拿来一看，其中刚好有份 445 期终刊号，那份报就少了一个角，里面为什么要停刊的内容都有。

就这样，在两三年之内我着重找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报纸，收获很多，使我的收藏快速增长。去年年底至今，好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价钱也直线上升，以后再找就难了。

我原以为原有的一大包遗留的油印传单会很不起眼，但着手整理后我感觉到，油印传单内容很丰富，有不少珍贵资料，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次偶然机会，我一次收到了十五本机床厂的传单集，内容很多。报纸上是没有的。

收集过程有辛苦，也有开心事，最开心有如下几例：

一、集报协会的报友都不看好的《工人造反报》，他们认为太多太杂很难收完整，但是被我收齐，还发现第 215 期有两个版本，可能是存世最完整的一套了，我很得意。

二、我看到“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的《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使我对复旦的“文革”资料留了意。当得知在北京相识的重庆报友，有整套《新复旦》、《复旦战报》时，立刻与他联系，在我再三

恳求下，朋友忍痛割爱。寄来一看，四个合订本，还是复旦的原物。现在回归复旦，算是我长期学习金先生著作的回报。

三、在报友的交流中，我用一份 1966 年《南通日报》“我国发射核武器成功”的号外，换到“文革报大王”《新北大》创刊号，据北京报友说：这是全国现世的第二份。我同报友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是我集报过程中一次最满意的成绩。

四、在网上见到有“文革歌曲一堆”拍卖，我很顺利就拍下了，这个“一堆”，其实是东北一个县文化馆在“文革”开始就收集的歌曲散页组成的《毛主席万岁歌曲集》，绝大部分是油印、手写、原创的，跨时十年，从《鬼见愁》到《批林批孔》都有，至少有歌曲 347 首，很少重复，是研究“文革”歌曲的难得资料。这是我最意外的收获。

收集“文革”资料需要学习，要了解这些报纸的来龙去脉，这里必须提到金大陆先生，他的《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使我开了窍，还有《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消》、《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等论文，我都学习过，对我的收集和整理文革资料，写博文介绍这些资料，帮助极大。

至于想给这些资料找个好的归宿，等建成“文革”博物馆也难，一直是我的心病。所以当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金大陆先生特地来访时，我知道“写博广告法”成功了，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了。金先生本是“文革”专家，资料专业对口，他又是我的“心中偶像”，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收藏资料交给历史研究所保存、研究。而金教授考虑的是，怎样使这些资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他认为这些资料，放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更多，保存的条件更好，研究更方便，收效会更大，况且复旦大学历史系有金光耀、冯筱才等教授积极推进“文革”史的研究，这使我很感动，并与复旦协商妥当，待整理完毕后，复制一套给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留存。近半年来，复旦历史系投入两位教授、八位

研究生,启动大型地图扫描仪整理、编目,已基本完成“文革资料库”的筹备工作。想要我的收藏的机构或个人也有,而考虑到这套资料能留在上海,妥善保存,充分利用、研究,是我最满意的。我内心里很感谢金大陆、金光耀这“两位金教授”。

在金大陆教授的筹划下,复旦历史系金光耀、冯筱才教授与我详细商谈了在复旦建立“文革研究资料库”的计划,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心甘情愿为此出一份力。2010年2月4日,立春,是个好日子。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第19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捐赠仪式”。陈国康,就是本老头子。那天,金光耀教授主持了会议,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代表校方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和纪念奖牌,还有一笔不菲的奖金,使这个老头子很不好意思。



章清教授说哈佛、斯坦福等大学的历史学科为什么有名,资料建设工作做得好,是重要的原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徐建刚副主任也到场祝贺。还有文革史研究工作者李逊也出席了会议。大家对我捐赠这些文革报刊资料高度赞赏,认为是对深入研究文革史作出了贡献。记得半年前,金光耀教授曾带我参观过复旦历史系的资料室,那里窗明几净,设备齐全,一群群的年轻学子在刻苦攻读。想

到我多年收藏的宝贝，终于找到了好婆家，欢欢喜喜地出嫁了，我真的很高兴。所以，当看到朋友们的祝贺：“热烈祝贺陈老头子联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诸贤达完成大功德一件！恭祝为人民再立新功！”时，我心里乐开了花。回想这些“文革”资料，从收集起始，至在复旦建立“文革研究资料库”，四十多年曲曲折折，终于大团圆。我想这过程，必将成为后人研究“文革”的一则佳话。

史料重在利用，从中了解来路的曲折，以利于前途的顺畅。十年“文革”，祸国殃民。现在看一些现象，我有些看不懂了。否定“文革”早有定论，现在却有人说要再来一次。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了解“文革”，也不懂“文革”。所以我通过写博客，就是以当时的报纸说事，看图说报，以报说事，都是有凭有据。现有的一些“文革”史研究，还是浮在上层，线条太粗。这主要在于许多研究者，很难找到原始资料，所以挖掘这些遗存的资料很重要。

我只是一个有心的集藏者，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感到一身轻松，觉得很欣慰。期待复旦的“文革研究资料库”，不断壮大，向社会开放，为研究者服务，建成中国的“文革资料研究中心”，功德大圆满。

[口述者简介]陈国康，男，1943年出生，原上海益明食品一厂职工

[采访者简介]林升宝，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附录六

“文革”时期上海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及分配情况统计 一、1966—1969届上海市各区、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统计

说明：1. 以下材料来自于上海档案馆。

2. 以下表格中的数据全部按原始材料实录。

1. 1966—1968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汇总表

单 位	人 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高教局	上海	奉贤	松江	金山	青浦	川沙	宝山	嘉定	崇明	半工半读	其他	
总 计	183 300	22 849	18 278	14 870	17 311	22 723	16 225	11 001	15 467	14 443	25 930	79	366	97	362	156	125	145	751	561	243	5	1 282	31
市郊国营农场	52 517	6 317	5 665	4 534	4 723	6 508	4 524	2 841	4 582	4 368	7 152	79	153	48	120	86	49	50	409	214	95			
江西省插队落户 (第一批)	1 069	151	61	86	86	117	162	89	107	72	117									21				

(续表)

单 位	人 数	杨 浦	静 安	黄 浦	卢 湾	徐 汇	南 市	长 宁	闸 北	普 鹏	虹 口	高 教 局	上 海	奉 贤	松 江	青 浦	金 山	嘉 定	宝 山	川 沙	南 汇	高 工	半 工	半 读	其 他	
云南省国营农场	1 018	131	101	85	100	131	97	65	91	92	125															
大丰国营农场	5 267	715	548	410	513	822	370	310	491	399	689															
河南省兰考县插队落户	28	9			1			9	1		6						1							1		
青海省共和县插队落户	14							14																		
福建省龙溪专区大和县插队落户	5						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0 350	1243	1 096	755	688	824	813	564	766	754	1 251														31	
黑龙江黑河地区插队落户	6 401	508	1 271	480	210	967	1 281	318	370	149	847															
黑龙江省车管农场	10 080	803	1 004	892	803	1 317	999	1 199	1 009	1 040	1 014															
内蒙古插队落户	2 139	113	121	106	450	297	238	81	67	49	510														107	
吉林省插队落户	23 227	4 194	1 684	1 679	3 123	3 333	1 736	652	1 276	1 362	4 188															
云南省插队落户	9 519	470	1 015	717	1 259	1 679	925	761	440	967	1 286															
贵州省插队落户	10 205	1 549	627	1 087	816	700	711	650	1 279	655	2 131															
江西省插队落户(第二批)	31 098	4 091	2 637	2 396	2 529	3 593	2 519	2 170	3 162	2 705	4 122														1 174	
安徽省插队落户	20 363	2 555	2 448	1 643	2 010	2 435	1 822	1 300	1 827	1 831	2 492															

说明：“附录六”中所收录的统计表，详尽反映了上海市各区、县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四个面向”和“上山下乡”的去向、人数等情况，原表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办公室”编制，今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228-1-32-1。

2. 1966—1967届知识青年去市郊国营农场人数

出发日期：1968年8月—12月

3.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江西、河南、青海、福建插队落户人数
云南、大丰国营农场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川沙	半工 半读	出发日期	
江西省	1 069	161	61	86	86	117	162	89	107	72	117	21			
新余县	518	20	37	86	15	162	89	26	72	11			1968 年 10 月		
峡江县	506	131			86	102		81		106			1968 年 10 月		
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45		24									21	1968 年 8 月 11 日		
云南省	1 018	131	101	85	100	131	97	65	91	92	125			1968 年 12 月 20 日	
红旗农场	201		101			100									
东风农场	399				85		131				91	92			
勐腊农场	418		131					97	65			125			
大丰农场	5 267	715	548	410	513	822	370	310	491	399	399	689			
第一批	202	20	20	19	24	22	20	20	20	19	19	18		1968 年 10 月 25 日	
第二批	5 066	695	528	391	489	800	350	290	471	380	671		1968 年 11 月		
河南省兰考县	28	9			1		9	1			6	1	1	1969 年 2、3、6 月分三次出发	
青海省共和县	14							14						1968 年 9 月分三次出发	
福建省龙溪专区大和县		5									5			1968 年 9 月 18 日	

4.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人数

	出发日期：1968年8月—9月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上海	嘉定	宝山	松江	金山	青浦	川沙	奉贤	崇明	南汇	其他
合计	10350	1243	1096	755	688	824	813	564	766	754	1251	213	148	347	242	76	70	320	49	5	95	31
一师	1000				311					424			68					70	41		86	
红色边疆	102				102																	
五大连池	295				209																	
北方团	407							228				68						70	41			
沿江团	105							105														
新华团	91							91														
二师	1372	54					246				860							9	66	137		
名山	193											193										
延兴	89											89										
二九〇	707	54									578							9	66			
绥滨	383									246											137	
三师	2595	877	747		2	508	1				4	163	64	32	197							
勤得利	611	611																				
万宝	330	266															64					
八五九	306					2	186				4	114					32					
胜利	148								116													
饶河	157								73				1					83				
集贤	223		15					133	1				48					26				

(续表)

(续表)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上海	嘉定	宝山	松江	金山	青浦	川沙	奉贤	崇明	南汇	其他
鹤山	87					87																
红五月	98					98																
金边	87					87																
丰收	93					93																
阿伦河	108					108																
万发	45					45																
太湖	85					85																
稻花香	53					53																
海洋	53					53																
新立	98					98																
金光	53					53																
金星	36					36																
幸福三路	52					52																
查哈阳	303					31	6	20													92	154
独立团	506					306																
红色草原地	200																					200
十一团	306					306																
独立营	182					23	38	14	3	10	39	24	30							1		
其他	55	2	5			1		5		6	2							3				
																					31	

说明：其他 55 人中，24 人是 12 月 18 日批准后单独出发去兵团报到的，分配到哪个师不清楚，31 人是未经批准的。

5.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黑龙江黑河地区插队落户人数

出发日期：1969年3月9日—5月25日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合计	6 401	508	1 271	480	210	967	1 281	318	370	149	847
嘉阴县	967					967					
爱辉县	1 048				201						847
逊克县	1 358	508			480				370		
呼玛县	242						242				
孙吴县	467							318		149	
德都县	236					9		132			
德都县垦属农场	2 083				1 176			907			
其中：龙镇农场	907							907			
龙门农场	654				654						
花园农场	522				522						

6.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赴黑龙江省军管农场人数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总计	10 080	803	1 004	892	803	1 317	999	1 199	1 009	1 040	1 014
七星泡农场	1 502						999		503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嫩江农场	1 546								506	1 040	
苏家店农场	1 014										1 014
引龙河农场	1 199							1 199			
长水河农场	1 004		1 004								
凤凰山农场	798					798					
永丰农场	519					519					
尾山农场	892			892							
格球山农场	803				803						
襄河农场	803	803									

7.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内蒙古插队落户人数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总计	2 139	113	121	106	450	297	238	81	67	49	510	107
(一) 乌兰察布盟	1 478	119	106	435		199		67	42	510		
丰镇县	199					199						
察哈尔右翼前旗	435				435							

出发日期：1969年3月21日—5月24日

(续表)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兴和县	241										241	
四子王旗	269										269	
卓资县	67										67	
托克托县	45		45									
土默特左旗	106			106								
土默特右旗	22										22	
清水河	20										20	
和林县	74		74									
(二) 昭乌达盟	552	67					297		81			107
宁城县	107											107
赤峰县	81								81			
克什克腾旗	108	67						41				
翁牛特旗	118								118			
林西县	37								37			
巴林左旗	22								22			
巴林右旗	28								28			
阿鲁科尔沁旗	51									51		

(续表)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三) 呼伦贝尔盟	100	46			15		39					
鄂温克旗	48	5			7		36					
布达哈旗	52	41			8		3					
(四) 菲里木盟	9	2								7		

8. 1966—1968届知识青年赴吉林省插队落户人数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合 计	23 227	4 194	1 684	1 679	3 123	3 333	1 736	652	1 276	1 362	4 188
延边自治州	17 476										
珲春县	4 247	2 195								144	1 908
延吉县	5 118	1 476								1 362	2 280
汪清县	1 647	523								1 124	
和龙县	3 333						3 333				
安图县	3 131				3 123					8	
四平专区	5 751										
梨树县	3 415										
怀德县	1 684		1 684						1 736		
双辽县	652									652	

出发日期：1969年3月1日—5月10日

9.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赴云南省插队落户人数

出发日期：1969年3月1日—5月20日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曲靖专区	9 519	470	1 015	717	1 259	1 679	925	761	440	967	1 286
会泽县	1 679					1 679					
宣威县	149					149					
富源县	97					97					
寻甸县	313					313					
罗平县	310					310					
宣良县	190					190					
嵩明县	141					141					
沾益县	239					239					
路南县	147					147					
大理白族自治州	93					93					
洋浦县	925					925					
鹤庆县	259					259					
祥云县	229					229					
	230					230					

(续表)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凤庆县	133									133	
云县	98								98		
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	967									967	
蒙自县	160									160	
开远县	241									241	
弥勒县	295									295	
泸西县	271									27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654	451					203				
文山县	110	110									
砚山县	341	341									
丘北县	203						203				
楚雄专区	893									893	
南华县	480									480	
牟定县	193									193	
姚安县	220									220	
丽江纳西族自治州	122	19					39			2	62

10.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赴贵州省插队落户人数

出发日期：1969年3月17日—4月20日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遵义县	1 279									1 279	
桐梓县	622	622									
凯里专区	1 762										
麻江县	213			213							
舟寨县	201			201							
岑巩县	441					441					
台江县	196				196						
三穗县	232						232				
天柱县	479						479				
安顺专区	1 466										
修文县	447					447					
紫云县	369					369					
关岭县	304								304		
郎岱县	346									346	
铜仁专区	627										
铜仁县	301						301				
印江县	326					326					

11.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江西省插队落户人数

出发日期：1969年3月1日—4月1日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合 计	31 098	4 091	2 637	2 396	2 529	3 593	2 519	2 170	3 162	2 705	4 122	1 174
上饶专区	5 169	4 091										1 078
贵溪县	418	418										
余江县	503	503										
横峰县	200	200										
万年县	498	498										
余干县	409	409										
婺源县	601	601										
上饶县	209	209										
铅山县	308	308										
德兴县	417	417										
弋阳县	528	528										
乐平县	426											
波阳县	652											
井冈山专区	7 284											
											3 162	4 122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崇明县	401								401			
吉安县	621							621				
永丰县	1 025									1 025		
峡江县	2 083									2 083		
新干县	1 041							1 041				
万安县	599								599			
宁冈县	500							500				
安福县	494										494	
吉水县	520										520	
宜春专区	5 068						2 529	2 519				20
宜丰县	1 029						1 029					
铜鼓县	505						505					
奉新县	1 115								1 095			
高安县	530								530			20
安义县	475									475		
靖安县	419									419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上高县	995				995							
抚州专区	4 896								2 170		2 705	
乐安县	1 161									1 161		21
黎川县	1 132							1 132				
宜黄县	1 029										1 008	
崇仁县	536										536	
南丰县	1 038								1 038			
赣州专区	5 033				2 637	2 396						
上游县	314						314					
信丰县	399						399					
崇义县	459							459				
安远县	494						494					
寻乌县	407							407				
全南县	414								414			
定南县	403								403			

(续表)

	合计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广昌县	417		417									
石城县	378		378									
宁都县	518		518									
瑞金县	424		424									
会昌县	406		406									
九江专区	3 648					3 593						55
永修县	337					337						
德安县	222					222						
武宁县	822					807						15
修水县	1 152					1 137						15
彭泽县	255					255						
湖口县	123					123						
瑞昌县	295					290						5
都昌县	332					312						20
星子县	110					110						

12. 1966—1968 届知识青年去安徽省插队落户人数

出发日期：1969年1月—2月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合计	20 363	2 555	2 448	1 643	2 010	2 435	1 822	1 300	1 827	1 831	2 492	
阜阳专区	7 606		1 437		2 361	1 316					2 492	
涡阳县	628										628	
蒙城县	807										807	
利辛县	802				459		343					
界首县	286						286					
阜阳县	756					756						
阜南县	474						474					
临泉县	1 131						1 131					
太和县	1 013								687			326
亳县	731											731
颍上县	576					576						
凤台县	402						402					
宿县专区	6 065	2 135	1 931			1 799					200	
怀远县	628				628							

(续表)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灵璧县	646	646										
五河县	654	654										
泗县	835	835										
濉溪县	1 000				1 000							
宿县	656		354		302							
固镇县	949		949									
萧县	497				497							
砀山	200									200		
滁县专区	2 583	420	517	206	211	74	506	337		312		
滁县	420	420										
来安县	517		517									
全椒县	312									312		
天长县	417				206	211						
凤阳县	337								337			
嘉山县	506							506				

(续表)

	人数	杨浦	静安	卢湾	黄浦	南市	徐汇	长宁	闸北	普陀	虹口	半工半读
定远县	74				74							
巢湖专区	2 282						963			1 319		
和县	325								325			
含山县	233								233			
无为县	429						429					
庐江县	459						429			30		
肥东县	464						105			359		
巢县	372								372			
池州专区	1 827								1 827			
石台县	165								165			
黄池县	580								580			
青阳县	322								322			
铜陵县	184								184			
东至县	576									576		

二、1966、1967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分配去本市、外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统计

1. 1966、1967 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分配去本市、外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数和政治情况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其 他	
总计	169 509	66 269	10 696	72 125	8 898	77 790	101 504	8 906	14 551	8 732	
一、 地方所属单位	146 395	62 209	8 090	62 277	7 857	68 171	87 781	7 939	13 719	7 797	
冶金局革委会	10 339	2 259	269	4 584	623	4 863	8 242	689	761	647	
机电一局革委会	36 720	15 249	1 682	16 481	2 100	16 457	28 592	2 077	3 635	2 416	

(续表)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其 他	
仪表局革委会	11 466	6 783	915	4 509	960	5 082	4 676		760	606	
化工局革委会	10 126	3 024	629	3 884	673	4 940					
纺织局革委会	29 968	22 234	1 711	15 565	1 015	11 677	21 199	2 426	4 189	2 154	
轻工业局革委会	12 101	7 350	1 114	3 948	703	6 336	9 030	914	1 539	618	
手工业局革委会	5 089		250	2 124	270	2 445					
交通局革委会	4 977	1 042	493	458	376	3 650	3 619	480	597	281	
建工局革委会	6 462			2 935	250	3 277	4 574	463	973	452	
房地局革委会	5 608		220	2 253	250	2 885					
公用局革委会	1 832	617		497	106	1 229	1 358	149	268	57	
城建局革委会	1 783	360		490	120	1 173					
环卫局革委会	211	81		97	109	5	146	31	17	17	
商业一局革委会	2 239	942		1 140	96	1 003	1 629	181	295	134	
商业二局革委会	2 856	1 240	7	1 477	110	1 262	2 108	234	313	201	

(续表)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其 他	
供销社革委会	1 426	700		682		744	937	173	199	117	
粮食局革委会	916			407	10	499	757	76	46	37	
水产局革委会	910	191	1	356	36	517	719	45	103	43	
出版局革委会	367		218	149							
体委革委会	48	23	11	37			32	3	8	5	
民政局革委会	47	21		47			29	5	4	9	
卫生局革委会	260	56	30	120	33	77	93	8	6	3	
电影制片厂革委会	14	7		14			8	1	5		
文汇报革委会	40			23		17					
新华书店革委会	38	18			17	21	33	4	1		
7341 部队	12	12				12					
各 县 属 企 业	540		540								
二、中央所属单位	17 702	3 122	1 729	6 720	865	8 388	10 931	921	823	870	
港务局革委会	6 121	1 255	1 122	747	572	3 680	4 394	608	618	501	

(续表)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其 他	
铁路局革委会	925	202			143	782	691	80	100	54	
海运局革委会	822	180		566	19	237	172	5	6	13	
长航局革委会	292	45			4	288	261	8		23	
航道局革委会	403				133		270				
机电二局革委会	72	28			72			66	1	5	
邮电局革委会	439		60	379							
华东电力建设局革委会	278	78		196	27	55	243	16	5	14	
人造板机器厂革委会	51	21			7	44	46	2	2	1	
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	382		49	111	19	203	197	10	2	13	
光学仪器厂革委会	100		31	69			90	1	2	7	
沪东船厂革委会	1 026	325	45	445	27	509	966	35	5	20	
求新船厂革委会	441	134		258	18	165	414	3		24	
东海船厂革委会	121	38			25	96	110			5	
东方红船厂革委会	655	204	50	350		255	636	2	2	15	
江南船厂革委会	1 624			640		984	1 430	64	25	105	

(续表)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其 他	
上海船厂革委会	669	206	2	349	4	314	308	15	6	22	
中国唱片厂革委会	117	56	14	103			92	11	6	8	
物资局革委会	256			256			196	22	20	18	
航海仪器厂革委会	25			25		24			1		
五四二厂革委会	81	30	29	52			80	1			
六一四厂革委会	40		14	26							
精密医疗器械厂革委会	67	28	2	65			66	1			
天然电器厂革委会	27			27		27					
上海矿灯厂革委会	61	23	35	26							
港口机械厂革委会	247	95	46	201			188	29	22	8	
上海电影机械厂革委会	10			10			8	2			
航标仪器厂革委会	55	22	5	50			51	3		1	
上海通讯工厂革委会	190	90		190							
新中动力机器厂革委会	185	62	37	148			169	2	2	12	
化工研究院革委会	43			43							

(续表)

单 位	人 数	其中： 女 生	66 届		67 届		家庭出身情况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劳 动 人 民	小 业 主	非 劳 动 人 民
烟草公司革委会	270		53	217					
纺机公司革委会	1 060			554		506			
航空工业学校革委会	8			8					
冶金机械学校革委会	65			65					
储运公司革委会	10			10					
上海机床厂革委会	90		60	30					
上海工具厂革委会	194		40	154					
上海医疗器械厂革委会	180		35	145					
三、支援内地建设									
江西第二指挥部	5 412	938	877	3 128	176	1 231	2 792	46	9
一机部	2 378	764	877	185	176	1 140	2 278	42	7
六机部	500			500					
第二汽车厂	443	144		443			428	2	11
西北工程机械厂	2 000			2 000			91	86	3
	91	30							

备注：1. 女生和初中中人数组有部分单位没分析，仅供参考。

2. 家庭出身情况是 133 693 人的分析。

2. 1966届知识青年分配去工矿的人数

(续表)

(续表)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川沙	上海	宝山	嘉定	松江	青浦	南汇	金山	高教局
航道局革委会	133	33	40						20				40							
机电二局革委会	72	4		12	23	5		2					26							
邮电局革委会	439	18	98					30	47	50	86	70								
电力建设局革委会	196	62	28	31		75														
柴油机厂革委会	160												160							
光学仪器厂革委会	100												100							
沪东船厂革委会	490												441	49						
求新船厂革委会	258		258																	
东方红船厂革委会	400												50	350						
江南船厂革委会	640							582	44										14	
上海船厂革委会	351	351																		
航海仪器厂革委会	25													25						
542厂革委会	81												81							
614厂革委会	40												40							
精密医疗器械厂革委会	67												67							
天然电器厂革委会	27																	27		

(续表)

(续表)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川沙	上海	宝山	嘉定	松江	青浦	南汇	金山	高教局
三、支援内地建设	4 005	347	442	244	362	262	260	298	349	446	839	57	35	49	15					
江西第二指挥部	1 062	97	142	54	162	12	60	98	49	40	217	57	35	24	15					
一机部	500				100				100		275			25						
六机部	443										146	297								
486厂	58										58									
467厂	88										88									
422厂	297											297								
第二汽车厂	2 000	250	300	190	200	150	200	200	200	200	260	50								

备注：（一）各县分至市属工厂的人数是市区学生在郊县学校学习的毕业生。

（二）高教局分配的人数是该局所属的业余大学的毕业生。

（三）分配去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学生是各县的城镇户口的毕业生。

3. 1967届知识青年分配去工矿的人数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总计	86 688	9 095	10 524	7 853	8 420	5 017	8 208	7 475	7 553	10 755	11 788
一、地方所属单位	76 028	7 750	8 189	6 771	7 926	4 881	7 213	6 821	7 104	9 004	10 369
冶金局革委会	5 486	411	583	649	236	193	151	187	1 310	314	1 452

(续表)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机电一局革委会	18 557	2 443	2 003	1 775	2 257	827	1 720	1 398	2 319	2 273	1 542
仪表局革委会	6 042	459	410	379	1 030	292	1 060	735	155	1 024	498
化工局革委会	5 613	173	234	125	1 192	709	385	778	239	752	1 026
纺织局革委会	12 692	1 694	1 779	1 880	644	672	1 600	775	383	1 447	1 818
轻工业局革委会	7 039	521	650	641	700	598	530	516	684	978	1 221
手工业局革委会	2 715	354	401	201	213	174	243	243	303	239	344
交通局革委会	4 026	446	478	142	367	288	262	485	421	539	598
建工局革委会	3 527	158	702	203		200	500	697	345	438	284
房地局革委会	3 135	350	298	278	456	239	342	282	266	294	330
城建局革委会	1 293	200	100	150	250	150		100	156	100	87
公用局革委会	1 335	39	148	52	145	100	130	100	90	177	354
环卫局革委会	114	21	9	10	10	10	15	10	10	10	9
商业一局革委会	1 099	216	55	68	130	54	90	122	135	88	141
商业二局革委会	1 372	116	98	132	183	123	104	89	129	179	219
供销社革委会	744	82	160	72	54	51	68	47	40		170

(续表)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粮食局革委会	509	33	61	7	20	6		249	96	19	18
水产局革委会	553		20			190				100	243
卫生局革委会	110	19		7	27	5	13		6	25	8
文汇报革委会	17	10							7		
新华书店革委会	38	5						8	10	8	7
7341部队	12				12						
二、中央所属单位	9 253	1 250	2 157	994	437	136	900	402	387	1 442	1 148
港务局革委会	4 252	749	1 155	259	55		452		174	873	535
铁路局革委会	925		335				178	130	163		119
海运局革委会	256		100	156							
长航局革委会	292		97	195							
航道局革委会	270						270				
华东电力建设局革委会	82					82					
人造板机器厂革委会	51								51		
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	222			110					112		

(续表)

	人数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杨浦
沪东船厂革委会	536								294	242	
求新船厂革委会	183	183									
东海船厂革委会	121										121
东方红船厂革委会	255		60								
江南船厂革委会	984		300	384	300						195
上海船厂革委会	318	318									
纺机公司革委会	506				136			109	50	80	131
三、支援内地建设	1407	95	178	88	57		95	252	62	309	271
江西第二指挥部	1316	95	178	88	57		95	252	62	265	224
西北建筑机械厂	91								44	47	

三、1966届初中毕业生各区、县分配情况总汇

1. 说明

一、1966届原来统计人数为159 358人，最近经各区、县重新核对统计，1966年初中毕业生实有人数为153 608人。其中：市区学生128 392人（包括在各县学校学习的市区学生1 370人）；各县学生25 216人，其中农村学生16 518人（包括农村学生在市区学习的166人），城镇学生8 698人。

二、1966年初中毕业生153 608人。计划安排如下：

1. 农业73 195人，占47.6%，其中：农村学生回生产队16 518人，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7 500人，国营农场17 500人，江西等外地农场31 677人。

各县城镇学生除500人去黑龙江外，其余由各县自行安排8 198人（主要是插队落户），占5.4%。

2. 支援内地建设2 450人，占1.6%。

3. 本市工厂企业安排69 765人，占45.4%。

三、市区毕业生128 392人。计划安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7 000人，占5.5%，国营农场17 500人，占13.6%，江西等本外地农场31 677人，占24.7%，支援内地2 450人，占1.9%，本市工厂企业69 765人，占54.3%。

四、原来计划安排本市企业事业单位 68 260 人，现实际安排 69 765 人。增减原因：

1. 支援内地建设原来计划 4 500 人，实际安排 2 450 人，减少 2 050 人。

2. 地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计划安排 64 510 人，实际安排 62 565 人，减少 1 945 人，文教卫生系统计划 200 人，安排 35 人，还有 165 人因需要单位未排出，计划未下达，须补充下达。

农业系统 100 人，因干部下放参加劳动，不需补充人员。公检法计划 100 人，安排 50 人，减少 50 人，其他 120 人未作安排。

各县县属企事业计划安排 1 500 人，需待安排政策明确后，再分配各县。

3. 中央各部在沪直属单位原计划安排 4 110 人，实际安排 7 200 人，增加 3 090 人，主要原因是单位生产需要，又有劳动计划，经请示市革会领导同志同意的，将 67 届毕业生计划安排人数中提前安排 3 000 人，其余 90 人是商业部所属两个单位在计划安排时未列入，后因单位需要补充增加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

2. 1966 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劳动分配汇总表

1968 年 8 月

人数	其中： 女性	毕业生人数		分 配 计 划				各县安排的 城 镇 学 生		
		合 计	其中：女性	农业(黑龙江、郊县 农 场 及 回 生 产 队)	工 厂 企 业 (包 括 支 内)	江 西 等 本 外 地 农 场 (待 分 配)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 中：女性	人 数
总 计	153 608	71 842	113 733	51 956	41 518	17 909	72 215	34 047	31 677	16 970
一、市 区	127 188	62 741	96 072	46 039	24 666	12 333	71 406	33 706	31 116	16 702
黄 浦	11 759	5 806	8 978	4 312	2 290	1 145	6 688	3 167	2 781	1 494
南 市	17 683	8 860	12 948	6 385	3 346	1 673	9 602	4 712	4 735	2 475
卢 湾	11 644	6 030	9 093	4 329	2 270	1 135	6 823	3 194	2 551	1 701
徐 汇	9 643	4 707	7 436	3 419	1 845	923	5 591	2 496	2 207	1 288
长 宁	7 676	3 858	5 806	2 957	1 470	735	4 336	2 202	1 870	921
静 安	13 379	6 670	10 037	5 333	2 540	1 270	7 497	4 063	3 342	1 337
普 陀	10 337	4 987	7 933	3 761	2 010	1 005	5 923	2 756	2 404	1 226
闸 北	11 575	5 660	8 782	3 749	2 245	1 122	6 537	2 627	2 793	1 911
虹 口	17 231	8 376	13 112	6 337	3 350	1 675	9 762	4 662	4 119	2 039

(续表)

	毕业生人数	分配计划						江西等本外地农场 (待分配)	各县安排的 城镇学生
		合计		农业(黑龙江、郊县 农场及回生产队)		工厂企业(包括支内)			
人数	其中: 女性	人数	其中:女性	人数	其中:女性	人数	其中:女性	人数	其中:女性
杨浦	16 261	7 787	11 947	5 477	3 300	1 650	8 647	3 827	4 314
二、各县	26 420	9 101	17 661	5 917	16 852	5 576	809	341	561
上海	2 601	866	1 652	518	1 447	446	205	72	38
嘉定	2 926	923	2 082	633	2 077	633		10	5
宝山	3 689	1 349	2 167	798	1 909	693	263	105	217
川沙	6 637	2 592	5 169	1 947	4 828	1 783	341	164	286
南汇	2 450	780	1 594	488	1 594	488		110	1 182
奉贤	912	290	610	187	610	187			535
松江	1 404	463	399	128	399	128		7	3
金山	1 142	382	414	133	414	133			728
青浦	1 215	403	489	155	489	155		3	1
崇明	3 444	1 053	3 065	930	3 085	930			723
									247
									359
									123

备注:各县毕业生分类的男女比例系估计数。

3. 1966 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任务分配表

		国营农场												星火农场				东海农场		供销站				
		合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学生回生产队			黄山茶场			向阳农场			红星农场		长征农场		东方红农场			
		小计	黄山	茶场	黄山	林场	跃进	农场	农场	小计	1 000	2 300	1 620	1 200	1 800	2 600	1 300	800	700	1 200	1 260	900	20	
总计	41 518	7 500	16 518	17 500	500	300	1 000	2 300	1 620	1 200	1 800	2 600	1 300	800	700	1 200	1 260	900	20					
一、市区	24 666	7 000	166	17 500	500	300	1 000	2 300	1 620	1 200	1 800	2 600	1 300	800	700	1 200	1 260	900						
黄浦	2 290	660		1 630	100		300	630	400											200				
南市	3 346	880	16	2 450	100		500									1 270			200			380		
卢湾	2 270	660		1 610	50	200			220	600						540								
徐汇	1 845	530		1 315	500						400	300					250	315						
长宁	1 470	420		1 050	40					200							200		310	300				
静安	2 540	730		1 810	110			870								530	300							
普陀	2 010	580		1 430	100				500								300		200		320	10		
闸北	2 245	660		1 585	100				500									250	375	350		10		
虹口	3 350	950		2 400	100				800							500	800			200				
杨浦	3 300	930	150	2 220	50											1 000		460	300		410			

(续表)

		国营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学生回生产队		小计		黄山茶场		黄山林场		向阳农场		跃进农场		红星农场		长征农场		东方红农场		前进农场		前哨农场		前卫农场		五四农场		星火农场		东海农场		农场		供销站	
二、各县	合计	16 352	500	16 352																																	
上海	1 447	65	1 382																																		
嘉定	2 077	50	2 027																																		
宝山	1 909	100	1 809																																		
川沙	4 828	70	4 758																																		
南汇	1 594	50	1 544																																		
奉贤	610	20	590																																		
松江	399	45	354																																		
金山	414	40	374																																		
青浦	489	40	449																																		
崇明	3 085	20	3 065																																		

说明：去黑龙江、国营农、林场的任务，女性 50% 供销站任务均男性。

4. 1966 届初中毕业生支援内地建设任务分配表

	合 计		第二汽车厂		486 厂		467 厂		422 厂	
	人 数	其中：女性								
总 计	2 450	735	2 000	600	50	15	100	30	300	90
黄 浦	250	75	250	75						
南 市	300	90	300	90						
卢 湾	190	57	190	57						
徐 汇	200	60	200	60						
长 宁	150	45	150	45						
静 安	200	60	200	60						
普 陀	200	60	200	60						
闸 北	200	60	200	60						
虹 口	410	123	260	78	50	15	100	30		
杨 浦	350	105	50	15					300	90

说明：第二汽车厂任务由机电一局、仪表局代招代培，机电一局 1 940 人，仪表局 60 人。422 厂、486 厂任务由沪东船厂代招代培。467 厂任务由沪东船厂代招代培 40 人。新中动力机厂代招代培 60 人。

5. 1966 届初中毕业生参加本市工厂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
(中央各部在沪直属单位部分)

合 计			中 央 各 部 在 沪 直 属 单 位												化 工 研 究 院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小 计	港 励 局	烟 草 公 司	物 资 局	橡 胶 公 司	医 药 公 司	纺 机 公 司	机 电 二 局	航 道 局	电 力 建 设 局	邮 电 局	海 运 局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总 计	39 765	33 312	7 200	2 427	610	122	243	157	260	52	320	160	200	100	554	221	78	30
一、市 区	38 956	32 971	7 056	2 330	610	122	243	157	240	48	320	160	200	100	554	221	74	29
黄 浦	6 438	3 092	1 165	314	89	16	25	16	57	11	9	5			4	1	40	10
南 市	9 302	4 622	818	264	160	32		3							50	13	30	6
卢 湾	6 633	3 137	871	253	100	20		10	3	13	6	6	3		12	5	30	6
徐 汇	5 391	2 436	178	71				30	6	45	23	10	5		23	9		
长 宁	4 186	2 157	383	148						70	35	38	19	190	76	5	2	
静 安	7 297	4 003	102	47						33	16	45	22	24	9			
普 陀	5 723	2 896	341	132			15	9		10	5	24	12	100	40		20	5
闸 北	6 337	2 447	519	178	80	16			55	11	7	4	27	14	50	20		
虹 口	9 352	4 559	1 000	332	70	14		45	9	23	12	32	16				40	24
杨 浦	8 297	3 722	1 679	641	120	24	203	132	40	8	119	59	9	4	190	76	30	12
二、各 县	809	341	144	47				20	4						4	1	40	10
上 海	205	72	65	26														
嘉 定	5	4																
宝 山	258	101	79	21						20	4				4	1	40	10
川 沙	341	164																

备注:各县任务是给在县属学校学习的市区学生。

(续表)

(续表)

6. 1966 届初中毕业生参加本市工厂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地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部分)

		地 方 所 属企 业、事 业 单 位																							
		小计		冶金局		机电一局		仪表局		化工局		纺织局		轻工局		手工局		交通局		公用局		建工局		城建局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中 人 数	其中 女性	
总 计	62 565	30 895	4 650	930	17 300	6 920	4 500	2 700	3 550	882	15 680	12 544	4 020	2 612	1 750	1 225	410	82	500	175	3 000	600	400	80	
一、市区	61 900	30 591	4 620	924	17 183	6 873	4 480	2 688	3 475	864	15 605	12 484	3 920	2 547	1 716	1 201	410	82	500	175	2 880	576	400	80	
黄浦	5 273	2 778	592	118	315	126	260	156	118	29	1 891	1 513	240	156	331	232	90	18		20	4				
南市	8 484	4 358	725	145	2 195	878	160	96	116	28	2 533	2 026	945	614	290	203			20	7	860	172	100	20	
卢湾	5 762	3 004			2 344	1 018	345	207	437	108	1 437	1 150	350	227	132	93			35	12	180	36			
徐汇	5 213	2 365			2 655	982	545	327	293	75	656	525	300	195	65	45			50	17			50	10	
长宁	3 803	2 009	100	20	757	303	185	111	497	122	1 260	1 008	350	227	92	64	20	4			140	28	50	10	
静安	7 195	3 836	673	135	1 440	576	550	330	416	104	2 529	2 023	410	267	236	165			50	18	440	88			
普陀	5 382	2 564	690	138	1 141	456	545	327	338	84	1 115	892	405	263	184	129	50	10	50	18	170	34	100	20	
闸北	5 818	2 389	660	120	2 510	1 004	315	189	239	59	454	363	380	247	134	94	150	30	30	10	400	80	50	10	
虹口	8 352	4 207	790	158	2 119	847	985	591	405	101	2 116	1 695	540	251	166	116			100	35	450	90	50	10	
杨浦	6 618	3 081	450	90	1 707	683	590	354	616	154	1 614	1 289		86	60	100	20	165	58	220	44				
二、各县	665	294	30	6	117	47	20	12	75	18												120	24		
上海	140	46																				100	20		
嘉定	5	4																							
宝山	179	80	30	6																					
川沙	341	164			117	47	20	12	75	18												20	4		

(续表)

地 方 所 属企 业、事 业 单 位													
	房地局	环卫局	商一局	商二局	供销局	粮食局	出版局	文汇报	电影放映 机械厂	民政局	水产局	体革会	
人 数	其中 女性 数	人 其中 女性 数	其中 女性 数										
总计	2 481	486	100	40	1 100	440	1 400	560	700	280	450	135	111
一、市区	2 480	490	100	40	1 100	440	1 318	527	688	275	450	135	111
黄浦	670	134	10	4	279	112	251	100	96	33	30	9	15
南市	200	40	10	4	279	112	251	100	96	33	30	9	15
卢湾	230	46	10	4	70	28	145	58	80	12	17	5	
徐汇	200	40	10	4	35	34	108	43	82	33	100	30	
长宁	120	24	10	4	45	18	85	34	45	18	47	14	
静安	250	50	10	4	63	25	80	32	48	18			
普陀	190	33	10	4	125	50	73	28	60	24	111	33	25
闸北	180	36	10	4	78	29	120	50	43	17	58	17	12
虹口	220	44	10	4	115	46	150	60	92	40	13	4	11
杨浦	220	44	10	4	165	66	214	86	96	38	15	5	40
二、各县							82	33	12	5			
宝山							67	27	12	5			
川沙							15	6					

四、1966届高中毕业生各区、县分配情况总汇

1. 1966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劳动分配表

(续表)

	毕 业 生 人 数		合 计		农 业		分 配 计 划		工 厂 企 业	
	人 数	其 中：女 性	人 数	其 中：女 性	人 数	其 中：女 性	人 数	其 中：女 性	人 数	其 中：女 性
卢湾	1 972	935	1 937	963	1 075	537	862	426		
徐汇	2 893	1 293	2 861	1 315	1 595	791	1 266	524		
长宁	1 517	785	1 480	728	810	405	670	323		
静安	3 162	1 519	3 156	1 562	1 730	865	1 426	697		
普陀	1 388	583	1 346	641	730	365	616	276		
闸北	1 921	866	1 903	865	1 010	491	893	374		
虹口	3 984	1 709	3 958	1 812	2 170	1 079	1 788	733		
杨浦	2 680	1 089	2 672	1 246	1 440	720	1 232	526		
高教局	420	209	408	210	260	130	148	80		
二、各县	7 057	2 451	6 324		5 187		1 137	508		
上海	751	263	653		505		148	63		

(续表)

	毕 业 生 人 数		分 配 计 划				工 厂企 业
	人 数	其中：女性	合 计	农 业	其 中：女性	人 数	
嘉定	670	216	602	524		78	30
宝 山	1120	408	1043	795		248	135
川 沙	1820	642	1738	1403		335	142
南 汇	496	159	425	390		35	14
奉 贤	244	77	225	205		20	8
松 江	576	213	471	361		110	49
金 山	319	106	222	177		45	18
青 浦	370	126	257	199		58	25
崇 明	691	241	648	628		20	8
其 他			40			40	16

注：一、各县农村学生男女学生没有统计，故农业中女性总数无列出。

二、各县安排城镇学生成去县属农牧场、插队落户等方面的人数未列入分配计划内。

2. 1966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任务分配表

		农 场																		
		农 垦 局 所			国 营 农 场			农 场			农 场			农 场			农 场			
合计		黑 龙 江	农 村 学 生 回 生 团	农 村 学 生 回 生 团	黄 山	跃 进	向 阳	长 � 征	红 星	东 风	东 方 红	农 场	前 进	前 卫	东 海	五 四 农 场	星 火 农 场	农 机 厂	牛 奶 公 司 牧 场	红 旗 种 子 场
总 计	18 407	2 500	3 407	12 500	500	740	1 670	1 200	680	1 400	2 000	830	400	700	320	620	950	150	250	90
一、市 区	13 260	2 045		11 215	500	740	1 670	780	580	1 400	2 000	830	400	430	260	490	660	135	250	90
黄 浦	1 070	160		910	40	740													130	
南 市	1 330	160		1 170	50							1 000						120		
卢 湾	1 075	145		930	40				780					110						
徐 汇	1 595	265		1 330	60									400	200	140	470		60	
长 宁	810	120		690	30													660		
静 安	1 730	300		1 430	60									900	470					
普 陀	730	120		610	30						580									
闸 北	1 610	165		845	40							460				210			135	
虹 口	2 174	320		1 850	80				1 620									60	90	
杨 浦	1 440	230		1 210	60							900			250					

(续表)

		农垦局所属国营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学生产队	小计	黄山茶林场	跃进农场	向阳农场	长征农场	农场	红星农场	东风农场	东方红农场	前进农场	前卫农场	东海农场	五四农场	星火农场	农机厂	牛奶公司所属牧场	红旗种子场
合计	260	60	200	10	50					40	100									
高教局	5 187	455	3 407	1 285					420	100					270	60	130	290	15	
二、各县																				
上海	505	40	295	170													170			
嘉定	524	30	394	100						100										
宝山	795	95	440	290											290					
川沙	1 403	85	898	420					420											
南汇	390	30	300	60												60				
奉贤	205	30	155	20													20			
松江	361	75	156	130													130			
金山	177	35	92	56														50		
青浦	199	30	99	70														70		
崇明	628	5	608	15															15	

注：表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局所属国营农场男女比例是女性占50%；农机厂、牛奶公司所属牧场女性占40%。

3. 1966 届高中毕业生支援内地建设任务分配表

		合 计		江 西 第 二 指 挥 部										安徽 711 厂		一机部			
人 数	其 中：	小计		九三二三厂		九三五三厂		九三三三厂		九三四四厂		九三〇四厂		九三三四厂		黎明药厂		九三五五厂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人	其中：女性
总 计	1880	585	1310	410	200	60	70	10	270	80	20	5	200	120	100	60	250	75	200
一、市 区	1705	529	1160	363	200	60	45	5	210	65	20	5	175	105	100	60	210	63	200
黄浦	110	33	110	33													110	33	
南 市	165	60	165	60														40	
卢 湾	170	60	100	60														70	
徐 汇	200	50	200	50														40	
长 宁	120	40	20	5															
静 安	200	60	200	60															
普 陀	100	30	100	30															
闸 北	145	40	45	5															
虹 口	275	96																	
杨 浦	220	60	220	60	200	60											20		
二、各 县	175	56	150	47															
上 海	40	10	40	10															
嘉 定	20	5	20	5															
宝 山	50	14	25	5															
川 沙	65	27	65	27															

注：上海县任务中有 20 人给市区学生，宝山县一机部 25 人给市区学生，川沙县中黎明药厂 40 人给市区学生。

4. 1966 届高中毕业生参加本市工厂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中央各部在沪直属单位部分)

(续表)

		中央各部在沪直属单位																															
人数	其中女性人数	合计		港务局		医药公司		东方红船厂		新中劝力机厂		上海机床厂		光学仪器厂		上海柴油机厂		唱片厂		中国五金四厂		六一机械厂		医疗机械厂		港口建设局		华东电力矿灯厂		上海邮电局		沪东船厂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奉贤	20	8																															
松江	110	49																															
金山	45	18																															
青浦	58	25																															
崇明	20	8																															
三、其他	40	16																															

注：一、各县的任数目，县属企业由各安排城镇学生、市属工厂安排市区学生。

二、县属单位女生比例初步匡计 40%。

三、其他 40 名任务待给郊区城镇学生在市区学校学习的学生。

5. 1966 届高中毕业生参加本市工厂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部分)

		地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数	合计		冶金局		机电一局		仪表局		化工局		纺织局		轻工局		手工局		交通局		房地局		出版局		县属企业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人	数
总计	75104057	250	50	1600	640	900	540	350	87	1720	1371	880	616	250	175	590	118	220	110	250	150	500	200				
一、市区	65483605	165	33	1523	609	895	537	310	78	1554	1239	833	583	228	161	590	118	215	107	235	140						

(续表)

地 方 所 属企 业、事 业 单 位													
合 计		冶 金 局		机 电 一 局		仪 表 局		化 工 局		纺 织 局		轻 工 局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人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黄浦	386	269		22	7	60	36		170	136	68	48	26
南市	621	345	35	6	67	25	170	103	10	3	150	120	45
卢湾	515	329			76	30	116	70	25	6	200	160	50
徐汇	866	421	45	10	338	140	82	50	55	14	85	65	145
长宁	454	253			56	24	40	24	60	15	110	88	103
静安	1051	588			290	120	130	78	60	15	316	252	65
普陀	443	214	15	3	70	28	40	24	70	18	125	100	
闸北	560	284			230	90	17	10			70	56	87
虹口	961	491	70	14	290	111	170	100	30	7	110	88	150
杨浦	593	341				84	34	70	42		180	144	60
高教局	98	70									38	30	60
											40		

(续表)

五、1967届高、初中毕业生各区、县分配情况总汇

1. 1967届高、初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任务汇总表

	合 计		黄 浦	南 市	卢 湾	徐 汇	长 宁	静 安	普 陀	闸 北	虹 口	杨 浦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中女性	人 数	其中女性
总 计	106 222	47 491	10 639	4 869	13 553	5 896	9 339	4 398	9 838	4 435	6 078	2 735
上山下乡	22 410	11 204	2 250	1 125	2 860	1 430	1 970	985	2 070	1 035	1 280	640
支援内地建设	1 450	421	100	35	210	54	90	26	60	21	100	15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	9 272	2 345	1 060	269	2 350	572	960	206	380	129	136	57
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	73 090	33 521	7 229	3 440	8 133	3 840	6 319	3 181	7 328	3 250	4 662	2 038

2. 1967 届高、初中毕业生去国营农场任务分配表

		合 计		黄	浦	南	市	卢	湾	徐	汇	长	宁	静	安	普	陀	闸	北	虹	口	杨	浦	其中	女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合 计	22 410	11 204	2 250	1 125	2 860	1 430	1 970	985	2 070	1 035	1 280	640	2 195	1 097	1 990	995	2 045	1 022	2 800	1 400	2 950	1 475				
跃进农场	1 560	780			620	310																		940	470	
新海农场	2 830	1 414																								
红星农场	1 800	900						900	450																	
长征农场	1 500	750						1 070	535																	
东风农场	2 500	1 250	1 250	625						250	125															
东方红农场	3 300	1 650			1 440	720			770	385								1 090	545							
前进农场	1 870	935																870	435							
前锋农场	900	450									320	160														
前卫农场	1 200	600			800	400					400	200												1 000	500	
东海农场	580	290																								
五四农场	1 480	740																								
星火农场	2 890	1 445	1 000	500																					1 010	505

3. 1967 届高、初中毕业生支援内地建设任务分配表

	合 计	黄 浦	南 市	卢 湾	徐 汇	长 宁	静 安	普 陀	闸 北	虹 口	杨 浦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总 计	1450	421	100	35	210	54	90	26	60	21	100	15
江西钢厂	400	60			100	15					100	15
422、467厂	50	16										
江西第二指挥部	1 000	345	100	35	110	39	90	26	60	21	260	90
其中：9345厂	20										20	
9355厂	200	70					60	21			20	7
9323厂	150	53										
9333厂	200	70	100	35	60	21						
9304厂	100	36			50	18					50	18
9353厂	140	50									70	25
黎明药厂	100	40									100	40
东风制药厂	40	8					40	8				
前卫油漆厂	50	18					50	18				

4. 1967 届高、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交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中央各部在沪直属单位部分)

		合 计	黄 浦	南 市	卢 湾	徐 汇	长 宁	静 安	普 陀	闸 北	虹 口	杨 浦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其 中 女 性 人 数	
合 计	82 362	35 866	8 289	3 709	10 483	4 412	7 279	3 387	7 708	3 379	4 798	2 095
一、中央在沪直属单位	9 272	2 345	1 060	269	2 350	572	960	206	380	129	136	57
港务局革命委员会	4 210	926	700	154	1 170	257	240	53				
铁路局革命委员会	1 000	220			340	75				200	44	130
航道局革命委员会	350	53								350	53	
航修厂革命委员会	300	30			100	10	200	20				
长航局革命委员会	300	45			100	15	200	30				
纺机公司革委会	506	213							136	57	109	46
江南造船厂革委会	920	295			300	96	320	103	300	96		
沪东造船厂革委会	520	166										300
求新造船厂革委会	180	58			180	58						
东方红造船厂革委会	260	83			60	19						200
上海造船厂革委会	360	115	360	115								
东海造船厂革委会	121	39										121
人造板机器厂革委会	50	21								50	21	
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	100	42			100	42						
上海矿灯厂革委会	15	6									15	6
华东电力建设局机修厂革委会	80	33							80	33		

5. 1967届高、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交企业劳动任务分配表(地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部分)

	合计	黄浦		南市		卢湾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闸北		虹口				
		其中 女性 人数																				
二、地方企业所属单位	73 090	33 521	7 229	3 440	8 133	3 840	6 319	3 181	7 328	3 250	4 662	2 038	6 328	3 443	6 926	3 006	7 130	2 848	8 800	4 123	9 736	4 352
冶金局革命委员会	5 430	1 194	405	89	570	125	650	143	235	52	190	42	115	25	170	37	1 335	294	320	70	1 440	317
机电一局革委会	17 900	7 518	2 420	1 016	2 040	857	1 430	601	2 060	865	786	330	1 657	695	1 478	621	2 206	927	2 323	976	1 500	630
仪表局革命委员会	5 940	3 742	416	262	400	252	379	239	968	610	292	184	933	588	870	548	155	97	1 037	653	490	309
医疗工业公司革委会	285	180	35	22	55	35	25	15	5	3	12	8	20	13			108	68	20	13	5	3
化肥局革命委员会	5 100	1 428	166	47	230	64	111	31	1 111	311	653	183	290	81	749	210	188	53	703	196	899	252
医药公司革委会	200	100	3	1		5	3	13	7	12	6	52	26	3	2	65	32	33	16	14	7	
橡胶公司革委会	230	115		2	1	6	3	47	23	24	12	5	3	28	14	5	3	11	5	102	51	
纺织局革命委员会	11 510	8 632	1 303	977	1 672	254	1 805	1 354	575	431	618	464	1 463	1 097	679	509	396	297	1 243	932	1 756	1 317
轻工业局革委会	6 050	3 933	480	312	650	423	500	325	550	357	500	325	520	338	500	325	600	390	900	585	850	553
手工业局革委会	2 670	1 869	353	247	400	280	199	140	212	148	169	118	237	166	243	170	304	213	230	161	323	226
建工局革命委员会	3 560	712	100	20	700	140	300	60		200	40	500	100	700	140	400	80	460	92	200	40	
房地局革命委员会	3 300	726	415	91	294	65	295	65	429	94	249	55	357	79	348	77	276	61	307	67	330	72
城建局革命委员会	1 300	260	200	40	100	20	150	30	250	50	150	30		100	20	170	34	100	20	80	16	
公用局革命委员会	1 340	495	40	15	150	55	50	19	145	53	100	37	130	48	100	37	90	33	175	65	360	133
交通局革命委员会	4 000	880	430	95	477	105	140	31	356	78	278	61	280	62	470	103	420	92	540	119	610	134

(续)

任务完成情况

1. 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任务分配表

		初中生		高中生		合计		高中生		初中生		合计		高中生		初中生		
总计		高中生	初中生					小计	市区	城	镇	小计	市	区	市	区	城	镇
总计	10 000	2 500	7 500															
一、市区	9 045	2 040	7 000	二、各县	955	455	180	275	500	85	415							
黄浦	820	160	660	上海	105	40	25	15	65	15	50							

(续表)

	合计	高中生	初中生	合计	高中生				初中生			
					小计	市区	城镇	小计	市区	城镇	小计	市区
南市	1 040	160	880	嘉定	80	30	30	50			50	
卢湾	805	145	660	宝山	195	95	65	30	100	25	75	
徐汇	795	265	530	川沙	155	85	65	20	70	45	25	
长宁	540	120	420	南汇	80	30	30	30	50		50	
静安	1 030	300	730	奉贤	50	30		30	20		20	
普陀	700	120	580	松江	120	75	25	50	45		45	
闸北	825	165	660	金山	75	35		35	40		40	
虹口	1 270	320	950	青浦	70	30		30	40		40	
杨浦	1 160	230	930	崇明	25	5		5	20		20	
高教局	60	60										

注：此任务系初步分配意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沪接收时，可能会略有调整。

2. 上海10区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任务完成情况表

区别	合计	1966届				1967届				1968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虹 口 区	合 计	1 249(589)	201	76	919	451	25	9	82	43	12	3	10	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54农场	360(165)	169	70	185	92	2	1	2	1	2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290农场	577(265)	18	2	490	235	17	6	45	20	3	4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名山农场	193(101)	13	4	154	83	1	1	22	12	3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延兴农场	89(40)			84	36	1		1	1	1	1	2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55农场	1(1)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50农场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859农场	4(3)				3	3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师独立农场	24(14)				2	1	4	1	12	9	3	3	3
	合 计	1 241	145	68	1 094	510			1					
杨 浦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55农场	309	142	65	167	7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勤得利农场	611			611	28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万宝农场	266	2	2	263	120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299农场	54	1	1	53	2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农场	1		1			(随虹口区前往)							

(续表)

区别		合 计	1966 届			1967 届			1968 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闸 北 区	· 合 计	766	65	28	556	273	8	4	111	42		26 1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沿江农场	105	1		54	30			41	13		9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新华农场	91	1		79	35			8	5		3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北方农场	228	13	7	156	83	1		49	20		9 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	10			5	1			1			4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8 农场	103	17	8	79	41	1	1	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6 农场	229	33	13	183	83	6	3	6	4		1 1
	· 合 计	749	87	33	502	174	17	11	109	51	15	8 19 1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7 农场	265	44	18	216	87	1		2	1		2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8 农场	203	37	11	157	43			9	6		
普 陀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4 农场	41			33	11	4	4	3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色草原农场	201	5	4	90	29	11	7	70	31	13	7 12 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	39	1		6	4	1		25	13	2	1 4 3

(续表)

区别	合 计	1966 届				1967 届				1968 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卢 湾 区	合 计	755	60	26	548	292	18	5	98	44	17	8	14	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丰收农场	93	10	4	82	52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金边农场	87	11	5	73	41	1		2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万发农场	44	8	3	35	21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太平湖农场	117	11	6	80	43	1		15	4	10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阿伦河农场	108	16	6	92	4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1 团	306	4	2	186	91	16	5	79	37	7	6	14	5
徐 汇 区	合 计	806	150	57	581	316	22	6	36	11	12	5	5	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荣军农场	161	39	12	117	56	2	2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旭光农场	118	47	19	63	35			6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高峰农场	106	44	21	61	39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铁峰农场	68	19	5	48	25			1	1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云山农场	23			21	12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八五〇农场	316	1		265	145	20	4	20	9	7	5	3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	14			6	4			4	1	3	1		

(续表)

区别	合 计	1966 届				1967 届				1968 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小计	其中女生
	合 计	564	57	28	474	245	5	3	9	3	9	4	9
长 宁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团虎林农场	315	57	28	251	121	3	2			3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绥滨农场	246			223	124	2	1	7	1	6	4	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望哈农场	3			1				2	2			
	合 计	824/16	88	46	643	295	18	8	49	30	19	6	23
南 市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鹤山农场	87	27	15	60	2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前峯农场	83	25	15	58	2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红五月农场	88	18	11	70	4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859 农场	185/12	8	4	147	61	16	8	9	7	9	5	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胜利农场	116	1		86	34	2		8	5	9	1	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饶河农场	73/1			69	32			5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集贤农场	133/1	9	1	124	63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 859 农场	1				1	1						

(续表)

区别	合计	1966 届			1967 届			1968 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南 市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金边农场	20		5	2		11	8		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	31/2		22	13		9	4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	7		1			6	3	1	1
	合 计	1 077	111	53	848	401	21	7	72	37
静 安 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一团(大西江)农场	148	38	19	110	59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团(跃进)农场	121	43	18	78	4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团(尖山)农场	75	30	16	45	2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597 团农场	407			358	148	3	32	15	1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兴团农场	118			88	56	9	6	21	1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星团农场	208			169	76	9	1	19	7
									4	1
									7	6

注：此表请于 20 日前报下乡上山办公室。

3. 上海 10 县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任务完成情况表

区别	合 计	1966 届				1967 届				1968 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合 计	210	24	8	120	49	14	7	47	22	2	2	3
上 海 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4 农场	20	19	8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集贤 859 农场	112	5		96	36	2	2	6	1	1	1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集贤农场	48			16	7	8	2	24	1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哈尔滨望哈农场	30			7	5	14	3	17	7	1	1	1
	合 计	320	48	12	185	71	20	5	67	28			
川 沙 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4 农场	29	26	7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绥滨农场	137	20	5	116	43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海洋农场	20	1		5	2	4	1	10	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丰收农场	23	1		9	7	4		9	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金星农场	20			11	3	2		7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万发农场	40			21	8	8	3	11	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稻花香农场	51			20	8	2	1	29	11			

(续表)

区别		合计	1966届			1967届			1968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宝 山 县	合 计	344	56	24	255	110	10	7	21	10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4 农场	25	21	7	4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4 农场	31			31	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云山农场	164	32	15	132	5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胜利农场	32			32	1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新立农场	38	1	1	19	10	7	5	10	6	1
嘉 定 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阿伦河农场	54	2	1	37	22	3	2	11	4	1
	合 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7 农场	16	3	1	13	8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万宝团农场	64	3	2	54	24	3	4	3		
南 汇 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北方团农场	68				55	22	5	4	8	4
	合 计	95	11	2	78	29	2	4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7 农场	9	6	1	3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大连池农场	86	5	1	75	28	2	4			

(续表)

区别		合 计	1966届			1967届			1968届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高 中		初 中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其中 女生	小计
松江 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8 农场	35	24	10	11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饶河团农场	79	9	3	61	10	6	3		2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 290 农场	10	1	3		1				5	3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集贤农场	26			9	1	8	1		9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北兴农场	90	16	5	26	6	19	5	3	2	3
奉贤 县	合 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军垦农场	49	8		41	19					
青浦 县	合 计	70	21	10	48	11			1	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北方团农场	70	21	10	48	11			1	1	
金山县	崇明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虎林县 854 农场	5	5								
	合 计	76	21	7	55	2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 290 农场	66	11	4	55	25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857 农场	10	10	3							

七、上海市 1968—1975 年(上半年)知识青年安排情况

1. 上海市 1968—1975 年(上半年)知识青年“四个面向”情况一览表

安排 总人数	上 山 下 乡										工矿企事业单位							
	合 计					外 地					本 市							
	人 数	插队 落户	兵团	农林场	小计	插队 落户	兵团	农林场	小计	插队 落户	农场	投亲 插队	小计	全民 集体 所有 制	本 市			
1730 856 947 024	381 627	150 429	327 538	87 430	600 981	305 523	150 429	68 076	76 853	346 043	76 004	259 462	10 577	576 934	458 830	118 104	33 260 23 364 87 225 10 656 1 944 1 800 48 619	
1968	274 228	90 654	23 057	11 366	56 241	12 447	1 081	11 366	78 217	21 976	56 241	164 097	164 097		5 412			14 055
1969	273 025	262 186	132 935	44 310	31 848	57 093	237 734	114 053	44 310	31 848	46 723	24 452	18 082	6 370				10 839
1970	250 839	245 380	142 486	58 045	21 863	22 986	242 890	142 486	58 045	20 873	21 496	2 490	900	1 500				5 499
1971	188 569	103 885	23 243	28 854	50 002	1 786	62 851	22 561	28 854	9 874	1 562	41 034	682	40 128	224	71 985	12 699	
1972	234 768	68 041	23 795	2903	39 826	1 517	24 609	14 878	2 903	5 481	1 347	43 432	8 917	34 345	170	100 480	66 521	33 959 14 899 16 976 13 575 3 465 601 6 731

(续表)

2. 上海市知识青年 1968—1975 年(上半年)去外省上山下乡分布情况表

3. 上海知识青年 1968—1975 年(上半年)分配去向占安排总人数百分比

	合计	外地：上山下乡	本市：上山下乡	本市：全民所有制单位	本市：集体所有制单位	外地：工矿企事业单位	为支援外 地代训	技工学校	卫生学校	师资培训中小学	外语培训	参军
1966—1974 届毕业生 人数	1852 120											
1968—1975 年(上半年)安排人数	1730 856	600 981	346 043	458 830	118 104	33 260	23 364	87 225	10 656	1 944	1 800	48 619
分配数占毕业生 %	93.45											
分配去向占安排总数 %	34.7	20	26.5	6.8	1.9	1.4	5.1	0.6	0.1	0.1	2.8	

4. 上海知识青年 1968—1975 年(上半年)去外地和本市上山下乡人数百分比

	合 计	外 地	本 市
1968—1975 年上半年上山下乡人数	947 024	600 981	346 043
占 %		63.5	36.5
外 地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1968—1975 年上半年上山下乡人数	600 981	305 623	150 429
占 %		50.9	25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续表)

本 市										
	合 计	插 队	农 场	投亲插队						
1968—1975年上半年上山下乡人数	346 043	76 004	259 462	10 577						
占%		22	75	3						
5. 上海知识青年 1968—1975 年(上半年)去各省上山下乡人数百分比										
	合 计	黑 江	江 西	安 徽	云 南	吉 林	贵 州	内 蒙	辽 宁	回原籍投亲 和零星去 外省插队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600 981	164 344	117 618	144 123	55 467	23 861	10 216	7 945	552	76 853
占下乡人数的%		27.3	19.6	24	9.2	4	1.7	1.3	0.1	12.8
黑 龙 江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农 林 场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164 344		26 801		71 284		66 259			
占%			16.3		43.4		40.3			
安 徽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农 林 场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144 123		131 155		12 837		131			
占%			91		8.9		0.1			

(续表)

内蒙古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农 林 场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7 945	1 622	6 323	
占%		20.4	79.6	
江 西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农 林 场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117 618	101 887	15 270	461
占%		86.6	13	0.4
云 南				
	合 计	插 队	兵 团	农 林 场
1968—1975(上半年)下乡人数	55 469	5 929	44 715	1 225
占%		17.2	80.6	2.2

6. 上海市知识青年 1968—1974 年

	总计	合 计						外 省					
		黑 龙 江			江 西			安 徽			外		
		人 数	插 队	兵团、农 林 场	人 数	插 队	兵团、农 林 场	人 数	插 队	兵团、农 林 场	人 数	插 队	兵团、农 林 场
一、上山下乡人数	889 085 463 109 405 976 599 897 381 940 217 957 164 214 26 671 137 594 117 594 101 863 15 731 143 539 131 119 12 420												
二、因招生、招工、参军等 原因迁出人数	195 329 106 137 89 192 124 796 89 352 35 444 29 524 7 177 22 347 29 954 25 967 3 987 30 449 26 797 3 652												
其中：本市招生人数					8 110			2 490			2 099		2 340
三、现有人数	873 756 356 972 316 784 475 101 292 588 182 513 134 690 19 494 115 196 87 640 75 896 11 744 113 090 104 322 8 768												
占下乡数%	77.5	77.1	78	79.2	76.6	83.7	82	73.1	83.8	74.5	74.6	78.8	79.6
													70.6
													75.8

说明：1. 表列上山下乡人数是按当年下乡的人数统计的。

2. 去外省的变动情况是赴各省学习慰问团提供的。

3. 本市招生人数是教育局提供的。

4.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的知识青年变动情况未掌握。

上山下乡人数和变动情况表

云 南		林插队落户		州插队落户		辽 宁		内 蒙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合 计		插队落户		农 场		本 市	
小计	插队落户	兵团、农林场	林插队落户	州插队落户	辽 宁	小计	插队落户	兵团	内 蒙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合 计	插队落户	农 场	本 市	插队落户	农 场	本 市		
55 467	9 527	45 940	23 861	10 216	552	7 944	1 621	6 323	76 570	269 188	70 771	188 019	10 398						
13 442	8 183	5 259	12 706	7 107	421	1 193	994	199		70 533	15 125	53 748	1 660						
590			313	160	8	110													
42 025	1 344	40 681	11 155	3 109	131	6 751	627	6 124	76 510	98 655	55 646	134 271	8 738						
75.8	14.1	88.6	46.7	30.4	23.7	85	38.7	96.9				73.8	78.6	71.4			84		

八、上海市中专、技校、半工半读毕业生安排情况

1. 上海市1968、1969届中专、技校、半工半读毕业生安排情况表

毕业生人数		安排情况												尚余学生数																
		合计		上山下乡						工矿企事业																				
六八届	六九届	外		上山		下山		本市		本部		安徽(小三线)		其他各省		本市														
		其中:	上山下乡	黑龙江	江西	内蒙古	回原籍	援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农场	农林场	插队	小计	农场	投亲插队、农林场	参军	退学、死亡等	合计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小计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40 054	36 254	3 800	39 102	20 922	19 155	15 026	2 584	12 442	1 673	1 173	500	1 235	90	291	107	184	790	1 767	1 181	536	17 104	6 535	7 000	2 036	1 533	882	194	952	252	700

说明: 1. 表列人数是由乡办提供的。

2. 上山下乡人数中 1 266 人是随同各区普通中学毕业生一起出发, 19 656 人由乡办组织出发, 已分别汇总在历年上山下乡总人数内。

2. 上海市 1968、1969 届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生上山下乡情况表

人数	合 计		外 省						本 市			
	插队落户	兵团	农林场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小计	兵团	农林场	小计	安徽插队	云南兵团	回原籍投亲和零星去外省插队	海丰农场
合 计	19 656	1 706	2 880	14 093	977	15 068	2 618	12 450	1 642	1 181	461	418
1968 年	11 254	1 281	2 800	6 196	977	8 814	2 618	6 196	1 174	1 174		
1970 年	8 321		80	7 241		6 251					80	
1971 年	1 081	425		656	3		3	468	7	461	418	

说明：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生上山下乡实际人数是 20 922 人，其中 1 266 人随同各区普通中等毕业生出发，因此未统计在此表中。

3. 上海市 1970—1972 届为外地代训学徒、技工、卫生学校学生分配情况表

人 数	届 别	分 配 情 况				续 代训数
		合 计	人 数	已报到	未报到	
合 计	52 272	32 998	18 845	15 595	3 250	17.3
一、有去向代训	18 256	13 118	13 118	10 735	2 383	18.2

(续表)

人 数	届 别	合 计	分 配 情 况			本 市	继 续 代 训 数
			人 数	已 报 到	未 报 到		
其中: 陕西省	2 799	七二	2 556	2 392	164	6.4	243
贵州省	1 944	七二	1 944	1 456	488	25.1	
云南省	1 267	七二	237	193	44	18.55	1 030
○六一	3 636	七二	950	813	137	14.4	2 706
甘肃省	264	七二	264	228	36	13.5	
内蒙	967	七二	898	898	313	585	65.2
三大动力改向	1 200	七〇	1 200	1 200	1 143	57	4.7
六机部	4 019	七〇	4 019	4 019	3 167	852	21.2
交通部	1 538	七〇	1 000	1 000	980	20	2
东海舰队	602	七〇	50	50	50		552
二、无去向代训	16 976	七二	2 840	2 840	2 690	150	5.2
三、技工学校	13 575	七二	13 575	1 457	951	506	34.7
四、卫生学校	3 465	七二	3 465	1 430	1 219	211	14.75
							2 035

说明: 1. 分配情况由市劳动局提供。

2. 73、74届代训学徒、技、卫校学生未学习期满,还没进行分配。

3. 无去向代训学徒、技、卫校学生分配去外地的人数,除卫校学生分配去山东、天津、武汉、大连等地二十多人外,其他都分配在本市领导的后方基地、原料基地和国营农场。

九、其 他

1. 上海市 1966—1975 届中学毕业生人数

届 别	合 计	市 区	郊县城镇
1966	170 667	156 952	13 715
1967	234 514	212 619	21 895
1968	236 157	198 357	37 800
1969	224 518	206 935	17 683
1970	208 172	191 472	16 700
1972	234 878	216 966	17 912
1973	229 894	227 827	2 067
1974	34 258		34 258
1975	259 406	237 394	22 012
总 和	1 832 464	1 648 522	183 942
1968 年半工半读	19 656	19 656	
1969 年半工半读	1 852 120	1 668 178	

说明：1. 因学制改变，71 届改为 72 届，71 届没毕业生。

2. 市区 74 届、郊县 73 届起改变春季毕业，因此该年没毕业生。

3. 不包括农村学生毕业生人数。

2. 上海市1955—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表

3. 上海市 1955—1971 年闲散居民上山下乡情况表

	人 数	户 数	安置地区
	70 881		
1955—1956 年	20 000	4 500	江西支农垦荒
1958 年	16 000		甘肃宁夏
1961—1964 年	26 120	6 026	安徽
1969—1971 年	8 761	2 300	安徽
其中：1969 年	2 208	570	
1970 年	5 699	1 500	
1971 年	854	230	

说明：1. 1955 年和 1956 年去江西支农垦荒的闲散居民，以后有一部分人返回苏北原籍，现在江西农村的约有 6 000 多人，1 300 多户。

2. 1955 年到 1964 年上山下乡的人数由市劳动局提供。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与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本书没有把对“文革”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而是把视野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使“文革”的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本书内容详细准确，观点鲜明，在细致的传叙中，还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和评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金大陆，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从事青年运动史研究，侧重于上海红卫兵运动史、知青运动史和“文革”社会史方向，以及“文革”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主编《上海青年志》。主持《上海文革资料留存和分布情况调查研究》、《上海知青运动大事记》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在《读书》、《社会科学》、《史林》、《青年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上百篇，主要著述有《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